

吴中杰评点鲁迅书信

吴中杰 编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鲁迅 1 455 封书信中,精选出 299 通,大都是一些思想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的篇幅。有些涉及对人生道路和社会问题的看法,补充了杂文未尽之意,且更有所发挥;有些对人和事做出毫无遮掩的针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吴中杰的评点,阐明书信的写作背景,揭示其蕴含的哲理与深义,考证原信在公开发表时的改动,对读者阅读理解颇多启发。

前言

近年来,批评鲁迅的文章很多,影响亦复不少。有些人还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修理鲁迅”。“修理”是个老词,这里却是新用,意思是要彻底否定。不过我在审阅这些批评文章时,发现口气很大的诸位否定论者,其实都并没有细读鲁迅,他们大抵根据一种流行观念,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就信口开河地批评起鲁迅来了。这叫做“跟着感觉走”。如果轻信这种批评,岂非跟着感觉的感觉走?

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要独立地进行思考,就必须对材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只有独立地进行研究之后,才能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么,要准确地评价鲁迅,就必须认真地阅读鲁迅的原著。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鲁迅,去年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沿着这条思路,今年我继而评点鲁迅书信。鲁迅书信是否定论者最看不上眼的东西,他们根据流行观念,认为只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才是文学的正宗,杂文就是庶出的了,或者简直不算文学,更何况书信。他们以为私人间的通信,总是琐琐碎碎的东西,微不足道。其实这也是因为不读原作而产生的想当然耳。鲁迅的书信当然也有一些事务性的内容,但却有很多思

想价值极高的篇幅。如《两地书》第一集中的信,大都是就许广平的提问,对于人生道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补充了杂文中的未尽之意,而更有所发挥。如在“人生”长途上碰到“歧路”和“穷途”时所取的态度,对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看法,以及“壕堑战”思想的提出,等等,都很重要。在给别人的书信中,这类真知灼见也很多。如1935年10月20日致孟十还信和29日致萧军信中,在比较了中外两篇评论果戈理的不同观点的文章之后,指出中国的评论者不了解外国的实际情况,脱离了当时的具体环境,而作出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并且说:“我因此颇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应该多译点外国人做的评传,给大家看看。”这不但印证了他在《题未定草》(七)中所提出的要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批评方法,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悟到产生现今酷评家的文化渊源。有时,即使是断简残篇,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如尤炳圻在1936年8月出版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的《译者附记》中,曾引述了鲁迅给他信中的话云:“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实际评价,也可以了解他不遗余力地揭发国民劣根性的真实意图。鲁迅生前,就有人说他多说中国坏话是卖国主义,是虚无思想;鲁迅死后,还有人指责他过多地揭发中国的黑暗面是消极行为,其实,他这样做,却正是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鲁迅书信中所写,有时看似个人间的纠纷,其实却反映出一些重要的社会矛盾,或者是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如他在厦门给许广平、章廷谦诸人的信中,常道及厦门大学中的人事纠纷,其中就反

映出许多学术体制、人事机制中的弊病和急功近利领导思想所带来的危害,而这种弊病和危害,却至今尚存在于学界之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鲁迅这些隐藏在貌似个人纠纷之后的重要思想,也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又如,1935—1936年间致曹靖华、胡风、萧军、萧红、台静农、杨霁云、王冶秋、姚克诸人的信中,常谈及左翼文坛内部的矛盾,后来人们常把这一矛盾归结为“两个口号之争”,这自然也有文字上的根据,单就鲁迅而言,就发表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何况对方还有许多煌煌大论,但细读鲁迅的书信,却发现他在信中基本上不谈两个口号问题,所谈的主要是对周扬等人领导作风和个人品质的意见,说他们是工头、元帅,手执皮鞭抽打工人而自己不做工,驱赶士兵去冲锋而自己却躲在铁板后面,批评他们许多重要事情都不商量,内部刊物也不给同仁看,还常常在背后放冷箭,一有题目就拿大帽子压人,等等。而且,就时间上看,矛盾的起始和激化,都比两个口号的出现要早得多。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信息,对理解鲁迅晚年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发展,对剖析中国文坛所存在的深层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其实,他对于左翼作家联盟,从一开始,评价就不高,这可以从左联成立大会刚开过不久的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看出,信中说:他“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则建议萧军不必加入左联,说是:“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更是耐人寻味。

由于鲁迅的书信当初是并不准备发表的,因而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写得随意,不但将自己的心情表露得十分坦率,而且对于人事的批评也毫无遮掩。有的学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是在书信中却总是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

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将此等书信编入。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此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于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谰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但鲁迅却因为直言而得罪了许多人，可见他虽号称“世故老人”，其实却很纯真，正如他在《补白》中论及《鬼谷子》时所说，这本书中的一些计谋，其实是今之常态，“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从鲁迅的书信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他的认真、率直的性格来。他的许多烦恼，也是由此而来。而这种认真、率直的性格和由此引起的烦恼，当然不能为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所理解。

鲁迅的文章，一向很少改动，这是因为他总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的缘故。他的书信更是如此。但是，在《两地书》出版时，却对原信作了很多的改动，特别是第二集，即在厦门所写的一部分。除了修辞上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内容上的增删。这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人事关系，有些话在当时不便公开发表，所以删去，而有些事则需要突出，要讲得透些，故也有所增补。这样，《两地书》就有了两种版本：经鲁迅修改的公开出版本，和未经修改的手稿影印本，到底用哪一种版本来评点，却使我颇费思量。在文字上，修改本明显优于手稿本，不过用修改本来评点，则删落的许多重要内容就反映不出来，若用手稿本来评点，

虽能看到书信的原貌,但哪些内容是后来被删落的,又看不出来,如要照顾到两个方面,就得用两种版本来加以比较。所以最后决定原文仍用修改本,而在评点中对照原信,将重要的增删部分列出,使读者知道鲁迅到底删掉些什么,增加些什么,这样也许比较全面一些。如果单从修辞上着眼,来看《两地书》的修改,的确是有助于揣摩文章,学习写作技巧的。鲁迅有一篇题为《不应该那么写》的文章,就建议有志于创作的青年,可以从大作家的未定稿中去学习,亦即从不应该那么写中去学习应该怎么写。但我的评点,重点不在于此,所以有关修辞上的改动,大都略而不论,却着重将内容上的增删点出来,使读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看法和修改时的考虑。这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态会有些好处。

现在有些人喜欢对鲁迅进行心理分析,这自然比仰着头看鲁迅要好些,但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鲁迅的实际情况,只拿外国心理学的条条框框来硬套,或者以今例古,凭“想当然耳”来推论,那是无法作出确切的评价的。阅读鲁迅书信,倒是可以具体而微地体察到鲁迅的思想和心态,对于理解鲁迅和评价他的作品,都很有好处。

2001-12-30 于沪上木石斋

目 录

前言.....	1
---------	---

上 册

1904 年	1
041008 致蒋抑卮.....	2
1910 年	5
101115 致许寿裳.....	6
1911 年	8
110307 致许寿裳.....	9
110412 致许寿裳	11
1918 年	13
180310 致许寿裳	14

180705	致钱玄同	16
180820	致许寿裳	18
1919 年		21
190116	致许寿裳	22
1920 年		25
200115	致胡适	26
200504	致宋崇义	28
201214	致青木正儿	31
1921 年		33
210103	致胡适	34
210826	致宫竹心	36
210908	致周作人	38
1922 年		40
220814	致胡适	41
220821	致胡适	43
1923 年		45
230108	致蔡元培	46
230612	致孙伏园	48
231210	致许寿裳	50
1924 年		52
240105	致胡适	53
240526	致李秉中	55

240924	致李秉中	57
1925 年		60
250311	致许广平	61
250315	致梁绳祎	66
250318	致许广平	69
250323	致许广平	73
250331	致许广平	76
250408	致许广平	81
250411	致赵其文	84
250414	致许广平	86
250503	致许广平	90
250518	致许广平	93
250530	致许广平	96
250613	致许广平	99
250628	致许广平.....	103
250713	致许广平.....	105
250729	致许广平.....	107
250823	致台静农.....	110
1926 年		112
260409	致章廷谦.....	113
260617	致李秉中.....	115
260815	致许广平.....	118
260912	致许广平.....	120
260920	致许广平.....	124
260925	致许广平.....	127
260928	致许广平.....	131

261004	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136
261010	致许广平·····	138
261016	致许广平·····	142
261020	致许广平·····	145
261021	致许广平·····	150
261023	致章廷谦·····	156
261028	致许广平·····	159
261029	致陶元庆·····	164
261101	致许广平·····	166
261103	致许广平·····	169
261106	致许广平·····	173
261115	致许广平·····	178
261118	致许广平·····	182
261120	致许广平·····	186
261121	致章廷谦·····	190
261128	致许广平·····	193
261205	致韦素园·····	197
261214	致许广平·····	201

1927 年 ····· 207

270106	致许广平·····	208
270111	致许广平·····	211
270225	致章廷谦·····	216
270420	致李霁野·····	219
270426	致孙伏园·····	222
270530	致章廷谦·····	224
270612	致章廷谦·····	226
270728	致章廷谦·····	230

270817	致章廷谦	235
270919	致翟永坤	238
270919	致章廷谦	240
270925	致台静农	242
271021	致廖立峨	245
271120	致江绍原	247
271206	致李小峰	250
271206	致蔡元培	252
271226	致章廷谦	254
1928 年		256
280530	致章廷谦	257
280722	致韦素园	259
1929 年		261
290106	致章廷谦	262
290315	致章廷谦	265
290322	致韦素园	268
290407	致韦素园	271
290526	致许广平	273
290529	致许广平	276
290601	致许广平	279
290817	致章廷谦	283
291108	致章廷谦	285
1930 年		287
300222	致章廷谦	288
300321	致章廷谦	291

300327	致章廷谦	294
300920	致曹靖华	297
301013	致王乔南	300
301206	致孙用	302
1931 年		304
310121	致许寿裳	305
310202	致韦素园	306
310204	致李秉中	308
310205	致荆有麟	310
310218	致李秉中	312
1932 年		314
320116	致增田涉	315
320222	致许寿裳	318
320302	致许寿裳	320
320315	致许寿裳	322
320320	致母亲	324
320322	致许寿裳	326
320413	致内山完造	328
320513	致增田涉	330
320605	致台静农	332
320618	致台静农	334
320624	致曹靖华	337
320801	致许寿裳	339
320815	致台静农	341
320817	致许寿裳	343
320911	致萧三	345

321103	致许寿裳·····	347
321120	致许广平·····	349
321123	致许广平·····	351

下 册

1933 年	353
---------------------	------------

330102	致李小峰·····	354
330201	致张天翼·····	357
330205	致郑振铎·····	359
330206	致赵家璧·····	361
330209	致曹靖华·····	363
330413	致李小峰·····	366
330504	致黎烈文·····	369
330510	致王志之·····	371
330525	致周茨石·····	373
330527	致黎烈文·····	375
330603	致曹聚仁·····	377
330618	致曹聚仁·····	379
330620	致林语堂·····	383
330620	致榴花社·····	385
330625	致山本初枝·····	387
330626	致王志之·····	389
330708	致黎烈文·····	391
330711	致曹聚仁·····	393
330711	致山本初枝·····	395
330714	致黎烈文·····	397

330813	致董永舒·····	399
330929	致山本初枝·····	401
331002	致郑振铎·····	403
331021	致郑振铎·····	405
331031	致曹靖华·····	407
331105	致姚克·····	409
331115	致姚克·····	413
331219	致何白涛·····	416
331219	致姚克·····	418
331220	致徐懋庸·····	420
331227	致台静农·····	424
1934 年	·····	426
340111	致郑振铎·····	427
340111	致山本初枝·····	430
340117	致萧三·····	433
340127	致山本初枝·····	436
340209	致郑振铎·····	438
340211	致姚克·····	440
340215	致台静农·····	443
340220	致姚克·····	445
340304	致黎烈文·····	447
340306	致姚克·····	449
340315	致姚克·····	452
340324	致姚克·····	453
340328	致陈烟桥·····	455
340401	致陶亢德·····	457
340409	致姚克·····	459

340409	致魏猛克·····	461
340411	致增田涉·····	464
340412	致姚克·····	466
340415	致林语堂·····	469
340419	致陈烟桥·····	471
340422	致姚克·····	474
340424	致杨霁云·····	476
340430	致曹聚仁·····	478
340506	致杨霁云·····	480
340515	致杨霁云·····	483
340516	致郑振铎·····	486
340522	致杨霁云·····	489
340602	致郑振铎·····	492
340603	致杨霁云·····	496
340609	致曹聚仁·····	499
340621	致徐懋庸·····	501
340621	致郑振铎·····	503
340727	致唐弢·····	506
340813	致曹聚仁·····	508
341009	致萧军·····	511
341013	致合众书店·····	513
341101	致窦隐夫·····	514
341117	致萧军、萧红 ·····	516
341118	致母亲·····	519
341206	致孟十还·····	521
341206	致萧军、萧红 ·····	523
341210	致萧军、萧红 ·····	527
341216	致杨霁云·····	530

341218	致杨霁云·····	533
341220	致萧军、萧红 ·····	535
341225	致赵家璧·····	537
341226	致萧军、萧红 ·····	539
341231	致刘炜明·····	541
1935 年	·····	543
350104	致萧军、萧红 ·····	544
350106	致曹靖华·····	548
350108	致郑振铎·····	550
350109	致郑振铎·····	554
350115	致曹靖华·····	556
350117	致曹聚仁·····	558
350126	致曹靖华·····	560
350129	致杨霁云·····	563
350129	致萧军、萧红 ·····	565
350204	致杨霁云·····	568
350204	致李桦·····	570
350206	致增田涉·····	572
350207	致曹靖华·····	574
350209	致萧军、萧红 ·····	577
350224	致杨霁云·····	580
350313	致萧军、萧红 ·····	582
350319	致萧军·····	585
350323	致曹靖华·····	587
350409	致山本初枝·····	589
350409	致增田涉·····	591
350410	致曹聚仁·····	593

350412	致萧军.....	596
350423	致萧军、萧红	599
350428	致萧军.....	601
350514	致台静农.....	603
350517	致胡风.....	605
350522	致曹靖华.....	607
350522	致孟十还.....	609
350610	致增田涉.....	611
350616	致李桦.....	613
350624	致曹靖华.....	617
350627	致萧军.....	619
350628	致胡风.....	622
350629	致赖少麒.....	625
350629	致唐英伟.....	627
350801	致增田涉.....	629
350824	致萧军.....	631
350911	致郑振铎.....	634
350912	致胡风.....	636
350920	致蔡斐君.....	639
351004	致萧军.....	641
351009	致黎烈文.....	644
351017	致郑振铎.....	646
351020	致孟十还.....	648
351022	致曹靖华.....	650
351029	致萧军.....	652
351105	致王冶秋.....	654
351115	致台静农.....	656
351116	致萧军、萧红	658

351125	致叶紫·····	660
351204	致王冶秋·····	662
351219	致杨霁云·····	664
1936 年	·····	666
360105	致曹靖华·····	667
360107	致徐懋庸·····	669
360108	致母亲·····	671
360121	致母亲·····	673
360201	致黎烈文·····	675
360203	致增田涉·····	677
360210	致曹靖华·····	679
360210	致黄莘荪·····	681
360217	致郑野夫·····	683
360219	致夏传经·····	685
360221	致曹聚仁·····	687
360221	致徐懋庸·····	689
360229	致杨霁云·····	691
360318	致欧阳山、草明 ·····	693
360326	致曹白·····	695
360328	致增田涉·····	697
360401	致母亲·····	699
360401	致曹靖华·····	701
360401	致曹白·····	703
360402	致杜和銓、陈佩骥 ·····	705
360402	致颜黎民·····	707
360405	致王冶秋·····	710
360413	致楼炜春·····	712

360415	致颜黎民.....	714
360423	致曹靖华.....	717
360424	致何家槐.....	719
360502	致徐懋庸.....	721
360503	致曹靖华.....	723
360504	致曹白.....	726
360504	致王冶秋.....	728
360508	致曹白.....	730
360508	致李霁野.....	732
360515	致曹靖华.....	734
360522	致唐弢.....	736
360523	致曹靖华.....	738
360525	致时玳.....	740
360706	致母亲.....	743
360707	致赵家璧.....	745
360711	致王冶秋.....	747
360828	致杨霁云.....	749
360903	致母亲.....	752
360903	致沈雁冰.....	754
360908	致叶紫.....	756
360915	致王冶秋.....	758
360925	致许寿裳.....	760
361015	致曹白.....	762
361015	致台静农.....	764
361018	致内山完造.....	766
后记.....		767

1904 年

041008 致蒋抑卮

拜启者：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厘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_円。人晔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讎，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讎。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

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啖，健饭如恒，差足自喜。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時計，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铄。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兄之耳谅已全愈，殊念。秋气萧萧，至祈摄卫，倘有余晷，乞时赐教言，幸甚，幸甚。临楮草草，不尽所言，容后续上。此颂
抑卮长兄大人进步。

弟 树人 言八月二十九日

再，如来函，可寄“日本陆前国仙台市土樋百五十四番地宫川方”为要。

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评点】

这是迄今为止搜集到的鲁迅最早的书信。收信人蒋抑卮在1902—1904年留学日本，是鲁迅早年关系较密的朋友，他参加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并经营广昌隆绸缎号，后曾资助鲁迅周作人兄弟印行《域外小说集》，并代为在自己的店铺里销售。

此时鲁迅刚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不久，信中多写仙台生活情景及校中状况，可与《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篇参读。鲁迅

是看厌了东京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所作所为，而特地跑到仙台这个偏僻地方来的，此处虽然还没有其他中国留学生，“离中国主人翁颇遥”，但所恨仍有怪事奇闻通过报纸传来，“以触我目”，联想到刚读过的《黑奴吁天录》中所写的美国黑奴的状况，不禁为故国的前途感叹。而仙台的生活也并不如意，虽然学校优待这位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不收学费，但食宿条件则大劣，“人哐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这使他怀念起在东京的住处了。

对于校方拒收学费一事，鲁迅表现得极为自然。“彼既不收，我亦不逊”，当日就买了块怀表来用。较之后来那些在日本支付了劳动，而拒不接受报酬，以示“大国风度”或发扬“高尚风格”者，鲁迅的处事要切实得多了。

而使鲁迅感触尤深的，则是以高贵人种自居的日本同学的言行，虽然他来此还只有一个月，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敏感到这一点。果然，后来终于酿成了《藤野先生》中所记载的那封匿名信事件。这大概也是促使鲁迅学业未竟即提早离开仙台的原因之一吧。而鲁迅与这些日本同学略一接触，就感到他们的思想行为决不居我们中国青年之上，乐观的思之，也就觉得中国当不会灭亡了。

使鲁迅感到不舒服的另一点，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功课安排与学习方法。刚入学的一年级生，功课就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和德语种种，“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而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拉丁文，德语则必须每日暗记，弄得脑力顿疲，不胜负担。所以鲁迅感叹道：“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辄。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其实，这种情况不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如此，几乎所有学校概莫能外。鲁迅从受教者的实际感受出发，提出问题，这是需要办教育者深思，应该切实改正的。

1910 年

101115 致许寿裳

季黻君监：不审何日曾获手书，娄欲作答而忘居址，逮邵明之归，乃始询得。顾校中又复有事，不遑暇矣。今兹略闲，率写数语。君之近状，闻诸邵蔡两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正长，希冀在是。译学馆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犹南方不？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自子英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状犹前，来书常存问及君，又译 Jokai 所为小说，约已及半。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欲言者似多，而欲写则又无有，故止于此，容后更谭。倘有暇，甚望与我简毕。

弟 树 顿首 十月十四日

【评点】

受信人许寿裳是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回国之初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同事，后来又继续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共事，两人相互支持，共同进退，成为终生好友。

此时两人均已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鲁迅回到了绍兴，没有适当的去处，遂应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杜海生之邀，暂时在该校任博物学教员，后又兼任监学。但校事并不太平，这里所说的考试风潮，即是校内矛盾的反映。而鲁迅的心情也是矛盾的：作为教员，他需要支持校方整肃校纪；而内心里，却又很同情受斥的学生，认为“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惻然”。鲁迅这种设身处地为受斥者着想的态度，很值得为师长者借鉴。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正如鲁迅在另一封信中所说：“闻北方土地多_潯淖，而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他很想离开府校，而又无处可去，所以心情很苦闷。虽然仍旧采集植物标本，而且还在汇集古代逸书，但并非做学问，只不过消遣而已，“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1911 年

110307 致许寿裳

季黻君监：得手书如见故人，甚以为喜。复知去年所奉书不达左右，则颇恨邮局，彼辈坚目人，不知置仆书于何地矣。师范收入意当菲薄，然教习却不可不为，对付今人只得如此对付古人或亦只得如此。燮和之事已定否？倘与相见，希为言，仆颇念之。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拟即献诸善人，事一成当即作为代付刊资也。绍兴府校教员，今年颇聘得数人，刘楫先亦在是，杭州师校学生则有祝颖，沈养之，薛丛青，叶联芳，是数人于学术颇可以立，然大氏憧憧往来吴越间，不识何作。今遂无一存者，仅余俞乾三，宋琳二子，以今年来未播迁耳。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侏南善扬人短与在东京时大不同矣，君若与书札往来，宜留意。此事似已奉闻，或尚未，均已忘却，故更以告。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敬承
曼福。

周树人 上二月初七日

【评点】

这封信反映了鲁迅家庭经济的窘境。当时，他们已入不敷出，靠变卖田产来过日子了，所得之钱亦早已用完，而已在日本娶妻的周作人（起孟），则需要家里供应，而他全不顾及这种窘况，还想继续留在日本，说是要“略习法文”。可见周作人是缺乏家庭责任感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好催他赶快回来，“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毕竟生活问题最要紧。当然，作为读书人，要是前两年说出这种话来，当自己谴责自己，但现实情况如此，使他不得不这样处理，他自己也觉得可悯叹者也。

因为许寿裳也是绍兴人，所以信中常有绍兴方言。这里所说的“坚目人”，上信所说的“厥目之坚”，以及给其他绍兴同乡信中之“硬眼”、“眼睛石硬”，均是有眼无珠、不识好歹、目中无人之意。

110412 致许寿裳

季黻君监：得三月二日手毕，发读忻慰。月入八十，居北京自不易易，倘别有兼事，斯有济耳。协和自睽隔后，仅来一书，言离甚病，并令赉译质学，义不可却，已寄两帖，而信息遂杳，今乃知已移入陆军小学，大可欢喜。此不特面朱可退，即其旋行之疾，亦必已矣。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诸嵎为甚，山会则颇坦然，此殆气禀有别。希冀既亡，居此何事。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此事了后，当在夏杪，比秋恐又家食，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小学答问》刊资已寄去，计十五圆，与仆相等，闻板已刻成，然方寄日本自校，故未印墨。此款今可不必见还，近方售尽土地，尚有数文在手。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法豪将为我师矣。迺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时欲入夏，幸力自摄。

仆 树 上三月十四日

并希时通消息，信可寄舍间或绍城塔子桥僧立小学堂周乔峰。

【评点】

家里的田地已经卖完，将来的生活如何维持，念之足以寒心，也只好不去深思了。“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要师法那位好睡的老同学，亦自嘲也。信中虽托许寿裳代觅工作，但毕竟是没有把握之事，而周作人却还滞留日本不归。看来，写信去催他回来，并不生效，所以鲁迅决定自己到日本走一趟，要周作人马上跟他一起回国。果然，鲁迅不久即有日本之行。这也更可见出周作人的自私心理了。

但书生毕竟是书生，尽管家道窘困如此，而仍不能忘情于文化事业。信中所说代付《小学答问》刊资，这是他们当年听讲的同学集资为老师章太炎刊印讲义；还拟立社集资刊印越中先贤著述，所立之社，就是“越社”，出版有《越社丛刊》。后来，鲁迅辑印《会稽群故书杂集》等书，就是这一工作的继续。他明知这是“蚊子负山之业”，但因其与社会有益，故仍勉力而行。

1918 年

180310 致许寿裳

季市君足下：数日前蒙书，谨悉。《文牍汇编》第三，今无其书，亦无付印朕兆。所物色之人，条件大难，何可便得，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糊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子英通信处是大路俊诚陞记箔庄转交，陈君尚无事。所需书目，起孟写出三种如别纸，惟其价目，今或因战事已稍增。又第三种较深，今之学生，虑未能读，可以从缓。《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日前在《时报》见所演说，甚所赞成，但今之同胞，恐未必能解。^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羨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暇清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专此并颂曼福。

^仆周树人 顿首三月十日

【评点】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到教育部任职。后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于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袁将政府迁至北京，鲁迅也随教育部来到北京。他在这里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军阀混战等事件，看来看去看得怀疑起来，对中国的前途甚为忧虑。此时，许寿裳外放江西省做教育厅长，亟思有所改革，时常写信请教鲁迅。前信曾询及改革方案，鲁迅以为改革尚非其时，他的回答极为实际：“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可见鲁迅并非唱高调之人。后信又请鲁迅推荐思路明晰之文牍人员，鲁迅也觉得条件大难。盖因当时政治昏暗，庸才塞途，故回信说：“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胡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这虽似笑话，其实倒是实情。

正因为当时政治不清明，所以社会上迷信盛行。上海有一班人设坛扶乩，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杂志》，还说能为灵魂摄影，登报大事张扬。鲁迅信中所说“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乱”，即指此而言。“人事不修，群趋鬼道”，这真是亡国之兆啊！可见当时《新青年》同仁提倡民主、科学，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本信可与《随感录三十三》参读。在这篇随感录中，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这也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性。

180705 致钱玄同

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起孟说过想译一篇小说、篇幅是狠短的、可是现在还未寄来。大约一到家里、内政外交、种种庶务、总须几天才完、渺无消息、也不足奇、想来廿日以内、总可以译好的。至于敝人的一篇、却恐怕有点靠不住、因为敝人嘴里要做的东西、向来狠多、然而从来未尝动手、照例类推、未免不做的点、在六十分以上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鲁迅 七月五日

【评点】

钱玄同是鲁迅在日本东京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时的老同学，此时又是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的组稿人，两人参加新文化运动虽然有先后，但对旧文化的态度都很决绝。鲁迅在信中抨击国粹派，言辞甚为激烈，这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性，也表现出他当时与钱玄同有着许多共同语言。信中着重攻击的是刘师培。说他“卖过人肉”，是指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曾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过革命党人。此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又参与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效劳，在人品上很不足道。所谓“侦心探龙”者，是仿南朝梁代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的书名而来。盖刘师培以研究六朝文学著称，而他又为端方做过侦探，所以有这样的刺语。而国粹派却要推这样的人出来作为国粹丛编的主持人（祭酒），与新文化阵营相对垒，怎么能不教人刮目相看呢？鲁迅与钱玄同因师从章太炎，对当初曾受章太炎重用的刘师培是深有了了解的，许多事他们都亲身经历过来，所以对此格外愤怒。

但刘师培毕竟是有学问之人，对此鲁迅并不否认。鲁迅虽鄙薄刘师培之为人，也反对他与新文化相敌对的态度，但对于他的学术成就还是尊重的。后来在广州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演讲时，鲁迅还特地向听众介绍刘师培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其尊重的态度。他在书信中向后学者介绍这方面资料时，也推荐过刘师培的这本书。可见鲁迅是将学术成就与文化取向加以区别对待的。人们往往以为鲁迅反对复古主义，抨击国粹派，就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抹煞前人的学术成就，这无疑是一种误解。

180820 致许寿裳

季市君足下：早蒙书，卒卒不即复。记前函曾询部中《最新法令汇编》，当时问之雷川，乃云无有。前答未及，今特先陈。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等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覃孝方之辞职，闻因为一校长所打，其所以打之者，则意在排斥外省人而代以本省人。然目的仅达其半，故覃去而X至，可谓去虎进狗矣。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工バ之健将牛献周金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

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此布，即颂曼福。

仆 树人 顿首八月廿日

【评点】

朋友之妻去世，一般人总是哀辞慰问，而鲁迅则不然。他在6月19日信中说：“吊慰悉属肤辞，故不欲以陈言相闻。度在明达，当早识聚离生死之故，不俟解于人言也。惟经理孺子，首是要事，不知将何以善其后也？”他所担心的是孩子的抚养问题。而在这封信里，则进一步发挥他的见解云：“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以此种话语来慰问失却妻子的朋友，看似不经，而实则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见解很深刻。许寿裳与鲁迅毕竟是多年相知的老友，的确也很能理解他的话。后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提及此事时说：“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语。”多年之后，鲁迅遇到另一件事，有所感触，很想把这一见解写成文章。他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到

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子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大概此时与黎烈文尚不熟悉，还不便于说这样的话吧。文章虽然终于没有做，但也可见他所持见解是一贯的，态度是认真的。

信中提到关于《狂人日记》等几句话，对于我们理解这篇作品和透视中国历史均很有帮助。“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虽然“近颇广行”，但深入研究者毕竟太少。应该研究的，不仅是道教本身的历史，而且还应侧重在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关系。鲁迅所说的中国巫风很盛，周作人批评的萨满思想，都与此有关。鲁迅以此读史，终于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狂人日记》即依据这种读史心得写成。所以《狂人日记》决非简单地模仿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而具有深厚的民族性，比果戈理的作品更为忧愤深广。鲁迅还将这种见解写入他的杂文，《灯下漫笔》里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对于中国人的价值的评估，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可以与《狂人日记》相参证。

信中所说教育部中种种怪事，实在令人感叹。鲁迅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这并非他感到中国已有了希望，而是在思想上打破了国界，以人类为着眼点，则无论中国之改良或者灭亡，都说明人类之进步也。此种思想，在为《新青年》所写的《随感录》中，亦时有表现。如《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灭绝，毫不客气”，即是这层意思的发挥。但鲁迅仍不愿看到中国人走向灭绝的路上，所以很是着急。他常有愤激之言者，即为此之故也。

1919 年

190116 致许寿裳

季市君足下：日前蒙书，谨悉。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起孟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大学之《模范文选》，本系油印，近闻已付排印，俟成后奉寄，不必得模胡之旧印矣。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

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闻夔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夔和于何处得来，或工八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ライブチヒ亦往往如此。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啧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哂耳。顷在部作此笺答，而惠书在寓中，故所答或有未尽，请恕为幸。专此，敬颂曼福。

仆 树 顿首一月十六日

《新潮》第一册顷已寄出，并闻。同日

【评点】

“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自然是文化革命者愤激之言。“汉字终当废去”，则是文字改革者的共同见解。钱玄同欲以罗马字取代，以及后来之试行拉丁化拼音，都是此种思路的实践。但一种民族文字一旦形成，而且有了像汉字这样悠久的历史，即使有多么严重的缺点，要废除恐亦不大容易。汉字自然要改革，但文字改革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先驱者的种种改革主张和尝试，即使并不正确，或者未必行得通，但仍是有益的。这便是鲁迅在论及文字改革时所说的“渡河与引路”。只有不改不动，这才是全盘皆错。

对于青少年教育，鲁迅主张“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这很重要。因为死记硬背许多文章，于将来未必有用，而“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都能适应。他后来在《青年必读书》中，主张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

书”者，即为此。因为他认为中国书易于使人消沉，而外国书能使青年思想活跃也。自然，少读中国书，于作文是不利的，但鲁迅的主张是以做人为上，“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不必纠缠在一些具体说法上，倒应该注意于这些文句后面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其实，鲁迅这种教育思想，是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忙于应付考试而忽视思想自由，不正是当前教育界的通病吗？

信中还提到他们家族的矛盾，迫使他“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鲁迅终于在本年12月4日回到绍兴，画押售去老屋，并于24日奉母并偕三弟及眷属离开绍兴，全家移至北京居住。

还有几个隐语，需略作说明：

女官首领。系指傅增湘，因与太平天国东王府女官首领傅善祥的姓名读音相近，故戏称之。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鲁迅对他颇有非议。

エバ。日语：夏娃，系指夏曾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对他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甚为推崇，而对他的为官之道，却颇不以为然。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对傅增湘、夏曾佑这两位顶头上司都曾议及。

ライブチヒ。日语：莱比锡，系指蔡元培。因蔡元培曾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学习。

1920 年

200115 致胡适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留。与其存《礼！》，不如留《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树 一月十五夜

【评点】

胡适是中国现代白话诗的最早尝试者，他于1920年将这些新诗汇集出版，即名为《尝试集》。因为处于尝试阶段，难免还保留有旧体诗的痕迹。他是逐步摆脱旧意境、旧格式的，所以自称为缠过脚而后解放，鞋样是一年放大一年。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编选时，就有点难以把握，于是向朋友发信征求意见。鲁迅与他当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很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并不如后人所想像的那样一开始就很对立，所以在收信之后，就很诚恳地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倘能对照原诗阅读，甚可体会鲁迅的艺术见解。而从“《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一句，则可见出鲁迅对于应酬之作的厌恶。中国的旧式文人，特多应酬的诗文，鲁迅不希望新文人沾染此风，他自己的诗文，甚至书信，都是直抒己见，写得很认真的。

200504 致宋崇义

知方同学兄足下：

日前蒙惠书，祇悉种种。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来，曾一返越中，往来匆匆，在杭在越之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犹以为憾！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主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南方学校现象，较此间似尤奇诡，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北京尚无此举，惟高等工业抬出校长，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无校长提倡，故学生亦不发起；若有如姜校长之办法，则现象当亦相同。世之论客，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

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此布，敬颂曼福！

仆 树 顿首五月四日

【评点】

受信人宋崇义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本信写得甚为坦率，道出了鲁迅对于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想法，其评价并不如后来史家们所说的那么高。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只不过是一时之现象，“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因而将学生称为志士是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对于新文化运动，鲁迅认为它能推进改革是好的，但对提倡者之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因而产生的流弊，却也应该有所辨识，不过这不是新思潮本身的责任。特别是他指出“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将来会弄得不可收拾，这是很有洞察力的。可惜后来研究五四运动以后之现代史者，对于鲁迅此信，都未曾引起注意。

对于俄国思潮能否传染中国的看法，可参阅收在《热风》里的两篇随感录：《“来了”》和《“圣武”》。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说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因此他认为，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而非俄国式之乱也。在鲁迅看来，旧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但转变之后，也不是新学家之所谓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鲁迅的这一见解，是很值得重视的。

另外，鲁迅认为爱国活动要有学问根柢，这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重要见解。

201214 致青木正儿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中国学》亦已收到，甚感。

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用词、造句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

我用这么拙劣的日文给你写信，请原谅。

青木正儿先生

周树人 十一〔十二〕月十四日

【评点】

青木正儿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著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思想史》等书，并编辑《支那学》（即《中国学》）杂志。鲁迅给他的这封信，表示了对自己小说的看法，也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学作出评估。他说他的小说是为冲破本国隆冬似的寂寞而写的，作品“极为幼稚”，今后能否写好，也还难说。而整个文学艺术界，也只是略吐新芽，能否成长，殊不可知。白话文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律。这虽属谦逊之辞，但仍反映了他的真实看法。鲁迅不是那种目光短浅，自我感觉极好的人，他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所以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后来他在《写在〈坟〉后面》里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这是极其确切的看法。后来有些人将鲁迅的作品奉为目标、范本，而另一些人也就以目标和范本为标尺来要求鲁迅，从而加以攻击，这实在是异曲同工，都与鲁迅原意背道而驰。

1921 年

210103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树 一月三日

【评点】

《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文化评论刊物，随着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教书，编辑部也移到了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同仁杂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又由陈独秀带回上海编辑，成为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胡适不赞成《新青年》的政治色彩，说它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要求转变方向。他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先给鲁迅、周作人等北京同人传阅，征求意见。此信提出了三个方案：“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鲁迅立即回信，转达了周作人的意见，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过去一些研究者常把鲁迅的复信说成是他与胡适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材料，但信中说得很明显，鲁迅认为三个办法都可以，而更倾向于第二个办法。这说明，当时鲁迅与胡适还有着共同语言的，即他们此时都愿意致力于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工作，而不欲介入政治斗争。这其实并不奇怪。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人，阅历丰富，见事分明，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从他与友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早就觉得自己不适宜于搞政治活动的。而且他还认为思想革命要比政治制度的变革更为重要，如果思想不改革，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都是不行的。所以他把改造国民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全力以赴地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故而在复信中有此一议，并不奇怪。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但并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人物，他身上的许多政治色彩，是后人涂抹上去的。

21082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

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 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誉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做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再先生报考师范，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统称癆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

《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

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 八月廿六日

【评点】

宫竹心当时是爱好文学的青年职员,慕名写信向周作人求教,其时周作人因患肋膜炎住在西山疗养,由鲁迅代为复信,于是他们就直接通起信来。宫竹心曾问起鲁迅其人,但鲁迅并未告知就是自己,故信中署名用的是本名周树人。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是何等热情地予以帮助,而且说的话都非常的实在。后来,宫竹心以白羽的笔名写武侠小说,成为有名的通俗文学作家。

210908 致周作人

二弟览：

イバネツ的生年，《小说月报》中亦无，且并“五十余岁”之说而无之。此公大寿，盖尚未为史家所知，跋中已改为“现年五十余岁”矣。

查字附上，其中一个无着，岂拉丁乎？至于 Tuleries 则系我脱落一 i 字，其为“瓦窑”无疑也。

光典信附上，因为信面上还有“如在西山赶紧转寄”等等急煞活煞的话。现代少年胜手而且我^{ママ}笨，真令人闭口也。署签“断乎不可”！

我看你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前回的《炭画》生硬，其实不必接他，从新起头亦可也。

孙公已到矣。

我十一本想上山，而是日早上须在
圣庙敬谨执事，所以大约不能上山矣。

余后谈。

兄 树上九月八日夜

【评点】

鲁迅早年与二弟周作人通信最多,但保存下来的,主要就是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的几封。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作为兄长,是如何尽力照顾弟弟的。从筹措养病费用、输送日常用品、上山探望病人、打听节赏规矩,到代为请假、代为复信、代为处理稿件,等等,真是无微不至。这里所选的一封,是与周作人讨论译稿问题的,从中可见鲁迅对于周作人在写作上的帮助。

1922 年

220814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倘能买得《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明重刻李邕《娑罗树碑》，原本系射阳山人所藏，其诗又有买得油渍云林画竹题，似此君亦颇好擦骨董者也。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树 上八月十四日

【评点】

当时鲁迅和胡适都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鲁迅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后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则从事古代小说名著的考证工作。从这封信和 8 月 21 日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是如何互相交换材料,交流心得的。

220821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

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现在大稿亦奉还，李伯元八字已钞在上方。

《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

《纳书楹曲谱》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一作巫枝祗，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

《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

树人 上八月二十一日

【评点】

这封信除继续与胡适交流古典小说研究心得外，还对胡适所作的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了意见。其中有两点意见很值得重视：

一是说“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这见解可为那些热衷于拼凑理论体系的空头理论家们照鉴。理论总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历史经验作基础的理论，只能是空头理论，实际上并无多大价值。

二是说“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这就是说，写历史应看大格局，不以小数目来入账。白话文是从《新青年》提倡以后，才走上康庄大道的，故应以此为大关键。以前虽亦有文豪以白话入诗者，却只类似于用“僻典”，并非正式用白话写作，应该有所区别。这是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

1923 年

230108 致 蔡 元 培

子民先生左右：谨启者，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今附上三枚：

一 南武阳功曹乡嗇夫文学掾平邑□郎东阙画像 南阙有记云章和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山东费县平邑集。 此象颇清楚，然亦有一人抱之，左右有朱鸟玄武。

（未摹）

二 嘉祥残画像 旧为城内轩辕氏所藏，今未详所在。象已漫漶，亦有一人持之。

三 未知出处画像 从山东来。 此象甚特别，似二人在树下，以尾相缠，惜一人已泐。

周树人 启上一月八日

【评点】

这是与蔡元培讨论美术问题的信件。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欲陶冶人们的心灵，他在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时，曾将美育列入国民教育的内容，很得鲁迅的支持，鲁迅还在教育部举办的夏

期讲演会上讲述《美术论略》。后蔡元培因不满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辞去教育总长职,美育随即被取消,鲁迅在日记中怒斥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1913年,鲁迅还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对传播、发展美术事业提出了具体意见,但并不见效。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又在校内推行美育,成立了“乐理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艺术团体,而鲁迅则长期收集汉石刻画像拓片等,后期又提倡版画,一直热心于美术事业,所以两人在这方面很有共同语言。

230612 致 孙 伏 园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

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迅 六月十二日

【评点】

中国人喜欢“遮丑”，明知是丑恶的东西，却总想遮盖起来，不让人看见。“为贤者讳”、“家丑不可外扬”等说法，都是这种“遮丑”思想的反映。但把各种丑陋思想或糊涂观念遮盖起来，其实并无好处。正如鲁迅所说的：“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将丑恶的东西揭露出来，使大家有所认识，这样才能加以克服，取得前进。

信中关于布袋和尚的比喻极妙，的确大可师法。但该和尚的大布袋中所有的无非是些零碎之物，所以他遇人即倒出来请看，如果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否还肯倒出来呢？

231210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前见《校刊》，知兄已递辞呈，又患失眠，此信本该不作，然实无奈，故写此以待，因闻诗荃兄言兄当以明日到京也。

此次教部裁员，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仅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而平时则杳然，如此，则天下事可知也。复次之胡闹，当在附属机关，弟因此颇为子佩忧，现在年数劳绩皆不论，更有何可说。前闻女师校有管注册者已去，而位尚虚，殊欲切为子佩谋之，但不知兄在辞中，尚可为不？尚可，并且无他窒碍，则专以此为托也。

附上讲稿一卷，明已完，此后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付排印，下卷则起草将完，拟以明年二月间出。此初稿颇有误，本可不复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者日内可装成，其时寄上。

弟 树人 上十二月十日夜

【评点】

这是一封为昔日学生求职的信，而信中关于教育部裁员情况的描述，极可注意。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而平时杳然，只在发薪时露面者反而留之。可见当时的用人标准，不看业绩，只凭关系，所以鲁迅屡言部中衙门乌烟瘴气也。

1924 年

240105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两天得到 手教并《水浒两种序》。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价了。

《西游补》送上，是《说库》中的，不知道此外有无较好的刻本。

自从《海上繁华梦》出而《海上花》遂名声顿落，其实《繁华梦》之度量技术，去《海上花》远甚。此书大有重印之价值，不知亚东书局有意于此否？我前所见，是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上有吴友如派之绘画，惜现在不可复得矣。

迅 上一月五日

【评点】

当时，亚东图书馆常出版一些汪原放标点、胡适作序的古典小说，胡适将他的古典小说研究心得通过序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对

于胡适的序文，鲁迅是加以肯定的。这里，他还推荐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给亚东图书馆出版，以助成其事。

信中说《海上繁华梦》在度量技术上远不如《海上花列传》，而出后却使《海上花》名声顿落，可见读书界亦以不识货者居多。而此种情况又决非个别现象，这就需要有眼光的批评家出来说话。鲁迅推荐重印《海上花》，大概亦有重新评价之意吧。

240526 致李秉中

庸倩兄：

今天得来信，俱悉。

《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近又托孙伏园面问，未遇，乃写信问，仍无复，则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秘魔崖修道，抑仍在北京著书，皆不可知。来信令我作书再催并介绍，今写则写矣，附上，但即令见面，恐其不得要领，仍与未见无异，“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谓也。况我又不善简牍，不能作宛转动听之言哉。

至于款项，倘其借之他人，则函牒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终于不得要领，必与卖稿无异，昔所经验，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较为可靠，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

但如 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

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树人 五月二十六日之夜

【评点】

《边雪鸿泥记》是北大学生李秉中求其代售之文稿，鲁迅认为此稿于商务印书馆较合适，而胡适与商务馆关系较密，故写了几封信托胡适介绍。鲁迅是不大肯求人的，特别是对于名流，但为学生计，仍勉为其难。当时鲁迅自己的经济也很拮据，但为了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他仍挤出钱来给予帮助。后于10月20日信中，又谈及经济支援之事：“我近来至于不能转动，明日还想去一设法，但希望仍必极少，因为凡和我熟识可以通融之人，其景况总与我差不多也。但我总要凑成二十之数，于礼拜四为止办妥，届时希一莅我寓为幸。”又说：“如不得已，则旧债之若干份，可由我担保”。此种情谊，真是令人感动。

240924 致李秉中

庸倩兄：

回家后看见来信。给幼渔先生的信，已经写出了，我现在也难料结果如何，但好在这并非生死问题的事，何妨随随便便，暂且听其自然。

关于我这一方面的推测，并不算对。我诚然总算帮过几回忙，但若是一个有力者，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简直不算是小事，现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帮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无力，所以还是无效的回数多。即使有效，也[不]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里。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

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树人 廿四日夜

【评点】

鲁迅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帮李秉中的忙，但却并不居恩。他认为他之所以看起来很像是帮忙者，正是由于自己无力的缘故。如果是有力者，则这些都是些微小事，或者简直不算是小事。这话的确说得很透彻。但是，那些有力者，却又不大愿意帮人家的忙。这看似不合逻辑，但世事就是这么奇怪。

鲁迅在1923年10月24日致孙伏园的信中说：“但记得我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世俗应酬。现在又表示欢迎李秉中来访，这是因为他觉得与李秉中还有话可谈，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鲁迅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他喜欢青年来访，但又怕来人“以我为是”，“陷入我一类的命运”；他总觉得自己的灵

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但又不能除去;他虽竭力遮蔽着,但总恐怕传染给别人。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在这封信中,他就向着一个青年学生解剖自己的灵魂。

1925 年

250311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

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化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伴，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

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评点】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名义，给鲁迅写信，请教郁结胸中多时的一些问题，鲁迅于当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从此书信不断，从讨论社会人生问题开始，逐渐进入情

感的交流，终于产生炽烈的爱情。许广平当时是一个认真向上，疾恶如仇，不满于黑暗的现实，积极探求人生真谛的青年学生，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有些看法未免幼稚了些。鲁迅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提出深一层的见解，循循加以开导。鲁迅这些深刻的人生见解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斗争策略，至今还对我们有着启示作用。

鲁迅是很重视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影响的，他不相信在昏暗的政治环境中，教育界独能清高，也不以为将学校搬到山林里去，就能有好学风。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走出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所以对于社会的改造，就显得非常重要。鲁迅不相信理想家们的话，他认为理想家对于“将来”的预言，就像牧师对于“死后”的许诺一样，都是很不可靠的，他执著于“现在”，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他自己并没有一套改造社会的方案，所以说不能给别人指路，但也不相信那些自称能给人指路的圣贤和哲人，他只是不断地在人生的长途上探索，而在探索中却积累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在信中所介绍的两条经验，就都极其宝贵。

一，是在人生的长途上如果遇到“歧路”和“穷途”，决不像墨翟和阮籍那样恸哭而返，也不向别人问路，因为他料定别人也并不晓得，而是休息一下，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或者在没有路的荆棘丛中走出路来。这使我们想起了《过客》中的老翁形象，那位老翁并不知道前途有着什么，但总觉得前面有声音叫他，他必须向前走去；也使我们想起了《生命的路》中那句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就是不畏艰险，不怕挫折，勇于开辟道路者的精神。

二，是对于社会的战斗，他并不想要挺身而出，也不劝别人去作牺牲，而是提倡“壕堑战”。这种“壕堑战”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而产生的。因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而且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感到死尸的沉重，群众又很麻木，

流血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不能轻言牺牲。“壕堑战”则既可以保存自己，又可以更多地消灭敌人，是一种有效的战法。但这种战略思想，往往不能为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接受，也不为群众领袖们所认识，所以每每造成血案。鲁迅后来在总结“三一八惨案”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群众领袖的错误，并且提出恳切的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而且说：“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当然，这不是怯战，所以鲁迅又说，有时被逼得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也只有短兵相接。而事实上，鲁迅常常是被逼得只好挺身而出，短兵相接。这是情势使然，不得已也。

250315 致梁绳祎

生为兄：

前承两兄过谈，甚快，后以琐事丛集，竟未一奉书。前日乃蒙惠简，俱悉。关于中国神话，现在诚不可无一部书，沈雁冰君之文，但一看耳，未细阅，其中似亦有可参考者，所评西洋人诸书，殊可信。中国书多而难读，外人论古史或文艺，遂至今不见有好书也，惟沈君于古书盖未细检，故于康回触不周山故事，至于交臂失之。

京师图书馆所藏关于神话之书，未经目睹，但见该馆报告，知其名为《释神》，著者之名亦忘却。倘是平常书，尚可设法借出，但此书是稿本，则照例编入“善本”中（内容善否，在所不问），视为宝贝，除就阅而外无他途矣，只能他日赴馆索观，或就抄，如亦是撮录古书之作，则止录其所引之书之卷数已足，无须照写原文，似亦不费多大时日也。但或尚有更捷之法，亦未可知，容再一调查，奉告。

中国之鬼神谈，似至秦汉方士而一变，故鄙意以为当先搜集至六朝（或唐）为止群书，且又析为三期，第一期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话，第二期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第三期六朝之书，则神仙之说多矣。今集神话，自不应杂入神仙谈，但在两可之间者，亦止得存之。

内容分类，似可参照希腊及埃及神话之分类法作之，而加以变通。不知可析为（一）天神，（二）地祇（并幽冥界），（三）人鬼，（四）物魅否？疑不能如此分明，未尝深考，不能定也。此外则天地开辟，万物由来（自其发生之大原以至现状之细故，如乌鸦何故色黑，猴臀何以色红），苟有可稽，皆当搜集，每一神祇，又当考其（一）系统，（二）名字，（三）状貌性格，（四）功业作为，但恐亦不能完备也。

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而起源则必甚迟。故自唐以迄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但此非数人之力所能作，只能待之异日，现在姑且画六朝或唐（唐人所见古籍较今为多，故尚可采得旧说）为限可耳。

鲁迅 三月十五日

【评点】

这是一封与青年学子讨论神话研究的书信。鲁迅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神话，但对中国神话的资料却非常熟悉。所以对于中国神话的分期及其内容分类法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鲁迅并非单从文体的角度来研究神话，而是根据社会思想的演变来对中国神话进行分期。因为在鲁迅看来，神话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一定的社会思想相联系的。所以在鲁迅讨论神话分期的文字中，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中国社会思想的独特看法。如说：“第一期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话，第二期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

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这“根柢在巫”和“杂有方士之说”,就极可注意。而在论及后代能否产生新神话时,鲁迅又说:“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那么,这些至今未脱的原始思想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其影响如何?这都是很可深入研究的现实性很强的学术课题。

25031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代。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

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三月十八日。

【评点】

看来,许广平对于“壕堑战”的思想一时尚不能接受,她在3月15日给鲁迅的信中以子路自况,说是“子路的为人,教他预备给人斫为肉糜则可,教他去作‘壕堑战’是按捺不住的,没有法子,还是站出去,‘不大好’有什么法子呢,先生。”所以鲁迅在此信中进一步阐发他的“壕堑战”思想。他说他之所以提倡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因此他对于子路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是大不以为然的。“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这里,提出了一个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以及斗争的灵活性问题。战斗是为了什么,牺牲的目的又何在呢?鲁迅所希望于青年的,“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而不是随便去牺牲。

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曾多次将中国比作“黑色的染缸”,这里又作了更完整的发挥:“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鲁迅认为:“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可见他既看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态度又是相当积极的。但是,改革也有种种不同的道路和方法。信中所举《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翁绥惠略夫,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社会的反抗,初意是要救群众,却反而被群众所迫害,忿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这当然不是正当的办法。鲁迅之所以特地翻译了这本书,大概也就是要大家看看,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反抗者,值得引以为鉴。他后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毁校周年纪念会

上,又谈到这个人物,说:“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而鲁迅自己呢?他是以文章来反抗社会的,他并不想以将来的理想世界来安慰读者,而是重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他深知自己的作品“太黑暗了”,并认为这与他的思想、经历有关。“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后来常有人批评鲁迅言辞偏激,其实鲁迅自己早就说出这一点了,但这种偏激的声音是由于绝望的抗战而产生的,当与那些思想片面者有别,也远比那些不思改革,只想维持现状者的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要富有活力。但是,他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是他当时的疑虑之处。鲁迅并不想以导师自居,给人指路,只是愿以自己在探索中的体会告诉后来者,所以他很坦诚地将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都公开在学生之前。

250323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的教育次长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

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不说的，但这种满纸是“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无甚益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三月二十三日。

【评点】

鲁迅在上一封信里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因而，许广平在回信中说：“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鲁迅此信，即对此议论而发。他认为“随顺现在”与“希望将来”一样，都是自慰或自欺之法，“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此即所谓知识分子之悲剧欤？古诗云：“人生识字忧患始”，亦此之意也。那么，古之统治者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也就无足奇怪了，因为只有无知识，才能保持麻木状态，只有民众的麻木不觉醒，才能便于统治。而查封启发民智，发表不同意见

的报纸，就成为官场的老手段。但鲁迅说得好：“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所好者，他已看到有准备毁坏这个染缸的人，只可惜数目太少。但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

250331 致许广平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

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的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去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上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

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枪，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

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到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胡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三月三十一日。

【评点】

信中对于民国初年以来政象的回忆，很有意思。民元的临时政府是革命党主政，而且新政权刚刚建立，总会有一番新气象，后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又失败了，使其失去制约，当然就逐渐的坏下去了。袁世凯死后，仍是他手下的北洋军阀当政，他们本是清朝皇室的奴才，满脑子都是奴才观念，所以鲁迅说：“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而且他认为，当时的坏而又坏，“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这就是说，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表面涂饰

了一下，所以很容易恢复本相的。鲁迅这话，很有普遍意义，不独北洋军阀政府为然。所以，他把国民性的改造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说是“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所谓国民性的改造，其实也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问题。虽然他在初到日本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而经历了许多历史事变之后，对这问题就更加重视了。中国近代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器物的改革，第二阶段是政体的改革，第三阶段是思想的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先驱者们因看到政体的改革未能奏效，而发动起来的文化思想上的改革。可见这也是先驱者的共识。

正因为国民性未曾获得改造，所以即使有什么新的主义进来，也全走了样。鲁迅在信中举了两个例子：“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正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主义与行动自相矛盾的做法，在中国至今也并不罕见。例如，以新潮思想而知名的诗人，却要仿效齐人有一妻一妾，最后是用斧头斫死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提倡自由民主的学者，却一心想做学术把头，高居众人之上。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矛盾，但由于民众缺乏理性思维，对于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也就习以为常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就出现了鲁迅所说的那种怪现象：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这种现象的普遍流行，又养成了巧滑的国民性。于是愈来愈积重难返了。

尽管如此，鲁迅“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当然，他无拳无勇，所有的只是手中的一支笔。然而他就用这支笔来袭击旧文明，他所写的杂文，就是匕首和投枪。而且，他“还要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鲁迅寄希望于青年，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曾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4月28日致许广平信中也说到：“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而许广平对于黑暗的社会现象，有不平，敢批评，这也是鲁迅对她赏识的重要原因吧。

鲁迅要寻找生力军，目的是要袭击旧社会，并不是想要做领袖。这是很可宝贵的性格。信中对于他自己不宜于做领导的原因的分析，也就分析了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其中很有耐人寻味处。

25040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薛先生辞职的意思，恐怕还在先，现在不过借题发挥，自以为去得格外好看。其实“声势汹汹”的罪状，未免太不切实，即使如此，也没有辞职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总无非是“用阴谋”与“装死”，学生都不易应付的。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是“声势汹汹”，则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

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也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虽说发达，内情何尝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买点心，一日吃一元，反有实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

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猛进》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后如不禁止，我当寄上，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份。

鲁迅。四月八日。

□□女士(按:原信作万璞女士)的举动似乎不很好:听说她办报章时,到加拉罕那里去募捐,如果不给,她就要对俄国说坏话云云。

【评点】

鲁迅对于孙中山因没有党军,而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的批评,说明他对于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在4月14日信中,他又说:“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这都是非常透彻的见解。孙中山在多次失败之后,自然也认识到这一点,黄埔军官学校的开办,就是为建立党军而培养干部的。然而,不但“惜已太晚”,而且在孙中山死后,党军还变成了新军阀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这真是中国的悲哀,但大概也是所有落后国家的通病吧。

鲁迅是文人,他当然只能在文化革命上起作用,用他手中的笔向旧文明进行袭击。但在这方面也是困难重重,不但旧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且“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对于压制言论的文网,鲁迅也看得很透。他认为“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对付之道,就是准备“钻网”的法子。看来,“张网”和“钻网”的斗争,是世界各国都有的,只是中国的文网比较严密,因而钻起来也就更加困难一些。

信中对于“女性文章”的批评,其实涉及到文章的格调和写法的问题。特别是说到关于辩论文写法,很值得注意。鲁迅不赞成“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的写法,认为这样“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他是主张要正对论敌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的。鲁迅自己的文章之所以能写得短小精悍,杀伤力极强,就是与此种写法有关。

250411 致 赵 其 文

××兄：

我现在说明我前信里的几句话的意思，所谓“自己”，就是指各人的“自己”，不是指我。无非说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们通了几回信，你就记得我了，但将来我们假如分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得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跎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

乎不能前进了。

鲁迅 四月十一日

【评点】

鲁迅一向认为：没有精神上的牵挂，可以使人更加勇猛。他以前所说的：“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就包含有这层意思。他要青年学生不要感激自己，即是为了使其不致受到感情上的束缚。《过客》中那位走破了脚的过客，不愿接受小女孩布施的布片，即因为“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他在长途跋涉中不愿有精神上的负担也。中国人历来讲究“知恩图报”，这里就有太多的感情上的纠葛。鲁迅的思想，实在已超越传统观念之上了。

250414 致 许 广 平

广平兄：

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坐，所以只能论到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也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谣言，所以还不如仍旧写回信。

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太太（按：原信作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

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而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

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不说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四月十四日

【评点】

许广平由于耐不住性子，喜欢“踔厉风发”地战斗，在信中表示出这样的想法：“所以小鬼之意，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予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是不赞成这种想法的。他说：“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提出了韧性的战斗精神。对于这种精神，讲得最明确的，是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在这篇演讲中，他说：“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齷齪，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这种韧性战斗精神，与前面信中所说的“壕堑战”

方法,是一致的。

信末进一步阐述了对于文章的看法,比较了两种写法的优缺点,说得较为全面,值得作文者参考。

250503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四月卅的信收到了。闲话休提，先来攻击朱老夫子的“假名论”罢。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切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

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

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那么，话题一转，而论“小鬼”之假名问题。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这许多名字中，既然“非心”总算还未用过，我就以“编辑”兼“先生”之威权，给你写上这一个罢。假如于心不甘，赶紧发信抗议，还来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即以默认论，虽驷马也难于追回了。而且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

试验题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没有补救之法的。其法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则效力之大，也抵得记大过二次。现在果然慷慨激昂的来“力争”了，而且写至七行之多，可见费力不少。我的报复计划，总算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少爷”之称，姑且准其取消罢。

历来的《妇周》，几乎还是一种文艺杂志，议论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前回的那一篇，则简直是笑话。请他们诸公来“试他一试”，也不坏罢。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就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中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

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是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但我已将废去考试法不用，倘有必须报复之处，则尊称之曰“少爷”，就足够了。

鲁迅。五月三日。

【评点】

对于朱希祖老夫子的批评，很有普遍意义。一个埋首南窗下，专治古学的教授，对于现实难免有些隔膜，评论起世事来，自然就会迂远之至。而中国所多的正是这类脱离现实的学者，他们做的也是脱离现实的学问。若要对历史和现实都有深切的了解，能用他的学问来改造现实的，就甚为难得了。这大概也是现实环境造成的，因其对统治者无害，易于保全也。但中国更需要的，则是后一类学者。

鲁迅主张发表文章用假名，是他提倡“壕堑战”思想的延伸，也就是叫人不要赤膊上阵的意思。所举张良为韩报仇之例，甚为允当。

25051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两信均收到，一信中并有稿子，自然照例“感激涕零”而阅之。小鬼“最怕听半截话”，而我偏有爱说半截话的毛病，真是无可奈何。本来想做一篇详明的“朱老夫子论”呈政，而心绪太乱，又没有工夫。简捷地说一句罢，就是：他历来所走的都是最稳的路，不做一点小小冒险事，所以他偶然的话倒是不负责任的，待到别人因此而被祸，他不作声了。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近来对于□先生（按：原信作黎先生，即黎锦熙）之赴西山，也有些怀疑了，但也许真真恰巧，疑之者倒是我自己的神经过敏。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消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

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学生家属之类的举动，我以为这些手段太毒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如果没有一个人肯负这一点责任（署名），那么，即使校长竟去，学籍也恢复了，也不如走罢。全校没有人了，还有什么可学？

鲁迅。五月十八日。

【评点】

从重视文艺的力量，到“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是一种认识的深化过程。促使鲁迅思想起变化的，是事实的教训。还在女师大事件之前，他就在课堂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现在他再次提到这一看法，是由于女师大事件的刺激。到得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就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后来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時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想听听大炮的声音了。

在女师大事件开始不久，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被她们所反对的校长杨荫榆以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之太多，而公理之终不敌强权”。所以鲁迅在回信中再次发挥他的“牺牲无用论”观点，并举当年被北京大学开除的讲义风潮带头人冯省三为例，说明牺牲的悲剧。其实，他的小说《药》，就是写为民众的利益而牺牲的革命

者，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反被民众拿他的鲜血蘸着馒头当药吃的悲剧。冯省三事件出来后，鲁迅也写过一篇杂文：《即小见大》，可见这是他一贯的看法。

但是学校当局的手段太毒了，鲁迅认为：“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5月27日，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七名教员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他还写了许多杂文，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这时，他只好挺身而出了。

250530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午回来，看见留字。现在的现象是各方面都黑暗，所以有这情形，不但治本无从说起，便是治标也无法，只好跟着时局推移而已。至于《京报》事，据我所闻却不止秦小姐一人，还有许多人去运动，结果是说定两面的新闻都不载，但久而久之，也许会反而帮它们（男女一群，所以只好用“它”）的。办报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报章的宣传，于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看见《现代评论》，所谓西滢也者，对于我们的宣言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给他碰一个小钉子。但不知于伏园饭碗之安危如何。它们是无所不为的，满口仁义，行为比什么都不如。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西滢文托之“流言”，以为此次风潮是“某系某籍教员所鼓动”，那明明是说“国文系浙籍教员”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之骂杨荫榆，却在此次风潮之后，而“杨家将”偏偏来诬赖，可谓卑劣万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

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

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而你却不高兴听这类话，——但是，为什么将好好的活人看作“废物”的？这就比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还“该打”！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其实小鬼希望父兄长存，而自视为“废物”，硬去替“大众请命”，大半也是如此。

《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法。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下笔时立志要显豁，而

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现在除附《京报》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不算少。待“闹潮”略有结束，你这一匹“害群之马”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鲁迅。五月三十日。

【评点】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文化界出现了两个不同倾向的派别：《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这两派在女师大事件中各支持一方，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从本信所揭露的事实看，显然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先攻击七教员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宣言，于是引起鲁迅的还击。既然战斗已经开始，鲁迅就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不肯“带住”，定要揭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双方的论争看似常执滞在一些小事情上，而且颇多个人意气，其实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陈西滢支持的是黑暗的教育当局，而鲁迅则站在代表正义的青年学生这一边。可惜当时人对这层关系并不太了解，以为是个人之争，不甚重视。鲁迅后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路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鲁迅在本信中再次对自己的思想作出剖析。他一再说，他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又说，他的反抗，只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与许广平的为希望光明的到来而反抗者不同。这仍是他在 3 月 18 日信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的意思。只有明白鲁迅的这种心态，才能对他前期的作品有深切的理解。

250613 致 许 广 平

广平兄：

六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我久没有复；今天又收到十二夕信，并文稿。其实我并不做什么事，而总是忙，拿不起笔来，偶然在什么周刊上写几句，也不过是敷衍，近几天尤其甚。这原因大概是因为“无聊”，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等暑假时闲空一点，我很想休息几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够。

第一，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不过这些表示，真所谓“就是这么一回事”。试想：北京全体(?)学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钊，女师大大多数学生而不能去一杨荫榆，何况英国和日本。但在学生一方面，也只能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现在“公理”也确有点飞来了，而且，说英国不对的，还有英国人。

所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所谓“经济绝交”者，在无法可想中，确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带条件，要耐久，认真。这么办起来，有人说中国的实业就会借此促进，那是自欺欺人之谈。（前几年排斥日货时，大家也那么说，然而结果不过做成功了一种“万年糊”。草帽和火柴发达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时候，是连这种万年糊也不会做的，排货事起，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造，我还是小股东，但是每瓶卖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货色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现在所做的好得多，进步得多了，但和我辈无关也。）因此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损，为报复计，亦足快意而已。

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前信反对喝酒，何以这回自己“微醉”（？）了？大作中好看的字面太多，拟删去一些，然后赐列第□期《莽原》。

□□，（按：原信作伏园）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

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

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止此而已罢。

迅。六月十三夜。

然而，这一点空白，也还要用空话来填满。司空蕙前回登过启事，说要到欧洲去，现在听说又不到欧洲去了。我近来收到一封信，署名“捏蚊”，说要加入《莽原》，大约就是“雪纹”，也即司空蕙。这回《民众文艺》上所登的署名“聂文”的，我看也是他。碰一个小钉子，就说要到欧洲去，一不到欧洲去，就又闹“琴心”式的老玩艺了。

这一点空白即以这样填满。

【评点】

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巡捕开枪打死中国群众造成的，而英国作家萧伯纳等却列名于国际工人后援会中央委员会为五卅惨案而发表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中，谴责“白种和黄种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惨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行为，正是民主思想的表现。这的确值得我们学习。鲁迅批评中国这样的人很少，正是由于我们缺乏民主思想之故。要

学得洋鬼子这种文明，必须从发扬民主入手。

另外，中国的巧人太多，也是一大害处。巧人们最善于让别人做牺牲，而自己却获得利益。这样，牺牲也就失却了意义。所以，在中国，特别不能轻言牺牲，而且还要防着被别人利用。鲁迅提倡“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者，即为此也。

250628 致许广平

（前缺。）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只是意见如此。编辑者对于投稿，照例不加批评，现遵来信所嘱，妄说几句，但如投稿者并未要知道我的意见，仍希不必告知。

迅。六月二十八日。

【评点】

“前缺”部分，其实在原信中是保存着的，因为是多带戏谑之言的“训词”，所以《两地书》中没有收入。而所收论诗的部分，的确很

重要。“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是至理名言。可见写诗需要情感的积淀过程，诗是不能作猛烈攻击之用的，宣传鼓动与审美创造也并不是一回事。在5月17日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还强调创作要有蕴蓄，不能把意思说得太清楚了。这些话都很值得重视。

250713 致许广平

嫩弟手足：披读七、九日来札，且喜且慰。缘愚兄忝识之无，究疏大义，谬蒙齿录，惭感莫名，前者数呈贱作，原非好意，盖目下人心趋古，好名之士，层出不穷愚兄风头有心，而出发无术，倘无援引，不克益彰。若不“改换”，当遗笑柄，我

嫩弟手足情深恐遭牵累引己饥之怀，行举斧之便，如当九泉，定思粉骨之报，幸生人世，且致嘉奖之词，至如“专擅”云云，只准限于文稿，其他事项，自有愚兄主张一切毋得滥为妄作，否则“家规”犹在，绝不宽容也。

嫩弟近来似因娇纵过甚，咄咄逼人大有不恭之状以对愚兄者，须知“暂_碍”“勿露”……之口吻殊非下之对上所宜出诸者，姑念初次，且属年嫩，以后一日三秋则长成甚速，决不许故态复萌也，戒之念之。又文虽做得稍久，而忽地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或以事牵，竟致潦草，此乃兄事烦心乱无足为奇者好在 嫩弟精力充足自可时进针贬愚兄无不乐从也手泐数行即询

英国的香烟可好？

愚兄手助 七十三

【评点】

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开始是师生间讨论社会人生问题,到这时,信中多感情戏谑话语,故有好几封信,《两地书》中没有收入。现在选录一封,以见一斑。

250729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还未到来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为还不如不发表。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至于如诸君之雪花膏派，则究属“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击或误解，终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倘在小说，或回忆的文章里，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论文中，而给现在的中国读者看，却还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则实在有点迂。我在那篇文章里本来说：这种骂法，是“卑劣”的。而你却硬诬赖我“引以为荣”，真是可恶透了。

其实，对于满抱着传统思想的人们，也还大可以这样骂。看目下有些批评文字，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而骨子里却还是“他妈的”思想，对于这样批评的批评，倒不如直捷爽快的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属合适。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

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用“他妈的”来骂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们，夫岂太过也欤哉！？

还有一篇，今天已经发出去，但将两段并作一个题目了：《五分钟与半年》。多么漂亮呀。

天只管下雨，绣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时候，赶紧晒一晒罢，千切千切！

迅。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

【评点】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非常有趣的办法。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对此有所发挥：“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静许多罢。”当然，这办法未必能够付诸实践，但这些话却的确能够起到揭露作用。

本信可以看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胚胎。对于民元革命的经验，鲁迅在这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革命党执政，失之过宽：“对于任何人都宽容”，“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不过这里还只初步论及，语焉不详，后来经过充分酝酿，到本年年底，就写成了那篇重要的文

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该文虽由林语堂插论《语丝》文体而引发，但从本信的内容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意见，却是酝酿已久。

鲁迅的文章，大都是在现实斗争中有所感触，再结合历史的经验，加以理论的思考，然后写成。所以，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理论深度，与那种四平八稳脱离现实之作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同于轻巧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文。他自己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曾说，他的文章和什么高超的“烟土披离纯”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他也不相信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会有什么好文章。“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墩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鲁迅创作的出发点和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250823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两回得信，因事忙未复，歉甚。《懊悔》早交给语丝社，现已印出了。

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兄不知何时回北京？

迅 上八月二十三日

【评点】

这里说的是鲁迅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之事。鲁迅因反对章士钊镇压女师大学生运动，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之职。鲁迅不服，提出上诉。偏偏这位善于“舞文弄法”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却在答辩书里留下了破绽。该答辩书云：“……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

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鲁迅即反驳道：“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这里，鲁迅抓住一个时间差问题，驳得章士钊无话可说。这场官司是以鲁迅胜诉告终。鲁迅于1926年1月17日复职。

这是一件下级告上级，小官告大官的典型事例。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他的高度智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见出，当时尽管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但对于权力，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机制，即使是像章士钊这样身兼两部总长的高官，也还不能肆意横行，哪怕是最高行政长官段祺瑞执政已经批准，并且付诸执行的公文，平政院也可予以推翻。否则，鲁迅就不能胜诉了。

1926 年

2604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承示甚感。

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曾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一口否认，甚至于说并无其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

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至于现在之事端，则最大者盖惟飞机抛掷炸弹，联军总攻击，国直议和三件，而此三件，大概皆不能归咎于五十人煽动之故也欤。

迅 上 四月九日

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其实只有四十八人，未知是遗漏，还是仿九六足串大钱例，以烂算计也。

【评点】

所谓“五十人案”，是指段祺瑞政府在制造“三一八”惨案以后，所开列的第二批通缉名单，鲁迅亦名列其中。这个名单的开列，当然是反动当局对于进步文化人的压迫，但同时也体现了名单开列者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的心理，以及夺取肥缺，扩大势力范围的打算。鲁迅看出了这一点，所以着手调查被通缉者的籍贯和饭碗，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加以揭露。“大衍”者，五十之数也，“发微”者，揭发内中之隐情也。从这张名单中，作者看到了许多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迫害学生的文化人的名字；而且，如果这个通缉令能够实行，则就可以空出一批优美的差缺来。

鲁迅所揭露的事件，虽然已成历史的陈迹，但挟私报复的心态和谋取实利的意图，却是相当普遍的。每有大运动来，即有借大题目来做自己的小文章的人，如果从鲁迅上述的观点分析起来，是很能发出内中之“微”的。

260617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从休养室走出，“偷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

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有人在。不过他们的计划，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但也没有什么效验。只是使我很觉得无聊，我虽然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阴险至于如此也。

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

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我现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别人的翻译及创作。可惜没有钱，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给你三本书，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写的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给我消息。

迅 六月十七日

【评点】

李秉中离开北大后，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参加过东江战役，此时又跑到苏联去留学了。鲁迅一直很记挂这位学生，久别之后收到来信，自然非常高兴。于是在复信中告以自己的境遇和此后的打算。鲁迅很称赞章太炎对学生的亲切态度，说和蔼若朋友然，他自己对学生也是如此。信中如朋友间谈心，绝无师长的架子。

但是，对于卑鄙阴险的上等人，他却是非常尖锐的。他自己很清楚，由于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必有人来咬。可见在中国要从事社会批评，实在很难。但是他决不退让，仍旧做文章，仍旧骂人。只是他感到很无聊，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并赚一点钱以助家用，过一两年之后，“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准备到厦门大学教书时的心态。

260815 致许广平

景宋“女士”学席：程门

飞雪，贻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

骏才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
或

下问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吾

生倘能赦兹愚劣，使^师得备薄饌，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时，假宫
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
幸！顺颂

时绥。

师 鲁迅 谨订 八月十五日早

【评点】

此信语多戏谑，很有情趣，却是模拟许广平的原信而写。1946年，许广平将它编入《鲁迅书简》时，曾写有一段说明，很可一读：

“这封信没有收入《两地书》内，大约编辑时此信散存他处，一

时未及检出。现出《书简》，正可乘便加入。这信的文笔颇与《书简》体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自从被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毁灭了之后，又经师长们以及社会正义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这一班国文系的同学，又得举行毕业，而被开除了之后的我，也能够恢复学籍滥竽其间。到了快要学业结束的时候，我国文系师长们如马幼渔先生，沈士远、尹默、兼士先生，许寿裳先生，鲁迅先生等，俱使人于学业将了，请益不易之际兴无穷感慨！良以学校久经波折，使师长们历尽艰辛，为我们学子仗义执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翫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陆晶清、吕云章和我三人具名肃帖，请各师长，在某饭店略备酒馔，聊表敬意。其后复承许寿裳先生及鲁迅先生分别回请我们，而鲁迅先生的短简，却是模拟我写的原信，大意如下：

××先生函丈程门

立雪承训多时幸

循循之有方愧駑才之难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

请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伤吾

师倘能赦兹愚鲁使生等得备薄饌于×日午十二时假西长安街

××饭店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肃请

钧安

陆晶清

学生 许广平 谨启

吕云章

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

260912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依我想，早该得到你的来信了，然而还没有。大约闽粤间的通邮，不大便当，因为并非每日都有船。此地只有一个邮局代办所，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办事，所以今天什么信件也没有——因为是星期——且看明天怎样罢。

我到厦门后发一信（五日），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开学在二十日，我有六点钟功课，就要忙起来，但未开学之前，却又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我已写好一张有这房子照相的明信片，或者将与此信一同发出。上遂（按：原信作季黻）的事没有结果，我心中很不安，然而也无法可想。

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利害，语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管的铜门也都挤弯，毁东西不少。我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层的百叶窗，此外没有损失。今天学校近旁的海边漂来不少东西，有桌子，有枕头，还有死尸，可见别处还翻了船或漂没了房屋。

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

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海水浴倒是最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若你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迅。九月十二夜。

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进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看上海报，北京已戒严，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

回上去讲我途中的事，同房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魏或韦，我没有问清楚，似乎也是民党中人，所以还可谈，也许是老同盟会员罢。但我们不大谈政事，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底细，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于客栈中人的话一样。船中的饭菜顿数，与广大同，也有鸡粥；船也很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门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我前信似乎说过这里的听差很不好，现在熟识些了，觉得殊不尽然。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容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等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

常有平等言动，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但茶水很不便，所以我现在少喝茶了，或者这倒是好的。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

我上船时，是克士（按：原信作建人）送我去的，还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才知道关于我的事情，伏园已经大大的宣传过了，还做些演义。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见我们同车到此，便深信伏园之说了，然而也并不为奇。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足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你已在大大地用功，预备讲义了罢，但每班一小时，八时相同，或者不至于很费力罢。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报上又常有闽粤风云紧张之说，在这里却看不出，不过听说鼓浪屿上已有很多寓客，极少空屋了，这屿就在学校对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可到。

迅。九月十四日午。

【评点】

鲁迅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与许广平同车南下。在上海小住数日，到9月初，各自乘船分赴厦门、广州。他们原定工作两年再见面，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鲁迅在厦门大学只工作了一

个学期，就到广州去了。在广州也只住了半年，两人同赴上海定居。

在分居厦门、广州两地时，他们思念之情弥切，书信不断。此时的信中，他们很少直接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了，所谈多是生活情况和周围环境。但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鲁迅的人生态度，以及他思绪的变化。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然而，就在这平凡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炽热的感情。

此信最后第三段（“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有所修改，接着又删去一段，现照原信补录如下：

“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并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

“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八月分的薪水，已汇给他二百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以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予酒钱十元，这样，则三天可以喝一瓶了，而且是每瓶一元的。”

删改的原因，大概因其中涉及周建人的隐私，并担心将周建人卷入他们的事情之中。但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爱弟之情。

260920 致 许 广 平

广平兄：

十三日发的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从五日发了一信之后，直到十四日才发信，十四以前，我只是等着等着，并没有写信，这一封才是第三封。前天，我寄上了《彷徨》和《十二个》各一本。

看你所开的职务，似乎很繁重，住处亦不见佳。这种四面“碰壁”的住所，北京没有，上海是有的，在厦门客店里也看见过，实在使人气闷。职务有定，除自己心知其意，善为处理外，更无他法；住室却总该有一间较好的才是，否则，恐怕要瘦下。

本校今天行开学礼，学生在三四百人之间，就算作四百人罢，分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此地不但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即使有人要来，也无处可住，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真是梦想。大约早先就是没有计划的，现在也很散漫，我们来后，都被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正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我和兼士及朱山根（按：原信作顾颉刚，下同），是早就收到聘书的，此外还有几个人，已经到此，而忽然不送聘书，玉堂费了许多力，才于前天送来；玉堂在此似乎也

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

我的薪水不可谓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时，也可以算很少，但别的所谓“相当职务”，却太繁，有本校季刊的作文，有本院季刊的作文，有指导研究员的事（将来还有审查），合计起来，很够做做了。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沈》整理一下拿出来，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玉堂好意请我，所以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但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

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按：原信作黄坚，下同）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此外，教员内有一个熟人，是先前往陕西去时认识的，似乎还好；集美中学内有师大旧学生五人，都是国文系毕业的，昨天他们请我们吃饭，算作欢迎，他们是主张白话的，在此好像有点孤立（按：原信还有“吃苦”二字）。

这一星期以来，我对于本地更加习惯了，饭量照旧，这几天而且更能睡觉，每晚总可以睡九至十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我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大约只要少应酬，关起门来，是做得到的。此地的点心很好；鲜龙眼已吃过了，并不见佳，还是香蕉好。但我不能自己去买东西，因为离市有十里，校旁只有一个小店，东西非常之少，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

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因为我在三层楼上之故。生疟疾的很多，所以校医给我们吃金鸡纳。霍乱已经减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坏，其实是在绕着人家的墙下，檐下走，无所谓路的。

兼士似乎还要回京去，他要我代他的职务，我不答应他。最初的布置，我未与闻，中途接手，一班绝不相干的人，指挥不灵，如何措手，还不如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罢，况且我的工作也已经够多了。

章锡琛托建人写信给我，说想托你给《新女性》做一点文章，嘱我转达。不知可有这兴致？如有，可先寄我，我看后转寄去。《新女性》的编辑，近来好像是建人了，不知何故。那第九[?]期，我已寄上，想早到了。

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再谈。

迅。九月二十日下午。

【评点】

鲁迅到厦门大学之后，即遇到一些很不舒服的事情：薪水虽然不少，杂事却极繁多，而且没有一定的住所，被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上下要走 192 级台阶；“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这种对学人的不尊重，真是由来久矣，而“急于事功”，也是“当局”的通病，这种做法，叫教师怎么能沉潜学问，做出好的成绩来呢？真乃小家子气也。

260925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八日之晚的信，昨天收到了。我十三日所发的明信片既然已经收到，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发的信也接着收到。我惟有以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了我的几封信的事，聊自慰解而已。至于你所寄的七，九，十二，十七的信，我却都收到了，大抵是我或孙伏园从邮务代办处去寻来的，他们很乱，或送或不送，堆成一团，只要有人去说要拿那几封，便给拿去，但冒领的事倒似乎还没有。我或伏园是每日自去看一回。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按：原信作陈万里），辛家本（按：原信作潘家洵），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我原住的房屋，要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而学校之办法甚奇，一面催我们，却并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员寄宿舍已经人满，而附近又无客栈，真是无法可想。后来总算指给我一间了，但器具毫

无，向他们要，则白果又故意特别刁难起来（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吃点小苦头的脾气的），要我开帐签名具领，于是就给碰了一个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席，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所以我已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

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撙节，而有许多悭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时，就又有一件。房中原有两个电灯，我当然只用一个的，而有电机匠来，必要取去其一个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化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

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么？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间壁是孙伏园和张颐教授（今天才到，原先也是北大教员），那一面是钉书作场，现在还没有人。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第一是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也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今天晚饭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了面包和罐头牛肉吃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懂得两三句普通话，但恐怕颇有点懒。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来听我的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这不但是国文系全部，而且还含有英文，教育系的；这里的动物学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员对坐而听讲。

但是我也许还要搬。因为现在是图书馆主任正请假着，由玉堂代理，所以他有权。一旦本人回来，或者又有变化也难说。在荒地里开学校，无器具，无房屋给教员住，实在可笑。至于搬到那里去，现在是无从揣测的。

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

今夜的月色还很好，在楼下徘徊了片时，因有风，遂回，已是十一点半了。我想，我的十四的信，到二十，二十一或二十二总该寄到了罢，后天（二十七）也许有信来，因先来写了这两张，待二十八日寄出。

二十二日曾寄一信，想已到了。

迅。二十五日之夜。

今天是礼拜，大风，但比起那一次来，却差得远了。明天未必一定有从粤来的船，所以昨天写好的两张信，我决计于明天一早寄出。

昨天雇了一个人，叫作流水，然而替工，今天本人来了，叫作春来，也能说几句普通话，大约可以用罢。今天又买了许多器具，大抵是铝做的，又买了一只小水缸，所以现在是不但茶水饶足，连吃散拿吐瑾也不为难了。（我从这次旅行，才觉到散拿吐瑾是补品中之最麻烦者，因为它须兼用冷水热水两种，别的补品不如此。）

今天忽然有瓦匠来给我刷墙壁了，懒懒地乱了一天。夜间大约也未必能静心编讲义，玩一整天再说罢。

迅。九月二十六日晚七点钟。

【评点】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鲁迅所遇到的不如意事，也愈来愈多了。信中所写的黄坚，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典型。凡小

人得志，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必定要兴风作浪的。在上司面前讲人坏话，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喜欢利用手中权力刁难别人，正是此类人物的德性。对于此人，后信中续有所写，甚可注意。鲁迅给他大碰其钉子，并非在发名士脾气，其实倒是在伸张正义。鲁迅在后信中说，这种人“依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学校”，这是的确的。中国有很多事，都是坏在这类人手中。但奇怪的是，这类人每每能够得到重用。当然，厦大之不景气，还有较为复杂的原因。鲁迅说：“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这可见鲁迅的正直，但也说明，当时在上司面前密语，议人短长，是被人看不起的。谁知后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小报告竟成为司空见惯事，而且还是受鼓励的行为呢！

原信在第四段末，“又何必如此计较呢”之后，还有这几句话：“取下之后，我就即刻发现了一件危险事，就是他只是宝贝似的将电灯泡拿走，并不关闭电门。如果凑巧，我就也许竟会触电。将他叫回来，他才关上了，真是麻木万分。”

在9月26日晚写的这一部分里，删去了最后第二段：

“有人看见我这许多器具，以为我在此要作长治久安之计了，殊不知其实不然。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需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我也许敷衍不到一年。”

此外，原信中还画有鲁迅住房位置的示意图，这些在不言之中的感情流露，收入《两地书》时，亦删去了。

26092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廿七日寄上一信，收到了没有？今天是我在等你的信了，据我想，你于廿一二大约该有一封信发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还没有到，所以我等着。

我所辞的兼职（研究教授），终于辞不掉，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据说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这是对他不起的，所以只得收下，将辞意取消。玉堂对于国学院，不可谓不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但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从昨天起，已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今天编好了第一章。眠食都好，饭两浅碗，睡觉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时。

从前天起，开始吃散拿吐瑾，只是白糖无法办理，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点心也这样。这里的点心很好，而我近来却怕敢买了，买来之后，吃过几个，其余的竟无法安放，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

风也很利害，几乎天天发，较大的时候，令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若在屋外，则走路倘不小心，也可以被吹倒的。现在就呼呼

地吹着。我初到时，夜夜听到波声，现在不听见了，因为习惯了，再过几时，风声也会习惯的罢。

现在的天气，同我初来时差不多，须穿夏衣，用凉席，在太阳下行走，即遍身是汗。听说这样的天气，要继续到十月（阳历）底。

L. S.（按：原信署 H. M.）九月二十八日夜。

今天下午收到廿四发的来信了，我所料的并不错。但粤中学生情形如此，却真出我的“意表之外”，北京似乎还不至此。你自然只能照你来信所说的做，但看那些职务，不是忙得连一点闲空都没有了么？我想，做事自然是应该做的，但不要拚命地做才好。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报章，登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

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了罢。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但我也以转瞬便是半年，一年，聊自排遣，或者开手编讲义，来排遣排遣，所以眠食是好的。我在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还可以无需帮助，你还是给学校办点事的好。

中秋的情形，前信说过了。谢君的事，原已早向玉堂提过的，没有消息。听说这里喜欢用“外江佬”，理由是因为倘有不合，外江佬卷铺盖就走了，从此完事，本地人却永久在近旁，容易结怨云。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谢君的令兄我想暂且不去访问他，否则，他须来招呼我，我又须去回谢他，反而多一番应酬也。

伏园今天接孟余一电，招他往粤办报，他去否似尚未定。这电报是廿三发的，走了七天，同信一样慢，真奇。至于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

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三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我因为多住了几天，渐渐习惯，而且骂来了一些用具，又自买了一些用具，又自雇了一个用人，好得多了，近几天有几个初到的教员，被迎进在一间冷房里，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须旅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嘴也不大乱吃，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我的功课现在有五小时了，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我到此之后，从上海又买了一百元书。克士已有信来，说他已迁居，而与一个同事姓孙的同住，我想，这人是坏，但他也不笨，或不至于上当。

要睡觉了，已是十二时，再谈罢。

迅。九月三十日之夜。

【评点】

本信删改之处颇多。比如：

在9月30日所写的第一段中，在“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之后，删去“北伐军是顺手的”七个字。这是事后有所醒悟，为冲淡当时的喜悦之情也。

从鲁迅在厦门给许广平所写的许多信来看，他当时对于北伐战争是表示支持的，故多热情之语。盖因鲁迅早年参加过民主革命活动，在北京又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压迫，所以他对国民革命军寄予希望是自然的。直待到了广东，才看出一些问题来，而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广州在四月十五日也开始了大屠杀，鲁迅于是起而反对暴行。所以他在《两地书》序言中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

第二段：“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原信是：“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能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我在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还可以无需帮助，……”，原信是：“我在这里的心绪，还不能算不安，还可以无需帮助，……”。

这里，显然是把因爱情的思念而引起的苦闷心绪转移了。大概作者不愿在公开出版时表露出太多的感情色彩。其实，在这些书信里，鲁迅感情的表露本来就很含蓄的。

第四段原信是这样的：“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

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管他了。只是玉堂们真是呆得可怜。”

“陈源”之后，漏写“之流”二字，故于出版时补上，此不足多怪。对于顾颉刚，则《两地书》中多所揭发，颇可注意。不能把它视为个人意气之争，其实是对于某种文人恶习的批评。虽然孔老夫子早就提出君子“群而不党”的告诫，但有些文人却总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在文坛学界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种风气至今犹存，甚可注意。后人研究学术史，于学术成果方面注意较多，而于此类事却易于忽略，倒不如当时人看得清楚，因为他们有着切身感受也。但这也是学术史的一部分，不可不加关注。

接下去又删掉一段：“齐寿山所要的书，我记得是小版《说文解字注》（段玉裁的？），但我却未闻广东有这样的版。我想是不必给他买的，他说了大约已忘记了。他现在不在家，大概是上天津了，问何时回来，他家里的人答道不一定。（季黻来信说如此）”

又，最后第三段云：“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约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这之后，删去五字：“和 HM 相见”。HM 者，害马之英文缩写也。盖因杨荫榆在开除女师大学生会许广平等六干事的布告中，有“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之语，故鲁迅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害群之马。而向自己的爱人保证对听讲女生目不邪视，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事。鲁迅虽然被称为“世故老人”，但一旦谈情说爱起来，心态还是相当年轻的。怪不得许广平在回信中说：“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

261004 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丛芜
素园兄：
霁野

前回寄上文稿一篇(《旧事重提》之六)，想已早到。十九日的来信，今已收到了。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

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

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我初到时穿夏布衫，现在也还穿夏布衫，听说想脱下它，还得两礼拜。

在上海时看见章雪村，他说想专卖《未名丛刊》(大约只是上海方面)，我没有答应他，说须得大家商量，以后就不提了。近来不知道他可曾又来信？他的书店，大概是比较的可靠的。但应否答应他，应仍由北京方面定夺。

迅 十、四

【评点】

鲁迅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文思自然也需要社会斗争来激发。他从斗争漩涡的中心，来到了孤立于海滨的学校，和社会隔离，失却了刺激，也就写不出文章来。而且因为编讲义，陷入古书堆中，也难以同时进行创作。这并非故作矫情，而是实况如此。他在同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说：“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这些话，从创作论的角度看起来，都很值得注意，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

另外，从鲁迅对于厦门景色的感受中，也可以悟出一些审美的规律来。厦门的景色是美丽的，但永远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这样的气候和这样的花草树木，也就显得单调了。正如他在《厦门通信（二）》中所说：“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不错，美应该是丰富、多样的，一陷入单调，也就很乏味了。

261010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来信后，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人间的纠葛真多，兼士直到现在，未在应聘书上签名，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一开毕，便往北京去，因为那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玉堂大不以为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我便从中调和，先令兼士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内再来厦门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又坚执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我只好退开。过了两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约也觉得除此更无别路了罢。现在此事只要经校长允许后，便要告一结束了。兼士大约十五左右动身，闻先将赴粤一看，再向上海。伏园恐怕也同行，至是否便即在粤，抑接洽之后，仍回厦门一次，则不得而知。孟余请他是办副刊，他已经答应了，但何时办起，则似未定。

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预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教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

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白果又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已喝了一点酒，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学校。昨天因为白果对书记们下条子（上谕式的），下午同盟罢工了，后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可谓糊涂。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

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一些，又因为见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预备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在此至少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但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

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爆。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中午同学生上饭厅，吃了一碗不大可口的面（大半碗是豆芽菜）；晚上是恳亲会，有音乐和电影，电影因为电力不足，不甚了然，但在此已视同宝贝了。教员太太将最新的衣服都穿上了，大约在这里，一年中另外也没有什么别的聚会了罢。

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

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

自从我到此之后，寄给我的各种期刊很杂乱，忽有忽无。我有时想分寄给你，但不见得期期有，勿疑为邮局失落。好在这类东西，看过便罢，未必保存，完全与否亦无什么关系。

我来此已一月余，只做了两篇讲义，两篇稿子给《莽原》；但能睡，身体似乎好些。今天听到一种传说，说孙传芳的主力兵已败，没有什么可用的了，不知确否。我想，一二天内该可以得到来信，但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

迅。十月十日。

【评点】

这里，反映了鲁迅的一个做人原则：尽可能地照顾别人，但也不想太委屈自己，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鲁迅是很重感情的。前信曾经言及，他因种种不如意事，提出要辞去国学院研究教授的兼职，据说林语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这是对他不起的”，于是，只好收下聘书，将辞意取消。现在，在展览碑碣拓片时，又遇到襄理黄坚的故意刁难，弄得大家狼狈不堪，所以他非坚决辞去国学院兼职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尽管如此，但因为林语堂一家人很为他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他仍不能决绝而去：“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在此至少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后来，他在厦门大学只教了半年就走了，那是各种不如意之事不断发生，实在无法呆下去了的缘故。

在北京听过年的鞭爆声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到厦门听

双十节的鞭爆声，“才觉得却也好听”。可见同是鞭爆，因何而放，意义便大有不同，而听者因情感的不同，对不同场合鞭爆声的感受也就大不一样。这就是审美的主观性在起作用，而这主观性又是有着明显的社会性的，此点似可作为美学研究的例证。鲁迅看北京人对于双十节的冷漠态度，很有反感，这在《头发的故事》中早就有所批评。作者借N先生的口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掀起一块班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从鲁迅对两地双十节的描述态度看，他对于辛亥革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本信亦有些修改。如第一段写到沈兼士不肯在应聘书上签字之事，云：“玉堂大不以为然”，原信是：“玉堂就大不谓然，甚至于说了许多气话（对我）。”删去后半句，显然系因某种人事关系；又如，第三段说：“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原信无“伏着”二字，加上此二字，加重对困境的描述也；此外，如第二段开头，“从我想”改为“据我想”，大概只是修辞上的原因。

261016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今天(十六日)刚寄一信，下午就收到双十节的来信了。寄我的信，是都收到的。我一日所寄的信，既然未到，那就恐怕已和《莽原》一同遗失。我也记不清那信里说的是什么了，由它去罢。

我的情形，并未因为怕你神经过敏而隐瞒，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原信作周览(鳗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兼士至于如此模胡，他请了一个朱山根，山根就荐三人，田难干(原信作陈乃乾)，辛家本，田千顷，他收了；田千顷又荐两人，卢梅，黄梅(原信作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另外又有一班教员，在作两种运动：一，是要求永久聘书，没有年限的；一，是要求十年二十年后，由学校付给养老金终身。他们似乎要想在这里建立他们理想中的天国，用橡皮做成的。谚云“养儿防老”，不料厦大也可以“防老”。

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记者之类亦有

来访，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而玉堂他们又要我在《国学季刊》上做些“之乎者也”，还有到学生周会去演说，我真没有这三头六臂。今天在本地报上载着一篇访我的记事，对于我的态度，以为“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觉得很出意料之外。这里的教员是外国博士很多，他们看惯了那俨然的模样的。

今天又得了朱家骅君的电报，是给兼士玉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已改职（当是“委”字之误）员制，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议定学制罢。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是不见得去的。我本来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所以十之九总是不能去了，这实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无论怎么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还有可笑的呢。田千顷并将他所照的照片陈列起来，几张古壁画的照片，还可以说是与“考古”相关，然而还有什么“牡丹花”，“夜的北京”，“北京的刮风”，“苇子”……。倘使我是主任，就非令撤去不可，但这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可见在此也惟有田千顷们相宜。又国学学院从商科借了一套历代古钱来，我一看，大半是假的，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我说，那么，应该写作“古钱标本”。后来也不实行，听说是恐怕商科生气。后来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看这假古钱的人们最多。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

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L. S. (原信署 H. M.) 十月十六日之夜。

【评点】

呼朋引类,拉帮结派之事,这里描述得更加清楚了。这也是中国靠引荐来用人之一大弊端。工作既靠引荐而得,则荐头就成了衣食父母,觅食者非投靠他不可,投靠之人一多,自然就结成了帮派。而为了保住饭碗,并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则势必排斥异己,于是,独立之学人,遂成攻击之对象矣。更令人讨厌者,此类帮派头头,总以学界领袖自居,其实却不过是学术把头而已,对学界之坏风气,很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学术应崇尚独立精神,故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时,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开一代学界新风。但蔡元培辞职之后,“北大精神”也就渐渐变质,某种势力膨胀,自然就不能兼容并包了。厦大是新办的学校,本应无此种人事纠葛,然而北京的势力渗透过来,“情形比北大还坏”。所以鲁迅在后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鲁迅之所感所述,看似琐细,实乃关系学界之大事也。

厦门本地报纸所载访问记,说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这很符合实际,确是鲁迅风格。而记者“觉得很出意料之外”者,正如鲁迅所说:“这里的教员是外国博士很多,他们看惯了那俨然的模样的。”其实不但是洋博士,就是土学者,也常装腔作势地端架子,他们误以为端架子是学者的必要条件,其实是想以架子来补充其学问之不足。真正有学问的人,是不摆派头,不端架子的,因为无需也。

261020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伏园今天动身了。我于十八日寄你一信，恐怕就在邮局里一直躺到今天，将与伏园同船到粤罢。我前几天几乎也要同行，后来中止了。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而且厦大也太过于闭关自守，此后还应该与他大学往还。玉堂正病着，医生说三四天可好，我便去将此意说明，他亦深以为然，约定我先去，倘尚非他不可，我便打电报叫他，这时他病已好，可以坐船了。不料昨天又有了变化，他不但自己不说去，而且对于我的自去也翻了成议，说最好是向校长请假。教员请假，向来是归主任管理的，现在他这样说，明明是拿难题给我做。我想了一想，就中止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話，谈话中常听见；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乳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几元，大约是大家都念念不忘的。我一走，至少需两星期，有些人一定将以为我白白骗去了他们半月薪水，玉堂之不愿我旷课，或者就因为顾虑着这一节。我已收了三个月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但倘计划远大，就不必拘拘于此，因为将来可以尽力之日正长。然而他们是眼光不远的，

我也不作久远之想，所以我便不走，拟于本年中为他们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到学术讲演会去讲演一次，又将我所辑的《古小说钩沈》献出，则学校可以觉得钱不白化，而我也可以来去自由了。至于研究教授，那自然不再去辞，因为即使辞掉，他们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别的工作，使收成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的，还是任它拖着的好。

“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闽南与闽北人之感情颇不洽，有几个学生极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

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于是佛化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花”之意。但此议竟未实行，否则和尚化为潘妃，倒也有趣。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

二十日下午。

写了以上的信之后，躺下看书，听得打四点的下课钟了，便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收得了十五日的来信。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那很好。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所以决计从此不瞪了。

这里近三天凉起来了，可穿夹衫，据说到冬天，比现在冷得不多，但草却已有黄了的。学生方面，对我仍然很好；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

或者下月要印出来。至于工作，我不至于拚命，我实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

你不会起草章程，并不足为能力薄弱之证据。草章程是别一种本领，一须多看章程之类，二须有法律趣味，三须能顾到各种事件。我就最怕做这东西，或者也非你之所长罢。然而人又何必定须会做章程呢？即使会做，也不过一个“做章程者”而已。

据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盖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遂还是找不到事做，真是可叹，我不得已，已嘱伏园面托孟余去了。

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确的。浙江确也独立了，上海附近也许又要小战，建人又要逃难，此人也是命运注定，不大能够安逸的，但走几步便是租界，大概不要紧。

重九日这里放一天假，我本无功课，毫无好处；登高之事，则厦门似乎不举行。肉松我不要吃，不去查考了。我现在买来吃的，只是点心和香蕉，偶然也买罐头。

明天要寄你一包书，都是零零碎碎的期刊之类，历来积下，现在一总寄出了。内中的一本《域外小说集》，是北新书局新近寄来的，夏天你要，我托他们去买，回说北京没有，这回大约是碰见了，所以寄来的罢，但不大干净，也许是久不印，没有新书之故。现在你不教国文，已没有用，但他们既然寄来，也就一并寄上，自己不要，可以送人的。

我已将《华盖集续编》编好，昨天寄去付印了。

迅。二十日灯下。

【评点】

这里所说：“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乳一般”，和前信所说的：“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都反映出当时厦大当局的眼光短浅。当局的眼光不远，不思长远建设，急于事功，要教员从速拿出许多成绩来，结果只能鼓励出弄虚作假之风。前信所说，国学院以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显然是为了应付上面要看成果的要求；有人以风景照来参展，冒充国学研究成果，居然能被接纳，则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成果可展之故；于是，又从商学院借得假古钱来当真货展出，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结果。这样的弄虚作假，哪里能办得好学校呢？鲁迅在杂文《通讯》里曾经说过：“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大约学校当局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教员的；好的教员，或者反而容易被挤掉。鲁迅在信中说：“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又说：“我也不作久远之想”，即此之谓也。

鲁迅所讽之事，虽然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纪，但似乎还不能以历史的陈迹视之，因为内中所说，我们今天也并不陌生，所以鲁迅的批评，至今还有生命力。鲁迅在信中向爱人诉说的对厦大的不满，似乎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发牢骚，里面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本信除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如第一段末尾“使收成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的，还是任它拖着的好”，原信为“使利息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不会给我便宜的，倒是任它拖着的好”；第二段开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原信为“此地研

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等等而外，还有两大段的删节：

一是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原信有这样一段：“关于银钱的推测，你也许以为我神经过敏，然而这是的确的。当兼士要走的时候，玉堂托我挽留，不得结果。玉堂便愤愤地对我道：他来了这几天就走，薪水怎么报销。兼士从到至去，那时诚然不满二月，但计画规程，立了国学院基础，费力最多，以厦大而论，给他三个月薪水，也不算多。今乃大有索还薪水之意，我听了实在倒抽了一口冷气。现在是说妥当了，兼士算应聘一年，前薪不提，此后是再来一两回；不在此的时候不支薪。他月底要走了。”删去此段，显然是为了照顾林语堂的面子，和林语堂与沈兼士的关系。

二是倒第五段，“据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原信无“据”字，而在这之前，却删去这样一大段：“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今年科学会在广州开会，即是一证，该会还不是多是灰色的学者么？科学在那里？而广州则欢迎之矣。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这里，鲁迅脑子里所存的还是早期民党的印象，对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作为革命力量看待，所以有此议论，并不奇怪。此处所论，可与他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参阅。而当1932年编辑《两地书》，准备公开出版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已经变质，蒋介石成为新的独裁者，他们不但不去打击旧势力，而且联合旧势力来打击革命力量。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也由支持而变为反对，所以就将这段话删掉了。

261021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我今天上午刚发一信，内中说到厦门佛化青年会欢迎太虚的笑话，不料下午便接到请柬，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并邀我作陪，自然也还有别的人。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槃”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

这样，总算白吃了一餐素斋。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听说这是厦门的特别习惯，福州即不然。

散后，一个教员和我谈起，知道有几个这回同来的人物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因为从他们的语气里，他已经听得出来，而且他们似乎还同他去联络。他于是叹息说：“玉堂敌人颇多，但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你两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

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你，一面又个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糊涂”云云。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他们误以为那些人们倒是兼士和我的士卒，我们是给他们来打地盘的），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序，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自做我的事，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兴。至于玉堂，我大概是爱莫能助的了。

二十一日灯下。

十九的信和文稿，都收到了。文是可以用的，据我看来。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处，这是小姐们的普通病，其病根在于粗心，写完之后，大约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过一两天，改正了寄去罢。

兼士拟于廿七日动身向沪，不赴粤；伏园却已走了，打听陈惺农，该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为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我不是雇了一个工人么？他却给这工人的朋友介绍，去包什么“陈源之徒”的饭，我教他不要多事，也不听。现在是“陈源之徒”常常对我骂饭菜坏，好像我是厨子头，工人则因为帮他朋友，我的事不大来做了。我总算出了十二块钱给他们雇了一个厨子的帮工，还要听埋怨。今天听说他们要不包了，真是感激之至。

上遂的事，除嘱那该打的伏园面达外，昨天又同兼士合写了一封信给孟余他们，可做的事已做，且听下回分解罢。至于我的别处的位置，可从缓议，因为我在此虽无久留之心，但目前也还没有决

去之必要，所以倒非常从容。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泰，决非欲“骗人安心，所以这样说”的：切祈明鉴为幸。

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也已经开始了，因国学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屋，所以他们的第一着是讨还房子。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大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此校大约颇与南开相像，而有些教授，则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也。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此胜于彼者，惟不欠薪水而已。然而“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关门也。

我所住的这么一所大洋楼上，到夜，就只住着三个人：一张颐教授，一伏园，一即我。张因不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伏园又已走，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观默想，所以精神上倒并不感到寂寞。年假之期又已近来，于是就比先前沉静了。我自己计算，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但这不只我，兼士们也这样说，则生活之单调可知。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

浙江独立，是确的了；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仗，那么，陈在徐州也独立了，但究竟确否，却不能知。闽边的消息倒少听见，似乎周荫人是必倒的，而民军则已到漳州。

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

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

此地天气凉起来了,可穿夹衣。明天是星期,夜间大约要看影戏,是林肯一生的故事。大家集资招来的,需六十元,我出一元,可坐特别席。林肯之类的故事,我是不大要看的,但在这里,能有好的影片看吗?大家所知道而以为好看的,至多也不过是林肯的一生之类罢了。

这信将于明天寄出,开学以后,邮政代办所在星期日也办公半日了。

L. S. (原信署 H. M.) 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评点】

厦大那位教员对于国学院人事的分析,十分深刻。北京同来的人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地盘,在使劲地排斥鲁迅,殊不知鲁迅一走,林语堂就会支持不住,国学院就要动摇,而林语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鲁迅走后,林语堂就无法支撑,不久也离开了厦大,那些准备作久长之计的人,也只好卷铺盖走人。

然而这情形不独厦大为然,可以说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某种悖论:强者一般总有容人之量,他有自信,心态也好,无需排斥他人;喜欢排斥他人者,每每自感缺乏竞争

力，总好像被别人压住一般，所以千方百计要打击或挤走他人，而将学力或能力较强的人挤走之后，他自己却难以支撑局面，结果是败坏了事业，自己或者也被人赶走。然而，当事者却很难看清这一点，所以此类事就会不断地出现。

本信所作的删改，较重要的有：

21 日所写第一段：“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之后，删去一句：“只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而不戴帽，乃敝人近日之服饰也。”此语表示对这种应酬，很不情愿，极不重视也。

第三段：“知道有几个这回同来的人物之排斥我”，原信为：“知道那些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原信为“这学校，就如一坐梁山泊，……”；“他们误以为那些人们倒是兼士和我的士卒”，原信为：“他们以为小鬼们是兼士和我的士卒”；在“吃苦的还是玉堂”之后，原信还有：“玉堂一失势，他们也就完，现在还欣欣然自以为得计，真是愚得可怜。”

23 日所写第二段：“伏园却已走了，打听陈惺农，该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为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原信为：“伏园却已走了，问陈惺农一定可以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我以为你殊不必为他出力，他总善于给别人一点长远的小麻烦。”这里，对于孙伏园的描述倒是增加了许多，大概随着时间的变迁，鲁迅对孙伏园的印象愈来愈坏了。本段后面“好像我是厨子头”几个字亦是后加的，“还要听埋怨”原为“还要听费话”。增加和修改的原因，则是为了更强烈地表达不满情绪。

第五段：“张颐教授”下原有注云：“（上半年在北大，似亦民党，人很好）”，删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对“民党”的看法有了变化；下面“但我却可以静观默想，所以精神上倒并不感到寂寞”句，

则原信为：“但我却可以静坐着默念 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删改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不愿使字句间爱情的色彩太显，但这样一来，文辞的意义就有所改变，因为“静观默想”的范围太广泛了，读者未必会猜到他这是在默念所爱者。

倒第三段，则改动得更多。原信为：“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他们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陪着玩了，先前也陪得够苦了，所以拟置之不理。（闹的原因是因为莽原上不登培良的一篇剧本。）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但此地的几个学生，已组织了一种出版物，叫作《波艇》，要我看稿，已经看了一期，自然是幼稚，但为鼓动空气计，所以仍然怂恿他们出版。逃来逃去，还是这样。”出版时，将“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改为“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将“他们真是吃得闲空”，改为“这真是吃得闲空”；将“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改为“这几年，生命耗去不少”等等，很明显，原来是对双方都有些不满，经修改后，明确地将责任归于高长虹这一边。这是由于几年以来，鲁迅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的缘故。至于删去厦大学生要他为《波艇》看稿事，大概是不愿将此事与高长虹事并提，对厦大学生存爱护之故。

26102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五日信收到了，知道斐君太太出版延期，为之恍然。其实出版与否，与我无干，用“恍然”殊属不合，不过此外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字。总而言之，是又少拿多少薪水，颇亦可惜之意也。至于瞿英乃之说，那当然是靠不住的，她的名字我就讨厌，至于何以讨厌，却说不出来。

伏园“叫苦连天”，我不知其何故也。“叫苦”还是情有可原，“连天”则大可不必。我看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燉牛肉，“做鸡蛋糕”，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燉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

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你将来最好是随时预备走路，在此一日，则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

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

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玉堂还太老实，我看他将来是要失败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但他们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们是站不住的。

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但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

我现在寄居在图书馆的楼上，本有三人，一个搬走了，伏园又去旅行，所以很大的洋楼上，只剩了我一个了，喝了一瓶啤酒，遂不免说酒话，幸祈恕之。

迅 上 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斐君太太尊前即此请安不另，如已出版，则请在少爷前问候。

【评点】

章廷谦，字矛尘，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时曾参加《语丝》工作，鲁迅说他那时“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常以逗笑之语与他说话，而且还要叫他的绰号：一撮毛。当《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时，鲁迅在给章廷谦的赠书上，就题有这样有趣的诗句：

请你

从“情人的拥抱里”

暂时汇出一只手来，

接收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

二三，十二，十三。

这是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朋友所开的玩笑。其中，“中国小说史略”六个字，就利用了书中扉页上铅字印好的书名，真是巧妙的设计！

鲁迅给章廷谦写信，也常以戏谑之语出之。本信中将章太太的分娩说成“出版”，在别的信中，又说是“发表”，都令人发噱，也见出文化人的本色。但在通篇谐谑的书信中，却将要转达的情况和欲告诫之语，都说清楚了。鲁迅对厦大虽然不满，但认为章廷谦为了薪水，还是应该到厦大来，只要随时准备走路，则“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鲁迅说得非常实际，为青年朋友着想，决不唱高调也。

26102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廿三日得十九日信及文稿后，廿四日即发一信，想已到。廿二日寄来的信，昨天收到了。闽粤间往来的船，当有许多艘，而邮递信件，似乎被一个公司所包办，惟它的船才带信，所以一星期只有两回，上海也如此。我疑心这公司是太古。

我不得同意，不见得用对付少爷们之法，请放心。但据我想，自己是恐怕决不开口的，真是无法可想。这样食少事烦的生活，怎么持久？但既然决心做一学期，又有人来帮忙，做做也好，不过万不要拚命。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我早已有些想到过，你这次出去做事，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们来访问你的，或者自称革命家，或者自称文学家，不但访问，还要要求帮忙。我想，你是会去帮的，然而帮忙之后，他们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恨，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这一点即等于不帮，你说竭力的帮了，乃是你吝啬的谎话。将来或有些失败，便都一哄而散，甚者还要下石，即将访问你时所见的态度，衣饰，住处等等，作为攻击之资，这是对于先前的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大约也正要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恍然大悟，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其实呢，就是你现在见得可怜的所谓“妇孺”，恐怕也不在这例外。

以上是午饭前写的。现在是四点钟，今天没有事了。兼士昨天已走，早上来别。伏园已有信来，云船上大吐（他上船之前喝了酒，活该！），现寓长堤的广泰来客店，大概我信到时，他也许已走了。浙江独立已失败，那时外面的报上虽然说得热闹，但我看见浙江本地报，却很吞吐其词，好像独立之初，本就灰色似的，并不如外间所传的轰轰烈烈。福建事也难明真相，有一种报上说周荫人已为乡团所杀，我看也未必真。

这里可穿夹衣，晚上或者可加棉坎肩，但近几天又无需了。今天下雨，也并不凉。我自从雇了一个工人之后，比较的便当得多。至于工作，其实也并不多，闲工夫尽有，但我总不做什么事，拿本无聊的书玩玩的时候多，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不容易睡着，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而且遇有来催我做文章的，大抵置之不理，做事没有上半年那么急进了，这似乎是退步，但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什么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

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全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会招到诘讫，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着，颞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玉堂病已好了。白果已往北京去接家眷，他大概决计要在这里安身立命。我身体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绪比先前较安帖。

迅。十月二十八日。

【评点】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多次提到这样意思的话：工作应该是努力的，但亦不可拼命地干。如1926年9月30日信中说：“我想，做事自然是应该做的，但不要拼命地做才好。”10月4日信中又说：“你初作事，要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什么，但也须兼顾自己，不要‘鞠躬尽瘁’才好。”在本信中，鲁迅又劝许广平“万不要拼命”，说：“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这不但是对所爱者的关爱之辞，而且也说出了鲁迅的另一条做人准则。鲁迅是反对鼓励别人去拼命工作的，因为无谓的去拼命，不但对工作并无好处，而且还会供养一些懒汉，于社会更有坏处。所以他认为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善于保护自己。这是务实的观点，值得倡导。那种叫人拼命地鼓干劲，不讲实效，不爱护群众积极性的做

法，实际上是为害无穷的。

至于信中所写，为了要看看有刺的铁丝网有怎样的拦阻力，就跳了一回试试，结果刺了两处小伤；为防蛇咬，晚间不到楼下去小便，“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实在妙极！盖当时厦大的房屋设计很特别，大楼内不设厕所，人们大小便要走很远的路，晚间尤其不便，故鲁迅自谓：“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这位名教授不但不俨乎其然地摆架子，而且简直极富童趣，真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本信除个别文词的改动外，还有几处小删改和一处大删改。

几处小删改为：第二段开头，原信为“我不得许可，不见得用对付三先生之法，请放心”，出版时改为：“我不得同意，不见得用对付少爷们之法，请放心”，隐去为周建人寄钱事；第三段末，“催我作文”之后，删去一句：“我才知道牺牲一部分给人，是不够的，总非将你消磨完结，不肯放手”，这里不但表示对高长虹的不满，而且也表示出对未名社诸君的不满；第五段，“兼士昨天已走，早上来别”之后，删去几句：“乃云玉堂可怜，如果可以敷衍，就维持维持他。至于他自己呢，大概是不再来，至多，不过是再来转一转而已。”

一处大删改，为第四段，原信是这样的：“我早已有点想到，亲戚本家，这回要认识你了，不但认识，还要要求帮忙，帮忙之后，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愤，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即使竭力地帮了，也等于不帮。将来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过你的帮助；或者还要下石，这是对于先前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似乎也正在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就更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

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这里可以见出鲁迅对于中国家族制度所形成的亲戚本家关系的认识，很有启示作用，因为这种关系至今还在中国到处存在着，像一条无形的葛藤，纠缠着人们。可惜在出版时为了避开许家的关系，改为针对来访的“自称革命家”或“自称文学家”者而言，意思便完全不同了。其中所说：“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则使我们想起了《呐喊》自序中那句名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非常重要。

261029 致陶元庆

璇卿兄：

今天收到二十四日来信，知道又给我画了书画，感谢之至。惟我临走时，曾将一个武者小路作品的别的书面交给小峰，嘱他制板印刷，作为《青年的梦》的封面。现在不知可已印成，如已印成，则你给我画的那一个能否用于别的书上，请告诉我。小峰那边，我也写信问去了。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但第二版我还未见过，这是从通信里知道的。

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画，我自然也很希望。现在就都开列于下：

一 《卷施》 这是王品青所希望的。乃是淦女士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施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品青希望将书名“卷施”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此稿大约日内即付印，如给他画，请直寄钦文转交小峰。

二 《黑假面人》 李霁野译的安特来夫戏剧，内容大概是一

个公爵举行假面跳舞会，连爱人也认不出了，因为都戴着面具，后来便发狂，疑心一切人永远都戴着假面，以至于死。这并不忙，现在尚未付印。

三 《坟》 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样写：^{鲁迅}墳（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
1907—25

所作）请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以上两种是未名社的，《黑假面人》不妨从缓，因为还未付印。《坟》如画成，请寄厦门，或寄钦文托其转交未名社均可。

还有一点，董秋芳译了一本俄国小说革命以前的，叫作《争自由的波浪》，稿在我这里，将收入《未名丛刊》中了，可否也给他一点装饰。

一开就是这许多，实在连自己也觉得太多了。

鲁迅 十月二十九日

【评点】

观此信所言，可知鲁迅对于书籍的封面装帧，是何等的认真，对于他人的艺术劳动又是何等的尊重。他在同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及此事道：“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此时，鲁迅已是文化名人，但他对青年晚辈，仍很平易，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觉得别人为他办事是应该的，所以才有如此客气的口吻。

261101 致许广平

广平兄(按：原信称“林”兄)：

十月廿七的信，今天收到了；十九，二十二，二十三的，也都收到。我于廿四，廿九，卅日均发信，想已到。至于刊物，则查载在日记上的，是廿一，廿，各一回，什么东西，已经忘却，只记得有一回内中有《域外小说集》。至于十月六日的刊物，则不见于日记上，不知道是失载，还是其实是廿一所发，而我将月日写错了。只要看你是否收到廿一寄的一包，就知道，倘没有，那是我写错的了；但我仿佛又记得六日的是别一包，似乎并不是包，而是三本书对叠，像普通寄期刊那样的。

伏园已有信来，据说上遂的事很有希望，学校的别的事情却没有提，他大约不久当可回校，我可以知道一点情形，如果中大定要我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就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此处别的都不成问题，只在对不对得起玉堂。但玉堂也太糊涂——不知道还是老实——至今还迷信着他的“襄理”，这是一定要糟的，无药可救。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至于学校方面，则这几天正在大敷衍马寅初。昨天浙江学生欢迎他，硬要拖我去一同照相，我竭力拒绝，他们颇以为怪。呜呼，我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也，其如“道不同不相为谋”何。明天是校长赐宴，陪客又有我，他

们处心积虑，一定要我去和银行家扳谈，苦哉苦哉！但我在知单上只写了一个“知”字，不去可知矣。

据伏园信说，副刊十二月开手，那么，他回校之后，两三礼拜便又须去了，也很好。

十一月一日午后。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此地这几天很冷，可穿夹袍，晚上还可以加棉背心。我是好的，胃口照常，但菜还是不能吃，这在这里是无法可想的。讲义已经一共做了五篇，从明天起，想做季刊的文章了。

迅。十一月一日灯下。

【评点】

鲁迅从他的实际经验出发，感到写文章和教书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这大概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着不同的特点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些

冲突。所以在同年 10 月 29 日致李霁野的信中，他还曾说过：“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鲁迅自己觉得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能做，而且自信都可以对中国社会作出贡献，但却只能以一方面为主，这就很使鲁迅犹豫。后来到上海，他辞谢了各大学的邀请，不再教书，专事写作，就是这一考虑的结果。

本信有几处重要删改：

第二段：“但玉堂也太胡涂——不知道还是老实——至今还迷信着他的‘襄理’，这是一定要糟的，无可救药。”原信为：“但玉堂也太胡涂——不知道还是老实——无药可救。昨天谈天，有几句话很可笑。我之讨厌黄坚，有二事，一，因为他在食饭时给我不舒服；二，因为他令我一个人挂拓本，不许人帮忙。而昨天玉堂给他辩解，却道他‘人很爽直’，那么，我本应该吃饭受气，独自陈列，他做的并不错，给我帮忙和对我客气的，倒都是‘耶曲’的了。黄坚是玉堂的‘襄理’，他的言动，是玉堂应该负责的，而玉堂似乎尚不悟。现黄坚已同兼士赴京，去接家眷去了，已大有永久之计，大约当与国学院同其始终罢。”接下去，“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原信为“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且另起一段；“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原信为：“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

最后一段之前，删去两小段：“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季黻是很细密的，可惜他文章不辣。办了副刊鼓吹起来，或者会有新手出现。”“你的一篇文章，删改了一点寄出去了。建人近来似乎很忙，写给我的信都只草草的一点，我疑心他的朋友又到上海了。所以他至于无心写信。”

最后一段，又删去最后一句：“我想在离开此地之前，给做一篇季刊的文章，给在学术讲演会讲演一次，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听的。”

261103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今天接到一篇来稿，是上海大学的女生曹轶欧寄来的，其中讲起我在北京穿着洋布大衫在街上走的事，下面注道，“这是我的朋友 P. 京的 H. M. 女校生亲口对我说的”。P. 自然是北京，但那校名却奇怪，我总想不出是那一个学校来。莫非就是女师大，和我们所用是同一意义么？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有一个留学生在东京自称我的代表去见盐谷温氏，向他索取他所印的《三国志平话》，但因为书尚未装成，没有拿去。他怕将来盐谷氏直接寄我，将事情弄穿，便托 C. T. 写信给我，要我追认他为代表，还说，否则，于中国人之名誉有关。你看，“中国人的名誉”是建立在他和我的说谎之上了。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的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从昨天起，山根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滿）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

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极其神出鬼没，似乎不来，似乎并非不来，而且立刻要来，于是乎终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迅。十一月三日大风之夜。

十月卅日的信，今天收到了。马又要发脾气，我也无可奈何。事情也只得这样办，索性解决一下，较之天天对付，劳而无功的当然好得多。教我看戏目，我就看戏目，在这里也只能看戏目，不过总希望勿太做得力尽神疲，一时养不转。

今天有从中大寄给伏园的信到来，可见他已经离开广州，但尚未到，也许到汕头或福州游玩去了。他走后给我两封信，关于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见中大的考试委员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内，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去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几个人却要他接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没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自己的工钱，都已豫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自己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只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帐也在向我索取。我本来不善于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这些代付和豫支的款，不消说是不能收回的，所以在十月这一个月中，我就是每日得一盆脸水，吃两

顿饭，而共需大洋约五十元。这样贵的听差，用得下去的么？“解铃还仗系铃人”，所以这回伏园回来，我仍要他将事情弄清楚。否则，我大概只能不再雇人了。

明天是季刊文章交稿的日期，所以我昨夜写信一张后，即开手做文章，别的东西不想动手研究了，便将先前弄过的东西东抄西撮，到半夜，并今天一上午，做好了，有四千字，并不吃力，从此就又玩几天。

这里已可穿棉坎肩，似乎比广州冷。我先前同兼士往市上去，见他买鱼肝油，便趁热闹也买了一瓶。近来散拿吐瑾吃完了，就试服鱼肝油，这几天胃口仿佛渐渐好起来似的，我想再试几天看，将来或者就改吃这鱼肝油（麦精的，即“帕勒塔”）也说不定。

迅。十一月四日灯下。

【评点】

鲁迅所说的这种阴鸷小人，在社会上并不少见。他们热衷于钻营倾轧，自然不能专心于学问；但也正因为学术上浅薄，他们就更加要在钻营倾轧上用功夫，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认真做学问的学者，对于这类人也实在难于对付。若与此辈周旋，则诚如鲁迅所说，必然要放下别的事情，另用一番心思，以致抛荒本业；若不与之周旋，则此辈终日惹是生非，也着实讨厌，而且有害。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信中常提及此类事者，实在是被骚扰得不得安宁之故也。后来他似乎想出了对付之法，即并不认真对待，而徐徐扑之。他曾对人说，如果你在行路，有一群蚊虫扑面而来，你不必停下来打，这样你首先就浪费了时间，而可以边走边打，这样就不至于影响走路了。此法甚妙，可以应用。人生应该有一定的目标，事

业也需有相当的计划，不能因对付无聊之徒，处理无谓之事，而停顿不前，最好是边前进边对付之。

本信较大的修改之处有：

3 日所写信中，第二段：“他怕将来盐谷氏直接寄我，将事情弄穿，便托 C. T. 写信给我，要我追认他为代表，还说，否则，于中国人之名誉有关。你看，‘中国人的名誉’是建立在他和我的说谎之上了。”原信为：“他怕事情弄穿，事后才写信到我这里来认错。你看他们的行为是多么荒唐，无论什么都要利用，可怕极了。”

第三段：“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下删去一句：“（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朱山根”原为“顾颉刚”；两处“‘现代’派”，原信均为“研究系”；“真是可怕可厌”，原信为：“真是可怕可恨”；“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原信为：“譬如要我对付”；“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原信为：“所做的事就浮浅了”。

4 日所写信中，第二段末：“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原信为：“大约正不必再需别人，我似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了”。

第三段，“这些代付和豫支的款，不消说是不能收回的，所以在十月这一个月中，我就是每日得一盆脸水，吃两顿饭，而共需大洋约五十元”，原信为：“这些代付和豫支的款，将来如能取回，则无须说，否则，在十月一月之内，我就是每日早上得一盆脸水，吃两顿饭，共需大洋约五十元”。

第四段末一句：“从此就又玩几天”，原信为：“从此就豫备玩几天”，并删去以下文字：“默念着一个某君，尤其是独坐在电灯下，窗外大风呼呼的时候。”

261106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昨上午寄出一信，想已到。下午伏园就回来了，关于学校的事，他不说什么。问了的的结果，所知道的是：（1）学校想我去教书，但无聘书；（2）上遂的事尚无结果，最后的答复是“总有法子想”；（3）他自己除编副刊外，也是教授，已有聘书；（4）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现代”派。这样看来，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但总当于阴历年假去走一回，这里阳历只放几天，阴历却有三礼拜。

李逢吉前有信来，说访友不遇，要我给他设法介绍，我即寄了一封介绍于陈惺农的信，从此无消息。这回伏园说遇诸途，他早在中大做职员了，也并不去见惺农，这些事真不知是怎么的，我如在做梦。他寄一封信来，并不提起何以不去见陈，但说我如往广州，创造社的人们很喜欢云云，似乎又与他们在一处，真是莫名其妙。

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又有“桂花蝉”和“龙虱”，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厦门也有这两种东西，但不吃。你吃过么？什么味道？

以上是午前写的，写到那地方，须往外面的小饭店去吃饭。因为我的听差不包饭了，说是本校的厨子要打他（这是他的话，确否

殊不可知)，我们这里虽吃一口饭也就如此麻烦。在饭店里遇见容肇祖（东莞人，本校讲师）和他的满口广东话的太太。对于桂花蝉之类，他们俩的主张就不同，容说好吃的，他的太太说不好吃的。

六日灯下。

从昨天起，吃饭又发生了问题，须上小馆子或买面包来，这种问题都得自己时时操心，所以也不大静得下。我本可以于年底将此地决然舍去，我所迟疑的是怕广州比这里还烦劳，认识我的人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

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做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这也不过是近一两天如此，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的。

今天大风，仍为吃饭而奔忙；又是礼拜，陪了半天客，无聊得头昏眼花了，所以心绪不大好，发了一通牢骚，望勿以为虑，静一静又会好的。

明天想寄给你一包书，没有什么好的，自己如不要，可以分给别人。

迅。十一月七日灯下。

昨天在信上发了一通牢骚后，又给《语丝》做了一点《厦门通信》，牢骚已经发完，舒服得多了。今天又已约定一个厨子包饭，每月十元，饭菜还过得去，大概可以敷衍半月一月罢。

昨夜玉堂来打听广东的情形，我们因劝其将此处放弃，明春同赴广州。他想了一会，说，我来时提出条件，学校一一允许，怎能忽然不干呢？他大约决不离开这里的了。但我看现在的一批人物，国学院是一定没有希望的，至多，只能小小补苴，混下去而已。

浙江独立早已灰色，夏超确已死了，是为自己的兵所杀的，浙江的警备队，全不中用。今天看报，知九江已克，周凤岐（浙兵师长）降，也已见于路透电，定是确的，则孙传芳仍当声势日蹙耳，我想浙江或当还有点变化。

L. S.（原信署 H. M.）十一月八日午后。

【评点】

鲁迅毕竟是一个战斗的作家，厦门大学的薪水虽多，但是地处海隅，与世隔绝，正如他在别的信中所说，有“费”而无生活，激发不起文思，对他并不合适。何况无聊之事，却复不少。所以他并不在乎收入的多少，愿意到工资少的中山大学去。因为广州当时号称“革命策源地”，该有一番新气象吧。他想到那里去，投入新的战斗，对研究系的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并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向旧社会进攻。但是世事实难料，广州并不如他所想像的那么好，而一年多后，创造社却把他当作革命对象，加以批判，火力之猛，前所未有的。但新的生活阅历，也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本信的重要修改之处有：

6日所写信，第一段：“（4）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现代’

派。这样看来，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原信为：“(4)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顾颉刚。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则电邀之，对于热心办事如季黻者，说了许多回，则懒懒地不大注意，似乎当局者于看人一端，很不了然，实属无法。所以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

7日所写信，第一段：“认识我的人们也多”，原为：“认识我的少爷们也多”。

第二段：“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得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便竭力攻击，……”原信为：“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也就是被用的器具之一，倘再加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前回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几篇。我为了别人，牺牲已不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便自然竭力攻击，……”这里，对孙伏园所说的话，口气改了，针对莽原社的批评，也改为泛指了。

第三段：“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原信为：“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原信为：“同创造社联络”；“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原信为：“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便又不作此想了”，原信为：“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就很心灰意懒了”。

在写信日期“十一月七日灯下”后，删去附注一句：“明天想寄给你一包书，没有什么好的，自己如不要，可以分给别人。”

8日所写信，第二段末句：“但我看现在的一批人物，国学院是一定没有希望的，至多，只能小小补苴，混下去而已”，原信为：“所以我看他对于国学院现状，似乎颇满足，既无决然舍去之心，亦

无彻底改造之意，不过小小补苴，混下去而已。他之不能活动，而必须在此，似与太太很有关系，太太之父在鼓浪屿，其兄在此为校医，玉堂之来，关系彼力荐，今玉堂之二兄一弟，亦俱在校，大有生根之概，自然不能动弹了。”原信对于林语堂的情况分析得更透，但不便公开发表，故在出版时作了很大的删改。

261115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次日即得七日来信，略略一懒，便迟到今天才写回信了。

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者，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很容易的。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也就往往有之。

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

(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我还要子细的看看。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简略的告知几句就好。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认为非军阀帮闲的，就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还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余地。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

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气稍凉。我仍然好的,也不怎么忙。

迅。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评点】

鲁迅虽然在愤激时几乎要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的话,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鲁迅一向很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特别是对于青年,扶持尤力。在北京时,他一边吃药,一边给别人看稿,改稿,编书,校对,将自己的生命,割碎在这些事情上。但后来却发现有些青年其实是在利用他,一到以为无可利用时,就加以诘责和攻击,这使他很伤心。特别是莽原社内哄,高长虹在《狂飚》周刊上指名大骂,这更使鲁迅愤慨。静夜自思,觉得将生命消耗在这些事上,很不值得,因此,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认真地提出了几种方案。这可见当时所遇之事对他伤害之深。但鲁迅毕竟是人道主义者,他又觉得,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所以他仍旧帮助青年看稿,打杂,对厦大学生所出《波艇》月刊,仍取扶持态度,后来到上海,也仍支持青年人的工作。

本信修改较多。第四段(“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进行了全面的改动。原信为:“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一些人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每月要做些文章。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还是帮的意思。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已尽力

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现在看来，山西人究竟是山西人，还是吸血的。”对照两个版本的文字，除了第一句将“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改为“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在语气上大不相同，和最后一句因有骂倒一切山西人之嫌，故删去之外，其他的文字，意思未变，而经过补充之后，则愤懑之情就表达得更清楚了。

最后第二段前半部分：“我在静夜中，……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也改动很大。原信为：“我又有种感触，觉得现在的社会，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是这么忙，来客不绝，但倘一失脚，这些人便是投井下石的，反面不识还是好人；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所以我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后半部分还有些小修改，如：（一）“积几文钱”之前，原信无“死了心”三字；（三）“再做一件事”原信为“再做一点事”，后面删去一句：“（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原信为：“倘同人排斥我了，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事都敢做”。

26111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已到。十二日发的信，今天收到了。校事已见头绪，很好，总算结束了一件事。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教我很难代下断语。你初出来办事，到各处看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到太不熟悉的地方去，或兼任的事情太多，或在一个小地方拜帅，却并无益处，甚至会变成浅薄的政客之流。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仍旧愿在广州，抑非走开不可，倘非决欲离开，则伏园下月中旬当赴粤，我可以托他问一问，看中女生指导员之类有无缺额，他一定肯介绍的。上遂的事，我也要托他办。

曹轶欧大约不是男生假托的，因为回信的地址是女生宿舍，但这些都不成问题，由它去罢。中山生日的情形，我以为和他本身是无关的，只是给大家看热闹；要是我，实在是“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恐怕连盛大的提灯会也激不起来的了。但在这里，却也太没有生气，只见和尚自做水陆道场，男男女女上庙拜佛，真令人看得索然气尽。我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我和种种文学团体的关涉，讲一个大略，但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至于真正的用功，却难，这里无须用功，也不是用功的地方。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

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此没有后文。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

我虽然早已决定不在此校，但时期是本学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没有定，现在是至迟至本学期末非走不可了。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校员恳亲会，我是向来不到那种会去的，而一个同事硬拉我去，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竟有人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帖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要立刻跳起来，但已有别一个教员上前驳斥他了，闹得不欢而散。

还有希奇的事情，是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他说，在西洋，父子和朋友不大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这人是西洋留学生，你看他到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样的大识见。

昨天的恳亲会是第三次，我却初次到，见是男女分房的，不但分坐。

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计要走了，但我不想以这一件事为口实，且仍于学期之类作一结束。至于到那里去，一时也难定，总之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耐烦，不诚恳。

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到武昌或广州做事去。但看来大半是无效的，这里是他的故乡，他不肯轻易决绝，同来的鬼祟又遮住了他的眼睛，一定要弄到大失败才罢，我的计画，也不过聊尽同事一场的交情而已。

迅。十八，夜。

【评点】

本信增删之处很多，改动的幅度较大。如：

第一段，“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以下，即多有改动。原信为：“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叫我很难下批评。你脾气喜欢动动，又初出来办事，向各处看看，办几年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于自己，却恐怕没有好处，结果变成政客之流。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毁损身心不少。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要在政界呢还是学界。伏园下月中旬当到粤，我想如中大女生指导员之类有无缺额，或者（由我）也可以托他问一问，他一定肯出力的。季黻的事，我也要托他办。”出版时，将自己的两种矛盾思想全部删去，而对许广平此后去向的意见，也有些改动。

第二段，关于曹轶欧事，字句有些改动，而意思未变；中山生日提灯会事，字句和语序都有些改变，有些地方，意思也并不一样，如说此事和他本身是无关的，“只是给大家看热闹”，此句原为“但于别人有益”，原句含义似乎更广，可指别人利用中山生日来为自己作宣传，不但给大家看看热闹而已；又说，要是我，“恐怕连盛大的提灯会也激不起来的了”，原信无此句；却删去了另一句：“默坐电灯下，还要算我的生趣，何得‘打’之，莫非并‘默念’也不准吗？”下文说：“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我和各种文学团体的关涉，讲一个大略，但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原信为：“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

第三段，说有“一个同事”硬拉他去参加恩亲会之事，原信写明

此人是林语堂的哥哥，出版时不但删去人名，而且文字也大有改变，这当然是为照顾林语堂的关系。原信是：“下午有恳亲会，我向来不赴这宗会的，而玉堂的哥哥硬拉我去。（玉堂有二兄一弟在校内。这是第二个哥哥，教授兼学生指导员，每开会，他必有极讨人厌的演说）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他又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之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就要跳起来，但立即想到他是玉堂的哥哥，我一翻脸，玉堂必大为敌人所笑，我真是‘哑子吃苦瓜’，说不出的苦，火焰烧得我满脸发热。照这里的人看起来，出来反抗的该是我了，但我竟不动，而别一个教员起来驳斥他，闹得不欢而散。”鲁迅一向疾恶如仇，而且最讨厌奴才思想，要他隐忍不发，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见当时他多么为林语堂着想呀！

接下来的第四段，也增删很多。原信为：“还有希奇的事情。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莫非真的以儿子自居，我真莫名其妙。至于玉堂的哥哥，今天开学生周会，他又在演说了，依然如故。他还教《西汉哲学》哩，冤哉西汉哲学，苦哉玉堂。”出版时，涉及林语堂哥哥的话，均删去，而增补了对于那一个“不以为然”的教员的批评意见。虽然在编辑出版《两地书》时，鲁迅与林语堂已经有很大的分歧了，但他还是很照顾这位老朋友的面子的。

最后一段，说要劝林语堂离开厦门，到武昌或广州做事，在“看来大半是无效的”文句以下，亦改动甚大。原信为：“但看来大大半是无效的，他近来看事情似乎颇胡涂，又牵连的人物太多，非大失败，大概是决不走的。我的计画，也不过聊尽同事一场的交情而已。结果一定是他怪我舍他而去，使他为难。”出版时，对林语堂的批评，修改得较为缓和些。但不知是否因听取了鲁迅的意见之故，林语堂后来的确是到武昌去了。

261120 致许广平

广平兄：

十九日寄出一信；今天收到十三，六，七日的来信了，一同到的。看来广州有事做，所以你这么忙，这里是死气沉沉，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数年前闹过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学了。我决计至迟于本学期末（阳历正月底）离开这里，到中山大学去。

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券。朱骝先还对伏园说，也可以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之数，但我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已经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好了。我想我还不至于完在这样的空气里，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至于厦大，其实是不必请我的，因为我虽颓唐，而他们还比我颓唐得利害。

玉堂今天辞职了，因为减缩预算的事，但只辞国学院秘书，未辞文科主任。我已托伏园转达我的意见，劝他不必烂在这里，他无回话。我还要自己对他说一回。但我看他的辞职是不会准的。

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

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唠唠叨叨的长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为了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小障碍能绊倒我，我不至于要离开厦门了。我也很想走坦途，但目前还不能，非不愿，势不可也。至于你的来厦，我以为大可不必，“劳民伤财”，都无益处；况且我也并不觉得“孤独”，没有什么“悲哀”。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不要认真”。我其实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的小说），看完《卷施》都分头寄出去了。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提起《卷施》，又想到了一件事。这是王品青送来的，淦女士所作，共四篇，皆在《创造》上发表过。这回送来要印入《乌合丛书》，据我看来，是因为创造社不征作者同意，将这些印成小丛书，自行发卖，所以这边也出版，借谋抵制的。凡未在那边发表过者，一篇

都不在内，我要求再添几篇新的，品青也不肯。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但我给她编定了，不添就不添罢，要骂就骂去罢。

我过了明天礼拜，便又要编讲义，余闲就玩玩，待明年换了空气，再好好做事。今天来客太多，无工夫可写信，写了这两张，已经是夜十二点半了。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其中的《语丝》九七和九八，前回曾经寄去过，但因为那是切光的。所以这回补寄毛边者两本。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脾气如此，所以仍寄。

迅。十一月廿日。

【评点】

许广平在接读了鲁迅许多发抒胸中不平之气的信件之后，于11月16日复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膜处之，或以待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感觉太敏感，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而且叫他不要因高长虹的批评而气短，“我觉得要走的路还在开垦，成绩不一定恶，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鲁迅在这封回信中基本上接受了许广平的意见，但也作了些辨正。他说：“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

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些话在出版时均有修改，但大旨未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性格的特点：敏感、热情、执著、认真，这既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因此有无限的痛苦，但也生出不断的文思，写出许多正义的文章。如果一切都看得很开，无所计较，当然就没有大痛苦，但也会失却写作的激情，变成模模糊糊的人了。

本信其他段落，也有些修改。

261121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前得十日信后，即于十七日奉上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日来信了，路上走了十天，真奇。你所闻北京传来的话，都是真的，伏将于下月初动身，我则至多敷衍到本学期末，广大的聘书，我已接收了。玉堂对你，毫无恶意，他且对伏园说过几次，深以不能为你的薪水争至二百为歉。某公之阴险，他亦已知，这一层不成问题，所虑者只在玉堂自己可以敷衍至何时之问题耳，盖因他亦常受掣肘，不能如志也。所以你愈早到即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一因谣言，一因京信，又迟迟不行，真可惜也。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今则在厦者且欲相率而去，大小饭碗，当空出三四个，他们只要有本领，拿去就是。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在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试思于自己不吃之饭碗，顾公尚不能移赠别人，而况并不声明不吃之川岛之饭碗乎？他们自己近来似乎也不大得意，大约未必再有什么积极的进攻。他们的战将也太不

出色，陈万里已经专在学生会上唱昆腔，被大家“优伶蓄之”了。

我的意见是：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倘令夫人已生产，你们一同来，倘尚无消息，你就赶紧先来，夫人满月后，可托人送至沪，又送上船，发一电，你去接就是了。但两人须少带笨重器具，准备随时可走。总而言之，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回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实呢，这里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校中的教员，谋为“永久教员”者且大有其人。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来带者！其实这种“活得弗靠活”，亦不足为训，所以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也并非很好的例证。至于“糟不可言”，则诚然不能为讳，然他们所送聘书上，何尝声明要我们来改良厦大乎？薪水不糟，亦可谓责任已尽也矣。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评点】

此信写得亦庄亦谐，竭诚劝说川岛赶快到厦大就职，爱护青年之心，跃然可见。川岛其时还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职员，饭碗是一大问题，所以鲁迅劝他大可不必听别人说什么，只要能拿到薪水，做好应做的工作即可。鲁迅自己虽然不愿在厦大呆下去，但他认为川岛还是可来此应聘的，只要有随时走人的准备即可。因为川岛与他自己的处境不同，性格也两样。鲁迅在信中对厦大的人事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对川岛并无不利，而且颇多自我调侃之辞，意谓川岛不必学他的样。这些话，也说得很实在。

261128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讲演，以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了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了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隔壁的礼堂里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究竟还是物理学教授有本领，走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了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而细心一点，也可以比较的安全，所以一时也决不定。总之，我先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我也决

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 H. M. 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他自己呢，我看未必走，再碰几个钉子，则明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或则像狂飙社嘴脸，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视同仁，不加分别。有几个学生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时再定。我觉得现在 H. M. 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也明知道这是应该改变的，但现在无法，明年从新来过罢。

逢吉既知道通信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我想，他是在研究 H. M. 是否真在广州办事，也说不定。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 H. M. 亦在厦门之说也。

女师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在未知如何？无米之炊，是人力所做不到的。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从速走开为宜。但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可有这样凑巧的处所？

迅。十一月廿八日午十二时。

【评点】

鲁迅是敢于直面人生的英勇战士，但即使是他，说话和做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可见人生处世之难，特别是在中国。鲁迅说，他“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这是坦率之言。在北京时，他就感到有些人常用“学者”、“文学家”的称号来束缚住他人的手脚，所以他说：“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又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但是，人不能不生活，而没有一定的地位，也就会失去力量，所以鲁迅又不能不顾及这一点。这使他内心感到矛盾，苦闷，同时下笔时也就不无犹豫。他在与此信同一个月所作的《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对此种心情就有详细的叙述：“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

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但鲁迅的社会地位是由他的作品造成的，而他的作品已有很大的影响，别人也难以抹杀，当时的学校和新闻出版业也还有相对之独立性，鲁迅可以教书、写稿谋生，所以他纵使有所顾忌，仍能大胆地说话。后来的文人则连这一点条件也没有，就不能不有更多的顾忌了，这也是形势使然。

261205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写在〈坟〉后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坟》能多校一回，自然较好；封面画我已寄给许钦文了，想必已经接洽过。

《君山》多加插画，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过而印成单行本的书，对于定《莽原》全年的人，似应给以特别权利。倘预定者不满百人，则简直各送一本，倘是几百，就附送特价（对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请由你们在京的几位酌定。我的《旧事重提》（还要改一个名字）出版时，也一样办理。

《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则以《往星中》为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这样，则未名社多了一本书，且亦不至于为别的书店去作苦工，因为我想剧本卖钱是不会多的。

对于《莽原》的意见，已经回答霁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

改了，陶君的画，或者可作别用。明年还是叫《莽原》，用旧画。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但这仍请你与霁野酌定，我并不固执。至于内容，照来信所说就好。我的译作，现在还说不定什么题目，因为正编讲义，须十日后才有暇，那时再想。我不料这里竟新书旧书都无处买，所以得材料就很难，或者头几期只好随便或做或译一点，待离开此地后，倘环境尚可，再来好好地选译。我到此以后，琐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无成绩，真是困苦。将来我想躲起来，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见一两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时间，倘这样下去，将要毫无长进。

留学自然很好，但既然对于出版事业有兴趣，何妨再办若干时。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论杂交》，直是笑话。他说那利益，是可以没有家庭之累，竟不想到男人杂交后虽然毫无后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

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上即很受影响，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长虹的骂我，据上海来信，说是除投稿的纠葛之外，还因为他与开明书店商量，要出期刊，遭开明拒绝，疑我说了坏话之故。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由我看来，是别有两种原因。一，我曾上海对人说，长虹不该擅登广告，将《乌合》《未名》都拉入什么“狂飙运动”去，我不能将这些作者都暗暗卖给他。大约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去了。二，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将来当面再谈罢，我想，大约暑假时总要回一趟[趟]北京。

前得静农信，说起《菴蓀》，我为之叹息，他所听来的事，和我所

经历的是全不对的。这稿子，是品青来说，说愿出在《乌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将来托我编定，只四篇。我说四篇太少；他说这是一时期的，正是一段落，够了。我即心知其意，这四篇是都登在《创造》上的，现创造社不与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乌合》去抵制他们，至于未落创造社之手的以后的几篇，却不欲轻轻送入《乌合》之内。但我虽这样想，却答应了。不料不到半年，却变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万想不到。我想他们那里会这样信托我呢？你不记得公园里钱行那一回的事吗？静农太老实了，所以我无话可答。不过此事也无须对人说，只要几个人（丛，霁，静）心里知道就好了。

迅 十二月五日

【评点】

鲁迅对未名社中人虽然也有意见，但认为他们做事小心、踏实，所以还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连李霁野的学费，也主动提出先予垫付，使他的《黑假面人》不致随便卖掉。对这些青年人，仍是体贴入微。而对于狂飚社中人，特别是对于高长虹，就不一样了。高长虹为《莽原》的稿件开始闹时，为了避免纠纷，鲁迅原想将《莽原》改名的，现在高长虹既已公开挑战，他认为就无须改了。这也是鲁迅的做人原则：“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

鲁迅在信中说：“未名社之立足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这是对出版社既简单而又重要的意见。因为未名社是小心有余而泼辣不足，鲁迅就鼓励他们多出书：“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但出版物毕竟以质量为主，所以鲁迅在下文中又说：“但我

也并非说小心不好，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飚》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可惜出版界至今还是《狂飚》式的东西行时，书籍不是凭坚实立足，而是靠炒作火爆。中国人的眼睛何时能亮起来呢？

261214 致许广平

广平兄：

昨(十三日)寄一信，今天则寄出期刊一束，怕失少，所以挂号，非因特别宝贵也。束中有《新女性》一本，大作在内，又《语丝》两期，即登着我之发牢骚文，盖先为未名社截留，到底又被小峰夺过去了，所以仍在《语丝》上。

慨自寄了二十三日之信，几乎大不得了，伟大之钉子，迎面碰来，幸而上帝保佑，早有廿九日之信发出，声明前此一函，实属大逆不道，应即取消，于是始蒙褒为“傻子”，赐以“命令”，作善者降之百祥，幸何如之。

现在对于校事，已悉不问，专编讲义，作一结束，授课只余五星期，此后便是考试了。但离校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

中大又有信来，催我速去，且云教员薪水，当设法增加，但我还是只能于二月初出发。至于伏园，却在二十左右要走了，大约先至粤，再从陆路入武汉。今晚语堂饯行，亦颇有活动之意，而其太太则大不谓然，以为带着两个孩子，常常搬家，如何是好。其实站在她的地位上来观察，的确也困苦的，旅行式的家庭，教管理家政的女性如何措手。然而语堂殊激昂。后事如何，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狂飙中人一面骂我，一面又要用我了。培良要我在厦门或广州寻地方，尚钺要将小说编入《乌合丛书》去，并谓前系误骂，后当停止，附寄未发表的骂我之文稿，请看毕烧掉云。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闲事，就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地方也不寻，丛书也不编，文稿也不看，也不烧，回信也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

《妇女之友》第五期上，有沅沁给你的一封公开信，见了没有？内中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对于女师大再被毁坏的牢骚。我看《世界日报》，似乎程干云仍在校，罗静轩却只得滚出了，报上有一封她的公开信，说卖文也可以过活，我想，怕很难罢。

今天白天有雾，器具都有点潮湿。蚊子很多，过于夏天，真是奇怪。叮得可以，要躲进帐子里去了，下次再写。

十四日灯下。

天气今天仍热，但大风，蚊子忽而很少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编了一篇讲义。印泥已从上海寄来，此刻就在《桃色的云》上写了几个字，将那“玻璃”印和印泥都第一次用在这上面，豫备等《莽原》第二十三期到来时，一同寄出。因为天气热，印泥软，所以印得不大好，但那也不要紧。必须如此办理，才觉舒服，虽被斥为“多事”，亦不再辩，横竖受攻击惯了的，听点申斥又算得什么。

本校并无新事发生。惟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白果从北京到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不知怎地我忽而记起了“燕巢危幕”的故

事，看到这一大堆人物，不禁为之凄然。

十五夜。

十二日的来信，今天(十六)就到了，也算快的。我看广州厦门间的邮信船大约每周有二次。假如星期二，五开的罢，那么，星期一，四发的信更快，三，六发的就慢了，但我终于研究不出那船期是星期几。

贵校的情形，实在不大高妙，也如别的学校一样，恐怕不过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一沾手，一定为难。倘使直截痛快，或改革，或被打倒，爽快，或苦痛，那倒好了。然而大抵不如此。就是办也办不好，放也放不下，不爽快，也并不大苦痛，只是终日浑身不舒服，那种感觉，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叫作“穿湿布衫”，就是恰如将没有晒干的小衫，穿在身体上。我所经历的事情，几乎无不如此，近来的作文印书，即是其一。我想接手之后，随俗敷衍，你一定不能；改革呢，能办到固然好，即使自己因此失败也不妨，但看你来信所说，是恐怕没有改革之望的。那就最好是不接手，倘难却，则仿“前校长”的老法子：躲起来。待有结束后，再出来另觅事情做。

政治经济，我晓得你是没有研究的，幸而只有三星期。我也有这类苦恼，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长”，“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戏台下一般，被挤在中间，退不开去了，不但于己有损，事情也做不好。而别人见你推辞，却以为谦虚或偷懒，仍然坚执要你做。这样地玩“杂耍”一两年，就只剩下些油滑学问，失了专长，而也逐渐被社会所弃，变了“药渣”了，虽然也曾煎熬了请人喝过汁。一变药渣，便什么人都来践踏，连先前喝过汁的人也来践踏，不但践踏，还要冷笑。

牺牲论究竟是谁的“不通”而该打手心，还是一个疑问。人们有自志取舍，和牛羊不同，仆虽不敏，是知道的。然而这“自志”又

岂出于本来，还不是很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言动的影响的么？那么，那学说的是否真实，那人的是否确当，就是一个问题，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恐怕不足以服足下之心，好在不久便有面谈的机会，那时再辩论罢。

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然则心粗而傻，似乎也和“傻气的傻子”差不多，“半斤八两相等也”。伏园大约一两日内启行，此信或者也和他同船出发。从今天起，我们兼包饭菜了，先前单包饭的时候，每人只得一碗半（中小碗），饭量大的人，兼吃两人的也不够，今天是多一点了，你看厨子多么利害。这里的工役，似乎都与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好教员吃苦，即如这个厨子，原是国学院听差中之最懒而最狡猾的，兼土费了许多力，才将他弄走，而他的地位却更好了。他那时的主张，是：他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会开口叫他做事的么？

我向上海买书很便当，那两本当即去带，并遵来命，年底面呈。

迅。十六日下午。

【评点】

社会上不能没有好事之徒，否则，生活就不能前进。所以鲁迅鼓励青年要做“好事之徒”。但是，要做“好事之徒”实在也大不容易，鲁迅做了，却惹得许多麻烦。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所以，他要改变方针，不再管别人的事了，自称这是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但实际上他仍然积极地为他人做事。所以他在别处又说，自己的思想，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消长。其实，在社会做事，在为别人做事时，同时考虑到自己，同时要保持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否则，真要变成“药渣”了。

“药渣”之喻甚妙。鲁迅后来在《新药》一文中，讽刺“党国元老”吴稚晖，将他比作被发挥过了作用之后，几乎要成为废弃的药渣。这里用词的意义有所不同，但比喻性却也相近。这里是说一个人自己应该学有专长，成为专门人才，不能跟着别人的需要转，否则，用过之后，便会被人抛弃，像药渣一样，任众人践踏。放眼大千世界，此类现象倒也比比皆是，我辈确应从中悟出点道理来才是。

本信除个别词句的修改以外，还有两处较大的增删：

其一，是14日所写信第五段中批评狂飚社的话，原信无“并谓

前系误骂，后当停止，附寄未发表的骂我之文稿，请看毕烧掉云”句；下文“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原信为：“至于对少爷们，则照例退让，或者自甘牺牲一点。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责骂，反弄得不可开交”；接着，删去“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都置之不理”几个字，而将最后一句“现在我将门关上，且看他们另向何处寻这类的牺牲”，改为：“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地方也不寻，丛书也不编，文稿也不看，也不烧，回信也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这样一改，当然生动得多，也情绪化得多了。

其二，是16日所写信第四段，将其中“这实在使我愤怒。我并没有略存求得好报之心，不过觉得他们加以嘲笑，是太过的”这两句，扩写成这样一大段：“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这段文字，较详细地形容了狂飚社中人如何在利用过他之后又来嘲笑、践踏他的情景。可见狂飚社是如何伤害了鲁迅，而使他愤怒、怨恨之极。

1927 年

270106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五日寄一信，想当先到了。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所以再来写几句。

中大拟请你作助教，并非伏园故意谋来，和你开玩笑的，看我前次附上的两信便知，因为这原是李逢吉的遗缺，现在正空着。北大和厦大的助教，平时并不授课，厦大的规定是教授请假半年或几个月时，间或由助教代课，但这样的事是很少见的，我想中大当不至于特别罢。况且教授编而助教讲，也太不近情理，足下所闻，殆谣言也。即非谣言，亦有法想，似乎无须神经过敏。未发聘书，想也不至于中变，其于上遂亦然。我想中学职员可不必去做，即有中变，我当托人另行设法。

至于引为同事，恐因谣言而牵连自己，——我真奇怪，这是你因为碰了钉子，变成神经过敏，还是广州情形，确是如此的呢？倘是后者，那么，在广州做人，要比北京还难了。不过我是不管这些的，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矣，所以被怎么说都可以。这回去厦，这里也有各种谣言，我都不管，专用徐大总统哲学：听其自然。

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因为上月的薪水，至今还没有付给我，说是还得等几天。但无论怎样，我十五日以前总要动身的。我看

这是他们的一点小玩艺，无非使我不能早走，在这里白白的等几天。不过这种小巧，恐怕反而失策了：校内大约要有风潮，现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这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学校运动，本已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少一刺戟，或者不再举动，但拖下去可不行了。那时一定又有人归罪于我，指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

这几天全是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夜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

那些请吃饭的人，蓄意也种种不同，所以席上的情形，倒也煞是好看。我在这里是许多人觉得讨厌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维为大人物。中国老例，无论谁，只要死了，挽联上不都说活着的时候多么好，没有了又多么可惜么？于是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并且对人说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

这里的情气，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现在有些学生们想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我看不过是一个幻想。

迅。一月六日灯下。

【评点】

厦大的风潮，当然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因鲁迅的去留问题而爆发，“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学校运动”，却也可见鲁迅的影响力。于是，无论赞成者或反对者，都来宴请和恭维鲁迅，使他陷入无聊的应酬中：“这几天全是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但鲁迅毕竟是清醒的，他深知人们恭维他的原因。原信上这样写

道：“这些请吃饭的人，有的是佩服我的，在这里，能不顾每月四百元的钱而捣乱的人，已经算英雄。有的是憎而且怕我的，想以酒食封我的嘴，所以席上的情形，煞是好看，简直像敷衍一个恶鬼一样。前天学生送别会上，为厦大未有之盛举，有唱歌，有颂词，忽然将我造成一个连自己也想不到的大人物，于是黄坚也称我为‘吾师’，而宣言曰‘我乃他之学生也，感情自然很好的。’令人绝倒。今天又办酒给我饯行。”此段在出版时，略作修改，又加上这几句：“中国老例，无论谁，只要死了，挽联上不都说活着的时候多么好，没有了又多么可惜么？”这实在是透彻之语。也只有看透了世情，才能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而有些人为了追悼会的规格，为悼词的恭维度而大争特争，真是其愚不可及。当然，为彻底平反而争者，该另当别论。

270111 致许广平

广平兄：

五日与七日的两函，今天（十一）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十五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十五日上船，也许要到十六才开，则到广州当在十九或二十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冑，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

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是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我要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原信作川岛），才知道这种流言，早

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玄倩（原信作衣萍，下同），微风（原信作小峰），宴太（原信作二太太，下同）。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帖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见，撕掉了。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我托令弟（原信作羨苏）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骤然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流言家的诡计了。

迅。一月十一日。

【评点】

鲁迅马上要到广州与许广平相会了，在这封信里，就着重谈了近年来围绕他们两人之间的风波。有相识者的流言，有高长虹因单相思而起的攻击，还因蓄意挑拨而引起的家庭矛盾。中国特多喜欢窥探别人隐私而制造流言者，其中还很有些是青年。鲁迅说：“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这话说得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观察某些新人物的实质，这种人在生活中实在并不少见。鲁迅在爱情上本来是自我贬抑的，但是各种流言、攻击纷起，却反而使他勇敢起来。他觉得他可以爱，他应该爱，而且宣称，什么名声、地位都不要，要大胆地反抗，要大胆地爱！这才是鲁迅性格。

本信也修改颇多，有几处较为重要：

第四段末：“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原信为：“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

第五段，原信只有简单的几句：“那流言，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说是沈钟社中人说，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两地书》中关于高长虹的一大段话，均是出版时所加。这是为了加强对于高长虹的剖析。

倒第二段最后几句：“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原信为：“我托羨苏

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也大不以为然，向八道湾鸣不平，听说二太太也大放谣言，说我纵容学生虐待她。现在是往来很密切了，老年人容易受骗。所以我早说，我一出西三条，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

270225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日及以前的信，都收到了。伏园已于十日动身，从湖南走，大约月底可到武昌。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坐在革命的摇篮之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绍原有电来索旅费，今天电汇了。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这样的人，会看不出来。大约顾孟余辈，尚以他为好货也。孟余目光不大佳。

兄事，我曾商之骊先，校中只有教务助理员位置了，月薪小洋百，半现半库券（买[卖]起来，大概八折），兄及夫人如来此，只足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曾向骊先说，请兄先就此席；骊先且允当为别觅地方。兄如可以，望即函知。且于三月间来此。但于“按月发给”办法，不有妨乎？厦大薪水，总以尽量取得为宜。

本校考试，二十八日是最末一次，而朱斐们还不来，我虽已为报名，不知二十七可能到。倘不到，则上半年不能入校，真做了牺牲了，可叹。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季黻已来此地。

兄究竟行止何如（对于广州），乞示复。寄玉堂一笺，希便中转交。

迅 二，二五

斐君兄均此不另。

【评点】

鲁迅到中山大学之后，被套上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其忙碌的情形，他后来在《在钟楼上》文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

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当地的文学青年希望鲁迅出来呐喊,宋云彬还发表了题为《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文章,鲁迅也很想“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但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等原因,而未能写。可见鲁迅对于这种生活,是非常的不适应。他与那些热衷于做主任的人志趣不同,所以说:“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而且,他连“名人”也不想做了,因为“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这话说得很真切。做“名人”当然有很多便利之处,但“名人”因为有名,就成为公众人物,公众必然对你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于是就没有了“自己”;而人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才有乐趣,这就产生了矛盾。鲁迅当然也知道名位的作用,但他是尊重个性,崇尚自我的,故有此语也。

270420 致李霁野

寄野兄：

四日寄小说稿一篇，想已到。此地的邮局颇特别，文稿不能援印刷品例，须当作信的。此后又寄一信，忘记了日子。

今日看见几张《中央副刊》，托罗茨基的书，已经译傅东华译载了不少了，似乎已译完。我想，这种书籍，中国有两种译本就怕很难销售。你的译文如果进行未多，似乎还不如中止。但这也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此后何往，还未定；或者仍暂留此地，改定《小约翰》，俟暑假后再说。因为此刻开学已久已无处可以教书，我也想暂时不教书，休息一时再说，这一年来，实在忙得太苦了。来信可寄“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非局字）收转。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这是一间小楼，卖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

《莽原》第五六期各十本及给我之各二本，今天收到了。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所以外来之品，销场还好。《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

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纪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

再谈。

迅 四，二十，夜

静农
漱园
丛芜

兄均此不另。

【评点】

这是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较早发出的信件。信中提到，他“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关于鲁迅辞职的原因，过去的研究者多着眼于政治方面，强调这是鲁迅对于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的抗议；而近年来，则又有些研究者根据鲁迅自己在书信中所说，认为是由于他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而与政治无关。应该说，鲁迅要离开中大，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而在这个时候提出辞职，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他对顾颉刚的不满，由来已久，非止一日，但在厦大时，也还是同校教书，此时何以顾来他非马上辞职不可呢？看来，鲁迅于四一五之后提出辞职，应是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义愤。鲁迅是一向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反对当权者对他们的压迫的，在北京时就与镇压者相对抗，这次他营救无效，愤而辞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很符合鲁迅性格。四一五事件，在鲁迅的心底引起很大的波澜，这可以从《而

已集》中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从《答有恒先生》中看出。而许寿裳和许广平的回忆录中，亦都言及鲁迅的辞职与国民党逮捕学生有关。他们当时都与鲁迅同住，有实际感受，当非虚言也。况且许寿裳的回忆录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更没有必要将此事涂上革命的色彩。至于鲁迅本人为什么要在当时所写的一些书信中，把辞职的原因完全指向顾颉刚呢，这显然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当时鲁迅也被当作赤色分子，为当局所注意，而处于危险之中。有人还以陈独秀曾办《新青年》，而鲁迅在《新青年》上投过稿这一层关系，要办他的罪呢。

270426 致 孙 伏 园

寄给我的报，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的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先生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评点】

本信最初发表于 1927 年 5 月 11 日武汉《中央日报》的《中央

副刊》上，为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所引。在孙伏园方面，他写作此文，引出此信，也许是特地要表明鲁迅之辞职是由于顾颉刚的关系，而非政治上的原因；顾颉刚时在杭州，看了此文后，却大光其火，竟提出要鲁迅待在广州，等他九月份回粤来打官司。于是引出鲁迅的文章：《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写得非常有趣，说是他八月中要动身，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褻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理由十分充足，调笑却在其中。此事后来是不了了之。

27053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我滚出中大以后，似乎曾寄两信，一往道圩，一往杭，由郑介石转。但是否真是如此，记不清楚了，也懒得查日记，好在这些也无关紧要，由它去罢。

十来天以前见绍原，知道你因闻季和我已“他亡”，急欲知其底细，当时因为他已写信，我又忙于整理译稿，所以无暇写信。其实是我固在此地，住白云楼上吃荔支也。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不少。时既太平，红鼻莅至，学者之福气可谓好极。日前中大图书馆征求家谱及各县志，厦大的老文章，又在此地应用了，则前途可想。骊先其将如玉堂也欤。绍原似乎也很寂寞，该校情形，和北大很不同，大约他也看不惯。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

帖标语，拥朱驱邹。后事如何，未知分解。鼻以此地已入平静时代而来，才来而平静时代即有“他亡”之概，人心不古，诚堪浩叹。幸我已走出，否则又将被人推出去冲锋，如抱犊山之洋鬼子，岂不冤乎冤哉而且苦乎。

敝人身体甚好，可惜，此地热了，但我想别处必也热，所以姑且在此逗留若干天再说。荔支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

纸完了，信也完了罢。

迅 五，卅

斐君兄及小燕兄均此请安不另。

【评点】

正因为有人在报上说，鲁迅之离开中大，是由于政治上之关系，还说他因“亲共”而逃走了，这在当时可是个杀头的罪名，而他又疑心这是傅斯年和顾颉刚为了攻击他而故意宣传的，所以特别声明，他的出走与政治无关，只是与顾颉刚（即信中所谓“鼻”者，因其红鼻故也）势不两立而已。

说话有一定之语境，有一定之目的性，似不宜单从字面上去理解。

270612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五月卅日的信，昨天收到了。《玉历钞传》还未到。我早搬出中大，住在一间洋房里，所以信寄芳草街者，因为我那时豫计该街卖书处之关门，当在我的寓所[?]之后。季黻先也住在这里，现在他走了，六日上船的，故五月卅日以前有人在杭州街上所见之人，必非季黻也。倘在六月十五以后，则我不能决矣。

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无疑，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种种。鼻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其所以为“学者”；而我之于鼻，则除乞药揷鼻一事外，不知其他，此其所以非“学者”也。难于伺候哉此鼻也，鲁迅与之共事，亦可恶，不与共事，亦可恶，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于是乎五万元之买书成为天经地义矣。岂不懿欤！休哉！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子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子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绍原，我想，他是在这里的。钱之不我许，是的确的。他很冤

枉，因为系我介绍，有人说他鲁迅派。其实我何尝有什么派，一定介绍同派呢。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倘非将一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于是说他也要走。还有人疑心我要运动他走。其实我是不赞成他走的，连季黻辞职时（因为走时，傅斯年探听他什么态度），我也反对过。而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预备寄给你的，但日内未必完工，因为太长。每日吃鱼肝油，胖起来了，恐怕还要“可恶”几年哩。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为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

在这月以内，如寄我信，可寄“广九车站，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下月则且听下回分解可也。

迅 上〔六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不另 小燕兄亦均此不另。

【评点】

本信第三段中所说的“介石”，指郑介石，名奠，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此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子公”指蔡元培，因其号子民故；“研究院”指拟议中的浙江大学研究院，1927年5月25日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该院计划，蔡元培为九人筹备委员之一。鲁迅对蔡元培一向很尊重，但在政见和人事上，亦时有分歧之处。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邀请鲁迅到部任职，鲁迅很支持他的工作，特别是他的美育计划，但对于他赏识和重用袁希涛、蒋维乔辈，却很不以为然，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中曾批评蒋维乔的“人之根本在脐”说，认为他以科学之名，麝进了鬼话。而此时，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一起出面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活动，很引起革命者的非议，故鲁迅于信中说：“其实，我与此公，气味不投者也”，实非无因。后来，蔡元培看清了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的面貌，起而反对，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亦为委员之一，积极配合工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第五段中的所谓“介石同志”，则是讽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此处是说待北伐军打进北京，他也许回北京去。这就是说，他走出中大之后，住在白云楼暂时不离开广州，一方面是为了打破说他逃亡的谣言，另一方面也是在此观望形势的发展，以便决定今后的去向。对于香港报纸上的谣言，鲁迅在《略谈香港》一文中有所分析：“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

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但一个月了，却不见登出来。

本信中还说：“其实我何尝有什么派，一定介绍同派呢。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倘非将某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此话亦极可注意。俗语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此之谓也。因为有些人自己喜欢拉帮结派，总以派性眼光看人，就觉得别人的一举一动，也都是在拉帮结派。昔日在北京时，鲁迅等人为女师大学生伸张正义，现代评论派即说是“某籍某系”所为，《华盖集》中《我的“籍”和“系”》，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现在到了广州，又受到拉帮结派者的怀疑，所以他很有感慨地说：“而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此种事有相当的普遍性，非独鲁迅个人的遭遇也。

27072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九日来信，廿八日收到了，快极。广州我想未必比杭州热，二百八九十度罢。

季荊尚无信来，但看这名目，似乎就无聊。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我想，便是茭白之流，也不会久的，将一批一批地挤出去，终于止留下旧日的地头蛇。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迓哉。夫汉人之为奴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茭白辈其标本也。

给丁山电中之“才年”，盖影射耳，似我非我，可以欺丁山，而我亦不能抗议。此种计画，鼻盖与闻其事的，而对绍原故作恐慌者，以欺绍原，表明于中大内情，他丝毫不知道也。其问我何以不骂他者，亦非真希望我骂，不过示人以不怕耳，外强中干者也。无人骂之，尚且要失眠，而况有人骂之乎？我未曾骂，尚且念念于我之骂，而况我竟骂之乎？骂是我总要骂的，但当与骂吧儿狗之方法不同。至于写入小说，他似乎还不配，因为非大经艺术化，则小说中有此

辈一人，即十分可厌也。你要知道ㄥ的小玩艺，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苏州一带地方人的互相标榜和攻讦的著作就好了。

况且以“才”署名，亦大可笑，我给别人的信，从未有自称为“才”者。蠢才乎，天才乎，杀才乎，奴才乎？其实我函电署名，非“树”则“迅”，傅与鼻是知道的。

吧儿跑到南京了，消息如别纸，今附上。

《游仙窟》我以为可以如此印：这一次，就照改了付印。至于借得影本后，还可以连注再印一回，或排或影（石印），全是旧式，那时候，则作札记一篇附之。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

译稿之处置，前函已奉告，但如他们不要或尚未送去，则交小峰亦可。但，这一篇，于周刊是不相宜的，我选择材料时，有点区别，所以《北新》如可免登，则以不登为宜。而我也可以从别方面捞几个零钱用。

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 and 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我也觉得不大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

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在北京办报，其把柄为张鬍所得。他筹办时，对我并不声明给谁办的，但要我一篇文章，登第一期，而且必待此文到后才出版。敝文刚到，他便逃了。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而西三条屋中，似乎已经增添了人，如“大太太”的兄弟之类，我回去，亦无处可住也。至于赴杭与否，那时再看。

倘至九月而现状不变，我以为绍原不如仍到此地来，以装傻混

饭；在浙与宁，吃饭必更费力也，但我觉得到九月时，情形如何，是一问题。南京也有人来叫我去编什么期刊，我已谢绝了。前天，离敝寓不远，市党部后门炸了一个炸弹，但我却连声音也无所闻，直至今天看香港报才知道的。

迅 上七，二八，夜

斐君兄均此不另。

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前天我们在丁惟汾先生处看见，丁先生要我将他们领到胡汉民处，我说有事，便跑出来了，出来告诉□□，于是□□在《市民日报》大骂驱逐投机分子陈西滢，倒也有趣，现在不知道他们活动的怎样。

七月七日发

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

【评点】

不能容纳人才之举，当然并非浙江所独有，但作为浙人，鲁迅对于浙江之不能容才现象，感触尤深。此种批评，并非一时愤激之语，而是长时期观察的结果，故在致章廷谦的好几封信中都论及此点。如本年7月17日信中，针对章廷谦因许寿裳和郑奠找不到工作而发的愤慨，就说：“其实浙江是只能如此的，不能有更好之事，我从钱武肃王的时代起，就灰心了。”本信中则说：“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接着，在8月8日信中又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

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恋气，较好。”从这些议论中，可以见出鲁迅对此事思考之深。他曾想将这类“国故”编辑成书，以昭示涉世未深者，可惜终于未曾动笔。但鲁迅提出的问题，却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盖用人之道，关涉事业之成败，国家之兴废，不可等闲视之，而当事者又往往出于某种褊狭心理，不能容纳人才，以致走上败亡之路。一部《三国志演义》，就将这类事描写得淋漓尽致，很可细究。鲁迅说，他是根据《三国志演义》而主张某朋友不要在浙谋事的，当非戏言也。

鲁迅又说：“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云云，此言亦极可注意。他在《文坛三户》中对破落户和暴发户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虽然其中所论的是作家，而非官僚，但在心理上亦有某种相通之处吧。而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则有一段论及奴才当主子之后的心态，可与本信所说奴才“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者相印证，语云：“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所以，凡事均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新旧划线，亦不能简单地以出身论人。

信中所说许寿裳(季荻)任职的“名目”，是指浙江省民政厅“视察”一职；“茭白”，指蒋梦麟，盖因“蒋”字的本义为茭白，故称之，此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代理校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马二，指冯玉祥，原属直系军阀，1924年改所部为国民军，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排挤出北京；张胡，指张作霖，原为东北胡子(土匪)出身，故称之，此时为奉系军阀首领，控制着北洋政府。所画之ㄥ，代鼻字，指顾颉刚，因其鼻红而称之。

信中对顾颉刚颇多心理分析，又证之以明末清初一带地方人的著作，显然，是将他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来解剖的。8月2日致江

绍原信中又说：“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藪。”则更将问题引向历史的深处。虽然这种社会类型很有研究的价值，但鲁迅却认为不能写入小说。“至于写入小说，他似乎还不配，因为非大经艺术化，则小说中有此辈一人，即十分可厌也。”寥寥数语，却表现出鲁迅的创作原则，不同于世之谴责小说也。后来，他在《半夏小集》中对此意更有所发挥，可以参看：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一部入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悔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悔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如果不拘泥于某种实指，而从创作理论上着眼，则鲁迅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美学原则，如选取题材的审美要求、生活原型与艺术典型的关系以及生活丑与艺术美的转化等问题，这往往为研究鲁迅美学思想者所忽略。

27081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日前寄一函，意专在阻止将敝稿送于姨副，故颇匆匆。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出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迅即𠂔，𠂔实即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

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_𦉑，因割掉卵_腺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

此地下半年之中大文科，实即去年之厦大而撵走了鼻所不喜之徒，而傅乃大贴广告，谓足为全国模范。不过这是半月以前的事，后来如何，须听下回分解矣。我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

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罢工，令我无船可坐；此地又渐热，在西屋中九蒸九晒，炼得遍身痱子。继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须挤在小屋中，不会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生痱子就生痱子，长疙瘩就长疙瘩，无可无不可也。总之：一有较便之船，我即要走；但要我苦心孤诣，先搬往番鬼所管之香港以上邮船，则委实懒于奋发耳。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矣。

《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但文无生气耳。见新月社书目，春台及学昭姑娘俱列名，我以为太不值得。其书目内容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吧儿辈方携眷南下，而情状又变，近当又皇皇然若丧家，可怜也夫。

迅 八，十七。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

【评点】

五四时期，在理性精神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一个疑古学派，即对古史传说提出怀疑，重新进行考察。为首的是胡适和钱玄同。胡适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的口号，钱玄同则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疑古玄同，可见态度之坚决，他们在打破历史成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上，起过积极作用。顾颉刚是他们的学生，承胡、钱之余绪，将同道者讨论古史的文章和书信汇编成书，名曰《古史辨》，前后出了七册，在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他在某些方面走过了头，将古史考得都没有了，也颇受人垢病。如他从字源学出发，考证出禹本无其人，只不过是“蜥蜴之类”的虫，就成为笑柄。鲁迅

在此信中也用字源学的方法来否定他的“考证”，并加以调笑。而故意将《史记》作者司马迁写成“司马_迁”，亦是此意。类似的意见，还可参阅《故事新编》中《理水》一篇。而《古史辨》第一册的书前有一篇顾颉刚的自序，长达一百多页，大谈自己的历史，所以一并为鲁迅所嘲笑。

《语丝》是孙伏园因《晨报》主编抽去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愤而辞职后，于1924年11月所创办的周刊。此刊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一個进步的文派：“语丝派”，鲁迅被认为是该派的领袖人物。鲁迅是很爱护这个刊物的，他称赞《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所以对于它的停刊，殊觉可惜。但《语丝》并未马上停刊，1927年10月被张作霖查封后，同年12月在上海复刊，先由鲁迅，后由柔石主编，至1930年3月停刊。关于此刊的详情，以及鲁迅与它的关系，可以参阅鲁迅在1929年末所写的《我和〈语丝〉的始终》。

本信开头所说的“姨副”，乃戏称《三五日报》之副刊也。盖因《诗经·召南·小星》云：“彼小星，三五在东。”小星，指妾，即姨太太也。

270919 致 翟 永 坤

永坤兄：

八月廿二，廿八日两信，今天（九月十九）一同收到了，一个学生给我送来的。你似乎还没有知道，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经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本来早想走，但先前是因为别的原因，后来是太古船员罢工，没有船，总是走不成。现在听说有船了，所以我想于本月之内动身。

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北大改组的事已在报上看见了。此地自从捉去了若干学生不知道数目，几十或百余罢以后，听说很乐观，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

这里新闻是一定应该有的，可惜我不大知道，也知不清楚。

《鲁迅在广东》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集些报上的议论罢。但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时光的确快，记得我们在马路上见了之后，已经一年多了，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受近来有些这样的情形，连和我熟识的学生，也会有人疑心他脾气和我相

似，喜欢揭穿假面具，所以看得讨厌。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

看看二十来篇作品的工夫，总可以有的。但近一年来，我全没给人选文章。有一个高长虹，先前叫我给他选了一篇文章，后来他在报上说，我将他最好的几篇都选掉了，因为我妒贤嫉能，怕他出名，所以将好的故意压下。从此以后，我便不做选文的事，有暇便自己玩玩。你如不相信高长虹的话，可以寄来，我有暇时再看，但诗不必寄，因为我不懂这一门。稿寄“上海，新闻路，仁济里北新书局李小峰”收转。

这里还是夏天，穿单衣，一做事便流汗。去年我在厦门时，十一月上山去，看见石榴花，用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好像造物在和我开玩笑。

鲁迅 九月十九夜

【评点】

高长虹的反叛和攻击，对鲁迅的伤害很深，但他仍答应给青年作者看稿、选文，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而且，对于追随他的学生，也仍然爱护有加，说是“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对于今后的工作，鲁迅此时已打定主意，不想涉足政、教两界，而专事译作了。这样，才有最后十年的撰述生涯。

27091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久不得来信，大约你以为我早动身了，而岂知我至今尚九蒸九晒于二楼之上也哉！听说太古船员诸公已复工，则我真将走成，现已理行李两天，拟于廿七八搬入客栈，遇有船则上之也。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子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此地已较凉。梁漱溟已为委员，我看他是要阔的。市民正拟欢迎张发奎将军，牌楼搭得空前之好。各种厅长多已换。黄浦[埔]学校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已。

中大今日(或明日，记不清了)开学，行授旗式，旗乃校旗也，青天白日外加红边，新定的。何日开课，未闻。绍原先生已行了罢。该校的安否，大概很与政局相关的，所以本学期如何，实在说不清。但他若取中立之状态，则无妨。

《语丝》的一四一，二两期，终于没有收到，大概没收了。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已将郁达夫看作危险人物，大奇。广西禁《洪水》与《独秀文存》。汕头之创造社被封。北新出了一本《鲁迅在广东》，

好些人向我来要，而我一向不知道。关于出版界之所闻，大略如此。

新月书店的目录，你看过了没有？每种广告都飘飘然，是诗哲手笔。春台列名其间，我觉得太犯不上也。最可恶者《闲话》广告将我升为“语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交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我已作杂感寄《语丝》以骂之，此后又做了四五篇。

凤举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我一去，一定又有几个学生要同去，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别人容易误会为我专是呼朋引类。我也许此后不能教书了。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

在二楼上，近来又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到上海后，当为新作家选小说，共有三部。此后，真该玩玩了，一面寻饭碗。

迅 上 九月十九夜

斐君太太前均此请安。燕兄及在绍兴的某兄均此致候。

【评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一点政界和文界的历史动态，为别的书籍所不大提及，值得一阅，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的态度。关于郁达夫被看作危险人物事，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有所论述，对于“《闲话》广告”，鲁迅写了《辞“大义”》、《革“首领”》、《扣丝发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等文，加以揭露，均可参阅。

270925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 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

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 上 九月二十五日

【评点】

诺贝尔文学奖,久已成为许多作家追逐之物,近 20 年来,中国作家也产生了一种诺贝尔情结,报上常有“中国作家何时能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为什么不给中国作家”等追问和诘责,还有某某作家原可获得诺贝尔奖的推测,急切之情,跃然纸上。但鲁迅对此,态度却截然不同。1927 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到中国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探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在这封复信中却加以辞谢。这并非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是出于深层的切实的考虑。信中所说的几点理由,都与常人的见解不同,却有甚深的意义。

首先,他认为:“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所以“我也不配”,而且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客观估价,与时下那些自我感觉太好的作家的意见大不相同。基于此种估价,鲁迅说:“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也是与众不同的见解。中国人喜欢搞平衡,讲照顾,评起奖来,总要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各种关系,并不完全按照实际水平来评比,再加上别的因素,结果是,得奖的作品未必好,落选的作品未必差,评奖工作遂成为摆平关系的活动,而且把得奖的

荣誉看得太高，确实助长了一些人的虚荣心，效果其实并不好。他们以这种眼光来看待评奖活动，所以责怪诺贝尔奖为什么一直不给中国作家。鲁迅却正是为了使中国作家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能够脚踏实地地努力，所以倒是以为瑞典最好还是不要给我们诺贝尔奖为好。这个意见很值得我们深思，其意义也不止于诺贝尔文学奖一事。

其次，就他自己而言，他还考虑到，鉴于当时的情况，自己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成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这也是他认真负责精神的表现，更是他对于自己写作前途的珍惜。他既不愿在得奖之后不再有新的作品，也不愿因得奖而获得名誉地位之后，就浮在无穷的应酬中，受制于各种关系，而失却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从此只能写一些不疼不痒的应景之作。中国古代的士人，在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因为有了一定的地位，同时也受制于皇家，就再也写不出有思想的文章了；现代的许多作家，在有了一定的地位，或进入官场之后，也只能写些世俗的东西，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鲁迅把一个作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看得重于一切，所以他宁可不要这种别人求之不得的世界性的荣誉，觉得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因此，他的文章永远保持着战斗精神，永远富有生气。

271021 致 廖 立 峨

立裁兄：

十二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先寄的另一封信，亦已收到。我于七日曾发一信，后又寄《野草》一本，想亦已到。

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我想，再过一星期，大约总可以闲空一点。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

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

现在我住在“宝山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九号”，此后有信可以直接寄此。这里是中国界，房租较廉，只要不开战，是不要紧的。

中大校长赴港，我已在报上看见，张之迈辈即刻疑神疑鬼，实在可怜。其实他们是不要紧的，会变化，那里会吃亏。至于我回广东，却连自己还没有想到过。

林语堂先生已见过，现回厦门接他的太太去了，听说十来天后再来上海。许寿裳先生在南京大学院做秘书，他们要请我译书，但我还没有去的意思。

江绍原先生已经见过，他今天回杭州去了，当暂住在他太太的家里。听说大学院要请他做编译，我想，这于他倒颇相宜的。

广州中大今年下半年大约不见得比上半年好。我想，你最好是自己多看看书。靠教员，是不行的，即使将他们的学问全都学了来，也不过是“瞠目呆然”。倘遇有可看的书，我当寄上。

顾孟余回广州之说，上海倒没有听到。《中央日报》不办了。南京另组织了一个中央日报筹备处，其中大抵是“现代派”。

我本很想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但很不容易。闹惯了，周围不许你静下。所以极容易卷入旋涡中。等许多朋友都见过了，周围清静一些之后，再看情形，尚可以用功，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

广平姊也住在此，附笔道候。她有好几个旧同学在此，邀她于[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还没有去。

迅 十月廿一日

【评点】

这封信是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十多天后所写，反映了他初到上海时的一些生活情况。

受信人廖立峨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时的学生，曾追随鲁迅到中山大学，后来又回到上海，自云是避祸而来，带了爱人，吃住在鲁迅家里，要鲁迅供他们读书，而在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时，他就离鲁迅而去，并且还忿忿地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但他临走时，却又向鲁迅要钱要物，提出许多非分要求。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曾提及此人，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则对其事有较详的记述。

271120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来信，并《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的注，都收到了。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我想，大抵有些人看看的；至于《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则商务馆即使肯收，恐怕也不过是情面。尚志学会似乎已经消声匿迹了。

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 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

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板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中国此刻还不能看戏曲，他们莫名其妙。以现状而论，还是小说。还有，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Essye。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者为限。我想先生最好弄这些。

英文的随篇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但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

我不知道先生先前所爱看的是那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 Thais 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但我的注意并不在飨宴的情形，而在这位修士的内心的苦痛。非法朗士，真是作不出来。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好〕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种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

此外，则须选作者稍为中国人所知，而作品略有永久性的。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但闻有一个 U. Sinclair（不知错否），他的文学论极新，极大胆。先生知之否？又 J. London 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

广东似乎又打起来了。沪报言戴校长已迁居香港，谢绝宾客。中校的一群学者，不知安否，殊以为念也。

迅 启上 十一月二十夜

太太前均此请安

【评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出版界的一些情况。由于受到商业利益的左右，学术书籍很受冷落，致使江绍原这样以研究宗教学和民俗学见长的学者，陷入困境。从生存的需要出发，鲁迅劝他“只好弄弄文学书”，而且还告诉他，读书界有一种新的趋势，是对于文艺或思想随笔的要求，让他最好弄弄这些。这也是对文化市场的一种适应吧。但适应并不等于迁就，鲁迅是希望文化界的朋友们既有一口安稳饭吃，又能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所以他劝江绍原去翻译法郎士的小说《泰绮丝》，又让他注意一下辛克莱的文学论和杰克·伦敦的作品。对于《泰绮丝》一书中的心理描

写,鲁迅是极其欣赏的,后来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就引用《泰绮丝》中的心理分析,来剖析京派对于海派由“奚落”而转为“送秋波”的心理状态。

271206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我对于一切非美术杂志的陵乱的插画，一向颇以为奇，因为我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近来看看《北新》半月刊的插画，也不免作此想。

昨天偶然看见一本日本板垣鹰穗做的，以“民族底色彩”为主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从法国革命后直讲到现在，是一种新的试验，简单明了，殊可观。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应该介绍。但书中的图画，就有一百三四十幅，在现今读者寥寥的出版界，纵使译出，恐怕也没一个书店敢于出版的罢。

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这书所选的图画两三张，再附译文十叶上下，则不到两年，可以全部完结。论文和插画相联络，没有一点白费的东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

为一部关于美术的书，要这么年深月久地来干，原是可叹可怜的事，但在我们这文明国里，实在也别无善法。不知道《北新》能够这么办否？倘可以，我就来译论文。

鲁迅 十二月六日

【评点】

针对非美术杂志上插画的零乱状况,鲁迅想译介一本系统的美术著作:日本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以他当时在文化界的地位,而出版这类专业书籍仍要费如此之周折,他人更可想而知。联系 11 月 20 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的情况,可见当时学术著作之出版,实在是很难的,无怪乎鲁迅整理的许多古籍和碑拓,当时大都未能出版。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环境,恐怕并不如某些研究者所想像的那么好。

271206 致 蔡 元 培

子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

雅范，结念弥深，伏知

贤劳，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进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忧，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

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

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

指挥，实为万幸。肃此布达，敬请

道安。

后学 周树人 启上 十二月六日

【评点】

本信发现得较迟,发表之后,有些人以此作为攻击之资,说鲁迅与国民党有所来往,帮助它收编军队,于是对他的立场大加非议。其实,人既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总有各方面的社会联系,不可能独来独往,一无牵连。荆有麟是他的学生,想利用自己的条件,收编已被击溃之北洋军残部,而鲁迅为了帮助自己的学生,给蔡元培写介绍信,也是人之常情。即为社会着想,与其让北洋军残部流为土匪,为民之患,还不如收编为好。至于荆有麟之沦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则是后来的事情,不能预先知之也。而且,鲁迅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也是随着它的压迫的加强,而愈来愈对立的。事情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以后来之认识来要求初始。

27122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五日信收到。《语丝》四卷三期已付印，来稿大约须入第四期了。

伏园和小峰的事，我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即如《桃色的云》的第一版卖完后，只给我一部分，说因当时没钱，后来补给，然而从此不提了。我也不提。而现在却以为我“可以做证人”，岂不冤哉！叫我证什么呢？

譬如他们俩究竟何时合作，何时闹开，我就毫不知道。所以是局外人，不能开口。但我所不满足的，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

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介绍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情面者，面情之谓也，我之亦要钱而亦要管情面者以此。

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得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真是如何是好。

明年商务印书馆也要开这样的新书店，这一流的书局，要受打

击了。倘不投降，即要竞争，请拭目以俟之。

绍原经济情形，殊可虑。但前两星期，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院的聘书到我这里来，也有绍原的一份，但写明是由胡适之转的。问他何时送去；他说已送去过了，胡博士说本人不在沪，不收。我本想中途截取转寄，但又以为不好，中止了。后来打听季葑，他说大约已经寄杭了，星期二（十九）付邮的。莫非还不到么？倘到，则其中有一批钱，可以过年。

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斐君太太小燕密斯均此请安。

【评点】

北新书局是鲁迅一手扶持起来的出版社，他的著作大部分都交给这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的著作销路很好，这是对北新极大的支持。而且鲁迅还并不立即算清版税，使北新在经济上多一些回转的余地。但后来，北新老板李小峰却故意拖欠鲁迅大量的版税不付，这对到上海后靠稿费和版税为生的鲁迅，自然是无法容忍的了，久催不理，最后只好请律师来解决问题，此乃后话。但即使当矛盾发展得愈来愈尖锐时，鲁迅也还记得李小峰的好处，所以在后来请律师理清版税后，也仍由北新出版他的著作，只不过用印花来加以制约而已。这正是鲁迅的宽容处。可见鲁迅待人，心中自有分寸，并不如某些人所说是睚眦必报，翻脸不认人的。

至于信中所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则是顺便对中国那种不学无术、空言无用的官员进行讽刺。据《烈皇小识》一书所载：明崇祯皇帝曾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道登：“何谓情面？”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此虽答等于不答，但大概也就不至于惹祸。

1928 年

280530 致章廷谦

矛盾兄：

还是得七日的信以后，今天才复。

要达夫作文的事，对他说了。他说“可以可以”。但是“可以”也颇宽泛的，我想，俟出版后，才会切实。至于我呢，自然也“可以”的，但其宽泛，大约也和达夫之“可以”略同。

我并不“做”，也不“编”。不过忙是真的。（一）者，《思想，山水，人物》才校完，现在正校着月刊《奔流》，北新的校对者靠不住，——你看《语丝》上的错字，缺字有多少——连这些事都要自己做。（二）者，有些生病，而且肺病也说不定，所以做工不能像先前那么多了。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中国倘无鲁迅，就有些不大热闹了。

月刊《奔流》，大约六月廿日边可出。

迅 上 五，卅

斐君太太均此问候。

【评点】

鲁迅离开厦门之前，曾在 1926 年 11 月 8 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准备到广州之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在即将离开广州之时，又在 1927 年 9 月 25 日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到达上海之后，还在 1927 年 12 月 3 日《时事新报》所刊出的《创造周刊》复刊广告中，与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等人共同列名为特约撰述员，这些，都可以见出鲁迅的意向。但是，到得 1928 年，创造社却与太阳社联合起来，对鲁迅进行围剿了。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义，将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来展开新的运动，并将鲁迅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余孽、乃至法西斯蒂。鲁迅起而反驳，遂形成一场“革命文学论争”。本信中所说的“革命文学家的言论和行动”云云，即指此而言。鲁迅对他们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对他们所提倡的“革命文学”，评价也并不高，如同年 4 月 9 日致李秉中信中所以说：“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此种话语，在书信中多有流露，极可注意。“革命文学家”们的理论，对后来的革命文学运动，影响甚大，许多左的理论和实践，都发源于此，应该认真予以清算。

280722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七月二日信片收到。

《美术史潮论》系在《北新》半月刊上附印，尚未成书，成后寄上。《思想，山水，人物》未注意，不知消路如何。

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凡关于苏俄文艺的书，两广两湖，都不卖，退了回来。

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日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

上海大热，夜又多蚊，不能做事。这苦处，大约西山是没有的。

迅 上 七月廿二日

【评点】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是打着唯物史观文艺论的旗帜来对鲁迅等人进行批判的，为了弄清对手的底细，这自然促使鲁迅去研究唯物史观。但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懂唯物史观，每每以意为之，离原意很远。所以他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笈上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方面也就容易招人误解。”在中国，有些人却就根据这种片面的意见，“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所以，鲁迅主张先翻译几本可靠的唯物史观的著作，读懂原意再说。他说：“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论战的过程中，即着手翻译唯物史观的文艺论著。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回忆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本信中对唯物史观文艺论的评价和对创造社的批评，即是此意。鲁迅此处所说的话，虽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有相当普遍的意义。盖因以自以为是的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运动、批判别人者，代不乏人，又何止于创造社、太阳社呢！

1929 年

29010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的来信未到之前两天，即“国历”一月一日上午，该巽伯已经光降敝寓了，惜我未起，不能接见，当蒙留下“明前”与“旗枪”各一包无误。至于《赌徒日记》，则至今未见，盖小峰老板事忙易忘，所以不以见示，推想起来，当将印入第二期矣。《奔》⁵ 洪乔之事，亦已函告他，但能否不被忘却，殊不可知，此则不能不先行豫告者耳。

赌徒心理的变幻，应该写写的，你“颇有经验”，我也并不觉其“混账”——惟有一节，却颇失敬，即于“至尊”之下，加以小注，声明并非香烟，盖不佞虽不解“麻酱”，而究属老支那人，“至尊”之为∴和∴∴，实属久已知道者也，何至于点火而吸之哉。

《全上古……文》，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大举，则《史》，《汉》，《三国》；《蔡中郎集》，嵇，阮，二陆机云，陶潜，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

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也。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青龙山者，在江苏句[句]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余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Kina 当是 Kind 之误。“回资啰……”我也不懂，盖古印度语（殆即所谓“梵语”乎），是咒语，绍兴请和尚来放焰口的时候，它们一定要念好几回的，焰口的书上也刻着，恐怕别处也一样。

冬假中我大约未必动，研究之结果，自觉和灵峰之梅，并无感情，倒是和糟鸡酱鸭，颇表好感。然而如此冷天，皮袍又已于去夏在“申江”蛀掉，岂能坐车赴杭，在西子湖边啃糟鸡哉。现在正在弄托尔斯泰纪念号，不暇吃饭也。

《游仙窟》似尚未出，北新近来殊胡里胡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嚶嚶书屋久不闻嚶嚶之声，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名其妙。上海书店有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则差堪告慰者也。

迅 启上 一月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Miss 许亦祈^我写一句代候。

【评点】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鲁迅治学上的见解。在他看来，系统研究和非系统研究，在阅读范围上是有所不同的。系统研

究应该详细占有资料,非系统研究则可不必要如此大举。但他对于大而无当的书籍,却很反感,认为即使系统研究,也不必去看。可惜这种“大而无当的”、“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书,却是自古已有,而于今为烈,这是读者应该明察的。

290315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前天得来信。次日，该前委员莅寓，当蒙交到茶叶三斤。但该委员非该巽伯可比，当经密斯许竭诚招待，计用去龙井茶价七斤，殊觉肉痛。幸该[委]员系由宁回平；则第三次带茶来沪之便人，决非仍是该委员可知，此尚可聊以自慰者也。

鼻君似仍颇仆仆道途，可叹。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据我看来，如此紧张，饭是总有得吃的，然而“着实要阔起来”，则恐未必，大概总是红着鼻子起忙头而已。

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其一，似乎书局中人，饭桶居多，所以凡事无不散漫。其二，则泰水闻已仙逝，李公曾前去奔丧，离沪数天，现已回来。但不知泰山其尚存否乎？若其未崩，则将来必又难免于忙碌也。总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但不料一切新书店，也一样散漫，死样活气，所以直到现在，北新依然为新书店魁首，闻各店且羨而妒之，呜呼噫嘻，此岂非奇事而李公小峰的福气也欤！

例如《游仙窟》罢，印了一年，尚无著落。我因听见郑公振铎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无大效。后来看见《文学周报》上

大讲该《窟》，以为北新之本，必致落后矣。而不料现在北新本小峰已给我五本了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呜呼噫嘻，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

石君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他不问石君以“你的腿上筋为什么发炎”，还算好的。

这几句是正经话了：且夫收口之快慢，是和身体之健壮与否大有关系的。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但倘脓未去尽，则不宜吃。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所以请你转告他。

听说，已经平和了，报上所说，全是谣言。敝寓地域之水电权，似已收回，现在每月须吃海潮灌在水中的自来水一回，做菜无须再加盐料。今日上半天无水，下午有了，而夜间电灯之光，已不及一支洋蜡烛矣。

迅 启上 三月十五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评点】

本信所谈虽然均系琐事，但内中却透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习俗问题。如中国人办事喜欢托人情，代买的茶叶也要托人带，殊不料收受者所用之招待费却远超过茶叶价，更不要说还须化去招待时间。鲁迅说“殊觉肉痛”，虽然是玩笑之语，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确也不值。所以鲁迅后来再托章廷谦在杭州买茶叶，就要他直

接邮寄。再如，信中提到北新书局办事很懒散，却不料别的书店更加懒散，结果，北新依然为新书店魁首，“此岂非奇事而李公小峰的福气也欤！”这当然是调侃的话，但所指懒散现象，却确是中国人的通病。如果碰到不懒散之外国人，则在竞争中必然失败。

290322 致韦素园

素园兄：

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早收到了。还记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复。因为信件多了，一时无从措手，一懒，便全部懒下去了。连几个熟朋友的信，也懒在内，这是很对不起的，但一半也因为各种事情曲折太多，一时无从说起。

关于 Gorki 的两条，我想将来信摘来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我所译的 T. iM，篇幅并不多，日译是单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 还有一篇论 W. Hausenstein 的，觉得很好，也许将来译它出来，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开天辟地》（现在已到“尧皇出世”了）和《封神榜》这些旧戏，新戏有《黄慧如产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学家是在讲革命文学。对于 Gorky，去年似乎有许多人要译他的著作，现在又不听见了，大约又冷下去了。

你说《奔流》介绍外国文学不错，我也是这意思，所以每期总要

放一两篇论文。但读者却最讨厌这些东西,要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所以这里有些书店,已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觉得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罢。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现在正在翻译 Lunacharsky 的一本《艺术论》,约二百页,下月底可完。

【评点】

这封信不但论及文学翻译以及上海小市民的欣赏趣味等问题,而且还谈到他对爱情的态度,以及他与许广平的“新生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着他们的流言蜚语实在不少,这很使鲁迅气愤。而一旦他们公开结合,那些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倒并不少见,它反映了一种畸形心态。难怪鲁迅要骂他们:“这班孱头,真没有骨力。”

“关于 Gorki 的两条”: Gorki, 苏联作家高尔基, 郁达夫曾于《奔流》第一卷第七期上译载了他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 韦素园对其中两处误译提出修正意见。于此可见当时翻译界的认真态度。

“卢氏”: 指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 曾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 即该部的部长。

“T. iM”: 指卢那察尔斯基的讲演稿《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主义》。

“L. 还有一篇论 W. Hausenstein 的”: 指卢那察尔斯基的《霍善斯坦因论》。

290407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三月卅日信，昨收到。L 的《艺术论》，是一九二六年，那边的艺术家协会编印的，其实不过是从《实证美学的基础》及《艺术与革命》中各取了几篇，并非新作，也不很有统系。我本想，只要译《实证美学之基础》就够了，但因为这书名，已足将读者吓退，所以选现在这一本。

创造社于去年已被封。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但我想，这怕未必。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还账的，因为他们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和《爱经》预告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的）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 Sanin 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菲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

消遣罢了。

迅 上 四月七日

【评点】

这里,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批评很可注意。革命文学家是以宣传无产阶级意识相标榜的,但鲁迅认为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而且“有些简直是军阀脑子”。而且,随着书籍市场的变化,今年又改嚷恋爱文学了,可见他们其实并无坚定的信仰,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种批评意见可以参见《上海文艺之一瞥》。

290526 致许广平

H. D:

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点钟。我是十点钟睡着的，十二点醒来了，喝了两碗茶，还不想睡，就来写几句。

今天下午，我出门时，将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邮筒，接着看见邮局门外贴着条子道：“奉安典礼放假两天。”那么，我的那一封信，须在二十七日才会上车的了。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且待“奉安典礼”完毕之后罢。刚才我是被炮声惊醒的，数起来共有百余响，亦“奉安典礼”之一也。

我今天的出门，是为士衡寻地方去的，和幼渔接洽，已略有头绪；访凤举却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他的北来，是为了觅饭碗的，志在燕大，否则清华，人地相宜，大有希望云。

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先令宗文劝诱，我即谢绝。宗文因吞吞吐吐说，彼校教授中，本有人早疑心我未必肯去，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并不在“在南边有唔唔唔……”，那非大树，不能迁移，那是也可以同到北边的，但我也来做教员，也不想说明别的原因之所在。于是就在混沌中完结了。

明天是星期日，恐怕来访之客必多，我要睡了。现在已两点钟，遥想你在“南边”或也已醒来，但我想，因为她明白，一定也即睡着的。

二十五夜。

星期日上午，因为葬式的行列，道路几乎断绝交通，下午可以走了，但只有紫佩一人来谈，所以我能够十分休息。夜十点入睡，此刻两点又醒了，吸一枝烟，照例是便能睡着的。明天十点要去镶牙，所以就将闹钟拨在九点上。

看现在的情形，下月之初，火车大概还可以走，倘如此，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车回上海，即使有耽误之事，六日总该可以到了罢——倘若不去访上遂。但这仍须临时再行决定，因为距今还有十天，变化殊不可测也。

明天想当有信来，但此信我当于上午先行发出。

二十六夜二点半。

ELEF.

【评点】

这是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共同生活后，鲁迅第一次只身赴北平探望母亲时所写之信。时许广平怀孕在身，短暂的分离，颇多怀念之语。

本信在收入《两地书》时，有几处重大的修改：

第二段，“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以下，原信是：“遇钱玄同，恶其噜_囂，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

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

第三段，“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以下，原信是：“先令韦丛芜游说，我即拒绝。丛芜吞吞吐吐说，彼校国文系主任（幼渔之弟，但非马衡）早疑心我未必肯去，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并不在‘因为南边有唔唔唔’，那是也可以同到北边的，我之谢绝，只因为不愿意做教员。因即告以我在厦门时高长虹之流言，及现在你之在上海，惟于那一小白象事，却尚秘而不宣。”

以下又删去两小段：“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丛芜又指《冰块》之封面画告诉我云：‘这是我的朋友画的，燕大女生……很要好……’”。

倒第二段，最后一句，原信为：“但这仍须俟临时再决定，因为距今还有十来天，倘觉不妥，便一定坐船。总之，我必当筹一妥当之走法，打听明白，决不冒险，你可以放心。”

原信前面称呼是“小刺猬”，署名则画一象的形状，意谓“小白象”。据许广平说，因为林语堂在一篇文章中将鲁迅誉为白象，故她戏称之。

290529 致 许 广 平

D. H:

此刻是二十九夜十二点，原以为可得你的来信的了，因为我料定你于廿一日的信以后，必已发了昨今可到的两三信，但今未得，这一定是被奉安列车耽搁了，听说星期一的通车，也还没有到。

今天上午来了一个客。下午到未名社去，晚上他们邀我去吃晚饭，在东安市场森隆饭店，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八时，尹默凤举等又为我饯行，仍在森隆，不得不赴，但吃得少些，十一点才回寓。现已吃了三粒消化丸，写了这一张信，即将睡觉了，因为明天早晨，须往西山看韦漱园去。

今天虽因得不到来信，稍觉怅怅，但我知道迟延的原因，所以睡得着的，并祝你在上海也睡得安适。

L. 二十九夜。

三十日午后二时，我从西山访韦漱园回来，果然得到你的廿三及廿五日两封信，彼此都为邮局寄递之忽迟忽早所捉弄，真是令人生气。但我知道你已经收到我的信，略得安慰，也就借此稍稍自慰了。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

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他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我说了一个大略。他所听到的似乎还有许多谣言，但不愿谈，我也不加追问。因为我推想得到，这一定是几位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今天得小峰信，云因战事，书店生意皆不佳，但由分店划给我二百元。不过此款现在还未交来。

你廿五的信今天到，则交通无阻可知，但四五日后就又难说，三日能走即走，否则当改海道，不过到沪当在十日前后了。总之，我当选一最安全的走法，决不冒险，千万放心。

L. 五月卅日下午五时。

【评点】

韦素园是未名社的成员，以抱病之身，从事出版、翻译工作，认真，踏实，深得鲁迅的赏识。肺结核病，在当时是一种绝症，所以鲁迅见之有这样一种悲凉的感觉。此种感受，后来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有所发挥。但《两地书》中在“谈了许多闲天”之后的这一

大段话：“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在原信中却没有，那是在整理出版时加上去的。下面一段文字：“他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也有所改动。原信是：“据丛芜说，关于我们的事，他闻之于马季铭（燕大国文系主任），马则云周作人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怕我去抢饭碗，即我们不住一处，他们也当另觅排斥的理由。然而我流宕三年了，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最后一段文字，也有较大的修改。原信是：“你廿五的信，今天到了，似交通尚好，但四五日后，却不一定了。三日能走则走，否则当改海道，不过到沪当在十日前后了。总之，我当择最稳当而舒服的走法，决不冒险，使我的小莲蓬担心的。现在精神也很好，千万放心，我决不肯将小刺猬的小白象，独在北平而有一点损失，使小刺猬心疼。”情意绵绵，写得更为坦露。

信前的称呼，原写“小刺猬”，信末的署名，是“你的小白象”，而“小白象”三字，则不用文字写出，而画一象以代之。

290601 致 许 广 平

D. L. ET D. H. M:

现在是三十日之夜一点钟，我快要睡了。下午已寄出一信，但我还想讲几句话，所以再写一点——

前几天，春菲（按：原信作董秋芳）给我一信，说他先前的事，要我查考鉴察。他的事情，我来“查考鉴察”干什么呢，置之不答。下午从西山回，他却已等在客厅中，并且知道他还先曾向母亲房里乱闯，大家都吓得心慌意乱，空气甚为紧张。我即出而大骂之，他竟毫不反抗，反说非常甘心。我看他未免太无刚骨，而他自说其实是勇士，独对于我，却不反抗。我说，我是愿意人对我反抗，不合则拂袖而去的。他却道正因为如此，所以佩服而愈不反抗了。我只得为之好笑，乃送而出之大门之外，大约此后当不再来缠绕了罢。

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开这题目。其实，这是我到此不久，便已感觉到了出来的：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猻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和“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所以现在倒非常

自在，于衮衮诸公之一切言动，全都漠然。即下午之呵斥春菲，事后思之，也觉得大可不必。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

这两星期以来，我一点也不颓唐，但此刻想到你之采办布帛之类，先事经营，却实在觉得一点凄苦。这种性质，真是怎么好呢？我应该快到上海，去约制她。

三十日夜一点半。

D. H.，三十一日晨被母亲叫醒，睡眠时间缺少了一点，所以晚上九点钟便睡去，一觉醒来，此刻已是三点钟了。泡了一碗茶，坐在桌前，想起 H. M. 大约是躺着，但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五月卅一这一天，没有什么事，只在下午有三个日本人来看我所搜集的关于佛教石刻拓本，以为已经很多，力劝我作目录，这是并不难的，于学术上也许有点用处，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晚间紫佩来，已为我购得车票，是三日午后二时开，他在报馆里，知道车还可以坐，至多，不过误点（迟到）而已。所以我定于三日启行，有一星期，就可以面谈了。此信发后，拟不再寄信，如果中途去访上遂，自然当从那里再发一封。

EL. 六月一日黎明前三点。

D. S.:

写了以上的几行信以后，又写了几封给人的回信，天也亮起来了，还有一篇讲演稿要改，此刻大约是不能睡的了，再来写几句——

我自从到此以后，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

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陵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 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D. H. M. ET D. L.，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时时如此呆想，我是并不如此的。这回不过因为睡够了，又值没有别的事，所以就随便谈谈。吃了午饭以后，大约还要睡觉。行期在即，以后也许要忙一些。小米（H. 吃的），梆子面（同上），果脯等，昨天都已买齐了。

这封信的下端，是因为加添两张，自己拆过的。

L. 六月一日晨五时。

【评点】

从鲁迅给许广平的几封信看，他此次到北平后，很引起一些波澜，有希望他留在北平任教的，有怕他抢饭碗而排斥的。正如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欢迎他的是青年学生和几个朋友，排斥他的则是一些小气的学者教授。因此难免引起他对北平学者和自己学术成绩

的一些议论。只是这两段重要的议论,在出版时都有较多的删改,现将原信摘录如下:

第三段:“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开这题目。……”原信为:“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俱颇不满。我想,此地是先前和‘正人君子’战斗之诸公,倘不自己小心,怕就也要变成‘正人君子’了。各种劳劳,从我看来,很可不必。我自从到北平后,觉得非常自在,于他们一切言动,甚为漠然;即下午之面斥董公,事后也毫不气忿,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敌人,亦不易也。”接着,又删去一小段:“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那里会明白呢。我到这里一看,更确知我们并不渺小。”

倒第三段,原信为:“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著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排斥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唯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就要见面了,那时再谈。”将此段文字与修改后的文字参阅,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态和筹划。但由于环境所限,鲁迅终于未能静下心来写出他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专著。这当然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但他所写的杂文,却为中国文学史增色不少,而且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开辟出一条新道路,亦一大贡献也。

此外,本信各段,还有一些小修改,不暇一一标出。

29081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九日信早到。北大又纷纷扰扰，但这事情，我去过北平以后，是已经有些料到的，所谓三沈三马二周之类，也有今日，真该为现代评论派诸公所笑。

我看，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中之一部分结合起来了。这是不大好的。但有什么法子呢。《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鼻公近来颇默默无闻，然而无闻，则教授做稳矣。其到处“服务”，不亦宜哉。

老版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老版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用种种方法骂我的潘梓年，也是北新的股东，你想可气不可气。

这里下了几天雨，凉起来了，我的痲子，也已经逐渐下野，不过太忙，还是终日头昏眼花，我常常想，真是何苦如此。

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

迅 上〔八月十七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评点】

鲁迅说,《新月》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这是剔皮见骨之论。从现代评论派以前与段祺瑞政府的关系,以及新月派后来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看,的确如此。而且,招牌虽换,但主要人员则是承袭的。特别是胡适,他虽不加入政府,但却热衷于政治,是自觉地将自己放在“诤友”的位置上。

下文所说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版税纠纷事,是由来已久了。前在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谦信中,已有所述,到得1929年,矛盾逐步激化,在鲁迅书信中亦有所反映,如7月21日致章廷谦信中说:“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痠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8月7日致韦丛芜信中又说:“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北新现在对我说穷,我是不相信的,听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鲁迅曾多次写信质询,李小峰竟不答复,鲁迅忍无可忍,只好聘请律师来解决了。到这时,李小峰再来拜访,当然是来不及了。李小峰急请郁达夫出面斡旋,终于协商解决了此事,但仍由律师代理。李小峰分四次还清积欠鲁迅旧版税共计8256元8角余,鲁迅作价收回旧著纸型,以后北新出鲁迅的书,必须加贴版税印花。《奔流》杂志的稿费问题,亦订出解决办法。

29110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月卅一日信早到。本应早答而竟迟迟者，忙也。斐君兄所经验之理想的衣服之不合用，顷经调查，知确有同一之现象。后来收到“未曾做过娘”的女士们所送之衣服几件，也都属于理想一类，似乎该现象为中国所通有也。

所谓忙者，因为又须准备吃官司也。月前雇一上虞女佣，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近无后文，盖在协以谋我矣。但不佞亦别无善法，只好师徐大总统之故智，“听其自然”也。

小峰前天送来钱二百，为《奔流》稿费，馀一百则云于十一日送来。我想，杂志非芝麻糖，可以随便切几个钱者，所以拟俟收足后，再来动手。

北京已非善地，可以不去，以暂且不去为是。倘长此以往，恐怕要日见其荒凉，四五年后，必如河南山东一样，不能居住矣。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农院如“卑礼厚币”而来请，我以为不如仍旧〔旧〕去教，其目的当然是在饭碗，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

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须豫先积下耳。

我和达夫则生活，实在并不行，我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夫，达夫似乎也不宽裕，上月往安徽去教书，不到两星期，因为战事，又逃回来了。

迅 启上 十一月八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密司许并嘱代笔问候。

【评点】

信中所说上虞女工事，乃鲁迅同情妇女，保护弱者的表现。关于此事，《鲁迅日记》有两处记载：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据许广平回忆，其间还请了当地乡绅来谈判。可见此事是费了很大周折，花了不少钱，才解决的。许广平很称赞这位女工做事勤快，又善于带孩子，但此事结束后不到两个月，王阿花因另有所爱，即离鲁迅家而去。

1930 年

300222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日信廿二收到，我这才知道你久在绍兴，我因为忙于打杂，也久不写信了。海婴，我毫不佩服其鼻梁之高，只希望他肯多睡一点，就好。他初生时，因母乳不够，是很瘦的，到将要两月，用母乳一次，牛乳加米汤一次，间隔喂之（两回之间，距三小时，夜间则只吃母乳），这才胖起来。米之于小孩，确似很好的，但粥汤似比米糊好，因其少有渣滓也。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

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 P 字。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今年是无暇“游春”了，我所经手的事太多，又得帮看孩子，没有办法。小峰久不见，但版税是付的，《奔流》拖延着。

迅 上 二月廿二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斐君和小燕们姊弟，也十二分加大号的致意，自然川岛先生尤其不用说了，大家都好呀！ 广平敬候

【评点】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一点关于语丝派分裂的情况。由于地位的变化，由于思想的分歧，文化界的分化是难免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句话：“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这意见，在 1929 年 6 月 1 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亦有所论述，可见他确是深有感触，并非随意而言。《我和〈语丝〉的始终》曾谈到语丝派的变化，但由于还比较的留情面，所以也说得不甚分明。后来鲁迅对这问题又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到得 1934 年刘半农去世时，他在一篇悼念文章里，就将刘半农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从趋时到复古的过程，这就把问题的实质

点明了,而且还联系到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的际遇,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分析,就说得更加透彻了。如果将鲁迅的书信和他的小说、杂文联系起来研读,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如何触发了他的灵感,又如何进而形成作品的主题的。

300321 致章廷谦

矛盾兄：

四日信早到。《萌芽》三本，已于前几日寄上。所谓“六个文学团体之五”者，原想更做几篇，但至今未做，而况发表乎哉。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其实是，在杭州自己沈没，倘有平安饭吃，为自己计，也并不算坏事情。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达夫本有北上之说，但现在看来，怕未必。一者他正在医痔疮，二者北局又有变化，大约薪水未必稳妥，他总不肯去喝风的。所以，大约不去总有十层之八九。自由同盟上的一个名字，也许可以算是原因之三罢。

半农玄同之拜帅，不知尚有几何时？有枪的也和有笔的一样，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约又阻碍了。兄至今勾留杭州，也未始不是幸事。

迅 上 三月二十一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评点】

在这封信里，鲁迅谈到他列名于中国自由大同盟发起人之事，虽轻描淡写，但很可注意。这个同盟成立于1930年2月，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政治性组织。共产党中央希望鲁迅也能做该同盟的发起人，派遣与鲁迅接近的党员冯雪峰去联系，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当时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的，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但他还是参加了同盟，并列名为发起人之一。鲁迅的名字原来是写在下面的，但发表出来却移到第二名，当然非常触目了。果然，自由大同盟一成立就遭到压迫，根本无法开展活动，到5月份就等于自行解散了。但鲁迅却因此遭到严重的迫害。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从此被列入黑名单。有人劝说他发表个声明，退出该组织，以鲁迅的性格，当然不肯这样做，他表示要用硬功夫来对付，决不声明。后来，他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谈及此事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到得鲁迅逝世前不久，南京政府通过鲁迅昔日的一个学生写信给他，说是要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希望“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却被鲁迅所拒绝了。据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回忆,鲁迅当时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令,就伴随着鲁迅终生。

30032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并不笑你的“懦弱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

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但世事万变，他此刻大约又未必去了罢。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

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

徐夫人出典，我不知道，手头又无书可查。以意度之，也许是男子而女名者。不知人名之中，可有徐负（负＝妇），倘有，则大概便是此人了。

乔峰将上海情形告知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动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今有此举，岂有什么决心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弯）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习，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

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为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迅 启上 三月二十七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不另。

【评点】

“梯子之论”，是指当时有人说鲁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来使用的话。但鲁迅是甘愿做人梯的，长期以来，他曾帮助过许多文学青年社团，“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者，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不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青年

的品质不好之故，如狂飚社的高长虹，不管鲁迅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心血，稍不如意就大肆攻击恩师，如朝花社的王方仁，骗走钱财，导致该社倒闭。尽管有这些不愉快的经历，而鲁迅“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此次应青年之邀，不但参加自由大同盟，而且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也就是出于这种责任心。鲁迅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凡事看得很透，他并非不知道自己仍是被当作梯子来使用，所慨叹者只是怕那些人未必能爬得上去。看来，他一开始就对参加左联的革命作家们评价不高。茄花色者，死色也，很难看，无观赏价值。

300920 致曹靖华

.....

究》上,此刊物亦又停顿,故后半未译,但很难懂,看的人怕不多。车氏及毕林斯基,中国近来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译书的霍乱症,现在又好了一点,因为当局不管好坏,一味力加迫压,译者及出版者见此种书籍之销行,发生困难,便去弄别的省力而可以赚钱的东西了。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听说连译作(也许连信件)也都在邮局暗中扣住,所以有一些人,就赶紧拨转马头,离开惟恐不速,于是翻译界也就清静起来,其实这倒是好的。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沈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别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但仍然毫无创作,他们的惟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是用鼻子的了。

你的女儿的情形,倘不经西医诊断,恐怕是很难疗治的。既然不傻不痴,而到五六岁还不能说话,也许是耳内有病,因为她听不

见，所以无从模仿，至于不能走，则是“软骨病”也未可知。打针毫无用处，海参中国虽算是补品，其实是效力很少（不过和吃鱼虾相仿佛），婴儿自己药片有点效，但以小病症为限。

不过另外此刻也没有法子，所以今天买了一打药片，两斤海参，托先施公司去寄，这公司有邮寄部，代办一切，甚便当的。不料他说罗山不通邮寄包裹，已有半年多了，再过两星期，也许会通（不知何故），因此这一包就搁在公司里，须过两星期再看。

过两星期后，我当再去问一声。

这里冷起来了。我也老下去了，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再谈罢，此祝
安吉。

弟周豫才 启 九月二十日
（通讯地址仍旧）

【评点】

本信虽然遗失了前面一半，但就保存下来的后半看，内容仍很重要。这里不但反映出因自由运动大同盟事而受通缉的情况，而且也表现了他对一些新文人的看法。只事空喊而无成绩，是这些文学家的通病，而随风转舵，投机行事，更是令人生厌。鲁迅对乘势而起的“民族主义文学”派和“新月派”都很讨厌，对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忽而又消沉下去的人，亦认为大有害处，说是他们的功劳，只在于提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目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里所反映的是鲁迅对革命文学家的真实评价，与世间所

宣传的，是两码子事。这层意思，他在次年所作的一个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曾经有所发挥，可惜文学史家们往往避而不谈这篇文章。其实此文是很有价值的。

301013 致王乔南

乔南先生：

顷奉到五日来信，谨悉种种。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

我的意见，以为《阿 Q 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勿复，并颂
曼福。

迅 启上 十月十三日

再：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

【评点】

《阿 Q 正传》寓意甚深，“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鲁迅担心，一改编成剧本，将只剩下滑稽，而且认为：“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这担心很有道理。并非他低估剧作家和明星，而是看透了实情的缘故。但王乔南坚持要改，而且大概已经改编好了本子，还要去适应观众的口味，以女角为主，改名为《女人与面包》。鲁迅实在没有办法，故在 11 月 14 日的复信中，特地声明：“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这是无可奈何的声明。鲁迅大概不曾料到，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作品还会被改编成各种适合时令而离开原意的舞台和影视剧本。鲁迅若地下有知，大概也只好声明：“它化为《……》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

301206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十一月廿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来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干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 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öfi 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译文的好坏，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

不过三色版即使无法，单色版总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他印出。此复，即颂
近安。

迅 启上。〔十二月六日〕

《阿 Q 正传》的世界语译本,我没有见过,他们连一本也不送我,定价又太贵,我就随他了。

【评点】

鲁迅在编辑《奔流》杂志时,孙用只是一个业余翻译一点东西的投稿者,与鲁迅并不相识,但鲁迅认为他所译裴多斐的《英雄的约翰》(即《勇敢的约翰》)有出版之价值,就为之奔忙,帮助找出版社。但由于孙用没有名气,《英雄的约翰》不是畅销书,裴多斐和鲁迅又正在倒楣的时候,故虽历尽艰辛,看遍出版商的势利相,还是未能如愿。其间,鲁迅曾经自己筹定款项,准备由个人付印一干部,后来终于有一家书店肯承印,但 12 幅插图和一幅作者像的制版费,仍需由鲁迅垫付。书出之后,鲁迅又将收回之一部分制图费,先寄给孙用垫付版税。关爱青年之情,实在可感。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格精神的感召,所以鲁迅身后有许多追随者,孙用也成为其中之一。

1931 年

310121 致许寿裳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道安。

弟 令斐 顿首 一月二十一日

【评点】

这是用隐语写成，向老友报平安的信件，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许寿裳后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飞’，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关于此事的背景，可参阅鲁迅悼念柔石等人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

310202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言，至于广播北方，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

其实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不过这一回造得较大，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这些人大抵便是所谓“文学家”，如长虹一样，以我为“绊脚石”，以为将我除去，他们的文章便光焰万丈了。其实是并不然的。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但在中国，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所以我近来搬了一处地方。景宋也安好的，但忙于照看小孩。我好像未曾通知过，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另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

我新近印了一本 Gradkov 的《Zement》的插画，计十幅，大约不久可由未名社转寄 兄看。又已将 Fadejev 的《毁灭》(Razgrom)译完，拟即付印。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

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 兄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迅 上 二月二日

景宋附笔问候

【评点】

从韦素园给许广平的询问信中，鲁迅乃知关于他的谣言，已经传遍全国矣。这种谣言，本乃沪上文学家们所造，鲁迅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分析得很透彻。他在给其他友人的信里，对此种心态，也都有剖析。如1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就说到：“其实此乃一部分人所作之小说，愿我如此，以自快慰，用泄其不欲我‘所作之《呐喊》，销行至六七万本’之恨者耳。”鲁迅对此类人很蔑视，他相信作家的地位只能由自己的作品来奠定，而不能靠阴谋手段来谋取。“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这是对历史的信任。

但是，“在中国，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所以鲁迅不得不弃家出走。在鲁迅，当然只是暂避一时之风险，但后来，这种阴谋手段在社会上愈演愈烈，被阴谋所害者，以阴谋而得逞者，都愈来愈多，这真是历史的悲哀。

310204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顷见致舍弟书，借知沪上之谣，已达日本。致劳殷念，便欲首途，感怆交并，非言可喻！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大谈陆王[黄]恋爱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今则轮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緘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此布，即颂曼福不尽。

迅 启上 二月四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评点】

从李秉中给周建人的信中，鲁迅知道关于他的谣言已达日本，乃作此信更正。信文辞短意长，透视力度甚深，忿慨之情跃然，收信者即予发表，使广流传，起到了辟谣作用。事后李秉中虽以擅自发表而致歉，鲁迅却也并不责怪，说心中“毫无芥蒂”，盖因“自己的信之发表，究胜于别人之造谣，况且既已写出，何妨印出”。

310205 致荆有麟

有麟兄：

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患，且为通电各处乞援，甚为感荷。

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

其实是不见得。

我还不知道福州路在那里。

但世界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将来真会被捕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是平安的。特此奉闻，以释远念。并希告关心于我的诸友为荷。此颂

曼福

迅 启上 二月五日

【评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有关鲁迅的谣言真是五花八门,以及造谣者无中生有的手法。对于上海一班无聊文人所说的种种,鲁迅只是说:“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对于“鲁迅在福州路被捕”的谣言,鲁迅则说:“我还不知道福州路在那里”,简单的两句话,就把全部谣言都揭穿了。但是,尽管这种反驳在逻辑上可以使这些谣言无立足之地,但造谣者决不会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事实,而是为了攻击某人。这是造谣者的“逻辑”,无可理喻也。

310218 致李秉中

秉中兄：

九日惠函已收到。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尚无恙，请释远念，并善自珍摄为幸。此布，即颂曼福不尽。

迅 启上 二月十八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评点】

中国虽遍地荆棘，鲁迅亦身处危难之中，而他仍不能绝裾而去

者，眷念故国之情怀也。鲁迅乃一真诚之战士，他执著于现实的斗争，不愿到外国去做寓公。尽管日本草木明瑟，诚足怡心，但他还是不甚向往。后来苏联多次发出邀请，他亦未去，皆因离不开现实斗争也。

1932 年

320116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拜启：一月十日惠函奉悉。

《十字街头》是左联的人化名办的刊物，恐怕不久就会被禁止的。评论《铁流》的作者底细不明。从他懂得俄文来推测，像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共产主义者。我的笔名是它音、阿二、佩韦、明瑟、白舌、遐观 etc.。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一九〇七或八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至于内容，都是短篇：美国的爱伦·坡，俄国的迦尔洵、安德烈夫，波兰的显克微支（Henrik Sienkiewicz），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等的作品，译文很艰涩。

我想你还是到东京去写作好，即使是胡乱写写也好，因为不乱写就不能有所成就。等到有所成就以后，再把乱写的东西改正就

好了。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对于我的表兄弟的画，不必还什么礼。他在乡下过着清闲日子，让他画几张画，并不费事。而且他恐怕已感到满足，也许在藏于他心里的自传中，已经写下“我的画已传到东瀛”了。

你即使到东京后，也请勿送什么给 Miss 许，还是在文字上“问候”有味。她听到我转告时，一定会说“是吗？真是多谢了！”就像对着电话筒频频施礼致意一样。前几天收到令尊的明信片，我因住在新旧历混用的国度里，连贺年片也没有寄一张，祈代问候。令堂、令夫人和木实君，也请致意。

鲁迅 顿首上 一月十六夜

增田仁兄

【评点】

鲁迅在这封信中明确指出，他和周作人当初翻译《域外小说集》，是出于对林琴南译作的不满，而企图加以纠正。林琴南不懂外文，靠着别人的口述来翻译，他用的是古文笔法，文笔优美，而且很适合中国士人的口味，所以读者众多，作品畅销，只是在加以归化之后，译品就不忠实于原著了；周氏兄弟用的是直译法，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表现方法上，都力求传达出作品原来的风貌，只是这种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都不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而且译笔古奥，索解为难，读者倒反而很少了。但鲁迅的翻译，并不以娱悦群众为目的，而是志在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表现方法，故他一直坚持直译法，不但施诸实践，而且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

《关于翻译的通信》等文中，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这是一种重要的翻译主张，应深入加以研究。

此外，与增田涉谈写作的一段话，也值得注意。人们往往以为大作家对于初学写作者是要求很严的，其实倒也不一定。鲁迅认为开始学习写作时，不妨“胡乱写写”，所谓“胡乱写写”者，意思是说可以写得随便一些，不必太谨严，因为一拘束就会写不出来了，不成熟之处，待到有成就之后再加以改正就是了。但是，写作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对事物抱有成见，不看与己意相抵触的事实，如果这样，那只能一直乱写下去了。这里虽然是针对某些日本人的情况而发，但在写作上有着普遍意义。

320222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倘赐信，可由“四马路杏花楼下，北新书局转”耳。此颂
曼福。

弟 树 顿首 二月二十二日

乔峰亦无恙，并闻。

【评点】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史称一二八事变。鲁迅所住的虹口北四川路底公寓，邻近日本海军司令部，正是交火的地点，“血刃塞途，飞丸入

室”，真是非常危险。据周建人说，在鲁迅写字台前面落地玻璃门上有一个弹孔，高低适在台子的抽斗下面，如果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有人坐着写字，子弹一定打在腹部。幸好当时没人。后来全家搬到英租界内山支店的楼上，席地而卧，过起了流浪的生活。正如一年前因柔石被捕而离家出走时一样，鲁迅此时又到处发函，告慰那些挂念他、打听他下落的亲友。

320302 致许寿裳

季芾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焚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钦文之事，在一星期前，闻虽眷属亦不准接见，而死者之姊，且

控其谋财害命，殊可笑，但近来不闻新消息，恐尚未获自由耳。

勿复，即颂

曼福。

弟 树 启上 三月二日

乔峰广平附笔致候

【评点】

“被裁之事”，指鲁迅于 1932 年 12 月被裁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职务一事。他原来应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于 1927 年 12 月起，担任此职的。特约撰述员的酬金每月有 300 元，约当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被裁之后，在经济上当然损失不少。但鲁迅此时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三弟建人。因为他所服务的商务印书馆在被炸之后，正在大量裁员，周建人亦在被裁之列。鲁迅自己被裁，尚有版税可以支持，而周建人则专靠工资生活的，被裁之后，则啖饭为难，鲁迅是手足情深，最记挂的还是这个兄弟。他要老友许寿裳就近找蔡元培设法，因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较深。周建人曾短期到别处谋职，后经蔡元培关照，商务印书馆重新聘用了周建人。

32031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此上，即颂曼福。

树 启上 三月十五日

【评点】

从本信所写的内容,可以看到一二八事变之后,北四川路一带被破坏的情况,和当时百姓生活之艰难。正如鲁迅先前在《幸福的家庭》中所描写的,中国之大,要寻找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地方,也实在并不容易。

320320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七日寄奉一函，想已到。现男等已于十九日回寓，见寓中窗户，亦被炸弹碎片穿破四处，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块之多。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窃去者，计害马衣服三件，海婴衣裤袜子手套等十件，皆系害马用毛线自编，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共值洋七十元，损失尚算不多。两个用人，亦被窃去值洋二三十元之物件。惟男则除不见了一柄洋伞之外，其余一无所失，可见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

老三旧寓，则被炸毁小半，门窗多粉碎，但老三之物，则除木器颇被炸破之外，衣服尚无大损，不过房子已不能住，所以他搬到法租界去了。

海婴疹子见点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风，但次日却发得很好，移至旅馆，又值下雪而大冷，亦并无妨碍，至十八夜，热已退净，遂一同回寓。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边吵嚷，令男不能安静。所说之话亦更多，大抵为绍兴话，且喜吃咸，如霉豆腐，盐菜之类。现已大抵吃饭及粥，牛乳只吃两回矣。

男及害马，全都安好，请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见，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同回四川云。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三月二十日夜

【评点】

鲁迅虽然在理论上非孝,严厉地批判亲权思想,但实际上,却事母至孝,不但在经济上负责供养她,而且尽量使她生活得愉快。盖鲁迅所反对的是“二十四孝”之类违反人性的“孝道”,而崇尚的则是出于人之常情的对于老人的尊重。一二八事变之后,鲁迅于家信中很详细的向母亲报告家中损失的数目,三弟的境遇,特别是她最关爱的孙子的情况,但都说得较为轻松,艰难悲惨之处,则避而不言,这与致友人的书信相较,即可见出,意在不欲使母亲担忧也。

320322 致许寿裳

季市兄：

近来租界附近已渐平静，电车亦俱开通，故我已于前日仍回旧寓，门墙虽有弹孔，而内容无损。但鼠窃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取去妇孺衣被及厨下什物二十余事，可值七十元，属于我个人者，则仅取洋伞一柄。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今路上虽已见中国行人，而迁去者众，故市廛未开，商贩不至，状颇荒凉，得食物亦颇费事。本拟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暂在旧寓试住，倘大不便，当再图迁徙也。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钦文似尚不能保释，闻近又发见被害者之日记若干册，法官当一一细读，此一细读，正不知何时读完，其累钦文甚矣。回寓后不复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见得有人来，转信殊多延误，此后赐示，似不如由内山书店转也。此上，即颂曼福。

迅 启上 三月二十一夜

再者

十七日快信，顷已奉到，因须自北新去取，故迟迟耳。

乔峰事经蔡先生面商，甚为感谢，再使乔峰自去，大约王云五所答，当未必能更加切实，鄙意不如暂且勿去，静待若干日为佳也。

顷又闻钦文已释出，法官对于他，并不起诉，然则已脱干系矣。岂法官之读日记，竟如此其神速耶。

迅 上 二十二日下午

【评点】

由窃贼专偷衣被及厨下什物，而对一切书籍，似未尝略一翻动，于是推论道：“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妙极！此种微讽手法，在鲁迅书信中随处可见，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如本信下文叙海婴在流徙中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之事，亦用此种笔法，写得真是跌宕有致：先是强调住进旅馆的目的是“贪其有汽炉耳”，这是抱着希望而去；接着则说：“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真是令人大失所望，且为病人担心；不料接着却出现了喜剧性的效果：“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最后，鲁迅做出了绝妙的结论：“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此或即上海人之所谓“冷面滑稽”欤？后面说到许钦文被拘事，将其能否保释，归结于法官读被害者日记之快慢，亦属此种笔法。

320413 致内山完造

[译 文]

拜启：四月二日惠函奉悉，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

你们的好意，深为感谢。由于不知道增田兄的地址，请代致意，特别是对佐藤先生，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自己的谢意。我于三周前回到原住处。周围虽颇寂寞，但也无多大不便。不景气当然也间接波及我们，不过先忍耐一下看，等到万一炮弹再次飞来又要逃走时再说。

书店还是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了。颇为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能早日归来。 草草顿首

鲁迅 呈〔四月十三日〕

密斯许同具

【评点】

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信中引《摩登式的救国青年》中所报道之事，当时并不鲜见。在纹银盒子上刻上“抗日救国”的字样，花前月下边摇出仁丹来吃，边说些抗日救国的话，于实际的抗日救国活动丝毫无补，而在一二八那时候如器具上有那样的文字，就要遭殃，“想活是极难的”。这叫做“‘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而更可悲的是：“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

正因为许多人至今未悟，所以在中国，到处还是办事如做戏。鲁迅把这种人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在许多杂文里加以批判。如《宣传与做戏》中就举过一些例子，并且说：“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对于这种发热昏的人，应该兜头浇一盆冷水，使其清醒起来，将青龙偃月刀或锄头送回戏院子里去，在生活中还是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的为好。

320624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十一日寄上一信，想已到。十七日寄出纸一包，约计四百五十张，是挂号的，想不至于失落。本预备了五百张，但因为太重，所以减少了。至于前信所说的二百小张，则只好作罢，因为邮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气的人，看见“俄国”两个字就恨恨，先前已曾碰过几个钉子，这回将小卷去寄，他不相信是纸，拆开来看，果然是纸，本该不成问题了，但他拆的时候，故意（！）将包纸拆得粉碎，使我不能再包起来，只得拿回家。但包好了再去寄，不是又可以玩这一手的么？所以我已将零寄法停止，只寄小包了。

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像十月革命以前的 Korolenko 那样的人物，这里是半个也没有。

萧三兄已有信来了。

兄所寄的书，文学家画像等二本，是六月三日收到的，至今已隔了二十天，而同日寄出之《康宁珂夫画集》还没有到，那么，能到与否，颇可疑了。书系挂号，想兄当可以向列京邮局追问。但且慢，我当先托人向上海邮局去查一查，如无着落，当再写信通知，由兄去一查问，因为还有十二幅木刻，倘若失少，是极可惜的。

至今为止，收到的木刻之中，共有五家，其中的 Favorsky 和

Pavlinov 是在日本文的书上提起过了的,说 F. 氏是苏联插画家的第一个。但不知这几位以外,还有木刻家否? 其作品可以弄到否? 用何方法交换,希兄便中留心探访为托。

《铁流》在北平有翻板了,坏纸错字,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已将纸版售给(板权不售)这里的光华书局,因为外行人实在弄不过书贾,只好让商人和商人去对垒。作者抽版税,印花由我代贴。

日文的《铁流》已绝版,去买旧的,也至今没有,据说这书在旧书店里很少见。但我有一本,日内当寄上,送与作者就是了。

我们都好的,请勿念。此上,即颂
安健。

弟 豫 启上 六月廿四夜

【评点】

鲁迅喜爱绘画,曾托徐诗荃、陈学昭在德国和法国搜集画册,这时他正在提倡木刻,所以又托曹靖华在苏联收集木刻作品。苏联木刻家为了支援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不收费,鲁迅就买了许多他们所喜欢的中国宣纸送给他们,算是一种交换。但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反苏,所以寄到苏联去的東西备受刁难。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小市民的思想趋向和无产作家的艰难处境。

320801 致许寿裳

季市兄：

上午得七月卅日快信，俱悉种种，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

王公胆怯，不特可哂，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关于此事之文章，《东方杂志》只作一附录，不订入书中，使成若即若离之状。但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闾大夫欤，必将大作《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此一节，仍亦甚可佩服也。

近日刊物上，常见有署名“建人”之文字，不知所说云何，而且称此名者，似不只一人，此皆非乔峰所作，顾亦不能一一登报更正，反致自扰也。但于便中，希向蔡先生一提，或乞转告云五，以免误会为幸。原笺附还。此复，即颂曼福。

弟 树 启上 八月一日夜

蔡先生不知现寓何处，乞示知，拟自去向其一谢。同夜又及

【评点】

为三弟建人(乔峰)谋复职事有了头绪,自然高兴,但“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却使鲁迅着急。“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这样暴露出自己的观点,就给人以打小报告之机,在险恶的环境中,是十分不利的。鲁迅自己是无所畏惧的斗士,但也深知其中艰险,所以希望还不足以抗拒风暴的三弟,能三缄其口,保住饭碗。这是对三弟的爱护,也是他讲求斗争策略的表现。

信中所说的“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的告密者,对于我们说来,并不陌生。这种人真是何代蔑有!大概只有当告密失去需求时,这类人才会消失。这也是一种供求关系吧。

下文所说的王公,是指当时商务印书馆主事者王云五,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之时,在本馆出版物中不敢有抗日字样,而日本却仍将商务印书馆当作抗日大本营,加以轰炸,实在是一个悲剧。王宅沦为妓馆,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这也反映出某些高层知识分子的懦怯心理。

320815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八月十日信收到。素园逝去，实足哀伤，有志者入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忆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见赠，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今此书尚在行篋，览之黯然。

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学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但此书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嘱书店寄上一册，至希察收。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年来伏处牖下，于小说史事，已不经意，故遂毫无新得。上月得石印传奇《梅花梦》一部两本，为毗陵陈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宝鉴》者，《小说史略》误作陈森书，衍一“书”字，希讲授时改正。此外又有木刻《梅花梦传奇》，似张姓者所为，非一书也。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缙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

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此复，即颂
曼福。

迅 启上 八月十五夜。

【评点】

鲁迅对于郑振铎治学方法的批评，具有普遍意义，很值得重视。

研究学问，既需要史料，也需要史识，两者缺一不可。研究者如能掌握新的史料，这当然很重要，但史料是用来说明问题的，也就是说，要从史料中引出观点来，这样才有价值，如果以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虽足以炫耀人目，但却失却了研究的意义。鲁迅批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这就是说，它只是汇编了许多史料，而缺乏深入的分析，提不出深刻的见解。当然，这些史料还是有用的，但需要具有史识者再加研究，才能写成文学史。可见鲁迅对于史识的重视。

320817 致许寿裳

季市兄：

日前往蔡先生寓，未遇，此后即寄兄一函，想已达览。兹有愚者，缘弟有旧学生孔若君，湖州人，向在天津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办事，近来家中久不得来信，因设法探问，则知已被捕，现押绥靖公署军法处，原因不明。曾有同学往访，据云观在内情形，并不严重，似无大关系。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被縲继，殊莫明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尔和先生住址，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教授，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或函中并列弟名亦可。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此上，顺颂曼福。

弟树顿首 八月十七日

【评点】

孔若君，即孔另境，系茅盾的小舅子，当时因共产党嫌疑在天

津被捕，后被押至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鲁迅通过老友许寿裳，再转托人设法加以保释。鲁迅出于对革命青年的爱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为许多被捕者帮过忙。

320911 致 萧 三

萧三兄：

七月十五日信收到。致周连兄等信，已即转交。

这回的旅行，我本决改为一个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经痛，赶紧医治，现在总算已在好了起来，但好得很慢，据医生说是年纪大而身体不好之故。所以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

VITZ 的画，不知何时可以寄下，中国人还不知道他，我想介绍一下。

俄国书籍，不远将由一个日本书店在上海贩卖了。此上，即祝安健。

豫 启上 九月十一夜

【评点】

萧三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

表,他给左联的信件,常由鲁迅代转。这里的所谓“周连兄”,即指左联,取其谐音作隐语也。

“这回的旅行”,是指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邀请鲁迅参加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紀念节活动并参观游览之事。当时苏联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鲁迅自然想去看看,他不愿接受对方的旅费,而准备自费前往。但因足疾,未能成行。同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亦曾说及此事。后来苏联方面又邀请了几次,也因种种原因而未去。

VITZ,是指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鲁迅对她的作品甚为欣赏。为了纪念柔石烈士,鲁迅曾选了她的一幅木刻《牺牲》,发表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1936年1月间,鲁迅又编选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为之写作序目,自费出版。

321103 致许寿裳

季市兄：

顷接一日手书，敬悉。介函已寄静农，甚感。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

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及被回人代表诘责，弟以为惟有直捷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而彼局又延宕数日（有事置之不理，是北新老手段，弟前年之几与涉讼，即为此），迨遭重创，始于报上登载启事，其误二也。此后如何，盖不可知。北新为介绍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

上海已转寒，阖寓无恙，请释远念。此复，即颂曼福。

弟树顿首 十一月三日

广平附笔问安。

【评点】

北新书局于 1932 年出版民间故事《小猪八戒》，引起上海北平等地回教徒的不满，晋京请愿，事情闹得很大，北新书局一度被封。鲁迅于信中分析了此事的历史原因和北新书局的责任，甚为客观精当。然中国之事，却很少有直截了当地处理的，大抵是能拖则拖，拖得失去时机就酿成大事，非独北新如此也。

321120 致许广平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

十七日寄出一信，想已达。昨得十五日来信，我相信乖姑的话，所以很高兴，小乖姑大约总该好起来了。我也很好；母亲也好得多了，但她又想吃不消化的东西，真是令人为难，不过经我一劝，也就停止了。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她和我们的感情很好，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的孩子们的照相则挂在墙上，初，我颇不平，但现在乃知道这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所以便无芥蒂了。二太太将其父母迎来，而虐待得真可以，至于一见某太太，二老人也不免流涕云。

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

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这里真是和暖得很，外出可以用不着外套，本地人还不穿皮

袍，所以我带来的衣服，还不必都穿在身上也。

现在是夜九点半，我从幼渔家吃饭回来了，同席还是昨天那些人，所讲的无非是笑话。现在这里是“现代”派拜帅了，刘博士已投入其麾下，闻彼一作校长，其夫人即不理二太太，因二老爷不过为一教员而已云。

再谈。

迅。〔十一月二十日〕

【评点】

鲁迅虽然从《狂人日记》开始，就着力抨击家族制度，但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未能摆脱大家族的阴影，总想兄弟怡怡，同处在一个大家庭内，永不分家。所以他们在卖掉绍兴老屋之后，就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房子，兄弟三家住在一起，鲁迅将自己的收入交给周作人的老婆，由她当家，统一管理财务。不料信子是个歇斯底里者，而周作人又昏庸糊涂，结果是兄弟分裂，鲁迅搬出八道湾。当鲁迅赁屋暂居砖塔胡同时，他的母亲因受不了信子的虐待，哭到砖塔胡同，要求与鲁迅同住，于是鲁迅又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但对做母亲的说来，虽然感情有所偏向，却毕竟双方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处事仍要一碗水端平，于是在家庭里也玩起外交手段来，真是有趣得很。而鲁迅因孩子照片所放的位置，而有所计较，这也是真实的感情。鲁迅毕竟是凡人。

321123 致许广平

乖姑：

二十一日寄一函，想已到。昨得十九所寄信，今午又得二十日信，俱悉。关于信件，你随意处分，甚好，岂但“原谅”，还该嘉奖的。

北京不冷，仍无需外套，真奇。我亦得好，昨天往北大讲半点钟，听者七八百，因我要求以国文系为限，而不料尚有此数；次即往辅仁大学讲半点钟，听者千一二百人，将夕，兼士即在东兴楼招宴，同席十一人，多旧相识，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

明日拟至女子学院讲半点钟，此外即不再往了。

母亲已日见其好起来，但仍看医生，我拟请其多服药几天也。坪井先生甚可感，有否玩具可得，拟至西安[单]市场一看再说，但恐必窳劣，无佳品耳。“雪景”亦未必佳。山本夫人拟买信笺送之，至于少爷，恐怕只可作罢。

我独坐靠墙之桌边，虽无事，而亦静不下，不能作小说，只可乱翻旧书，看看而已。夜眠甚安，酒已不喝，因赴宴时须喝，恐太多，故平时节去也。

云章为师大舍监，正在被逐，今剪报附上，她不知我在此也。

L. 十一月廿三下午

【评点】

鲁迅于 1932 年 11 月因母病电召,赴北平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在北平各大学作了五次演讲,是为“北平五讲”,计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再论第三种人》及《文艺与武力》,均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且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原拟出版《五讲三嘘集》,后未果。前两篇后收在《集外集拾遗》中,其余三篇未整理成文,但其论点散见于别人的回忆中和他本人的杂文中。

从这封信中所述,可以想见鲁迅演讲时的盛况。

1933 年

330102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去年承见访，甚感，后来才知道并见付版税百五十元，未写收条，店友来时希带纸来，当签名。并希携下《三闲集》五本为荷。

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因我鉴于《二心集》的覆辙，这地步是要留的。

现在不妨明白的说几句。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并且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

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尚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条，须先决见示——

- 一、书中虽与政治无关系，但开罪于个人（名字自然是改成谜语了）之处却不少，北新虑及有害否？
- 二、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
- 三、广告须先给我看一遍，加以改正。

四、因我支了版税而又将书扣住了，所以以后必须将另一作品给与天马书店。

以上四条，如北新都可承认，那么，可以付北新出版了，但现在还未抄完，我也得看一遍，所以交稿就必须在阴历过年之后了。

迅上 一月二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评点】

这封信主要是与北新书局老板商谈《两地书》的出版事宜。曾有论者根据此信及相关的几封信，推定鲁迅所说“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云云，是故弄玄虚，假说别家书店要出版，借以与北新讨价还价，意在提高版税。此乃不察实情，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也。其实，只要多读几封鲁迅书信，即可看出，当时鲁迅的著作销路很好，诸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特别是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当然许多人都想看看，销路自然会更好，版税高一点也在情理之中。这本书的版税是25%，在今天看来，似乎高得吓人，因为时下出版社给作者的版税，一般是8%，常有低于此数的，畅销书也不过给12%，除非印数特别高的。而当时，20%的版税是常事，鲁迅的书常常高于此数，则《两地书》给25%也并不算太多了，作者无需为这一点数字挖空心思地故弄玄虚，而且鲁迅一向做事实，更不是故弄玄虚的人。他一向支持北新书局，除了未名社，因为是他的几个学生所办，情不可却外，他的创作一般都是给北新出版的，这在信中说得很明白。这次之所以将《两地书》许诺给天马，信中也说得很清楚，是因为鉴于《二心集》的教训。当鲁迅在李小峰的一再催促下，将几年来的杂文编为《三闲

集》和《二心集》交给北新书局时，北新只接受了《三闲集》，而将《二心集》退回，虽然说了种种理由，但鲁迅疑心这是由于《二心集》中多处批评了赵景深的缘故，赵景深是李小峰的妹夫，时任北新书局总编辑。但这次在李小峰的坚决要求下，鲁迅还是与天马书店商量，收回许诺，将《两地书》交给北新，作为弥补，后将《自选集》给天马书店出版。

330201 致 张 天 翼

一之兄：

自传今天收到。信是早收到了，改为这样称呼，已无可再让步。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嗟语“密斯偷”之神韵译而已。

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

迅上 二月一夜

【评点】

鲁迅将文艺批评的精义归结为八个字：“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对于作者决不肯敷衍，总是要将真实的意见说出，有时甚至于很尖锐。但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与中国

人好讲面子、喜受恭维的民情不合，易于招怨。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30205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昨乔峰交到惠赠之《中国文学史》三本，谢谢！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沈了。

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实为最便。且孙伯恒先生当能相助也。

此布，并颂
曼福。

迅启上 二月五日

【评点】

这是鲁迅建议与郑振铎合作编印《北平笺谱》的信。《北平笺谱》系彩色水印的木刻笺纸选集，于当年编成出版。这种笺纸，有人物、山水、花鸟诸种，品类繁多，向为文人所珍爱，鲁迅亦常用来写信，别有情趣。但随着文化风气的转变，笺素之道将衰，鲁迅想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点资料，所以建议编印此书。他在1932年11月到北平省亲时，已选购了一些笺纸，复由时在北平工作的郑振铎就近再加搜罗，寄给鲁迅挑选，再由郑振铎分头托各纸店用原版印刷，另行装订而成，书籍甚为精美。鲁迅于该书序言中历叙中国木刻的发展历史、笺纸的价值以及他们编印此书的目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爱护之情，跃然纸上，谁说他要割断传统呢？

330206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今天翻翻良友公司所出的书，想起了一件事——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贵处校对先生，以供采择否？此请著祺。

鲁迅上 二月六夜

【评点】

排版之事虽小，但是亦能于此见出精神。对于版式，鲁迅一向是很注意的，所以他的书籍，总要自己设计版式，标示规格。本信所说，虽乃细节，但是亦关版面之美观，所以鲁迅特地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告知。在《忽然想到(二)》中，他就将版式中的问题提到时代精神的高度来看。鲁迅说，近来中国的新书大抵没有副页，天地

头也很短，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使人有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是没有“余裕”心的表现，而“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并说，这些“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

330209 致曹靖华

靖华兄：

一月九日来函，今日收到。我于何日曾发信，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今年似尚未寄过一信。至于书报，则在去年底曾寄《文学月报》等两包；又再版《铁流》等四本共一包。今年又寄上《竖琴》十本分两包，除赠兄一册外，乞分赠作家者也，但兄如不够用，可见示，当再寄上。

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文学月报》出五六合册后，已被禁止。

《铁流》系光华书局出版，他将我的版型及存书取去，书已售完，而欠我百余元至今不付。再版之版税，又只付五十元，以后即不付一文，现此书已被禁止，恐一切更有所藉口，不能与之说话矣。其实书是还是暗暗的出售的，不过他更可以推托，上海书坊，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压迫而赚钱者，常常有之。

兄之版税，存我处者共三百二十元（《铁流》初版二百元，再版五十元，《星花》七十元），上月得霁，静两兄来信，令寄尚佩芸五十元，又尚振声一百元，已于本月一日，由邮局汇出。所存尚有一百七十元，当于日内寄往河南尚宅也。

静兄因误解被捕，历十多天始保出，书籍衣服，恐颇有损失。近闻他的长子病死了，未知是否因封门，无居处，受冷成病之故，真是晦气。

我们是好的，经济亦不窘。我总只做些杂务，并无可以特别提出之译作。《二十人集》下本，大约三月底可出，一出即寄。杂志如有较可看的，亦当寄上，但只能积三四本寄一回，因须挂号，如此始较合算也。

《铁流》作者今年七十岁，我们曾发一电贺他，不知见于报章否？

前回曾发一信（忘记月日），托兄再买别德纳衣诗（骂托罗茨基的）之有图者一本，又《文学家像》第一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

它兄曾咯血数口，现已止，人是好的。他已将《被解放之 Don Quixote》译完，但尚未觅得出版处；现正编译关于文艺理论之论文。他有一信，今附上。

这里要温暖起来了。

此复，即颂

安好。

弟 豫上。二月九日之夜。

【评点】

文学运动是要讲求实绩的，而当时中国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却往往流于空喊，而没有像样的货色，所以常为鲁迅所不满。现在则出了几个新作家，而且茅盾又拿出了 3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子夜》，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所以为鲁迅所肯定。他很高兴

地称赞说：“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但上海书坊老板，却利用左翼作家之被压迫而赚钱，实在可鄙也。

330413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版税收到，收条当于星期六面交店友。

《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以每页十二行，每行卅六字版印之，已是很厚的一本，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

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其办法可仿《两地书》，每发行一千，由兄给我百元，由我转寄。此一千本，北新专在收账确实处发售，于经济当不生影响，如此办法，以三次为度。但此三千本，我只收版税百分之二十。

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正在托人另抄，本文我也须略看一回，并标明格式，星六不及交出了，妥后即函告。

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

迅上 四月十三日

【评点】

瞿秋白曾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一伙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他在养病的同时，从事写作，并关心左联工作，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鲁迅曾录何瓦琴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相知之深。这本《鲁迅杂感选集》即瞿秋白所选，他还写了长篇的序言，对鲁迅的思想和杂文的价值都作了科学的论断。瞿秋白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就纠正了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对鲁迅思想的歪曲，指出了鲁迅对于革命的意义。同时，针对那种鄙视杂文，讽刺鲁迅为“杂感专家”的论调，又分析了杂文发生的社会原因和鲁迅杂文的时代意义。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瞿秋白这篇序言，不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标帜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

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鲁迅在信中对出版者说：“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这不但是他对战友劳动的尊重和对其生活的关心，而且也表示出他对瞿氏工作的首肯。

33050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顷奉到三日惠函。《自由谈》已于昨今两日，各寄一篇，谅已先此而到。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 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此复，即请著安。

迅启上 五月四日晚

【评点】

鲁迅应邀于 1933 年 1 月开始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到 5 月初，渐有不能发表之势。他在 7 月间编成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中，说明其中的原因道：“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

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而从这封给《自由谈》编者黎烈文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文禁之下，写文章之难。鲁迅想改变风格，“更加婉约其辞”，但事实上却难以做到不“干犯豪贵”。这封信于晚间寄出后，夜里又做了一篇《多难之月》，果然仍很尖锐。所以再给黎烈文写一信道：“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

330510 致王志之

郑朱皆合作，甚好。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静农久无信来，寄了书去，也无回信，殊不知其消极的原因，但恐怕还是为去年的事罢。我的意见，以为还是放置一时，不要去督促。疲劳的人，不可再加重，否则，他就更加疲乏。过一些时，他会恢复的。

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内当寄上一点。雁君见面时当一问。第一期诚然有些“太板”，但加入的人们一多，就会活泼的。

【评点】

收信人王志之是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辑；郑朱，指郑振铎、朱自清，是非左翼作家，鲁迅对北平左联能取得他们的合作，

甚为赞赏。鲁迅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对谁都剑拔弩张,动辄申斥,而是很注意团结人的。在这里,他特别提出,要求左翼文学青年态度应该缓和,不要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要责备求全,使人远避。这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鉴于“革命文学家”们常有使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脾气而发的,他自己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就深受其害。而且,这也不是一时的政治策略,而是从人生经验出发,提出的切实的意见,只可惜后来的许多革命者,仍喜欢疾声厉色,责备求全,使正直的人远避,而品质坏的人却来迎合,从而使革命变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330525 致周茨石

茨石先生：

来信收到了。灾区的真实情形，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字，所以倘有切实的纪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

不过商量办报和看文章，我恐怕无此时间及能力，因为我年纪大起来，家累亦重，没有这工夫了。但我的意见，以为（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2）用这些材料做小说自然也可以的，但不要夸张及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上 五月二十五日

【评点】

鲁迅抱着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以改造社会为自己的职责，所以

他极其重视作品的真实性。而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们,为了宣传某种革命观念,却不去描写现实的真实情况。所以鲁迅建议这位来信商办报刊的左联成员,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一种诚实的材料”,倘用这些材料写小说,则“不要夸张及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这并非鲁迅不喜欢文学,而是反对文学脱离现实,走上新的瞒和骗的道路。在鲁迅看来,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尚在其次,要紧的是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

330527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来函收到。日前见启事，便知大碰钉子无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为也，不能也。近来所负笔债甚多，拟稍稍清理，然后闭门思过，革面洗心，再一尝试，其时恐当在六月中旬矣。

以前所登稿，因早为书局约去，不能反汗，所以希给我“自由”出版，并以未登者见还，作一结束。将来所作者，则当不以诺人，任出单行本也。

此复，并颂
时绥。

迅启上 五月廿七夜。

【评点】

文网的日益收紧，不但使鲁迅的文章不能发表，而且整个《自由谈》也不能“自由”地谈下去了。而据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说：“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

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于是到5月25日，编辑室就刊出了一则启事，说是“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黎烈文写了上述启事之后，又写信约请鲁迅继续为《自由谈》撰稿，鲁迅才回了这封信。其实，《自由谈》本来就不是自由谈话的地方，所以鲁迅将这近半年来在《自由谈》上发表和不能发表的文章，编成一集，名曰《伪自由书》。到6月7日，他改变笔调，又开始为《自由谈》撰文，起首的两篇是《夜颂》和《推》，同日给黎烈文的信中说：“夜间做了这样的两篇，虽较为滑头，而无聊也因而殊甚。不知通得过否？如以为可用，请一试。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但能否如愿，却未详也。”后来鲁迅虽未能一直保持此调，因变换了各种笔名，文章仍得以继续发表。但到了11月，又发不出来了，只好停笔。他将下半年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编成一集，名曰《准风月谈》，并在《后记》里说明缘由：“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这里，说是障住了编辑先生的眼睛，自然是一种掩护，而这两本书的书名，“自由书”而“伪”，“风月谈”而“准”，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330603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二日的惠函，今天收到了。但以后如寄信，还是内山书店转的好。乔峰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号，那时因为要挂号，只得借用一下，其实是我和他一月里，见面不过两三回。

《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到那时候，倒令人更为难。所以我以为不如“自由”印卖，好在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惟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能卖完，已属如天之福也。

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倘有可投《涛声》的，当寄上；先前也曾以罗忧之名，寄过一封信，后来看见广告，在寻这人，但因为我有《涛声》，所以未复。

看起来，就是中学卒业生，或大学生，也未必看得懂《涛声》罢，近来的学生，好像“木”的颇多了。但我并不希望《涛声》改浅，失其

特色,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专复,并颂

著祺。

鲁迅上 六月三夜

【评点】

鲁迅建议李大钊的文集不必送审,不如“自由”印卖,这倒是突破文网的一个好办法。鲁迅还是为这位死难老友的文集写了一篇《〈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涛声》杂志上,只可惜因内部纠葛,此集未能出版。信中说:“赤者颇嫌其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此乃中国读书界的通病,岂独李集如此,实在值得悲哀。

330618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书敬悉。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贤入孔庙，被以袞冕，现在却还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渔仲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欵，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欵，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

是也。

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鲁迅启上 六月十八夜。

【评点】

鲁迅一向主张读史，他在《忽然想到（四）》里曾经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这里将近事与明末相比较，即是此意。但鲁迅认为，中国的史书，“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于是他提倡读野史、杂记。这里提出重新写史，所谓“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者，就是希望能写出历史真面目来。鲁迅自己是有志于修史的，他计划中要写的就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客观条件又不允许他静坐下来写作，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鲁迅原来是相信进化论的，所以对于青年，一向是尽力培养。但有些人为了了一点小利，反噬构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鲁迅曾经身受，对此非常反感。因此引发出对于师道的议论。古代的师道，和孝道一样，都是中国传统纲常名教的重要内容，当然为鲁迅所反对。但他所反对的是对于老师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应有的尊敬。所谓“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也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不要盲从的意思；但同时他又指出：“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这是辩证的观点，独立的立场。他引自己与章太炎的关系为例，就是最好的说明。古之师道，实在太

尊,但后来将教师作为教育革命的对象,不断批判,无限上纲,更有甚者,还任意打骂,则连起码的人格尊重都没有了。此等极端行动,皆为势利所驱,行动者本身也失却了独立的人格。有人将“文化革命”中的极端行动,归罪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然而从鲁迅关于师道的论述中,或他自己的行动中,哪里能找得出后来那些所谓“革命行动”的影子呢?后来的那些“革命行动”,其实正是违反鲁迅精神的。

鲁迅对人从不苛求,而善于分析历史原因,对于“自首之辈”也是一样。他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然而这一情况,却使“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这是十分悲哀的事。

330620 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专复，并请道安。

迅 顿首 六月廿夜

尊夫人前并此请安。

【评点】

1932年9月，林语堂等创办《论语》半月刊，专刊幽默小品，鲁迅虽然不赞成在此时提倡幽默，但还是为该刊写过几篇文章，当然，他的幽默是倾向于讽刺的了，后来也还肯定该刊“萧伯纳专号”

的好处。但毕竟他们之间在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有所差异，鲁迅在本信中还是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其一是，林语堂令作打油诗，鲁迅则不能应命，因为文学是应运而生的，与环境 and 心境的关系很密切，在当时重重压迫之下，鲁迅感到不能喘气，他只能呻吟叫号，而没有打油的心情，——这也是对环境感受的不同吧；其二是，《论语》想专谈风月，在鲁迅看来，这恐怕也大不容易，因为风月也有不同的谈法，他在《准风月谈·前记》里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这就是“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现在当局专用手枪来对付作家，执笔人都被视作眼中钉，还怎么能够幸免呢？

“虫二”者，即“风月”之隐语也，从“风月无边”一语演化而来。风字的繁体字为風，“風月”二字去边，即是“虫二”了。

330620 致榴花社

榴花艺社诸君：

十一日信及《榴花》第一期，今天都已收到。征求木刻，恐怕很难，因为木版邮寄，麻烦得很。而且此地盛行白色恐怖，仅仅主张保障民权之杨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杀，闻在计画杀害者尚有十余人。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别人极难会面，商量一切。但如作有小品文，则当寄上。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六月二十日

【评点】

“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此乃至理名言，亦鲁迅一向主张的壕堑战思想的发挥。基于这种思想，鲁迅认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中，刊物不宜激烈，即使被视为灰色也没有关系，“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这与当时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是针锋相对的。左倾分子喜作激烈之谈，丢弃营垒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还把革命者赶到街头，大搞搞飞行集会，这就白白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联系当时的背景来看鲁迅这封信，就能看出鲁迅的高明之处来。

330625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玉照收到，谢谢。《明日》第四期也到达。作者们锐气如故。上海已热，蚊虫颇多，经常咬我，现在还在挨咬。身旁内山夫人送给我的杜鹃正在开花。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苦中之乐。不过，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只是不能自由地去内山书店漫谈，有些扫兴。去还是去的，不过是隔日一次。将来也许只有夜里才能去。但是，这种白色恐怖也无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搬家后孩子似乎很好，很活泼，肤色也变黑了。井上红梅先生已来上海，看样子喝了不少酒。草草顿首

鲁迅 拜呈 六月廿五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评点】

丁玲失踪，杨铨遭暗杀，鲁迅自己也被列入密杀令中，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当时有些人逃匿，有些人转向，而鲁迅则表示出大无畏精神，他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何等英勇的气概！

在同月 28 日致台静农信中，他再次表示了不可动摇的战斗决心：“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

330626 致王志之

志之兄：

来信收到。

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茅稿已寄谷兄，我怕不能作。

《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的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所以这书在他本国，新版还很多，可见看的人正不少。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糊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落花集》出版，是托朋友间接交去的，因为我和这书店不熟，

所以出版日期,也无从问起。序文我想我还是不做好,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于本书有损。

我交际极少,所以职业实难设法。现在是不能出门,终日坐在家里。《两地书》一本,已托书店寄出。

此复,并颂

时绥。

豫上 六月廿六夜

《年谱》错处不少,有本来错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说是“翰林院大学士”,就差得远了),也有译错的(凡二三处)。 又及。

【评点】

这封信反映了鲁迅对同路人作品的看法。同路人虽看不见全局,但确也写出了一面的实情,这就很有价值。鲁迅喜欢反映真实的作品,他在别的信中也一再强调文章一定要写出实情来。联系到他对“革命文学家”不能正视现实的批评,可见他对文学真实性的重视。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

330708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惠函收到。向来不看《时事新报》，今晨才去搜得一看，又见有汤增敦启事，亦在攻击曾某，此辈之中，似有一小风波，连崔万秋在内，但非局外人所知耳。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看《自由谈》所发表的几篇批评，皆太忠厚。

附奉文一篇，可用否希酌夺。不久尚当作一篇，因张公启事中之“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数语，亦尚有文章可做也。

此复，即颂

著祺

家干 顿首七月八日

【评点】

对于中国新文人的弊病,《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深刻的分析,可以参阅。而这里提出:“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否则,若与此辈耗尽时间,岂复能做有益之事耶!

对于信中所引张资平数语的批评,见于《豪语的折扣》。

330711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涛声》至今尚存，实在令人觉得古怪，我以为当是文简而旨隐，未能为大家所解，因而侦探们亦不甚解之故，八月大寿，当本此旨作一点祝辞。

近来只写点杂感，亦不过所谓陈言，但均早被书店约去，此外之欠债尚多，以致无可想法，只能俟之异日耳。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启上 七月十一日

【评点】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不好,这里所谓怕死,即其表现之一也。“若干文虻,趁势造谣,各处恫吓”,更是恶劣。然而,知识分子一旦受到迫害,影响就特别大,使压迫者感到麻烦,却也是其优势。

330711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上海已热起来，即使室内，寒暑表也升到九十度以上，但我们都好，孩子也活泼地吵闹着。正路君也放了暑假，颇为顽皮罢？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然而我在提防着，内山书店也难得去。暗杀者大概不会到家里来的，请勿念。最近收到增田君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以及孩子的画。虽不漫谈，却在漫读，似乎过得还挺悠闲。从画上看去，增田君故乡的景色非常幽美。现在还不要什么书，需要时再拜托你。我这次的住处很好，前面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狗也在吠，现在已是午夜二时了。草草顿首

鲁迅上 七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评点】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即使自己的名字上了密杀命,鲁迅既不肯出国,亦不肯易地避难,而“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这表现了他的硬骨头精神,也显示出他对于前途的信心。早在1926年,在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时,他就充满信心地说过:“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记谈话》)现在,他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同样充满着这样的信心。

33071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昨得大札后，匆复一笺，谅已达。《大晚报》与我有夙仇，且勿论，最不该的是我的稿件不能在《自由谈》上发表时，他们欣欣然大加以嘲笑。后来，一面登载柳丝（即杨邨人）之《新儒林外史》，一面崔万秋君又给我信，谓如有辨驳，亦可登载。虽意在振兴《火炬》，情亦可原，但亦未免太视人为低能儿，此次亦同一手段，故仍不欲与其发生关系也。

曾大少真太脆弱，而启事尤可笑，谓文坛污秽，所以退出，简直与《伊索寓言》所记，狐吃不到葡萄，乃诋之为酸同一方法。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中国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后，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吧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

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略为平和，本亦一法，然而仍不免攻击，因为攻击之来，与内容其实是无甚关系的。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气，故脾气甚

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辑，必苦于应付，我在北京见一编辑，亦新文人，积稿盈几，未尝一看，骂信蜩集，亦不为奇，久而久之，投稿者无法可想，遂皆大败，怨恨之极，但有时寄一信，内画生殖器，上题此公之名而已。此种战法，虽皆神奇，但我辈恐不能学也。

附上稿一篇，可用与否，仍希
裁夺。专此，顺请
暑安。

干 顿首七月十四日

【评点】

关于杨邨人、曾今可、张资平等人，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和《伪自由书·后记》等文章中有更多的揭露，可以参阅。揭露他们的目的，正如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所说：“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纪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330813 致董永舒

永舒先生：

你给我的信，在前天收到。我是活着的，虽然不知道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雪朝》我看了一遍，这还不能算短篇小说，因为局面小，描写也还简略，但作为一篇随笔看，是要算好的。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但看别人的作品，也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要紧，极精采处，而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经历了类似的事，这才了然起来。例如描写饥饿罢，富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懂的，如果饿他几天，他就明白那好处。

《伟大的印象》曾在杂志《北斗》上登载过，这杂志早被禁止，现在已无从搜求。昨天托内山书店寄上七(?)本书，想能和此信先后而至，其中的《铁流》是原版，你所买到的，大约是光华书局的再版罢，但内容是一样的，不过纸张有些不同罢了。

高尔基的传记，我以为写得还好，并且不枯燥，所以寄上一本。至于他的作品，中国译出的已不少，但我觉得没有一本可靠的，不必购读。今年年底，当有他的《小说选集》和《论文选集》各一本可

以出版，是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好译本，那时我当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启上八月十三日

以后如有信，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收转，则比较的
可以收到得快。 又及。

【评点】

鲁迅指导文学青年学习创作的要点：第一要观察，——这就是说，要面对现实生活，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第二要看别人的作品，——这就是说，要学习、借鉴，而且不能局限于一家。而看别人的作品，也要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否则就不易领会其中的精彩处。这观点，就是日后兴起的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其实，这道理前人早已发现，只不过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已。但从另一方面看，此说也就印证了生活经验对于阅读和创作的重要性。

330929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久疏问候。谢谢你日前送给孩子各色礼物。今天又拜领《明日》第五期，增田君在上面大发议论，不过对我未免过奖了。也许因为太熟悉了罢。上海连日阴天，大雨、大风，前天才放晴。政情依然是白色恐怖，但并无目的，全是为恐怖而恐怖。内山书店经常去，但不是每天，漫谈的人材也寥若晨星，令人感到寂寞。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我不去更正。过一年自然又会消失的。但是，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我们均好。我较前更清闲了，或许比前年胖了些。孩子偶尔还患感冒，但已较前几年结实多了。在家太闹，送进了幼稚园。去了三四天，说先生不好，又不肯去。最近每天让他到野外去。我看那个先生也不好，抹了满脸脂粉，还是很难看。总之上海是寂寞的。本想去北京，但自今年起，北京也在白色恐怖中，据说最近两三个月就捕了三百多人。所以，暂时恐怕还住在上海。 草草顿首

鲁迅 九月廿九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评点】

对于鲁迅的谣言，正是层出不穷。拿卢布说刚刚破产，又出现了向日本出卖秘密说。其实，听者只要动一动脑筋，就可辨别清楚的：一介文人，有何秘密可卖？但是谣言还是能传播开来。鲁迅采取“不去更正”的办法，说明他对于此类谣言的蔑视，而且，他也不值得花时间去更正，如果与造谣者纠缠，就没有时间去做正事了，这倒正上了造谣者的当。他在《半夏小集》中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即对此类人而言。

331002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笺样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标准从宽，连“仿虚白斋笺”在内，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种，已将去取注在各包目录之上，并笺样一同寄回，请酌夺。大约在小纸店中，或尚可另碎得二三十种，即请先生就近酌补，得三百种，分订四本或六本，亦即成为一书。倘更有佳者，能足四百之数，自属更好，但恐难矣。记得清秘阁曾印有模“梅花喜神谱”笺百种，收为附录，亦不恶，然或该板已烧掉乎。

齐白石花果笺有清秘，荣宝两种，画悉同，而有一张上却都有上款，写明为“△△制”，殊奇。细审之，似清秘阁版乃剽窃也，故取荣宝版。

李毓如作，样张中只有一家版，因系色笺，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绪年中，似为纸店服役了一世，题签之类，常见其名，而技艺却实不高明，记得作品却不少。先生可否另觅数幅，存其名以报其一世之吃苦。吃苦而能入书，虽可笑，但此书有历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书名。曰《北平笺谱》或《北平笺图》，如何？

编次。看样本，大略有三大类。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画，宜于笺纸者用之，如戴醇士，黄瘦瓢，赵搗叔，无名氏罗汉，二也；特请人为笺作画，三也。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

霖，宣统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编次似可用此法，而以最近之《壬申》，《癸酉》笺殿之。

前信曾主张用宣纸，现在又有些动摇了，似乎远不及夹贡之好看。不知价值如何？倘一样，或者还不[如]将“永久”牺牲一点，都用夹贡罢。此上，即颂
著安。

迅 顿首十月二夜。

【评点】

鲁迅对于绘画，有极高的鉴赏力，而且熟悉相关的史实，他选择画笺，标准很严，从此信中可以看出，所根据的，是审美观点和历史观点。他的编选工作，极其认真，而且自信此书具有历史意义，决不是别人所攻击的，仅是玩玩古董而已。《北平笺谱》和相关的几封信，很有研究价值，其中充分体现出鲁迅的美学思想。

331021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纸张大小，如此解决，真是好极了。信笺已于十九日寄回，并两封信，想已到。

清秘阁一向专走官场，官派十足的，既不愿，去之可也，于《笺谱》并无碍。

第二次应否续印，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此，则容易被同一之事绊住，不能作他事。明年能将旧木刻在上海开一展览会，是极好的事，但我以为倘能将其代表作（图）抽印以成一书，如杨氏《留真谱》之类，一面在会场发卖，就更好（虽然不知道能卖多少）。倘无续印之决心，预告中似应删去数语（稿中以红笔作记），此稿已加入个人之见，另录附奉，乞酌定为荷。

我所藏外国木刻，只四十张，已在十四五开会展览一次，于正月再展览，似可笑。但中国青年新作品，可以收罗一二十张。但是，没有好的，即能平稳的亦尚未有。

《仿〔访〕笺杂记》是极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谱中。第二次印《笺谱》，如有人接办，则为纸店开一利源，亦非无益，盖草创不易，一创成，则别人亦可踵行也。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十月二十一日

现在十月中旬，待登出广告，必在十二月初或中旬了，似不如改为正月十五截止，一面即出书，希酌。 同日又及

【评点】

不要“被同一之事绊住，不能作他事”，这是很重要的意见。不仅学术工作如此，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盖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创造，即使做了一件成功的事，也不能被它绊住，而要不断做出新的成绩来，才有意思。但一件事绊住人一生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这是值得警惕的。

331031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月廿八日信收到。你的大女儿的病，我看是很难得好的，不过只能医一下，以尽人力。

我也以为兄在平，教一点书好，对学生讲义时，你的朋友的话是对的，他们久居北京，比较的知道情形，有经验。青年思想简单，不知道环境之可怕，只要一时听得畅快，说得畅快，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这种情形我亲历了好几回了，事前他们不相信，事后信亦来不及。而很激烈的青年，一遭压迫，即一变而为侦探的也有，我在这里就认识几个，常怕被他们碰见。兄还是不要为热情所驱策的好罢。

《安得伦》我这里有，日内当寄上三四本，兄自看外，可以送人。《四十一》的后记曾在《萌芽》上登过，我本来有，但因搬来搬去，找不到了。《铁流》序早收到，暂时无处可以发表。

日内又要查禁左倾书籍，杭州的开明分店被封了，沪书店吓得像小鬼一样，纷纷匿书。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不过我有准备，半年总可以支持的，到那时再看。现正在出资印《被解放的吉诃德》，这么一来，一定又要折本了。

木刻望即寄下，因为弟亦先睹为快也。可买白纸数张，裁开，将木刻夹入，和报纸及封面之硬纸一同卷实（硬纸当于寄《安得伦》

时一并附上，又《两地书》一本，以赠兄），挂挂寄书店转弟收，可无虑。关于作者之材料，暇时希译示，因为无论如何，木刻是必当翻印的，中国及日本，皆少见此种木刻也。

此复即颂
时绥。

弟 豫 顿首 十月卅一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

【评点】

鲁迅奉劝曹靖华，在北平教书，不可为热情所驱策，说得激烈，以图一时之畅快，那样是得不偿失的。这是他对朋友的爱护，也是他一贯反对赤膊上阵的主张。何况他阅历丰富，见过“很激烈的青年，一遭压迫，即一变而为侦探的”，于是就更加警惕了。但鲁迅这种意见在当时很不被人们所理解，“事前他们不相信，事后信亦来不及”。真是无可奈何啊！

331105 致 姚 克

Y. K. 先生：

十月卅日信昨收到，关于来问及评传的意见，另纸录出附呈，希察。

评传的译文，恐无处登载，关于那本书的评论，亦复如此，但如有暇，译给我们看看，却极欢迎。前几天，这里的官和出版家及书店编辑，开了一个宴会，先由官训示应该不出反动书籍，次由施蛰存说出仿检查新闻例，先检杂志稿，次又由赵景深补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删改，或用××代之。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渔利。有些官原是书店股东，所以设了这圈套，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板物之情形可以推见。大约施、赵诸君，此外还要联合所谓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这是欺骗读者，以掩其献策的秘密的。

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译名应该画一，那固然倒是急务。还有新的什物名词，也须从口语里采取。譬如要写装电灯，新文学家就有许多名词——花线，扑落，开关——写不出来，有一回我去理发，就觉得好几种器具不知其名。而施君云倘要描写宫殿之类，《文选》就有用，忽然为描写汉晋宫殿着想，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了。

其实，在古书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谈。例如我们翻开《文选》，何以定其字之死活？所谓“活”者，不外是自己一看就懂的字。但何以一看就懂呢？这一定是原已在别处见过，或听过的，既经先已闻见，就可知此等字别处已有，何必《文选》？

我们如常，《自由谈》上仍投稿，但非屡易笔名不可，要印起来，又可以有一本了，但恐无处出版，倘须删改，自己又不愿意，所以只得搁起来。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漩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

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评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

上海也冷起来了，天常阴雨。文坛上是乌烟瘴气，与“天气”相类。适兄尚存，其夫人曾得一信，但详情则不知。

见 S 君夫妇，乞代致意。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一月五日

对于《评传》之意见

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第二段“在孩时”，父死我已十六七岁，恐当说是“少年时”了。

第三段“当教育总长的朋友……”此人是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

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

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

第六段“《莽原》和《语丝》”,我只编《莽原》;《语丝》是周作人编的,我但投稿而已。

第七段“……交哄的血”,我写那几句的时候,已经清党,而非交哄了。

第八段“他们的贪酷”,似不如改作“一部分反动的青年们的贪酷……”较为明白。

第十段“……突兴并非因为政治上的鼓励,却是对于……”似不如改为“突兴虽然由于大众的需要,但有些作家,却不过对于……”

第十一至十二段 其中有不分明处。突兴之后,革命文学的作家(旧仇创造社,新成立的太阳社)所攻击的却是我,加以旧仇新月社,一同围攻,乃为“众矢之的”,这时所写的文章都在《三闲集》中。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此后我所写的东西都在《二心集》中。

第十六段成的批评,其实是反话,讥刺我的,因为那时他们所主张的是“天才”,所以所谓“一般人”,意即“庸俗之辈”,是说我的作品不过为俗流所赏的庸俗之作。

第十七段 Sato 只译了一篇《故乡》,似不必提。《野草》英译,译者买[卖]给商务印书馆,恐怕去年已经烧掉了。《杂感选集》系别人所选,似不必提。

答来问

一、《小说全集》,日本有井上红梅(K. Inoue)这日本姓的腊丁拼法,真特别,共有四个音,即 I-no-u-e 译。

《阿 Q 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珪三(K. Matsuura)

译,(二)林守仁(S. J. Ling,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

译,(三)增田涉(W. Masuda,在《中国幽默全集》中)译。

又俄译本有二种,一种无译者名,后出之一种,为王希礼(B. A. Vasiliev)译。

法文本是敬隐渔译(四川人,不知如何拼法)。

二、说不清楚,恐怕《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及《鲁迅论》(李何林编)中会有一点,此二书学校图书馆也许有的。

三、见过日本人的批评,但我想不必用它了。

此信到后,希见复以免念。 临封又及

【评点】

这里提到关于《庄子》《文选》之争,很可注意。鲁迅不是就书论书地讨论这两本书是否有阅读价值,而是把对这两本书的推荐看作当时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而加以反对。信中所说:“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即是此意。而同一时期所出现的新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亦具同样性质,故陈望道、乐嗣炳等人提倡大众语,意在跳出文白之争,而将运动推进一步。要了解这一背景,才能明白这场关于《庄子》《文选》之争的实质所在。

信后附录《对于〈评传〉的意见》,虽然是几条零碎的意见,但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和看法,值得一读。如这里指出,“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的谣言,是张资平所造;又如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则反映出他对左联成立之真实看法,殊堪品味。

331115 致 姚 克

Y 先生：

九日函收到。《申报》上文章已见过，但也许经过删节的罢。近来报章文字，不宜切实，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十二日艺华电影公司被捣毁，次日良友图书公司被毁一玻璃，各书局报馆皆得警告。记得抗日的时候，“锄奸团”“灭奸团”之类甚多，近日此风又盛，似有以团治国之概。

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

看报，知天津已下雪，北平想必已很冷，上海还好，但夜间略冷而已。我们都好，但我总是终日闲居，做不出什么事来。上月开了一个德俄木刻展览会，下月还要开一个，是法国的书籍插画。校印的有《解放了的 Don Quixote》，系一剧本，下月可成，盖不因什么团而止者也。《伪自由书》已被暗扣，上海不复敢售，北平想必也没

有了。此后所作，又盈一册，但目前当不复有书店敢印也。

专此布达，并颂

文安。

豫 顿首十一月十五夜

【评点】

到得 1933 年 11 月，白色恐怖愈益严重了，除了书报检查、通缉令之外，又演出了全武行，即组织“锄奸团”、“铲同志会”之类“团体”来捣毁书店和电影公司，所以被鲁迅讥为“以团治国”。这是模仿德国法西斯党徒的“水晶夜”暴行，意在用流氓手段，迫使书店和电影公司不敢出革命作品。这些事，鲁迅将它记载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资料。

对于以写中国事情出名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布克夫人），信中说她虽“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此种评价，至为允当。盖作家必须有深入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得真切，外国人毕竟隔了一层，很难写得好。鲁迅最看重生活实感，所以当姚克说想写小说时，就很得到他的鼓励，说极表赞成，因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起来，才可以见真相”。次年 1 月 25 日信中又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鲁迅又以自己为例，作出说明，也很值得注意。以前有一段时期，鲁迅专家们曾大事宣传鲁迅如何用功学马列，将这定为他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在这里，鲁迅却明确地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曾寓目，连手

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在《三闲集·序言》里,他虽表示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但同时就说到,促使他进化论思路轰毁的,则是事实的教训。可见,对于作家说来,最要紧的是要能够正视现实,写出生活的实情来。

331219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十六日信并木刻三幅，今天收到了，谢谢。另外的一卷，亦已于前天收到，其中的几幅，我想抽掉，即克白兄的《暖》，《工作》及先生的《望》。

《望》的特色，专在表现一个人，只是曲着的一只袖子的刻法稍乱，此外是妥当的；但内容却不过是“等待”而无动作，所以显出沈静之感。我以为无须公开。

《牧羊女》和《午息》同类，那脸面却比较的非写实了，我以为这是受了几个德国木刻家的影响的，不知道是不是？但这样的表现法，只可偶一为之，不可常用。

《私斗》只有几个人略见夸张，大体是好的。

《雪景》的雪点太小了，不写明，则观者想不到在下雪，这一幅我也许不送去。但在原版上，大约还可以修改。

《小艇》的构图最好，但艇子的阴影，好像太多一点了。波纹的刻法，也可惜稍杂乱。各种关于波纹的刻法，外国是很多的，我们看得不多，所以只好摸暗路，这是在中国的不幸之处。

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在，艺术上是

要地方色彩的。从这一观点上,所以我以为克白兄的作品中,以《等着爹爹》一幅为最好。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二月十九日

【评点】

鲁迅与木刻青年的通信很多,除了对他们的习作提出具体意见之外,还常有理论上的指导。如本年7月18日致罗清桢信中说:少年学木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不可开手即好大喜功”;本信则指出:中国的新木刻,应该参照中西二法,“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12月26日致罗清桢信中又说:“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意见。现在,报刊上竭力在鼓吹少年儿童写长篇小说,则完全是把儿童手制的童稚玩具当作热销商品来炒作,比“好大喜功”的害处更大。而有些理论家则竭力在批判艺术上的“地方色彩”说,以为没有地方色彩才能融入世界,结果恐怕正适得其反。因为没有本国特点,没有地方色彩,也就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正如鲁迅在1934年1月8日致何白涛信中所说:“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鲁迅的意见,至今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331219 致 姚 克

Y 先生：

十二夜的信早收到。谭女士至今没有见，大约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能领她找我的人，现又不在上海，或者终于不能遇见也难说。我在这里，已集得木刻数十幅，虽幼稚，却总也是一点成绩，如果竟不相遇，我当直接寄到那边去。

《不是没有笑的》译文，已在《文艺》上登完，是两个人合译的，译者们的英文程度如何，我以为很难说。《生活周刊》已停刊，这就是自缢以免被杀；《文学》遂更加战战兢兢，什么也不敢登，如人之抽去了骨干，怎么站得住。《自由》更被压迫，闻常得恐吓信，萧的作品，我看是不会要的；编者也还偶来索稿，但如做八股然，不得“犯上”，又不可“连下”，教人如何动笔，所以久不投稿了。

台君为人极好，且熟于北平文坛掌故，先生去和他谈谈，是极好的。但是，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那一次开展览会，因借地不易，所以会场不大好，绘画也只有百余幅，中国之观者有二百余人。历来所集木刻，颇有不易得者，开年拟选印五十种，当较开会展览为有益。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

闽者，其实我看他们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粵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惜我不能公开作文，加以阻止。

所作小说，极以先睹为快。我自己是无事忙，并不怎样闲游，而一无成绩，盖“打杂”之害也，此种情境，倘在上海，恐不易改，但又无别处可去。幸寓中均平善；天气虽渐冷，已装起火炉矣。

中国寄挂号信件，收受者须盖印，倘寄先生信件，挂号时用英文名，不知备有印章否？便中乞示及。

此上，即颂
时绥。

L 启上十二月十九夜。

【评点】

留法青年敬隐渔曾将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译成法文，译本在《欧罗巴》杂志上发表之前，该刊主编罗曼·罗兰读之甚为赞赏，曾写有一信给鲁迅，托敬隐渔转递，敬隐渔因不知鲁迅的地址，就寄到创造社，请他们转交，但从此就没有下落。这里所说的，即是此事。但在 1926 年 3 月 2 日《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柏生的文章《罗曼罗兰评鲁迅》里，却说到罗曼·罗兰对《阿 Q 正传》的赞语：“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 Q 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331220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侍桁先生的最初的文章，我没有看他，待到留意时，这辩论快要完结了。据我看来，先生的主张是对的。

文章的弯弯曲曲，是韩先生的特长，用些“机械的”之类的唯物论者似的话，也是他的本领。但先生还没有看出他的本心，他是一面想动摇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面在为自己辩护。他说，沙宁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其实俄国确曾有，即中国也何尝没有，不过他不叫沙宁。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倘如韩先生所说，则小说上的典型人物，本无其人，乃是作者案照他在社会上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于是而社会上就发生了这种人物。他之不以唯心论者自居，盖在“存在之可能（二字妙极）”句，以为这是他顾及社会条件之处。其实这正是呓语。莫非大作家动笔，一定故意只看社会不看人（不涉及人，社会上又看什么），舍已有之典型而写可有的典型的么？倘其如是，那真是上帝，上帝创造，即如宗教家说，亦有一定的范围，必以有存在之可能为限，故火中无鱼，泥里无鸟也。所以韩先生实是诡辩，我以为可以置之不理，不值得道歉的。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

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这大约便是韩先生之所谓大作家所创造的有社会底存在的可能的人物事状罢。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共六本，已出五本），我看了一点，才知道所谓英国美国，犹如中国之王孝籟而带兵的国度，比年青时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论，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广志的《唯物辩证法讲话》（白杨社版，一元三角），《史的唯物论》（ナウカ社版，三本，每本一元或八角）。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 G. Brandes 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日本的《春秋文库》中有译本，已出六本（每本八角），（一）《移民文学》一本，（二）《独逸の浪漫派》一本，（四）《英国ニ於ケル自然主义》，（六）《青春独逸派》各二本，第（三）（五）部未出。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闻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所见的日文书，新近只有《社会主义的レアリズムの問題》一本，而缺字太多，看起来很吃力。

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二月二十夜。

【评点】

鲁迅一向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将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基础，所以他认为，艺术典型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不能凭空造出。不能“舍已有之典型而写可有的典型”。他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是非常正确的说明。芝麻与油的比喻，也很贴切。这里所说的沙宁，是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的主人公，他的个人主义和性欲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俄国产生了许多沙宁式的青年。于是有人就以为是先有文学典型，后有现实人物。鲁迅认为不然，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里指出：“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按：即《沙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敏锐，所以阿尔志跋绥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倾向，做出《赛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这思潮渐渐酿成社会运动，终于出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约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静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起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边，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这里把问题说得很清楚：是现实生活中先有沙宁式的人物，而后才有沙宁这个文学典型，只不过在革命运动时期，沙宁式人物还不太显露，而诗人特别敏感，所以早就感觉到了，写出来了。当然，艺术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创作可以缀合，抒写，不必实有其事，“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可见社会生活终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鲁迅自称“不研究理论”，自然也没有写过有

关典型的专题论文,但是他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解,在这封信中就提出了完整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论。有关的意见,还可以参看《叶紫作〈丰收〉序》等文。

信末所说,乱骂或乱赞唯物论的书都看不得,“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也是很切实的意见。中国对于新的理论,乱骂乱赞的实在太多,乱译乱编的书亦复不少,其实都可以不看,只看一点基本书即可。

331227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下午从书店得所惠书，似有人持来，而来者何人，则不可考。《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我所约尚有余，当留下一部，其款亦不必送西三条寓，当于交书时再算账耳。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涵养，至于问事不报，则往往有之，盖不独对于靖兄为然也。

写序之事，传说与事实略有不符，郑君来函问托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简字），以谁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识之故。至于不得托金公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慳吝人乞烂铅钱也。关于国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为人作书，惟平日颇嗤其摆架子，或郑君后来亦有所闻，因不复道耳。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这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

投稿于《自由谈》，久已不能，他处颇有函索者，但多别有作用，故不应。《申报月刊》上尚能发表，盖当局对于出版者之交情，非对

于我之宽典，但执笔之际，避实就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是旧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写出少许。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明年颇欲稍屏琐事不作，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然能否亦殊未可必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二月廿七夜

【评点】

鲁迅在以前的书信中，就曾感慨当年的新文化战士，由于有了一点小地位，就变到他的反面去了。此处，又通过书写序文和题签之事，抒发了他的意见。鲁迅一向反对“夸而懒”，讨厌俗媚，讨厌摆架子，故对于有此等习性者，特别不能容忍。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很得青年的景仰，鲁迅也曾在《我观北大》中赞扬过北大精神，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殊不料北大教员的变化有如此之大，鲁迅认为北大已经堕落了，已经失去了五四精神，故为之慨叹。

1934 年

340111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顷接六日信，甚喜。《北平笺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天行写了这许多字，我想送他一部，如他已预约，或先生曾拟由公物中送他，则此一节可取消，而将此一部让给别人；又，静农已向我约定一部，亦乞就近交与，所余十八部，则都运上海，不能折扣矣。

第二次印恐为难，因为大约未必再能集至一百人，一拖延，就散了。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做事万不要停顿在一件上（也许这是我年纪老起来了的缘故），此书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就是将那资本，来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每幅略加解题，仿《笺谱》预约办法。更进，则北平如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可以组织一个会，影印明板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使它能够久传，我想，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上海的邵洵美之徒，在发议论骂我们之印《笺谱》，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

前几天，寄了一些原版《晚笑堂画传》之类给俄木刻家，《笺谱》出后，也要寄一部，他们之看中国，是一个谜，而知识甚少，他们画五六百年前的中国人，也戴红缨帽，且拖着一条辫子，站在牌楼之下，而远处则一定有一座塔——岂不哀哉。

《文学》二卷一号，上海也尚未见，听说又不准停刊，大约那办法是在利用旧招牌，而换其内容，所以第一着是检查，抽换。不过这办法，读者之被欺骗是不久的，刊物当然要慢慢的死下去。《文学季刊》未到，见过目录，但也如此麻烦，却得信后才知道，因为我总以为北平还不至于像上海的。我的意思，以为季刊比月刊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评论，随笔，书报介绍，而诗歌小说则从略，此即清朝考据家所走之路也。如此，则成绩可以容易地发表一部分。但上海《词学季刊》第三期，却有不振之状。

《大公报》及《国闻周报》要投稿，倒也并非不肯投。去年在上海投稿时，被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不如沈默之为愈，所以近来索性不投了，但有时或有一两篇，那是只为了稿费。北边的容易犯讳，大概也不下于上海，还是不作的好罢。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一夜。

【评点】

这里再次提到“做事万不要停顿在一件上”，是因为鲁迅想要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多做些事情。在他逝世前不久所写的文章《死》里，也说到，在他想定要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之后，就说：“要赶快做”。这不但是由于年纪老起来了的缘故，而且

也正是做实事者的作风。所以单是在印行古代版画方面,就为郑振铎设想了很多可做之事。鲁迅总想要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点什么,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他创议编印《北平笺谱》亦是此意。但在邵洵美所编的《十日谈》里,却发表了一篇《二十二年的出版界》的文章,对鲁迅郑振铎之编印《北平笺谱》大加讥笑攻击,说:“特别可以提起的是北平笺谱,此种文雅的事,由鲁迅西谛二人为之,提倡中国古法木刻,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至于全书六册预约价十二元,真吓得煞人也。无论如何,中国尚有如此忧游不迫之好奇精神,是十分可贺的,但愿所余四十余部,没有一个闲暇之人敢去接受。”所以鲁迅骂他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所谓“大出丧”者,是指邵洵美的岳祖盛宣怀在1916年去世时举行大出丧,排场之大,轰动一时。这些人的心思,的确是无法与鲁迅相通的。鲁迅不但要为后人留下点文化遗产,而且还希望能使外国人多了解点中国,他将中国木刻寄赠给外国人,即是此意。

340111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惠函敬悉，谢谢。我们平安如常，上海还是很寂寞，天气也冷了。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时还是等等再说为好。记得前次惠函中曾说起想去塔希提岛，其实我想实物决没有书本、画册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秀丽。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我不需要什么东西，但有一件颇麻烦的事相托。我自前年开始订阅版画杂志《白与黑》，是限定版，我又订迟了一些，缺一至十一期，又二十期、三十二期，共十三册。倘贵友中有常到旧书店走动的，烦他代为留意购买。“白与黑社”的地址是淀桥区西落合一之三七号，但该社除了第三十二期外，已无存书。但这也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东西，倘没有，也不必费力去找。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增田二世的相片我也收到了。我回信说，他比父亲漂亮，想来这对一世有些失

敬，然而事实。

鲁迅 上 一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评点】

说“实物决没有书本、画册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秀丽”，这确是经验之谈，所以鲁迅到过东京之后，便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但他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而到长安，在大失所望之余，却将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来的计划完全打破，因而连小说也不写了，却是十分可惜之事。据他的朋友们回忆，鲁迅准备要写的唐代历史小说，是《杨贵妃》。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里还记述了他的构思，是很有独到见解的：“朋友的 L 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声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

至于在当时白色恐怖日益猖獗的形势下，鲁迅还能活下来的原因，据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中记载，当年军统特务头子沈醉曾告诉他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

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你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

340117 致 萧 三

E. S. 兄：

十一月二十四日来信，现已收到。一星期前，听说它兄要到内地去，现恐已动身，附来的信，一时不能交给他了。寄来之《艺术》两本，早已收到。本月初，邮局送一张包皮来，说与内容脱开，倘能说出寄来之书名，可以交付，但因无人能知，只好放弃。以后如寄书报，望外面加缚绳子，以免擦破而落下为要。不过它兄既不在沪，则原文实已无人能看，只能暂时收藏，而我们偶然看看插画而已。

寄卓姊信，二月那一封是收到的，当即交去，并嘱回答；而六月那一封及英文信，则并未收到，零星之信件，我亦未过手一封（倘亦系寄我转交的话）。至于她之于兄，实并非无意，自然，不很起劲是有点的，但大原因，则实在由于压迫重，人手少，经济也极支绌。譬如寄书报，就很为难，个人须小心，托书店代寄，而这样的书店就不多，因为他们也极谨慎，而一不小心，实际上也真会惹出麻烦的。

书籍我收到过四次，约共二十余本，内有 M. Gorky 集，B. Shaw 集，演剧史等，但闻亚兄回时，亦有书籍寄出，托我代收者不少，所以这些已不知是兄的，还是亚兄的，要他看过才会明白了。

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寄上书籍杂志（《文学》从第一期起在内）两

包，一月初寄列京木刻家中国画本时，附有杂志两本并它兄短信，托其转交，不知已收到否？今天又寄杂志五本共一包。现在的刊物是日见其坏了。《文艺》本系我们的青年所办，一月间已被迫停刊；《现代》虽自称中立，各派兼收，其实是有利于他们的刊物；《文学》编辑者，原有茅盾在内，但今年亦被排斥，法西斯谛将潜入指挥。本来停刊就完了，而他们又不许书店停刊，其意是在利用出名之招牌，而暗中换以他们的作品。至于我们的作家，则到处被封锁，有些几于无以为生。不过他们的办法，也只能暂时欺骗读者的，数期后，大家一知道，即无人购阅。《文学季刊》（今天寄上了）是北京新办的，我亦投稿（改名唐俟），而第一期已颇费周折，才能出版。此外，今年大约还有新的刊物二三种出版，俟出后当寄上。

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Goethe 纪念号是收到的；《文学报》收到过两回，第一回它兄拿去了，它一去，这里遂再没有会看原文的人。此后寄书，望常选插图多的寄来，最好是木刻插图，便于翻印介绍，倘是彩色，就不易翻印了。

此复即请
春安。

豫 启上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信封是它兄写的，我不会写。此后来信时，望附来写好之信封二三个，以便寄回信。信可寄信箱，书籍之类也可以寄信箱吗？便中示及。 又及。

【评点】

当时萧三远在苏联，所以信中向他介绍了国内文化界的一些情况，这些介绍，今天对研究者还有参考价值。

“它兄要到内地去”，指瞿秋白要到中央苏区去；卓姐，指左联；M. Gorky，即高尔基；B. Shaw，即萧伯纳；Goethe 纪念号，即《歌德专号》。

“大会”，指 1934 年 8 月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曾向鲁迅发出邀请，但鲁迅考虑到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不但不能向国内介绍大会的情况，而且也不能继续战斗，所以他还是决定不去，说：“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文章好一点罢。”鲁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考虑的是实际的战斗效果，而不是其他表面上的东西。

340127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承提醒我注意的事，甚感。上海也冷，据闻闽粤交界一带四十年来初次下雪，今年似乎到处都冷。Tahiti 岛究竟怎样，我也怀疑。谢谢芙美子女士的好意，下次遇到时务请代为转达。前几天读了《面影》，也想看看房间，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恐怕会引起麻烦。让便衣钉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始终莫名其妙。然而依我看，恐怕还是北斋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我早想多加些插图予以介绍，但首先按读书界目前的状况，就办不到。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因此我正不知将来该把我自己的东西交给谁。增田一世仍孜孜不倦地在翻译《小说史略》，遇到不理解的地方时常问我，倘无书店可以出版，就实在太遗憾了。只要有助于出版，我为他写一篇序文也好。 草草顿首

鲁迅 一月二十七日

【评点】

上信说“身后跟着便衣去看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此信又说：“让便衣钉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都是对日本警事制度的嘲讽和蔑视。但于此也就可见鲁迅即使避难到日本，也不会得到自由的。

信中论及日本的浮世绘，亦表现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想将这种异国风俗画介绍到中国来，可惜此时已没有精力来从事了。

340209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五日函及《北平笺谱》补页五张，已于今九日同时收到。分送印本办法，请悉如来函办理。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第二次预约数目，未知如何？倘已届五十或一百，我并不反对再印，但只须与初版略示区别，如有余书，则当酌加书价出售，庶几与初版预约及再板预约者皆有区别也。

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过二十余元，我豫算可以担任，如先生觉其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至于渐成《图版丛刊》，尤为佳事，但若极细之古刻，北平现在之刻工能否胜任，却还是一个问题，到这时候，似不妨杂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罗版也。

中国明人（忘其名）有《水浒传像》，今似惟日本尚存翻刻本，时被引用，且加赞叹，而觅购不能得，不知先生有此本否？亦一丛刊中之材料也。

上海之青年美术学生中，亦有愿参考中国旧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则又苦于难得，所以此后如图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别制一种廉价本，前者以榨取有钱或藏书者之钱，后者则以减

轻学生之负担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几近之。

我在这里其实并无正业，而又并无闲空，盖因“打杂”之故，将许多光阴，都虚掷于莫名其妙之中。《文学》第二期稿，创作恐不能著笔，至于无聊如《选本》那样之杂感，则当于二十五日以前，寄奉一则也。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二月九日

【评点】

《十日谈》的作者希望《北平笺谱》卖不完，而实际却很快就再次重印，这说明鲁迅和郑振铎的工作是受到文化界人士的欢迎的。这样，他们就再翻刻了一部《十竹斋笺谱》，也很有价值。《十竹斋笺谱》是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翻印的，按他们的计划，是想以这个会的名义，继续再印行版画，可惜由于环境、经费和鲁迅身体的关系，《十竹斋笺谱》之后，这个会就没有再印什么东西。但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一些很好的设想，如于精印本之外，还想为青年美术学生出一种廉价本，使他们能够购以作为参考书。可见鲁迅的印书，并不在赚钱，也不是为了个人玩古董，而是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

340211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一月廿五日第一号信及二月五日信，均已收到。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三元）最简明。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粹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至于别的种种，只好以意为之，如必俟一切研究清楚，然后下笔，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倘有介绍，我以为也不妨拜访几位，即使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明白那是怎样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处也。

《自由谈》上近已见先生之作一篇，别的几篇，恐怕原因多在为洪乔所误，因为尝闻黎叹无稿也。他在做编辑似甚为难，近新添《妇女园地》一栏，分明是瓜分《自由谈》之现象。我只偶投短文，每月不过二三篇，较长而略有关系之文章，简直无处发表。新出之期刊却多，但无可看者，其中之作者，还是那一班，不过改换名姓而已。检查已开始，《文学》第二期先呈稿十篇，被抽去其半，则结果之必将奄奄无生气可知，大约出至二卷六期后，便当寿终正寝了。

《现代》想必亦将讲民族文学，或以莫名其妙之文字填塞耳。

此刻在上海作品可以到处发表，不生问题的作者，其实十之九是先前用笔墨竞争，久已败北的人，此辈藉武力而登坛，则文坛之怪象可想。自办刊物，不为读者所购读，则另用妙法，钻进已经略有信用的刊物里面去，以势力取他作者之地位而代之。从今年起，大约为施行此种战略时代，不过此法亦难久掩他人之目，想来不到半年，《现代》之类也就要无人过问了。

我旧习甚多，也爱中国笺纸，当作花纸看，这回辑印了一部《笺谱》，算是旧法木刻的结账。S夫人既爱艺术，我想送她一部，但因所得之书有限，不能也送S君了。这在礼仪上，不知可否？倘无碍，则请先生用英文写给我应该写上之文字，以便照抄，邮寄。并嘱令弟以其住址见告，令弟之通信地址，亦希嘱其函知，因我不知地址，有事不能函询也。

上海已渐温暖，过旧历年之情形，比新历年还起劲。我们均安。

此上即颂
时绥。

弟 豫 顿首 二月十一日

【评点】

姚克写历史作品，要了解当时的典章文物，这原是必要的准备工作，但在今天看来，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盖因今之作者，大抵喜欢戏说历史，而脱离历史实际乱写一通，更是常事。但真正好的历史作品——无论是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或者历史影视，则不但在典章文物上要符合历史真实，而且还应写出历史的真谛来，这就

要作家具具有相当的史识。

本信还写了当时文网之严,可以从中了解白色恐怖下的文化界情况。至于说到北平学者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很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亦是入骨之批评。

340215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二月十一日来信昨收到。我的信竟入于被装裱之列，殊出意外，遗臭万年姑且不管，但目下之劳民伤财，为可惜耳。

亚兄以七日午后到沪，昨十四日晨乘轮船北归，此信到时，或已晤面，见时希转告，以一信通知到燕为荷。

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前在沪闻其口谈，则似意在多印图而少立说。明版插画，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尤绍介，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此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二月十五日午后

【评点】

有人在破坏、毁灭，有人在保存、建设，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文

化态度。鲁迅与西谛之所为，即是为保存古代的文化精品，以利于建设新文化也。为此，即使彼此意见稍有不同，鲁迅亦加以支持，盖因即使不能立说研究，“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论者或因鲁迅批判旧文明态度之坚决，认为他一定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实乃片面之论。鲁迅对于旧物，或扬弃，或保存，以其对我们是否有用，而有所区别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就说得非常清楚。

340220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第五信收到。来论之关于诗者，是很对的。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现在的白话诗，已有人掇用“选”字，或每句字必一定，写成一长方块，也就是这一类。

先生能发表英文，极好，发表之处，是不必太选择的。至于此地报纸，则刊出颇难，观一切文艺栏，无不死样活气，即可推见。我的投稿，自己已十分小心，而刊出后时亦删去一大段，好像尚未完篇一样，因此连拿笔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了。傅公，一孱头耳，不知道他是在怎么想；那刊物，似乎也不过挨满一年，聊以塞责，则不复有朝气也可知。那挨满之由，或因官方不许，以免多禁之讥，或因老版要出，可以不退定款，均说不定。

M. Artzybashev 的那篇小说，是《Tales of the Revolution》中之一，英文有译本，为 tr. Percy Pinkerton, Secker, London; Huebsch, N. Y.; 1917. 但此书北平未必能得，买来也可不必。大约照德文转译过来，篇名为《Worker Sheviriov》，亚拉籍夫拼作

Aladejev 或 Aladeev,也就可以了。“无抗抵主义者”我想还是译作“托尔斯泰之徒”(Tolstoian?),较为明白易晓。译本出后,给我三四本,不知太多否?直寄之店名,须写 Uchiyama Book-store,不拼中国音。

送 S 君夫妇之书,当照来函办理,但未知其住址为何,希见示,以便直寄。又令弟之号亦请示及,因恐行中有同姓者,倘仅写一姓,或致误投也。

前回的信,不是提起过钱君不复来访吗,新近听到他生了大病,群医束手,终于难以治愈,亦未可知的。

武梁祠画像新拓本,已颇模胡,北平大约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画像》,亦汉刻,似十幅,内有战斗,刑戮,卤簿……等图,价或只四五元,亦颇可供参考,其一部分,亦在《金石索》中。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二月二十日(第四)

【评点】

信中所说,文人常将民间物取为己有,弄成僵石的情况,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的一种心得,不但可以用来观察历史,而且对于研究时下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关系,也不无好处。此种观点,鲁迅在别的文章中也有所表述,如《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里,就说过:“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粘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从这个角度来论述梅兰芳的变化,也就显得格外深刻,富有历史的纵深感。

34030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

“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此上，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三月四夜

【评点】

“此公”，指徐诗荃。为了照顾他的颇不平常的脾气，鲁迅只好请许广平为他抄文章，有时还自己代他抄。据说后来徐诗荃看到

鲁迅书信后，颇为后悔，说他本以为鲁迅总该有秘书代劳的，没有想到他都是自己动手。但直到晚年，徐诗荃成为很有名的学者之后，他对于鲁迅总是很尊敬的。

徐诗荃很能写文章，当时有人把他的文章当作鲁迅所写，而对鲁迅大加攻击。鲁迅在4月1日致黎烈文信中说：“‘此公’盖雄于文”；又说：“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邨人，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

340306 致 姚 克

Y 先生：

二月廿七日函收到；信的号数，其实是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我于信件随到随复，不留底子，而亦不宜留，所以此法也不便当，还是废止，一任恩赐没收，不再究诘，胡里胡涂罢。

汉画象模胡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汉画象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象》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

〔 〕马脚，读者颇知其不可信了。上月我做了三则短评，发表于本月《改造》上，对于中、日、满，都加以讽刺，而上海文氓，竟又藉此施行谋害，所谓黑暗，真是至今日而无以复加了。

插画要找画家，怕很难，木刻较好的两三个人，都走散了，因为饥饿。在我的记忆中，现在只有一人或者还能试一试，不过他不会木刻，只能笔画，纵不佳，比西洋人所画总可以真确一点。当于日内去觅，与之一谈，再复。

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在内。我所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今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事也。

上海还冷，恐怕未必逊于北平。我们都好。

此布，即颂

时绥。

弟 豫 顿首 三月六夜

【评点】

鲁迅一向强调作家对于生活要有深入的观察，所以他反对浮光掠影地看一看，便写印象记的旅行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也提到日本的旅行者，且对好下结论的日本人有类似的讽刺：“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褻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迷

的国度’了。”

关于查禁 149 种书籍之事，鲁迅在 2 月 24 日致曹靖华信，及其他信中，均有道及，而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则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参看。这是国民党政府企图扼杀革命文艺的做法。但此举不但困死革命作家，而且也要困死许多书店，所以实际上无法持久实行，于是衍化出一种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也是为害不浅。

340315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顷接十日函，始知天津报上，谓我已生脑炎，致使吾友惊忧，可谓恶作剧；上海小报，则但云我已遁香港，尚未如斯之甚也。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仍如往日。假使真患此症，则非死即残废，岂辍笔十年所能了事哉。此谣盖文氓所为，由此亦可见此辈之无聊之至，诸希 释念为幸。插画家正在物色，稍迟仍当奉报也。专此布复，即请
旅安。

豫 顿首 三月十五夜

【评点】

对于鲁迅的谣言，又出现了新花样，这回天津报上竟说鲁迅生了脑膜炎，要停笔十年了。鲁迅只得又向朋友和亲属发信辟谣。次日，鲁迅戏作一绝，寄台静农。诗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固如冰。”

340324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二十一函顷奉到。流行感冒愈后，大须休养，希勿过劳为要。力作数日，卧床数日，其成绩逊于每日所作有节而无病，这是我所经验的。

关于我的大病的谣言，顷始知出于奉天之《盛京时报》，而所根据则为“上海函”，然则仍是此地之文氓所为。此辈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

敬隐渔君的法文听说是好的，但他对于翻译却未必诚挚，因为他的目的是在卖钱，重译之后，错误当然更加不少。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小说插图已托人去画，条件悉如来信所言。插画技术，与欧美人较，真如班门弄斧，但情形器物，总可以较为正确。大约再有十天，便可寄上了。

S君信已收到，先生想已看过，那末一段的话，是极对的。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介绍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

我们都好。但闻钱君病颇危耳。此复，并请
著安。

豫 顿首 三月廿四日

【评点】

这里提出了青年艺徒的学习与借鉴问题，很值得注意。杰出的作家和画家不可能凭空造成，学习环境至为重要。“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在《由聋而哑》一文中，他曾作过一个比方，说有些哑子，并非喉舌不能说话，而是因为从小耳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遂成哑子。所以他抨击那些堵塞运输精神粮食航路的人，说“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并且说：“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自己一向不断地翻译作品，后又陆续编印版画，就是这种运输精神粮食的工作。

340328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二十一日信并木刻一幅，早收到了，想写回信，而地址一时竟不知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那一幅图，诚然，刻法，明暗，都比《拉》进步，尤其是主体很分明，能令人一看就明白所要表现的是什么。然而就全体而言，我以为却比《拉》更有缺点。一、背景，想来是割稻，但并无穗子之状；二、主题，那两人的面貌太相像，半跪的人的一足是不对的，当防敌来袭或预备攻击时，跪法应作ㄣ，这才易于站起。还有一层，《拉》是“动”的，这幅却有些“静”的了，这是因为那主体缺少紧张的状态的缘故。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对比的力量，已经很能运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细的观察实状，实物；还有古今的名画，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都要随时留心，不可放过，日积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先前售卖的旧法花纸，其实乡下人是并不全懂的，他们之买去贴起来，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为习惯：这是花纸，好看的。所以例如阴影，是西法，但倘不扰乱一般观众的目光，可用时我以为也还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头上放出一道毫光，内画人物，算是做梦，与西法之嘴里放出

一道毫光，内写文字，算是说话，也不妨并用的。

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我想，最好是募集作品，精选之后，将入选者请作者各印一百份，订成一本，出一种不定期刊，每本以二十至二十四幅为度，这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可惜我一知半解，又无法公开通信处，不能动。 此复，即颂时绥。

迅 上 三月廿八日

【评点】

这里再次提到艺术手法的中西融合问题：“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这是鲁迅一贯的主张。其实不但在艺术手法上，就是在艺术精神上，鲁迅也是主张中西融合的，所以他在赞扬陶元庆的绘画时，曾说：“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梏中国的民族性。”

340401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日前寄奉芜函后，于晚便得《南腔北调集》印本，次日携往书店，拟托代送，而适有人来投大札，因即乞其持归，想已达览。此书殆皆游词琐语，不足存，而竟以出版者，无非为了彼既禁遏，我偏印行，赌气而已，离著作之道远甚。然由此亦可见“本不能文”云云，实有证据，决非虚_桥恃气之谈也。

《论语》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即读一过。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甚者且堕入油滑。闻莎士比亚时，有人失足仆地，或面沾污_髻而不自知，见者便觉大可笑。今已不然，倘有笑者，可笑恐反在此人之笑，时移世迁，情知亦改也。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然亦只能姑试之耳。

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倘为 先生个人所需，而不用于刊物，当奉呈也。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一夜。

【评点】

陶亢德时为林语堂编辑《论语》杂志的助手，曾寄杂志给鲁迅征求意见，鲁迅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愿对人虚与委蛇，他不赞成此时在中国提倡幽默，也就直率地对幽默杂志编者提出了批评意见。鲁迅认为，中国有讨便宜，有说笑话，但没有真正的幽默。此处说：“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亦即此意。而且信中所说，造成幽默的情势，是随着时代条件而起变化的，即所谓“时移世迁，情知亦改也”，则把对于幽默的研究推向深入，很值得我们思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审美范畴的内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340409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愚人节所发信，顷已收到。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洒洋服，令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短评中已曾屡次道及，然无效，盖此辈本不读者耳。

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此布即请
文安。

豫 顿首 四月九日

【评点】

关于胡须的式样问题，鲁迅在《说胡须》一文中有所详述；对于以镪水洒洋服的“小英雄”，则在《洋服的没落》中作过批判。这些信口开河的妄人，都是不读书，没有历史知识，而以爱国者自居的人。然而，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又何代没有呢。而今，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违背基本事实，而骂倒一切前辈作家的人，又何尝不是这类自以为是的“小英雄”呢？这也可见鲁迅提倡读史的重要性了。当然，根本上还是为人处世的态度问题，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决不会去尊重史实的。

“邻猫生子”的典故出自英国斯宾塞的著作。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曾引他的话说：“或有告者曰：邻宾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所谓“‘邻猫生子’的学者”，即谓专门研究无用史实之学者。人们总是盛赞清代学术之成就，鲁迅在《算账》一文中曾经指出，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是在“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而换得的，实际上并不合算；在这里，他又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清代学术发展史，指出从清初学者的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到后来的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是文字狱造成的，在当时是迫不得已，而革命以后还守着奴才家法，不敢开展，那真是没有出息了。鲁迅总是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事态，这样就可以看出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趋势，而不致将其看得凝固了。用历史眼光来看问题，也就不至于被某种历史高峰所压住。

340409 致魏猛克

××先生：

七日信收到。古人之“铁线描”，在人物虽不用器械，但到屋宇之类，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住，换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又无粗细了，这种图，谓之“界画”。

学吴友如画之危险，是在只取了他的油滑，他印《画报》，每月大约要画四五十张，都是用药水画在特种的纸张上，直接上石的，不用照相。因为多画，所以后来就油滑了，但可取的是他观察的精细，不过也只以洋场上的事情为限，对于农村就不行。他的沫流是会文堂所出小说插画的画家。至于叶灵凤先生，倒是自以为中国的 Beardsley 的，但他们两人都在上海混，都染了流氓气，所以见得有些相似之处了。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是装鬼脸，未来派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 Mayakovsky 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

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毛哥哥》虽然失败，但人们是看得懂的；陈静生先生的连环图画，我很用心的看，但老实说起来，却很费思索之力，而往往还不能解。我想，能够一目了然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报上能够讨论，很好，不过我并无什么多意见。

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这回给他加上皮肤，穿上衣服，结果还是死板板的。脸孔的模样，是从戏剧上看来，而此公的脸相，也实在容易画，况且也没有人能说是像或不像。倘是“人”，我就不能画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九夜

【评点】

从吴友如所画人物的流氓相，到叶灵凤的“新流氓主义”，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有所论述。这篇文章是从文艺思潮方面着眼，所以对这些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说得较为清楚，对读者很有启示。

反对者往往攻击鲁迅割断文化传统，其实，他是极其重视文化的继承性的。这里所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态度就很明确。当时，报刊上正在讨论“旧形式的采用”问题，鲁迅还写了一篇《论“旧形式的采用”》的文章，批评一些革命青年反对采用旧形式的说法。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

出现,也就是变革。”他还结合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中有哪些可以采取之处,并说:“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在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Beardsley,即毕亚兹莱,英国画家,喜画带图案性的黑白画,为叶灵凤所模仿。Mayakovsky,即马雅可夫斯基,苏联诗人,早期习画,属未来派。

340411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拜启：四月六日手书奉悉。

送佐藤先生的《北平笺谱》一函，已于三月二十七日用小包寄出，到四月五日尚未收到，实在太慢。现在谅已到达，可否顺便问一声，如终未到达，当再寄奉。

《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他是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的编辑（另一人是施蛰存），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

因此，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写文章来吹捧自己。在日本很难了解其中奥妙，就不免把它当做金科玉律。

多谢你上次来信忠告。我曾再三要求编者帮我改正，但除太触目处略作修订外，大抵照样刊登，实在难办。

再：日本的木版彩色印刷，有人说比中国的逊色。依我看，纸质大有关系。中国的纸有洇的性能，印刷时就利用了这性能。日

本的纸不涸，因此色彩就呆板了。 草草

洛文 四月十一日

增田兄几下

【评点】

对于杜衡化名“文艺年鉴社”的事，鲁迅曾写过一篇《化名新法》，专门加以揭露：“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Oho！”而苏汶也就是杜衡。鲁迅对于这种化名一个“社”来自吹自捧的现象，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在文末警告道：“‘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340412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顷收到八日来信；一日信亦早到，当即于九日奉复，现想已于恩赐检查之后，寄达左右矣。给杨某信，我不过说了一部分，历来所遇，变化万端，阴险诡随如此辈者甚多，倒也惯而不以为怪，多说又不值得，所以仅略与答复而止，而先生已觉其沈痛，可见向来所遇，尚少此种人，此亦一幸事，但亦不可不小心，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而上海文坛之不干不净，却已于此可见。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来信谓好的插画，比一张大油画之力为大，这是极对的。但中国青年画家，却极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实是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

之插画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其二，则他们的先生应负责任，因为也是古里古怪的居多，并不对他们讲些什么，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其奇怪的是美术学校中几乎没有藏书。我曾想出一刊物，专一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之末技，但经济，文章，读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上海虽春，而日日风雨，亦不暖。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耳。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四月十二夜

【评点】

“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因为其人一激烈，便无实事求是之心，容易反复无常。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说：“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所以有些左翼作家就变成右翼作家，自称革命的狼者，则变成反革命的狗。鲁迅从长期的生活阅历中悟出了这点道理，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可惜人们不大注意，因而以后仍旧不断地地上激烈者的当。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是指当时有人揭发何家槐将徐转蓬的多篇小说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从而引起的争论。此事并非孤立的现象，文坛上的丑事很多，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学术腐败”或“文坛腐败”罢，而且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这种腐败，使得“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而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

受，鲁迅自己就认为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这是很可悲的。他有一篇杂文《逃名》，说的就是这意思。“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鲁迅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学界和文坛的腐败现象却至今仍旧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

信中所描述艺术青年的怪相，亦值得注意。这种不肯正经作画的稀奇古怪的作风，也是影响艺术的发展的。

340415 致林语堂

顷收到十三日信，谨悉种种。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并“非私人请托”，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又久不弄笔，实亦不符；而且示众以后，识者骤增，于逛马路，进饭馆之类，殊多不便。《自选集》中像未必竟不能得，但甚愿以私谊吁请勿转灾楮墨，一以利己，一以避贤。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屡承下问，慨然知感，遂辄略布鄙怀，万乞曲予谅解为幸。此复即请道安。

迅 上 四月十五日

【评点】

林语堂向鲁迅要照片，是要登在杂志上的，故说“非私人请托”，而鲁迅自称“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者，则系反讽也。此种事，人所求之不得的，鲁迅却避之唯恐不及。一来，是“逃名”，“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二来，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也使他不愿“示

众”，怕在生活上会带来诸多不便也。5月25日致陶亢德信，又辞采访和拍照，云：“作家之名颇美，若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340419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来信，备悉种种。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我曾经看过 M K 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的《木刻集》（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

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试试看，可选之作不多，也许只能作为“年刊”，或不定期刊，数目恐怕也不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自说要出专集，克白的住址我不知道，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么，一本也只有二十余幅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又前信谓先生有几幅已寄他处发表，我想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缩小，这回也仍可收入的。

【评点】

“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这的确是一种通病，“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这种现象，至今仍旧存在。有些学校不是因为有了人才和成果，而去申请建立博士点或什么基地，倒是为了要申请建立博士点或什么基地，这才忙着去拼凑班子和炮制著作，甚至于马上就能搞出一大套丛书来；也不是因为有了好的人才，而加以引进，却是为了要达到引进人才的指标，而盲目地引进，滥竽之才也拿来充数；至于为了向某个节日献礼，而大赶工程进度，则更是常事，质量的低劣，当然在所不惜。这些，都是这种通病的表现。鲁迅说：“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而一当这种做法与某种利益联系在一起时，那么单靠耐心也就无济于事了。

“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这是针对当时那些

革命文学家们只强调革命题材而不要技术的左倾思想的反拨。当时是左倾机会主义当道，讲技术，讲艺术性，都是犯忌的，但鲁迅为了青年作家、艺术家的健康成长，还是一再强调这一点。鲁迅提出新兴木刻要拓宽题材，加入静物、风景、风俗，还要突出地方色彩，就是为了突破单一革命题材的局限性，他是要让新兴木刻走向群众，走向世界。但正在发革命热的青年，却不大能领会鲁迅的深意，只图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甚至在封面上刻上马克思像，这样就会把普通读者吓退，而且把刊物一下子拉到地下，这实际上等于自杀。

340422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十三日函早收到；近来因发胃病，腹痛而无力，躺了几天，以致迟复，甚歉。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石刻画像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朱鲔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来了（古怪之至，不知何意），未塞之前，拓了一次，闻张继委员有一套，曾托人转辗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此复即请
文安。

豫 顿首 四月二十二夜。

【评点】

本信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探讨又深入了一层,看来原因还在于国民性,还在于中国的黑色染缸。“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此语是针对当时情况而说的,但今天读来仍很新鲜。作家、学者、副教授、教授、硕士、博士……这些冠冕堂皇之“名”,不正在重新被一个个地玩过去,被一个个地糟蹋了吗?但既然问题在于整个染缸,那么,单是整顿学界,是未必能清除学术腐败的。

340424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惠函读悉。所举的三种青年中，第一种当然是令人景仰的；第三种也情有可原，或者也不过暂时休息一下；只有第二种，除说是投机之外，实在无可解释。至于如戴季陶者，还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

来问太大，我不能答复。自己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但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廿四夜

【评点】

鲁迅一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信仰，要按信仰办事，而反对思想主张变化无常的无特操者。戴季陶身居国民党政府高官，自称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但一会儿捐资修建孔庙，提倡忠孝，一会在他所主持的考试院内设置佛堂，持斋拜忏，一会儿又到陕西去扫文武周公的墓，说是“救国救民”，是一个毫无特操者。鲁迅并指出，说他是忏悔旧事等等，是假的，实则是应付环境变化之举。这就是无特操者的逻辑。对于戴季陶，鲁迅在许多杂文中曾加以揭露。

34043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函顷奉到。《南腔北调集》于月初托书局付邮，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谅，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四月卅日。

【评点】

当幽默杂志办不下去时，林语堂又于本月创办了另一份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半月刊，专门提倡性灵与闲适，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二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此诗发表后，步原韵奉和者甚众，颇为肉麻，林语堂又发表《周作人诗读法》，说是“寄沉痛于幽默”，有人写文章说是读周作人的诗感动得流泪。反对者则骂周作人“自甘凉血懒如蛇”，“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欲谁责？”能公允持平地评论周作人诗的，只有鲁迅。惜乎当时只在信中表达此意，而未能公开作文。然而兄弟已经不和，形如参商，鲁迅又怎能公开发表意见呢。而有人将周作人诗定为误国之罪，则更使鲁迅反感。当然，当时指责清流误国者，也并非仅对周作人而言，而有更深的用意。民族主义文学家所办的《汗血月刊》上就发表了《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行》一文，将明代之亡国，归罪于清流，这是为误国者推卸责任的做法。所以鲁迅说：“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340506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四日惠函已读悉。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墩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们试看撰稿人名单，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这许多作者存在，现在都网罗在《人间世》中，藉此看看他们的文章，思想，也未尝无用。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谅，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

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钅》（后来译为雷铎），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娄如瑛君和我，恐怕未必相识，因为我离开故乡已三十多年，他大约不过二十余，不会有相见的机会。日前曾给我一信，想是问了先生之后所发的，信中有几个问题，即以答复，以后尚无信来。

“碎割”之说，是一种牢骚，但那时我替人改稿，介绍，校对，却真是起劲，现在是懒得多了，所以写几句回信的工夫倒还有。

此复，即颂
归绥。

鲁迅 五月六夜。

【评点】

林语堂是教会学校出身，后又留学美、德，英文很好，而于中国

学问，其实并不在行。他提倡性灵、闲适小品，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很推崇明代公安派的性灵散文，林语堂就大加鼓吹。但文学是有时代性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并不合适。正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所以鲁迅对于他们的提倡，持反对态度。现在时代环境有了变化，人们再度欣赏性灵小品，又反过来对鲁迅的批判持否定态度，则是不顾历史条件的做法，诚不足取也。

信中所说：“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则是指林语堂等人对于旧学并未贯通，看到一点即大惊小怪，自己还没有怎么弄懂，就胡乱加以提倡，其实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于社会并无好处。6月18日致台静农函中，亦曾言及此事：“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曾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途，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当时，杨霁云提出要编集鲁迅的集外作品，所以鲁迅在给他的回信中，多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后由杨霁云编成《集外集》出版。这里所说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怀旧》，载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篇末附有编者恽铁樵的批语云：“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诂订。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340515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惠示收到，并剪报，甚感。《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但恐怕也不多，因为自己或同时人，较知底细，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则未曾身历其境，即如隔鞋搔痒。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诉他火灼是怎样的感觉，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国人谈起，在中国不久的，大约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等事，他们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谈》。所以应否编印，竟也未能决定。

二则，这类的文章，向来大约很多，有我曾见过的，也有没有见过的，那见过的一部分，后来也随手散弃，不知所在了。大约这种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会愤懑的，后来经验一多，就不大措意，也更无愤懑或苦痛。我想，这就是非洲黑奴虽日受鞭挞，还能活下去的原因。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作，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先生一定又大吃一惊了罢，但是，人们是往往这样的。

烈文先生不做编辑，为他自己设想，倒干净，《自由谈》是难以办好的。梓生原亦相识，但他来接办，真也爱莫能助。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实是别一人。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十五日

【评点】

鲁迅想搜集十年来攻击他的文章，出版一本《围剿十年》，对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对文章的策略和用意，都加以考证。这将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它可以为后人保存一段珍贵的史料，让人们

了解当时文艺斗争的复杂情况，也了解战法的五花八门，并了解某些学者作家的另一面。如当时有名的中央大学教授卢冀野，就在《茶座琐语》中污蔑过鲁迅，而那篇判定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其作者杜荃，竟是郭沫若的化名。如果任这些攻击鲁迅的文章消失，只剩下鲁迅还击的文章，就无从了解对立面的手段，而只显得鲁迅的尖刻了。可惜鲁迅终于没有编成这本书，只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两篇后记里保留下一部分资料，使我们得见当时情况的一斑。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文艺思想斗争史。

340516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顷得十二日惠函，复印木刻图等一卷，亦同时收到。能有《笺谱补编》，亦大佳，但最好是另有人仿办，倘以一人兼之，未免太烦，且只在一件事中打圈子也。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雕版画集》印刷甚好，图则《浣纱》《焚香》最佳，《柳枝》较逊，所惜者纸张不坚，恐难耐久，然亦别无善法。此书无《北平笺谱》之眩目，购者自当较少，但百部或尚可售罄。有图无说，非专心版本者莫名其妙，详细之解说，万不可缺也。

得来函后，始知《桂公塘》为先生作，其先曾读一遍，但以为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此外亦无他感想。别人批评，亦未留意。《文学》中文，往往得酷评，盖有些人以为此是“老作家”集团所办，故必加以打击。至于谓“民族作家”者，大约是《新垒》中语，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倂之民族主义文

学，一面又在讥刺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铁报》以来之老拳法，而实可见其无“垒”也。《新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陵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囊囊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又有不满于语堂者，竟在报上造谣，谓当福建独立时，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烈文系他调，其调开之因，与“林”之论战无涉，盖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职不可，而暗中发动者，似为待[侍]桁。此人在官场中，盖已颇能有作为，且极不愿我在《自由谈》投稿。揭发何家槐偷稿事件，即彼与杨邨人所为，而《自由谈》每有有利于何之文章，遂招彼辈不满，后有署名“宇文宙”者之一文，彼辈疑为我作，因愈怒，去黎之志益坚，然宇文实非我，我亦终未知其文中云何也。梓生忠厚，然胆小，看这几天，投稿者似与以前尚无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将必有稿勒令登载，违之，则运命与烈文同。要之，《自由谈》恐怕是总归难办的。

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匆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五月十六夜

短文当作一篇，于月底寄上。 又及

【评点】

本信除讨论《十竹斋笺谱》等事外，还因郑振铎的《桂公塘》而涉及文坛状况，很可注意。“左打左派，右打右派”，“如童子初着皮鞋”等比喻，极妙。对于攻击者，鲁迅是察其动机，而加以区别的。他认为特别恶劣的，是污蔑他为汉奸，造谣说林语堂在福建独立时曾秘密前去接洽，这是直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用心实在险恶。信中对《复仇》一文的解释，给我们索解《野草》一书提供了一把钥匙，使我们了解到，这些散文诗都是作者的战斗生活的结晶，而且和作者的战略思想相联系的。

340522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惠示谨悉。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骂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 先生都不要它。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一段）及《黄金虫》（A. Poe 作），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

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得的。自然，辑印起来，可知也未始不可以作后来者的借鉴。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处，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故《围剿十年》或当于暇日作之。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迅 启上 五月廿二日

再北新似未有叭儿混入，但他们懒散不堪，有版而不印，适有联华要我帮忙，遂移与之，尚非全部也。到内山无定时，如见访，最好于三四日前给我一信，指明日期，时间，我当按时往候，其时间以下午为佳。 又及

【评点】

鲁迅常将现实状况与宋末明季的史事相比方，因其颇多相似之处。连嫁祸舆论，指摘清流误国这一点，也是一样的。从《汗血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里，鲁迅看出了当时误国者的自觉性，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拿明末的史事来进行隐射的。这篇文章，即指本俊所写的《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文中说：“明代士大夫因为陷于卑下无耻，所以便致附和宦官乱政，因为流于虚矫偏

激，便造成激烈的党争，贻误抗清之大计，结果明朝社稷，便告颠覆；民族史上又添上沉痛之一页。”照此说法，则罪在清流，过在批评政治腐败的舆论，而统治者倒反没有责任了。鲁迅对此特别敏感，是因为他自己就有被诬为汉奸的切肤之痛，因此对内中的意思也能看得更为分明。他在6月2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说是由我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

鲁迅因好抨击时弊，常被卷入矛盾漩涡的中心，由事而及人，亦乃必然，而被指为个人恩怨，则是肤浅之见。鲁迅说：“《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这话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其实，不但是《华盖集》及《续编》，鲁迅所有的文章都应作如是看。要从思潮上着眼，而不要将其当作个人纠纷，这才能读出鲁迅文章的深刻含意来。

340602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信，今日午后收到。去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

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年内先印两种，极好。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又闻有染成颜色，成为旧纸之状者，倘染工不贵而所用颜料不至蚀纸使脆，则宣纸似亦可用耳。

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错误甚多，好像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

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纸板寄去的（但他们竟颠倒了两页），印，纸，装订，连运费在内，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国钱），但印中国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图，本多小块，所以书不妨小，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价，日前已去函问，得复后当通知。大约每本六十图，则当需二元，百二十图分两本，成本当在四元至三元半，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见又不多，得一小题，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复不已。《桂公塘》事即其一，我以为大可置之不理，此种辩论，废时失业，实不如闲坐也。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令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例如乡下顽童，常以纸上画一乌龟，贴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认真与他们辩论自己之非乌龟，岂非空费口舌。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但章之攻林，则别有故，章编《人言》，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

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六月二日夜。

【评点】

生活节奏慢，没有紧迫感，是长期以来自然经济的产物，在这种悠悠然的生活状态中，一生的确是做不了几件事的，所以鲁迅讽刺道：“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然而，即使长寿，这些人怕也未必肯多看书、多做事，只不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这习惯，在许多地方至今尚未改变，正是实行现代化生活的一种障碍。鲁迅总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一向不愿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信中劝郑振铎对于别人无聊的攻击，可以置之不理，不必辩论，也就是为了使自已可以多做事的缘故。

鲁迅欣赏朴实的作品，强调绘画的真实性。而中国的新潮艺术家，却不喜欢观察，缺乏基本功，一味模仿西方的怪画，于是畸形怪相，弥漫于画苑，而革命艺术家们，则专画凶眼睛，大拳头，以为这就是革命。鲁迅对此很不满意，于是编印《引玉集》，使青年画家有所参考。他在这本书里集苏联版画家 11 人的 60 幅木刻，希望对纠正画苑怪风，能起一些作用，真是用心良苦啊！

对于小品文的看法，鲁迅在此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垢病，实因过事张扬”；“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不但当时的小品文是这样，其他许多事情又何尝不如此呢？有些人事，本来是很普通的，也并非毫无价值，而一旦过分炒作之后，就会令人生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情况，对于好炒作者，不能不深长思之。

信中所谓“章之攻林”指当时章克标对于林语堂的攻击。《清代文字狱档》中的山西秀才上书乾隆求娶表妹而几乎杀头事，鲁迅将它写入杂文《隔膜》中，从中悟出很深的道理，值得一读。

340603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二日函收到。叭儿无穷之虑，在理论上是对的，正如一人开口发声，空气振动，虽渐远渐微，而凡有空气之处，终必振动下去。然而，究竟渐远渐微了。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为得之现在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于将来并非只是损。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那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新社会半月刊》曾经看过几期，那缺点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后，觉得并无所得，当然不能引人注意。来信所述的方针，我以为是可以的，要站出来，也只能如此。但有一种可叹的事，是读者的

感觉，往往还是叭儿灵。叭儿明白了，他们还不懂，甚而至于连讥刺，反话，也不懂。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这却比文坛上之多叭儿更可虑。然而也顾不得许多，只好照自己所定的做。至于碰壁而或休息，那是当然的，也必要的。

办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投稿，不过未必能每期都有。我的名字，也还是改换好，否则，无论文章的内容如何，一定立刻要出事情，于刊物未免不合算。

《引玉集》并不如来函所推想的风行，需要这样的书的，是穷学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个，况且有些人是我都送过了。至于有钱的青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德国版画集，我还想计划出版，那些都是大幅，所以印起来，书必加大，幅数也多，因此资本必须加几倍，现在所踌躇的就是这一层。

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板；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斯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

现在我在收集中国青年作家的木刻，想以二十幅印成一本，名曰《木刻纪程》，留下来，看明年的作品有无进步。这回只印一百本，大约需要者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三夜

【评点】

文坛污浊，叭儿无穷，而且这些叭儿还善于变换面目，鲁迅对此是深有了解的，所以常深恶而痛绝之。他在许多杂文中加以揭露，写出他们的一鼻，一嘴，一毛，而且还要在杂文集的后记里加上一条尾巴，使其形象更加完整，就是深知叭儿必然会绵延不绝，因而要给后来战斗的青年提供一些认识此类的资料。但是，鲁迅对于前途却并不悲观，他认为“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这就是说，他是寄希望于新的社会力量，而非文人自身。的确，文坛是社会的一部分，非有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文坛是无法自己清洗干净的。

信中所批评的读书界不正之风，如：买了一批关于日本的书，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的书出版；制造家只想寻找一些记载秘诀的小册子；画家只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图案、广告画之类，而对于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则弃而不顾；……这些，都是浮躁学风的表现。可见，立竿见影式的实用主义学风，在我国真是由来已久，现在的浮躁症只不过是老病复发而已。但因为是老毛病，要医治起来，也就格外困难了。

340609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不敢承印《准风月谈》事，早成过去；后约者乃别一家，现正在时时催稿也。

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上 六月九日

【评点】

随着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提倡尊孔读经，文化界再次掀起一股复古热潮。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倡小学学习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大学》、《中庸》，接着，吴研因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

对,引起了新的文白之争。当时,进步语文工作者陈望道、乐嗣炳等人认为,重复五四的文白之争没有太大意思,而且只是打防御战也很被动,应该提倡一种更为积极的东西,于是他们发起大众语运动。先由陈子展在 1934 年 6 月 18 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开了头炮,接着各人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预有所闻,认为此举对打击复古思潮很有好处,所以加以支持,后来也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他对那种激进的论点并不赞成,撰文加以匡正。他的观点,集中地表现在《门外文谈》中,可以研读。

340621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新语林》第二期的文章很难说，日前本在草一篇小文，也是关于清代禁书的，后来因发胃病，孩子又伤风，放下了，到月底不知如何，倘能做成，当奉上。闲斋尚无稿来，但有较长之稿一篇在我这里，叫作《攻徐专著》，《自由谈》不要登。其实，对于 先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我想，就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登出来，倒也有趣，明天当挂号寄上，倘不要，还我就好了。

《动向》近来的态度，是老病复发，五六年前，有些刊物，一向就这样。有些小说家写“身边琐事”，而反对这种小说的批评家，却忘记了自己在攻击身边朋友。有人在称快的。但这病很不容易医。

不过，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间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御战。这事受损很不小。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假使攻击者多，而一一应付，那真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但这也须自己有正当的主见，如语堂先生，我看他的作品，实在好像因反感而在沈沦下去。

《引玉集》的图要采用，那当然是可以的。乔峰的文章，见面时当转达，但他每天的时间，和精力一并都卖给了商务印书馆，我看也未必有多少工夫能写文章。我和闲斋的稿费，托他也不好（他几乎没有精神管理琐事了），还是请先生代收，便中给我，迟些时是不要紧的。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二十一日

因时间尚早，来得及寄挂号信，故将闲斋（= 区区）稿附上了。
又及。

【评点】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而对于那些恶意的批评，更是不必理睬，以免浪费有用的时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总是奉劝青年作者，不必认真看待批评，只管走自己的路，如果与那些批评针锋相对，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所以当他看到徐懋庸老是在打防御战时，就向他提出了忠告。这是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同日致郑振铎信中，也劝他不必理会那些无聊的批评，说是“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340621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六月十八日函及《十竹斋笺谱》样张，今天都收到。《笺谱》刻的很好，大张的山水及近于写意的花卉，尤佳。此书最好是赶年内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罗版印者一种。我想，购买者的经济力，也应顾及，如每月出一种，六种在明年六月以内出全，则大多数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两月出一种，使爱好者有回旋的余地。

对于纸张，我是外行，近来上海有一种“特别宣”，较厚，但我看并不好，研亦无用，因为它的本质粗。夹贡有时会离开，自不可用。我在上海所见的，除上述二种外，仅有单宣，夹宣（或云即夹贡），玉版宣，煮碯了。杭州有一种“六吉”，较薄，上海未见。我看其实是《北平笺谱》那样的真宣，也已经可以了。明朝那样的棉纸，我没有见过新制的。

前函说的《美术别集》中的《水浒图》，非老莲作，乃别一明人本，而日本翻刻者，老莲之图，我一张也未见过。周子兢也不知其人，未知是否蔡先生的亲戚？倘是，则可以探听其所在。我想，现在大可以就已有者先行出版；《水浒图》及《博古页子》，页数较多，将来得到时，可以单行的。

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

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像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像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凯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青年心粗者多，不加说明，往往连细看一下，想一想也不肯，真是费力。但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长恨歌画意》，也不过将梅兰芳放在广东大旅馆中，而道士则穿着八卦衣，如戏文中之诸葛亮，则于青年又何责焉呢？日本人之画中国故事，还不至于此。

六月号之《文学》出后，此地尚无骂声，但另有一种脾气，是专做小题，与并非真正之敌寻衅。此本多年之老脾气，现在复发了，很有些人为此不平，但亦无以慰之，而这些批评家之病亦难治。他们斥小说家写“身边琐事”，而不悟自己在做“身边批评”，较远之大敌，不看见，不提起的。但（！），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十竹斋笺谱》刻工之钱，当于月底月初汇上一部分。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隼 上 六月廿一日

寄茅兄函，顷已送去了。 又及

【评点】

诚如鲁迅自己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他之翻印古画，介绍外国美术，除了文化史上的意义之外，还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即为了纠正青年画家的时弊，而印些东西给予参考。郑振铎与他有同好，故于通信中多所擘划。在本月9日致台静农函中，也说到：“对于印画，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鲁迅还托他代为收集拓片，可惜此事终未成功。

340727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来信问我的几件事情之中，关于书籍的，我无法答复，因为向来没有注意过。社会科学书，我是不看中国译本的。但日文的学习书，过几天可以往内山书店去问来，再通知，这几天因为伤风发热，躺在家里。

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但对于苏联的文学理论的介绍，近来却有一个大缺点，即常有删节，甚至于“战争”“革命”“杀”（无论谁杀谁）这些字，也都成为××，看起来很不舒服。

所以，单靠日本文，是不够的，倘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但是，我想，你还是划出三四年工夫来（并且不要间断），先学日本文，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因为，一者，我们先就没有一部较好的华俄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书；二者他们有专门研究俄文的杂志，可供参考。

自修的方法，我想是不大好，因为没有督促，很容易随便放下，不如进夜校之类的稳当。我的自修，是都失败的，但这也许因为我

太懒之故罢，姑且写出以备考。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评点】

鲁迅对于外文学习，着重于实用，故对于不同的对象，所提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唐弢志在研究文学，且专门请教学习日文事，故与他谈学习日文的有用处，因为日本介绍外国的作品多，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但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所以劝他兼学俄文。而在6月8日致陶亢德函中，则说：“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介绍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预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大概陶亢德是要学习创作的，重在阅读作品，所以鲁迅劝他学西文，以便直接阅读西方文学原著。

340813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十一日信，十三才收到。昨天我没有去，虽然并非“兄弟素不吃饭”，但实在有些怕宴会。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而这回却有了两种上述的病根，书坊老板代编辑打算盘，道不同，必无是处，将来大约不容易办。但是，我说过做文章，文章当然是做的。

关于大众语问题，我因为素无研究，对个人不妨发表私见，公开则有一点踌躇，因为不预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没有顾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我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子的人，后来有一些人会由些[此]改骂鲁迅而忘记了大众语。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但如 先生一定要发表，那么，两封都发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请代改为“客观上替敌人缴械”的意思，以免无谓的纠葛。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

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

专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八月十三日

【评点】

讨论大众语问题的两封信，写于7月29日和8月2日。后一封信以《答曹聚仁先生信》为题，发表在同月《社会月刊》1卷3期，收入《且介亭杂文》，主要讨论大众语与汉字拉丁化的关系和大众语与方言的关系；指斥“狗才”的话，则见于前一封信：“但现在真是哗啦哗啦，有些论者，简直是狗才，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因为他们知道大众语的起来还不在目前，所以要趁机会先将为害显然的白话打倒。至于建立大众语，他们是不来的。”这是大众语讨论中的新动向，所以鲁迅特别指出，又因为是私人信件，故用语没有避忌。鲁迅说若要发表，“狗才”云云，要修改一下，可见他写文章时还是要顾及各方面的关系的。但正因为当初是不准备发表的私人信件，所以写得更坦率，因而也就更值得一读。

在这封信里，还可以见出鲁迅的交友之道。他之所以反对林

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小品，其实是为了林语堂好。“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他不愿朋友将有用的时间花在无聊的事情上，所以劝他放弃这玩意儿。但他决不会出难题给朋友去做，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因为这不是林语堂所能做的事，而是劝他翻译英国文学名作。林语堂英文好，这是他的所长，而且这工作也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用，能留下长远的东西，于己于人都有好处。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自以为是良言者，在林语堂看来，却是充满暮气之语，当然不会接受，所以他在牛角尖里钻得滋滋有味。更何况，在他身后还有一批追随者，吹打弹唱，弄得热热闹闹，而在他头上，还因此而飞来一顶“幽默大师”的桂冠呢。

341009 致 萧 军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九夜。

【评点】

萧军与萧红夫妇，是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青年作家，他们向鲁迅求教，鲁迅很热情地帮助他们。这次所要求于鲁迅的，是要他审阅萧红的《生死场》手稿和他们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后来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并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里所说的“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是鲁迅一贯的创作主张。他在1927年写的《革命文学》一文中就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1931年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他又说：“总之，我的意见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们的理论而发的。“革命文学家”们从阶级观念出发，要求写革命题材，因为写的是并不熟悉的生活，所以常常出现假大空的作品；而鲁迅则重视生活实感，强调作家应写自己熟的题材，认为只要有革命思想，写什么样的题材都是革命文学，这样的作品自然写得较为实在。

鲁迅对于《野草》的自我评价，很公允贴切。《野草》的艺术性很高，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的心情，有很深的思想含义，值得深入研究。

341013 致合众书店

径启者，得 惠函，要将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以售去版权之作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此请

合众书店台鉴

鲁迅 十月十三日

【评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见出当时文化统制之严酷。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于 1934 年 5 月，是专门查禁进步书刊的机构，至 1935 年 7 月，因《新生》事件而无形解体。鲁迅《二心集》删余的 16 篇，曾以《拾零集》的书名出版。

341101 致 寞 隐 夫

隐夫先生：

来信并《新诗歌》第三期已收到，谢谢；第二期也早收到了。

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别处省一点，捐几块钱在现在还不算难事。不过这几天不行，且等一等罢。

骂我之说，倒没有听人说，那一篇文章是先前看过的，也并不觉得在骂我。上海之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缓。

迅 上 十一月一夜

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于是此后看见“文妖”二字，便以为就是骂我，互相报告了。这情形颇可叹。但我是不至于连这一点辨别力都没有的，请万勿介意为要。 又及。

【评点】

“革命文学家”们往往只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其实艺术形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与内容一样，同样决定着艺术的成败和发展。唐代出现诗歌的全盛时期，固然与重振汉魏风骨有关，同时也得力于六朝在艺术形式上的成功探求。五四以来，新诗之所以不及旧诗，不能广为流传者，就与形式上的不完善有关。鲁迅在这里不谈内容，专论形式，正是看出了这一弊病。他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就是要求新诗在形式上能为大众所接受。惜乎此事至今尚未解决，无怪乎新诗会出现危机。

341117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不过现在大约要好起来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心，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以下，答复来问——

一、不必改的。上海邮件多，他们还没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二、放在那书店里就好，但时候还有十来天，我想还可以临时再接洽别种办法。

三、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四、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七日

【评点】

对于文学家们的变化无常，鲁迅早在 1931 年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就有所描述，可以参看。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

待到革命一受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鲁迅认为，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这样的作家，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容易把革命写歪。

341118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

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专
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广平海婴随叩 十一月十八日

【评点】

鲁迅给他母亲写信，难得说及自己的窘迫状况，以免老人家担忧也。这次因病，不能不说一点，也说得较为轻松。为了使母亲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拿她熟悉的事情作比方。比如，说现在的病，就以在北京时生病的情形作比，说目下的处境，则拿当年绍兴老家的情况作比。“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这个比喻极妙，有如《红楼梦》里凤姐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鲁迅之所以摆脱不开那些琐事，总是要打杂，时间被割碎，即此之故也。

341206 致孟十还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外国的作家，恐怕中国其实等于并没有介绍。每一作家，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

计划的译选集，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近十年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一次』大当，《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后来不要了的一种。

《译文》材料的大纲，最好自然是制定，不过事实上很难。没有能制定大纲的元帅，而且也没有许多能够担任分译的译者，所以暂时只能杂一点，取乌合主义，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

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塞满全张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算稿费论页，已由我们自己决定了，这回是他们会插画减

少，可惜那几张黄纸了，你看可气不可气？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评点】

鲁迅一向重视翻译工作，目的是为了将外国的新思想和新艺术介绍到中国来。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写作《摩罗诗力说》，翻译《域外小说集》，做的就是这种译介工作。后来组织未名社，编辑“未名丛刊”；组织朝花社，出版“朝花小集”；组织译文社，发行《译文》杂志；还编辑过“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等，做的都是这方面的工作。可惜由于书商只顾眼前利益，还有翻脸不认账的，所以结果不但不好，而且还常常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他始终不肯放弃这项工作，而且有鉴于译界的乱译情况，还想系统地介绍一些名家，出版他们的选集。在本月4日致孟十还的信中，就提出了翻译果戈理选集的计划。“我想，中国也该有一部选集
1. 《Dekanka 夜谈》；2. 《Mirgorod》；3. 短篇小说及 Arabesque；
4. 戏曲；5 及 6. 《死魂灵》。”本信所说的“计划译选集”即指此事。后邀孟十还共同从事，他自己在重病时还坚持翻译了《死魂灵》。不久鲁迅逝世，这个选集也就没有出成。

341206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以下答问——

1. 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女儿。

2. 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3. 《君山》我这里没有。

4. 《母亲》也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没落》我未见过。

5. 《两地书》我想东北是有的，北新书局在寄去。

6. 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7. 关于脑膜炎的事，日子已经经过许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罢。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

不敢当的。但倘能出版，则错字和不妥处，我当负责改正。

你说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及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此复，即请

俚安。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有《桃色的云》及《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现在再版印出来了，你们两位要看吗？望告诉我。 又及

【评点】

社会一古老，花样自然繁多，情况也就比较复杂，要应付这种关系，就得用去大量的时间，哪里还有精力去做正经的事情呢。中国有很多人心思都用在关系学上，而在事业上则一事无成，即与此有关。但如果你只埋头做事，而不顾及各种关系，那么别人就要暗

算你，各种谣言随之而来，不但使你做不成事，而且还可以置你于死地。鲁迅由于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所以他慨叹在中国处世之难。而这些古老的花样，反映到革命的组织中来，就出现了以革命的名义到处整人的做法。鲁迅所说：“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盖即指此而言。但这在当时还只不过是萌芽，后来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把能做事的人都整垮，就危及整个局面。

答问中所说的那个会，是指 1933 年 9 月在上海开的远东反战会议，主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鲁迅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之一，但未出席会议；《母亲》、《没落》，都是高尔基的小说，《没落》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341210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来了，胃口已略开，大约可以渐渐恢复。童话两本，已托书店寄上，内附译文两本，大约你们两位也没有看过，顺便带上。《竖琴》上的序文，后来被检查官删掉了，这是初版，所以还有着。你看，他们连这几句话也不准我们说。

如果那边还有官力以外的报，那么，关于“脑膜炎”的话，用“文艺通信”的形式去说明，也是好的。为了这谣言，我记得我曾写过几十封正误信，化掉邮费两块多。

中华书局译世界文学的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现在蒋死了，说本想托蒋译，假如活着，也不会托他译的，因为一托他，真的译出来，岂不大糟？那时他们到我这里来打听靖华的通信地址，说要托他，我知道他们不过玩把戏，拒绝了。现在呢，所谓“世界文学名著”，简直不提了。

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现在虽然说得好像深通世

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国光社的当，他们与我订立合同，托我找十二个人，各译苏联名作一种，出了几本，不要了，有合同也无用，我只好又磕头礼拜，各去回断，靖华住得远，不及回复，已经译成，只好我自己付版税，又设法付印，这就是《铁流》，但这书的印本一大半和纸版，后来又被别一书局骗去了。

那时的会，是在陆上开的，不是船里，出席的大约二三十人，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义军的记载看过了，这样的才可以称为战士，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来斗争，当然更好，但这种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实来克服。

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但是，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

卖性的事，我无所闻，但想起来是能有的；对付女性，南方官大约也比北方残酷，血债多得很。

此复，即请
俚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夜。

【评点】

商家为利，名人为名，他们都不为文化建设着想，也不顾及读者的利益，所以一旦结合，就常常设局骗人。这封信里说的是虚张声势并不实行的骗局，还有大出丛书而卖伪劣假货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于是，认真的作者、译者、读者，均受其害。鲁迅一向做事认真，想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出力，所以对此种情况倍加反感。

鲁迅对于文人性质的批评，很可注意。他是见惯了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情况而发的感慨。这种毛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1928年提倡“革命文学”之际，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唯我独革，骂倒一切，真是不可一世。只不过后来受到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批评，而且实际上也搞不下去了，这才收敛起来，联合鲁迅，成立左联。但由于左倾思潮未曾认真清算，病根未除，所以一有机会，就要发作。这一点，只要看看到得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时候，李初梨还在否定鲁迅，就可以想见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可见左倾病毒埋藏之深了。鲁迅说：“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这既指思想基础，也指组织基础。有些人是为着赶时髦，充先进而加入左联的，压迫一来，难免就要逃走，以至于出卖。但鲁迅对此倒并不悲观，因为革命队伍总是在经过洗炼之后，才会变得纯粹起来的。

信中所说的“蒋”，指蒋光慈；“那时的会”，仍指远东反战会议；“义军的记载”，指萧军所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341216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四十五两函，顷同时收到。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上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那时烦忙，原想回上海后再记一遍的，不料回沪后也一直没有做，现在是情随事迁，做的意思都不起来了，所以那《五讲三嘘集》也许将永远不过一个名目。

来函所说的印法，纸张，我都同意；稿子似乎只要新加的给我看一看就好，前回已经看过的一部分，可以不必寄我了。如有版税，给我一半，我也同意，大约我如不取其半，先生也一定不肯干休的。至于我因此费力，却并无其事，不必用心的事情，比较的不会令人疲劳。但近来却又休息了几天，那是因为在一天里写了四五千字，自己真也觉得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了，很想到乡下去，连报章都不看，玩它一年半载，然而新近已有国民服役条例，倘捉我去修公路，那就未免比作文更费力了，这真叫作跼天蹐地。

前信提出了一篇《〈爱罗先珂童话集〉序》，后来一想，是不应当收的，因为那童话也几乎全是我的翻译。

东北文风，确在非常恭顺而且献媚，听说报上论文，十之九是

以“王道政治”作结的。又曾见官厅给编辑的通知,谓凡有挑剔贫富,说述斗争的文章,皆与“王道”不合,此后无须送检云云,不过官气倒不及我们这里的霸道政治之十足。但有一件事,好像我们这里的智识者们确是明白起来了,这是可以乐观的。对于什么言论自由的通电,不是除胡适之外,没有人来附和或补充么?这真真好极妙极。

专此布复,顺颂
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六日

【评点】

鲁迅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文章中常用对偶之句,这一积习,亦常施之于文章的标题和书名。文题如《帮闲法发隐》对《登龙术拾遗》,《双十怀古》对《重三感旧》,《中秋二愿》对《考场三丑》;书名如《朝花夕拾》对《故事新编》,《三闲集》对《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鲁迅原想出版一本《五讲三嘘集》与已出之《南腔北调集》配对的,“五讲”者,即指1932年在北平的五次演讲,“三嘘”者,传说鲁迅要嘘上海的三个作家: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但鲁迅说,杨邨人太弱,不够做一嘘的材料,所以可能要换一个。但这本书,后来没有写成,北平五讲虽已讲过,但纪录不全,后来也没有时间补写。经鲁迅修改过的两篇演讲纪录:《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和《今春的两种感想》,亦未收入杨霁云所编的《集外集》中,而是在鲁迅逝世之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中。

鲁迅说:“帮忙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中国的文人依附性强,热衷于为主子帮忙或者帮闲,

而缺乏独立性,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鲁迅正是从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出发,才看出了这一毛病。以此来观照文学史,自然就会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而且对现实也有所针砭作用。他在一些杂文中曾以此种视点来分析过一些作家,如说屈原的《离骚》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如对袁枚、李渔等人帮闲本质的分析,只是还来不及对帮闲文学作出全面的阐释,这是很可惜的。

341218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革命文学……》则有几句简直和我的话相反，更其要不得了。这两个题目，确是紧要，我还想改作一遍。

《关于红的笑》我手头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但这次重看了一遍，觉得这位鹤西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暂时大约也不能移动。

先生前信说回家要略迟；我的序拟于二十四为止寄出，想来

是来得及的罢。

专此布达，即请
旅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八日

【评点】

“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这句话说出了鲁迅当时的实际处境。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们，虽然尊鲁迅为左联盟主，但实际上并未放弃原来的成见，所以一有机会，即从背后加以攻击，使他不能专心对敌。而从背后放暗箭，也是古已有之的对付勇敢战士的老法。这也是在中国难以做事的一个原因。

绍伯，是田汉的化名。当鲁迅答曹聚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时，因为同期有一篇杨邨人的文章，绍伯就在《火炬》上发表《调和》一文，说鲁迅已经和杨邨人调和，并且深深地感慨了一番中国人的富于调和性。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予以回击之后，田汉于1935年1月29日写信给鲁迅说，《调和》“虽与我有关，但既非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这真是令人绝倒。而当时“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鲁迅回击的文章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里记下这件事道：“‘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鲁迅遇到此类事已非止一次，忍无可忍了，所以才公开地加以揭露。

341220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田的直接通信处，我不知道。但如外面的信封上，写“本埠河南路三〇三号、中华日报馆、《戏》周刊编辑部收”，里面再用一个信封，写“陈瑜先生启”，他该可以收到的。不过我想，他即使收到，也未必有回信，剧本稿子是否还在，也是一个问题。试写一信，去问问他也可以，但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结果的。此公是有名的模模糊糊。

小说稿我当看一看，看后再答复。吟太太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

专此布达，并颂
俚安。

迅 上 十二月二十日

【评点】

中国社会，一向以长者为本位，儿童深受压抑，这一点，鲁迅小时候有切身体会，见于《朝花夕拾》中的记载。他是主张以幼者为本位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尊重儿童的天性。对于自己的儿子，则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不加压制。因此，海婴才敢于在他面前问：“爸爸可以吃么？”而他的回答，居然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又据《从孩子的照片说起》一文中所记，海婴还曾当面给他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而且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可见海婴小时候在精神上是相当自由的。但鲁迅逝世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许广平继承鲁迅遗风，仍很尊重儿子的个性发展，但社会上却以他是鲁迅的儿子而提出种种要求，使他受到很多限制。这从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可以看出。比如，他少年时代爱好无线电，刚架好天线，地下党就要他拆掉；青年时在北大读书，有一次看到同学为桥牌的规则而争论，他插了几句嘴，就招来非议，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喜欢打桥牌，团委书记还找他谈话，说鲁迅儿子要注意影响，吓得他从此不敢参加文娱活动。如果说，前者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么，后者实在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了。可见名人的儿子也难做。

341225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一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

察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可虑之列。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廿五夜。

【评点】

青年编辑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策划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作一个总结，邀请鲁迅编选小说二集，即除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小说作品，并作导言。鲁迅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在本日曾复一信，答应其所请。接着，考虑到文禁之严，自己写的序论怕难以通过，所以又于夜间再写一信，说明理由，表示辞谢。从这封信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当时文化统制到了何种地步，同时也可以看到鲁迅的认真负责态度。他不希望因他之故，而使别人为难。后经赵家璧坚请，他终于还是答应下来，而且所选之书居然也能出版。鲁迅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是一篇很好的批评文章，值得认真研读。

341226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廿四日信收到，二十日信也收到的。我没有生病，只因为这几天忙一点，所以没有就写回信。

周女士她们所弄的戏剧组，我并不知道底细，但我看是没什么的，不打紧。不过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

《准风月谈》尚未公开发卖，也不再公开，但他必要成为禁书。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母亲》久被禁止，这一部是托书坊里的伙计寻来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线索。日前做了一篇随笔到文学社去卖钱，七千字，检查官给我删掉了四分之三，只剩一个脑袋，不值钱了。吟太太的小

说,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

这几天真有点闷气。检查官吏们公开的说,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即不和个人为难的意思。有些出版家知道了这话,以为“公平”真是出现了,就要我用旧名子[字]做文章,推也推不掉。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如果只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那是通得过的,不过,这有什么意思呢?

今年不再写信了,等着搬后的新地址。

专此布复,即颂
俚安。

豫上 十二月二十六夜

【评点】

现在研究上海文学史者,大都只注意上海文学的成绩,而绝口不谈此种扭扭捏捏的才子气。其实,上海开埠以后,因为思想开放而带来之新文风,固然是其积极的一面,而各地跑来的才子们所带来的坏脾气,——从晚清,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也就形成了消极的一面,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成为海派文学。而这后一面,非如鲁迅这样有亲身感受者,是不容易体察到的。因此,鲁迅杂文和书信中所揭露的上海文人的弊端,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历史的材料。

341231 致刘炜明

炜明先生：

十二日的信，早收到了；《星洲日报》也收到了一期，内容也并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谢谢。《二心集》总算找到了一本，是杭州的书店卖剩在那里的，下午已托书店和我新印的一本短评，一同挂号寄上，但不知能收到否。此种书籍，请先生万不要寄书款来，因为我从书店拿来，以作者的缘故，是并不化钱的。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上半年曾在《自由谈》（《申报》）上作文，后来编辑换掉了，便不再投稿；改寄《动向》（《中华日报》），而这副刊明年一月一日起就停刊。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至于期刊，我给写稿的是《文学》，《太白》，《读书生活》，《漫画生活》等，有时用真名，有时用公汗，但这些刊物，就是常受压迫的刊物，能出到几期，很说不定的。出版的那几本，也大抵被删削得不成样子。

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面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现在我如果用真名，那是不要紧的，他们只将文章大删一通，删得连骨子也没有；我新近给明年的《文学》写了一篇随笔，约七八千字，但给他们只删剩了一千余字，不能用了。而且办事也不一律，就如那一本

《拾零集》，是中央删剩，准许发卖的，但运到杭州去，却仍被没收，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

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我是还要反抗的。从明年起，我想用点功，索性来做整本的书，压迫禁止，当然仍不能免，但总可以不给他们删削了。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三十一夜。

【评点】

文网收得愈来愈紧，鲁迅几乎不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所以他慨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鲁迅在好几封信中一再提起的那篇原有七八千字而被删得只剩下了一千字的随笔，即指《病后杂谈》。鲁迅在将它收入《且介亭杂文》时，于《附记》中写道：“《病后杂谈》是向《文学》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主张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然而，要靠这种手段来压服革命者是不可能的，这只有更加激起鲁迅的反抗情绪。报刊文章不能写了，他准备索性来写整本书，另谋出版，不给他们删削。

1935 年

350104 致萧军、萧红

刘
吟先生：

二日的信，四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删改文章的事，是必须给它发表开去的，但也犯不上制成锌板。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在咪咪的 called，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沈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你所遇见的人，是不会说我怎样坏的，敌对或侮蔑的意思，

我相信也没有。不过“太不留情面”的批评是绝对的不足为训的。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

而且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糊。由我说起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它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却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

至于检查官现在这副本领，是毫不足怪的，他们也只有这种本领。但想到所谓文学家者，原是应该自己会做文章的，他们却只会禁别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時候，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吗？

考察上海一下，是很好的事，但我举不出相宜的同伴，恐怕还是自己看看好罢，大约通过一两回，是没有什么的。不过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点情形不同的人走过，恐怕它就会注意。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

专此布达，并请
俚安

迅 上 广附笔问候 一月四日

【评点】

鲁迅的杂文写得非常尖锐，常常是剔皮见骨，使对方没有避闪的余地。这种风格，颇不适合于中国的中庸之道，使那些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熏陶出来的文人很不习惯。于是纷纷指责，即使不怀敌意的论者，也常批评他太不留情面，似乎这是他的缺点。其实不然，鲁迅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在这封信里就说：“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这话说得很对。中国人正因为讲究中庸，好留情面，对坏事丑事不肯彻底揭露，这就易于藏垢纳污，使有些人在做过坏事丑事之后，仍能以外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继续骗人，继续污染社会空气。所以，留情面其实是有害于社会的。鲁迅还分析中国文人要留情面的心理原因及其后果道：“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这也就是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所说的：“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不要‘费厄’而亦不可得。”

至于对他好“骂人”的指责，鲁迅也不能同意。分歧在于对“骂”字的看法。在鲁迅看来，说婊子是婊子，这不能算骂，因为他说出了真实情况，只有把良家女子说成婊子，这才是骂人，因为他在诬陷好人；而有些批评家则以为凡是指出了别人不好的一面，即是骂人。鲁迅批评那些批评家，认为他们对于“骂”字的用法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的用法则是有害的。正如他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里所说的，不能将文艺上的批评斥之为“私骂”，不能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来抹杀是非，“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

‘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有人批评鲁迅工作不努力，实际上，鲁迅后期写得比前期多。单就杂文而言，1933年所写的，就有两本集子：《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4年所写，他又集了两本：《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但是，对于文字的压迫，愈来愈严了，短文几乎已无处发表，鲁迅在别的书信中就说过，他想直接写书。如果自己设法出版，就可以绕过书报检查机关，自然是一种冲破文网的方法。但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就是本信中所说的，要从古书里发掘材料，“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与当今很有相似之处，而目前那些坏种的做法也是祖传下来的。

350106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去年除夕的信，今天收到了。和《译文》同寄的，就是郑君所说的那本书，我希望它们能够寄到。其中都是些短评，去年下半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末了有一篇后记，大略可见此地的黑暗。

上海出版界的情形，似与北平不同，北平印出的文章，有许多在这里是决不准用的；而且还有对书局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书局的感情），对人的问题，并不专在作品有无色采。我新近给一种期刊作了一点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创作经验》望抄毕即寄来，以便看机会介绍。

此地尚未下雪，而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弟病则已愈，似并无倒闭之意；上月给孩子吃鱼肝油，胖起来了；女人亦安好，可释远念。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此布，即请
冬安。

弟 豫 顿首 一月六夜。

【评点】

本信揭露了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劣迹,指出他们的检查,已经不在作品的有无色彩,而且还有对人和对书店的问题。这与检查官个人的好恶很有关系,“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比如,鲁迅曾批判过“第三种人”,有些“第三种人”当上检查官之后,对他作品的检查就特别的严,连没有政治意味的文章也要查禁。鲁迅为《生生月刊》写了一篇短文:《脸谱臆测》,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据他自己在几封信中所说:“毫无别种意思”,“绝无政治意味或讽刺之类”,但因内中有涉及“第三种人”的问题,就被抽掉了。鲁迅将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集中出版时,就把检查官在送审原稿中所做的标记印出,而且在《附记》中加以揭露:“《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350108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四夜信收到。记得去年年底，生活书店曾将排好之校样一张送给我，问有无误字，即日为之改正二处，寄还了他。此即《十竹斋》广告，计算起来，该是来得及印上的，而竟无有，真不知何故。和商人交涉，常有此等事，有时是因为模模胡胡，有时却别有用意，而其意殊不可测（《译文》在同一书店所出的别种刊物上去登广告，亦常被抽去），只得听之，而另行延长预约期间，或卖特价耳。

在同一版上，涂以各种颜色，我想是两种颜色接合之处，总不免有些混合的，因为两面俱湿，必至于交沁。倘若界限分明，那就恐怕还是印好几回，不过板却不妨只有一块，只是用笔分涂几回罢了。我有一张贵州的花纸（新年卖给人玩的），看它的设色法，乃是用纸版数块，各将应有某色之处镂空，压在纸上，再用某色在空处乱搽，数次而毕。又曾见 E. Munch 之两色木版，乃此版本可以挖成两块，分别涂色之后，拼起来再印的。大约所谓采色版画之印法，恐怕还不止这几种。

营植排挤，本是三根惟一之特长，我曾领教过两回，令人如穿湿布衫，虽不至于气绝，却浑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先前的历史，是排尽异己之后，特长无可施之处，即又以施之他们之同人，所以当他统一之时，亦即倒败之始。但现在既为月光所

照，则情形又当不同，大约当更绵长，更恶辣，而三根究非其族类，事成后也非藏则烹的。此公在厦门趋奉校长，颜膝可怜，迨异己去后，而校长又薄其为人，终于不安于位，殊可笑也。现在尚有若干明白学生，固然尚可小住，但与月孽争，学生是一定失败的，他们孜孜不倦，无所不为，我亦曾在北京领教过，觉得他们之凶悍阴险，远在三根先生之上。和此辈相处一两年，即能幸存，也还是有损无益的，因为所见所闻，决不会有有益身心之事，犹之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但萌退志是可以不必的，我亦尚在看看人间世，不过总有一天，是终于要“一走了之”的，现在是这样的世界。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年底做了一篇关于明末的随笔，去登《文学》（第一期），并无放肆之处，然而竟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了一个头，我要求将这头在第二期登出，聊以示众而已。上海情形，发狂正不下于北平。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二十余年矣，可曾见有人为他的首领拚命？将来的狂热的扮别的伟人者，什九正是现在的扮 Herr Hitler 的人。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辈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之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

S 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我们自己也还有好青年，但不知在此世界，究竟可以剩下几个？我正在译童话，拟付《译文》，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呜呼！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八夜。

【评点】

三根，指顾颉刚。因其鼻红，故称其为朱山根，朱者红也，山根者鼻梁也，又由山根衍化为三根。鲁迅与顾颉刚共事两次，一次是1926年在厦门大学，一次是1927年在中山大学，鲁迅对他的意见，可参阅在厦门大学时写给许广平和章川岛的信，和在中山大学时写给章川岛等人的信。月，指新月派。鲁迅对新月派的批评文章有：《文学和出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

营植排挤，在中国其实并非个别人和个别社团之事，可以说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劣根性所致，所以这类现象是相当的普遍。其过程则正如鲁迅所说，先是排斥异己，继而施之同人，“所以当他统一之时，亦即倒败之始”。此种结局，别人也并非没有看到，而营植排挤之风始终不止，而且愈演愈烈者，盖社会结构使然也。中国长期处于宗法制度中，办事不靠真本事，而靠宗族势力，宗族势力所不及处，亦须打通各种社会关系，所以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斥打击异己力量，遂成为第一要事。而此种风气不改，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亦难矣。

鲁迅慨叹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由来已久。没有真正的党徒，是由于没有信仰之故；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所以在理论上多圆通的说法，如三教同源之类；在行动上，则无特操，投机取巧，随风转舵。投机取巧者唯利益是趋，所以革命

时行时，他比谁都激烈，而革命一受打击，他就投降变节，出卖同伴。当然，有朝一日，如果革命有利，他也许忽然又会激烈起来。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鲁迅深恶痛绝之。但因为这种人对于某一方面有用，所以又总是受到鼓励，于是也就绵延不绝。这不但是革命的不幸，而且是民族的不幸。

Herr Hitler, 德语：希特勒先生；仲方，即茅盾；S 君，指斯诺。

350109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昨复一函，想已达。顷得六日信，备悉种种。长于营植排挤者，必大嫉妒，如果不是他们的一伙，则虽闭门不问外事，也还是要遭嫉视的。阮大铖还会作《燕子笺》，而此辈则并无此种伎俩，退化之状，彰彰明矣。

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许君处已去函问，得复后，当即转达。许君人甚诚实，而缺机变，我看他现在所付以重任之人物，亦即将来翻脸不相识之敌人。大约将来非被彼辈所侵入，则亦当被排去，不过现在尚非其时耳。

南方当然不会不黑暗，但状态颇与北方不同。我不明教育界情形，至于文坛，则龌龊琐鄙，真足令人失笑。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杀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学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学家”，则似中国所独有也。脸皮之厚，世上无两，尚足与之理论乎。

顷见《文学季刊》，以为先生所揭士大夫与商人之争，真是洞见隐密，记得元人曲中，刺商人之貌为风雅之作，似尚多也，皆士人败后之扯淡耳。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九夜

【评点】

鲁迅对郑振铎的治学方法虽有意见，曾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予以批评，但对他的热心好学，却很肯定，因此，当郑振铎在北平受到排挤时，鲁迅很为他打抱不平，而且伸出援手，向时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老友许寿裳推荐，要求他请其教授文学。如果只看到鲁迅对郑振铎批评的一面，而看不到对他肯定、爱护和帮助的一面，就不能全面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及其交友之道。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见出真诚直率的鲁迅性格。

禁人作文之“文学家”，是指当了检查官的“文学家”。这些人原来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文学家”，投靠当局，当了检查官之后，就专门查禁别人的作品，所以成了禁人作文之“文学家”。这的确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乃书报检查制度的产物也。所以鲁迅斥之曰：“脸皮之厚，世上无两，尚足与之理论乎。”

350115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一日信昨收到；小包收据，今日亦已送来，明日当可取得，谢谢。

农兄病已愈，甚可喜，此后当可健康矣。霁兄来信，亦略言及。

此地文艺界前年至去年上半之情形，弟在后记中已言其大略。近更不行了，新书无可观者。拉甫列涅夫之一篇，已排入《译文》第五本中，被检查者抽去，此一本中，共被抽去四篇之多（删去一点者不算），稿遂不够，只得我们赶译补足。此为他们虐待异己法之一。使之疲于奔命，一也；使内无佳作，二也；使出版延期，因失读者信用，三也……这真是出版界之大厄，我看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但兄之译稿，仍可寄来，有便当随时探问，因为检查官对于出版者有私人之爱憎，所以此店不能出，彼店或能出的。或者索性加入更紧要之作，让我们来设法自行出版，因为现在官许之印本，必经检查，抽去紧要处，恰如无骨之人，毫无生气了。

这回《译文》中有一篇是讲德国一个小学堂，不肯挂希氏照相的，不准登；有一篇是十九世纪初之法人所作，内有说西班牙之多盗，是政府之故的，被删掉了。今之德国和昔之西班牙都不准提，还有什么可说呢？

近两年来，^弟作短文不少。去年的有六十篇，想在今年印出，而今年则不做了。一固由于无处可登，即登，亦不能畅所欲言，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我想玩他一年了。

此地至昨天始较冷，但室内亦尚有五十余度。寓中大小均安，请释念。此布，即请
冬安。

弟 豫 顿首一月十五夜。

【评点】

连今之德国和昔之西班牙都不准提，真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一个政权神经衰弱到如此地步，岂能久乎！至于一本《译文》，被检查者抽去四篇之多，而且连并无政治色彩的拉甫列涅夫的作品也不准发表，则是有意的刁难，目的是拖垮《译文》。这也是中国特色，正如鲁迅所说的：“这真是出版界之大厄，我看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但这些事，在文化史上却少有记载，如果不读鲁迅书信，是很难了解到这种具体情况的。

“农兄病已愈”，系隐语，指台静农被捕后已获释；“后记”，指《准风月谈·后记》，文中记述了本书写作期间上海文艺界的风云变幻。

350117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十七日信当日到。官威莫测，即使无论如何圆通，也难办的，因为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我说中国人非中庸者，亦因见此等事太多之故。

《蹇安五记》见赠，谢谢。但纸用仿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七晚。

致徐先生一笺，乞便中转交为感。 又及。

【评点】

信中所说：“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此语极妙，道出了中国人好走

极端，不知适可而止的特点。中国的事，有很多都是由此而走向反面的，但却又总是不能吸取教训，实在也很可悲。孔子提倡中庸，儒者于是好谈中庸，人们遂以为中国人是奉行中庸之道的，其实不然。正如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文中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此种逆推理的方法对人很有启示作用。当然，这不仅是逻辑问题，而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所以鲁迅说：“我说中国人非中庸者，亦因见此等事太多之故。”

350126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二日信，顷已收到。红枣早取来，煮粥，做糕，已经吃得不少了，还分给舍弟。南边也有红枣买，不知是从那里运来的，但肉很薄，没有兄寄给我的好。

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我们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钱，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而且不给看的还不止我一个，我恐怕三兄那里也未必会寄去。所以我现在避开一点，且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说。

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兄原稿未取来，但可以取来，因为杂志是用排印了的稿子送检的。我的原稿之被扣，系在一种画报上，故和一般之杂志稍不同。译本抄成后，仍希寄来，当随时设法。我的那一本，是几个书店小伙计私印的，现一千本已将卖完，不会折本。这样的还有一本，并杂文（稍长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至于新作，现在可是难了，较好的简直无处发表，但若做得吞吞吐吐，自己又觉无聊。这样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残到什么也没有的。

木刻除了冈氏、克氏两个人的之外，什么也没有。寄《引玉集》

是去年秋天,此后并不得一封回信;去年正月,我曾寄中国古书三包,内多图画,并一信(它兄写的)与 V,请他公之那边的木刻家,也至今并无一句回信,我疑心 V 是有点官派的。

捷克的一种德文报上,有《引玉集》介绍,里面说,去世的是 Aleksejev。他还有《城与年》二十余幅在我这里未印,今年想并克氏、冈氏的都印它出来。但如有那小说的一篇大略,约二千字,就更好,兄不知能为一作否?冈氏的是伊凡诺夫短篇的插图,我只知道有二幅是《孩子》,兄译过的,此外如将题目描上,兄也许有的曾经读过。

《木刻纪程》如果找不到,那只好拉倒了。

这里天气并不算冷,只有时结一点薄冰。我们都好的,但我总觉得力气不如从前了,记性也坏起来,很想玩他一年半载,不过大抵是不能够的,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饭问题而已。因为查作品,看了《豫报副刊》,在里面发见了兄的著作,兄自己恐怕倒已忘记了罢。

农已回平,甚可喜,但不知他饭碗尚存否?这也是紧要的。

专此布达,即请

冬安。

弟 豫 顿首 一月廿六日

嫂夫人前均此问候不另。

【评点】

这里所说的“出过一种刊物”,是指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油印刊物《文学生活》半月刊,1934年1月创刊,但仅见一期。左联

秘书处出的刊物，却不给左联盟主看，这说明盟中有盟，鲁迅是被他们所排挤的，或者说，鲁迅只是被他们作为一面旗帜来使用，而并不当作自己人来看待，因此也才会有匿名加以攻击的事。鲁迅是极其敏感的人，此种情况自然不会没有觉察，也不会没有反应。上信所说：“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本信所说：“所以我现在避开一点，且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说”，这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可见左联的内部分歧并不从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鲁迅对于“四条汉子”的意见也由来已久。而左联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对鲁迅只是加以利用，并不尊重，不但排斥，甚至还要从背后放冷枪，这就是造成矛盾的原因。

对于那些“穿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进行书报检查而造成的“倒运”，鲁迅在前一天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有更精彩的描述：“检查官中颇有些摩登女郎，彼女流辈（试用明治时代的写法），对我的文章看不懂就动手，删得叫人不舒服。高明的勇士，一刀便击中要害，置敌于死地，然彼女流辈手持小刀，对着背上或屁股的皮肤乱刺，流着血，样子也难看，但被刺者不易于倒下，虽不倒下，总使人厌恶难受。”

鲁迅如此腹背受敌，需横站着战斗，自然分外吃力，难以持久了。

350129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收到二十七日惠函；承寄《发掘》一本，亦早收到，在忙懒中，致未早复，甚歉，见著者时，尚希转达谢忱为幸。

《集外集》既送审查，被删本意中事，但开封事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而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却亦不可解，其实有几首是颇为“不妥”的。至于引言被删，则易了然，盖他们不许有人为我作序或我为人作序而已。颠倒书名，则以显其权威，此亦叭儿脾气，并不足异。

尤奇的是今年我有两篇小文，一论脸谱并非象征，一记娘姨吵架，与国政世变，毫不相关，但皆不准登载。又为《文学》作一文，计七千字，谈明末事，竟被删去五分之四（此文当在二月号刊出）；我乃续作一文，谈清朝之禁汉人著作，这回他们自己不删了，只令生活书局中人动手删削，但所存较多（大约三月号可刊出）。这一点责任，也不肯负，可谓全无骨气，实不及叭儿之尚能露脸狂吠也。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昇平耳。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 锦注者也。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一月廿九夜

【评点】

《集外集》出版时，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删去十篇文章，除杨霁云的“编者引言”外，鲁迅的文章计有九篇：《来信（致孙伏园）》、《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上海所感》，这九篇文章，后均收入《集外集拾遗》。前面两篇，是揭发1925年4月在开封铁塔发生的兵士强奸女学生事件。1925年还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与此时的统治者国民党无关，而仍犯忌，所以鲁迅说：“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所谓“颠倒书名”者，即将原送审书名《鲁迅：集外集》改为《集外集：鲁迅著》，这除了“显其权威”外，也别无解释了。

“论脸谱非象征”文，系《脸谱臆测》，“记娘姨吵架”文，指《阿金》，均被抽下，不能发表。“谈明末事，竟被删去五分之四”者，指《病后杂谈》，“续作一文”，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网之严，而鲁迅要自行印刷杂文集，将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加以揭露，也可见他反抗之激烈。

350129 致萧军、萧红

萧、吟两兄：

二十及二十四日信都收到了。运动原是很好的，但这是我在少年时候的事，现在怕难了。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然而自从升为“先生”以来，就再没有工夫干这些事，二十年前曾经试了一试，不过架式还在，不至于掉下去，或拔住马鬃而已。现在如果试起来，大约会跌死也难说了。

而且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没有规则，而一有规则，即于译作有害，这是很难两全的。还有二层，一是琐事太多，忽而管家务，忽而陪同乡，忽而印书，忽而讨版税；二是著作太杂，忽而做序文，忽而作评论，忽而译外国文。脑子就永是乱七八糟，我恐怕不放笔，就无药可救。

所谓“还有一篇”，是指萧兄的一篇，但后来方法变换了，先都交给《文学》，看他们要那一篇，然后再将退回的向别处设法。但至今尚无回信。吟太太的小说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

便搁下了。

您们所要的书,我都没有。《零露集》如果可以寄来,我是想看一看的。

《滑稽故事》容易办,大约会有书店肯印。至于《前夜》,那是没法想的,《熔铁炉》中国并无译本,好像别国也无译本,我曾见良士果短篇的日译本,此人的文章似乎不大容易译。您的朋友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出版否很难豫定,不可用“空城计”。因为一个人遇了几回空城计后,就会灰心,或者从此怀疑朋友的。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象蝨蝨了,那就会有蝨蝨样的文章。

此复,即请

俚安。

豫上 一月廿九夜。

【评点】

前面所谈,大抵是个人生活,但可以见出鲁迅的心情和习惯。学会骑马,是他在南京读书时的事,他从水师学堂转入矿路学堂,这矿路学堂是附设于江南陆师学堂的,所以与马有缘。而且少年意气,骑马疾驰更是神采飞扬。但后来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鲁迅曾经说过,他受到《韩非》和《庄子》的影响,有时峻急,有时随便,这里所说:“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大概就是峻急的表现。这种峻急作风,自然有害于身体,但却有利于译作。如果松松垮垮,那么一年就写不了几

篇文章,这是很矛盾的。

后面所说:“您的朋友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出版否很难豫定,不可用‘空城计’”,讲的是交友之道,也是对人的态度。这就是说,对朋友的事,一面要热情帮忙,一面要告以实际情况,不能乱拍胸脯夸大口。这里所谓不可用“空城计”者,即俗语所说不要给别人吃“空心汤团”之意。

350204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收到二月二日大札。《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

文字请此辈去检查，本是犯不上的事情，但商店为营业起见，也不能深责，只好一面听其检查，不如意，则自行重印耳。《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

被删去五分之四的，即《病后杂谈》，文学社因为只存一头，遂不登，但我不以悬头为耻的，即去要求登载，现已在二月号《文学》上登出来了。后来又做了一篇，系讲清初删禁中国人文章的事情，其手段大抵和现在相同。这回审查诸公，却自己不删削了，加了许多记号，要作者或编辑改定，我即删了一点，仍不满足，不说抽去，也不说可登，吞吞吐吐，可笑之至。终于由徐伯_诤〔昕〕手执铅笔，照官意改正，总算通过了，大约三月号之《文学》上可以登出来。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俟此文发

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了。

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想先生当亦以为然的。专此布复，并颂
新禧。

迅 启上 二月四夜

【评点】

检查官们既要删改别人的文章，却又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编辑和作者自己动手来改，这实在太没有骨气，很使鲁迅看不起。而且还要将与国民党统治无关的文章抽掉，而对几首颇有“不妥”之处的旧诗，却一首也未删，说明这些检查官水平很低，毫无眼力，所以被讥为“呆鸟”。被这些“呆鸟”宰割，当然是很不舒服的，鲁迅决定将这些被删、被抽的文章收入自印的杂文集中，并作后记加以揭露。这篇后记，就是《且介亭杂文·附记》。

新年，在中国一向是很重要的节日，但鲁迅并不重视，他认为这种时序的变化本无什么意思，只不过可借此总结一下工作而已，所以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这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鲁迅却偏要过旧历年了，说是“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反抗吧。

350204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先生十二月九日的信和两本木刻集，是早经收到了的，但因为接连的生病，没有能够早日奉复，真是抱歉得很。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集》和《罗浮集》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罢。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得新颖，却难于更加伟大，因为一方面也被题材所限制了。彩色木刻也是好的，但在中国，大约难以发达，因为没有鉴赏者。

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这就到了先生所说的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

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四夜。

【评点】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的通信中，多次谈到技巧和题材问题，因为在当时，这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文艺论争的焦点。革命文学家强调内容而轻视技巧，但是没有技巧，怎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呢；他们又强调要写革命斗争的题材，但如果自己不在这革命斗争的旋涡中，又怎能写得真切？其结果，是导致革命文艺作品水平的低落。鲁迅从实际出发，则一向重视艺术技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求内容的充实；他强调艺术家要写自己经验过的生活，表现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状态，同时也认为他们应该了解书斋外面的社会。这是辩证的观点。鲁迅在书信中曾多次发表此种见解，而在这封信里，则表达得更为全面。在当时，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艺术见解。

350206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一月卅日手书拜读。木实女士的杰作，决非“一笑的东西”。它已脱离从头上长出四根棍以当手脚的境界，成为颇写实的東西。脸的画法也端正。中国美人画已经去找了，我的字写好后一并寄上。

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

白话信读过了。多处是日本式的句子，但大抵可以看懂，只有两三句还费解。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尚未成形，外国人自然不容易写的。我对吴君不大熟悉，但从他的回信所发的议论看来，我以为此人是颇不足道的。第一，我不赞成“幽默是城市的”的说法，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小市民还要多。第二，把日本的切腹、投水等看做幽默，不知是何道理？严肃地观察或描写一种事物，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将眼光放在狭窄的范围内，那就不好了。第三，俄国文学没有幽默，这与事实相反。即在目前也有幽默作家。吴君好像是自满的，如果那样，就停留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地位了。依我看，同他通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最近，红军进入此君的故乡（安徽），据说他家的人逃到上海来了。

《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昨日立春，初次下雪，但随即融化。我为糊口，应某书店之托，编选别人的小说，三月中旬左右可成。去年年底出版了一册短评集，已别封寄上一册。今年还有两册材料（都是去年写的），看来至少还可以出两本。

洛文 上 二月六夜

增田兄炉下

【评点】

鲁迅对于幽默并未作过系统的论述，但在杂文和书信中，却时有涉及，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见解。这里对于吴组缃幽默论的批评，就很可注意。其实，信中对于海婴的调侃，就很富有幽默感。

郭君，指郭沫若。他针对增田涉《鲁迅传》中涉及创造社的文字，在《台湾文艺》1935年2月号上发表了《〈鲁迅传〉中的误谬》一文，而在这之前，他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创造社的批评，就写了一本《创造十年》来辩驳，所以鲁迅说：“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35020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种刊物，原是我们自己出版的，名《文学生活》，原是每人各赠一本，但这回印出来，却或赠或不赠，店里自然没有买，我也没有得到。我看以后是不印的了，因为有人以文字抗议那批评，倘续出，即非登此抗议不可，惟一的方法是不再出版——到处是用手段。

《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板。但这书我不想看，可不必寄来。今年我还想印杂文两本，都是去年做的，今年大约不能写的这么多了，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城与年》的概略，是说明内容（书中事迹）的，拟用在木刻之前，使读者对于木刻插画更加了解。木刻画想在四五月间付印，在五月以前写好，就好了。

农兄如位置还在，为什么不回去教书呢？我想去年的事情，至今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大约不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虽然不明详情）。如果另找事情，即又换一新环境，又遇一批新的抢饭碗的人，不是更麻烦吗？碑帖单子已将留下的圈出，共十种，今将原单寄回。又霁兄也曾寄来拓片一次，留下一种，即“汉画像残石”四幅，

价四元，这单子上没有。

这里的出版，一塌糊涂，有些“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简直是胡闹。去年年底，有一个朋友收集我的旧文字，在印出的集子里所遗漏或删除的，钞了一本，名《集外集》，送去审查。结果有十篇不准印。最奇怪的是其中几篇系十年前的通信，那时不但并无现在之“国民政府”，而且文字和政治也毫不相关。但有几首颇激烈的旧诗，他们却并不删去。

现在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连插画也常被抽去；连现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此外古怪事情还多。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三月间可完工。至于介绍文学和美术，我仍照旧的做。

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我们大家都好的。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 豫 上 二月七日

【评点】

说鲁迅的短评是买办意识的,指廖沫沙以林默笔名发表的文章《论“花边文学”》;指责鲁迅为调和派的,是田汉化名绍伯发表的文章《调和》。对于这两篇文章,鲁迅都曾撰文加以驳斥,而且在别的书信中也谈过绍伯的事,现在又将这些事集中在一起谈,则因为此类事遇得多了,使他很不舒服,再加上《文学生活》事件,使他“实在忍耐不住了”。积愤太多,难免就要爆发,也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可见 1936 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表,决非偶然。

350209 致萧军、萧红

刘军先生：
悄吟

来信早收到；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今天已将悄吟太太的那一篇寄给《太白》。余两篇让我想一想，择一个相宜的地方，文学社暂不能寄了，因为先前的两篇，我就寄给他们的，现在还没有回信。

至于你要给《火炬》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登不出来的，不如暂留在我处，看有无什么机会发表；不过即使发表，我恐怕中国人也很难看见的。虽然隔一道关，但情形也未必会两样。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是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平和的。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罢。

此请
俚安。

豫 上 二月九日

再：那两篇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因为在俄有一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动，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改什么呢？等来信照办。

又及

【评点】

徐树铮，亲日的北洋军阀。他的儿子徐道邻，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历任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职，也是个亲日派。他在1935年1月26—30日的《申报》上连载一篇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检讨的结果，决定日本是友，而不是敌。这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代表了政府当局的亲日主张，为其卖国投降政策张目的。所以鲁迅说他是“现代阔人的代言人”，而且讽刺道：“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即承认日本是自己的主人。鲁迅是位“过来人”，他见过袁世凯的卖国行径，知道袁世凯就是乘过年放假，大家不注意时，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又将“一二八”、“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取消，不也是一种征兆吗？而且鲁迅熟悉历史，他知道宋、明等朝代，在将要完结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将本国好的人物打扫干净，给新的主子可以毫不费力地进来。现在大力镇压抗日人物，摧残国内英才，不也是在为新主子清道吗？正因为鲁迅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所以他才能见微而知著，比别人更早看出问题来。

350224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二十二日信收到；十二日信并序稿，也早收到了。近因经济上的关系，在给一个书坊选一本短篇小说——别人的，时日迫促，以致终日匆匆，未能奉复，甚歉。《集外集》中重出之文，已即致函曹先生，托其删去，但未知尚来得及否。

我前次所举尹嘉铨的应禁书目，是钞《清代文字狱档》中之奏折的，大约后来又陆续的查出他种，所以自当以见于《禁毁书目》中者为完全。尹氏之拚命著书，其实不过想做一个道学家——至多是一个贤人，而皇帝竟与他如此过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约杀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学家自命，因而开罪于许多同僚，并且连对主子也多说话，致招厌恶，总也不无关系的。

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第九”不必读粤音，只要明白出典，盖指“八仙”之名次而言，一到第九，就不在班列之内了。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二月廿四夜。

【评点】

关于尹嘉铨事，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有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不但揭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情况，而且以此透视出想做名儒名臣的道学家的心态，和不愿朝中有名臣的自命为“英主”的帝王的心态。其中对于尹嘉铨被杀原因，分析得非常透彻。该文说：“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然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事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通过这一个案的分析，使读者能明白许多事理，知道各种人物的心态，知道有许多“尊崇”的对象是不许“学样”的，一学样，便有杀身之祸。明乎此，便可知为什么许多鲁迅弟子以及学习鲁迅的人纷纷落马的原因了。

350313 致萧军、萧红

刘军兄：
悄吟

十日信十三才收到，不知道怎的这么慢。你所发见的两点，我看是对的；至于说我的话可对呢，我决不定。使我自己说起来，我大约是“姑息”的一方面，但我知道若在战斗的时候，非常有害，所以应该改正。不过这和“判断力”大有关系，力强，所做便不错，力一弱，即容易陷于怀疑，什么也不能做了。“父爱”也一样的，倘不加判断，一味从严，也可以冤死了好子弟。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约还看不出江苏和浙江人的不同来，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人的。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

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好在现在已经认识几个人了，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

《八月》我还没有看，要到二十边，一定有工夫来看了。近来还是为了许多琐事，加以小说选好，又弄翻译。《死魂灵》很难译，我轻率的答应了下来，每天译不多，又非如期交卷不可，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幸而明天可完了，只有二万字，却足足化了十二天。

虽是江南，雪水也应该融流的，但不知怎的，去年竟没有下雪，这也并不是常有的事。许是去年阴历年底就想来的，因寓中走不开而止。现在孩子更捣乱了，本月内母亲又要到上海，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么办呢？

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寄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

专此布复，并请
俚安。

豫 上 三月十三夜。

【评点】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过：“籍贯之都鄙，固不能

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同时，他又写过一篇《北人与南人》，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需要克服缺点，相师优点才好。所以相书上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认为，“这并不是妄语”。在这封信中他又说：“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这是因为他与上海文人打了多年的交道，很讨厌他们的扭扭捏捏，曲曲折折之故。所以叫萧军不要故意改掉“野气”，也就是要他保存北人的优点，以补南人之不足也。至于引《三国志演义》许褚之例，而反对赤膊上阵者，则是他一贯主张壕堑战思想的表现。二萧初到上海，不知此地人事的复杂性，故鲁迅多所叮咛。这些地方，也表现出鲁迅对于青年真诚的爱护。

350319 致 萧 军

萧军兄：

十八日信收到。那一篇译稿，是很流畅的，不过这故事先就是流畅的故事，不及上一回的那篇沉闷。那一篇我已经寄给《译文》了。

这回孩子给沸水烫伤，其实倒是太阔气了的缘故，并非没有人管，是有人而不管他。寓里原有一个管领他的老妈子，她这几天因为要去求神拜佛，访友探亲，便找了一个替工。那天是她们俩都在的，不过她以为有替工在，替工以为有她在，就两个都不管，任凭孩子奔进厨房去捣乱，弄伤了脚。孩子也太淘气，一不留意，他就乱钻，跑得很快，人家有时也实在追不上。痛一下子也好，我实在看得麻烦极了，痛的经验是应该有一点的，但我立刻给敷了药，恐怕也不怎么痛，现在肿已退，再有十天总可以走得路，只要好后没有疤痕，我的责任算是尽了。

这孩子也不受委屈，虽然还没有发明“屁股温冰法”（上海也无冰可温），但不肯吃饭之类的消极抵抗法，却已经有了的。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准风月谈》已经卖完了，再版三四天内可以印好；《集外集》我

还没有见过，大约还未出版罢，等我都有了，当通知你，并《南腔北调集》一并交付。先前还有一本《伪自由书》，您可有吗？

这几天在给《译文》译东西，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因为静不下，就更不能写东西，至多，只好译一点什么，我的今年，大约也要成为“翻译年”的了。

专此布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三月十九夜

【评点】

鲁迅在 1918 年写过一篇批判父权思想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有句名言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从幼者本位的立场出发，说明做父亲的责任。他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的。所以海婴活泼开放，敢于捣乱，有时闹得鲁迅不能静心读书写作，他当然也嫌烦，在与母亲和友人的通信中，每有烦言，甚至说：已宣布以敌人视之矣；又说：希望他快长到二十岁，可以跟着爱人跑掉。其实，这正是爱得很深的表现。对于海婴，鲁迅特别能忍耐，所以在这里自我调侃道：“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古有《二十四孝图》，是表彰二十四位孝子的，“二十五孝”者，即二十四位孝子之外又加上一位孝子也。

35032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九日来信收到。我们都好的，但想起来，的确久不寄信了，惟一的原因是忙。从一月起，给一个书坊选一本小说，连序于二月十五交卷，接着是译《死灵》，到上月底，译了两章，这书很难译，弄得一身大汗，恐怕还是出力不讨好。这是为生计，然而钱却至今一个也不到手，不过我还有准备，不要紧的，请勿念。其次，是孩子大了起来，会闹了；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介绍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一口气，睡觉。但同人里，仍然有些婆婆妈妈，有些青年则写信骂我，说我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其实是照现在的情形，大约体力也就不能持久的了，况且还要用鞭子抽我不止，惟一的结果，只有倒毙。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

寄 E 的信，还来不及起稿子，过几天罢。蕻的信我没有收到，当直接通知他。插画本《死灵》，如不费事，望借我看一看。

今天托书店寄出杂志一包，是寄学校的。还有几本，日后再寄。

专此布复，并颂

春绥。

弟 豫 上 三月二十三日

【评点】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当时的生活情况。无论家里和外面,杂事都很多,简直是琐事猬集。而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终日做苦工,如此下去,体力是不能持久的。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同人还要指责他“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而且在后面用鞭子抽打不止,所以他愤怒了。后来公开指责这些以鸣鞭为职业者,也是势所必然。

350409 致山本初枝

[译 文]

拜启：四月一日惠函已拜读。日前承赐珍品多种，谢谢。因为忙而懒，吃了有平糖，也未致谢，希谅。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增田一世到东京后，曾有信来。《中国文学》月报第二号上已登出他讲演的预告，想来是大为活跃。然而文章卖不出去，也委实困难。在中国也如此。现在好像到处都不是文章的时代。上海的几个所谓“文学家”，出卖了灵魂，每月也只能拿到六十元，似乎是萝卜或鲰鱼的价钱。我仍在写作，但大多不能付印。无聊的东西倒允许出版，但自己都觉得讨厌。因此，今年大抵只做翻译工作。

鲁迅 上 四月九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评点】

美,并不是纯客观的东西,审美,更带着审美主体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对于自然美的欣赏,也并不例外。龙华的桃花虽美,但那里有残杀革命者的警备司令部,也就大杀风景了。鲁迅因为有几个朋友被杀害在那里,所以他是决不去欣赏桃花的。这里不经意的几笔,为审美分析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350409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三月卅日惠函收到。前几天曾寄上《小品文与漫画》一册，其中有吴组缃君的短文，这次态度好了。

我忘记已寄过《文学季刊》第四期到惠县村，就请将后寄的送给别人罢。其中郑君的论文，有关元代商人与士大夫在妓院竞争的记载，很有意思。

中国、日本之外，还有西洋学者对《四库全书》如此珍视，实为不解。这次所记述的，只是一鳞半爪，如再详细研究，还可以发现很多不妥之处。并且还有取舍的不公，清初反满派的文集被舍弃，可以说是由于清朝之故，但是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品也大受排斥，其实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

《文学》三月号刊出的拙作，也大被删削。现在国民党的做法，实在与满清时大致相同，也许当时满洲人的这种作法，也是汉人教的。自从去年六月以来，对出版物的压迫步步加紧，出版社大感困难。对于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压迫特别厉害，常常把有关紧要之处全部删除，只留下空壳。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倘对此种情形没有仔细了解，就不免很隔膜了。就是说，我们都是带着锁链在跳舞的。

但我最近在收集去年所写的杂文，拟将被删削的，被禁止的，

全补加进去，另行出版。

《十竹斋笺谱》第一册，日内将出版，只印了两百部，等北平送来后当即奉寄。其他三册如何，现尚不得而知。《北平笺谱》已成珍本，只有内山老板处大概还有五部出售。

今后打算用珂罗版复制的，有陈老莲《博古牌子》（用于酒令的）和明刻宋人《耕织图》。

洛文 上 四月九日

增田学兄几下

【评点】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大型文库，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 3 503 种，历时 10 年而成。编纂这部文库，既是乾隆好大喜功的表现，也是文化统制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集中了许多文人于四库馆中，抄录书籍，以免他们在外生事；另一方面则将“违碍”、“犯上”的字样加以篡改、删除，使之符合“圣意”。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大厄，但却为中外文人所珍视，所以鲁迅说：“实为不解”。他在《买〈小学大全〉记》及《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中对其篡改情况有所揭露。

35041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三日八日的信，都已收到；《芒种》三期也读过了，我觉得这回比第二期活泼些。广收外稿，可以打破单调，是很好的，但看稿却是苦事，有些也许要动笔校改一点，那么，仍得有许多工夫化费在那上面，于编者是有损的。

那一篇文章，因为不能一直写下去，又难以逞心而谈，真弄得虎头蛇尾，开初原想大发议论，但几天以后，竟急急的结束了。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眈机想把它塞起来。

《集外集》二校还没有到，但我想可以不必等我看过去，这才打纸板了，还是快点印出的好，否则，邮件往来，又是许多日子。我在再版《引玉集》，因为重排序文，往往来来，从去年底到现在，才算办妥，足足四个月。一个人活五六十岁，在中国实在做不出什么事来（但，英雄除外），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

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陈先生的漫画，望寄给我。他日印杂感集时，也许可以把它印出来，所流转的四个编辑室，并希见示为幸。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上 四月十日

【评点】

“那一篇文章”，指《从“别字”说开去》。该文从写别字问题说起，着重批判了保守的维持现状说，而指出文化改革之必不可免。所谓“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者，是指陈友琴在《活字与死字》中所引的何仲英《中国文字学大纲》中的论点，该书认为：“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而“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鲁迅认为，这种维持现状说虽然在任何时候都有，但“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的，“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鲁迅并不是在为写别字辩护，而是认为，古人今人都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所以他主张必须从根本上改革这方块字。鲁迅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

黑屋子开窗与掀屋顶的比喻，曾见于1927年2月16日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无声的中国》，那是为了说明，五四时期白

话文之所以得以通行，是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如果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是连平和的主张也不肯行的。但实际上，连这一点成功也不能持久，因为这些老先生们在折中之后，虽然也允许开一个窗，“但总在司机把它塞起来”。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胜利的，但不久就要复古，当时的提倡尊孔读经和学习文言，就是这种塞窗行动。鲁迅再次提出这个比喻，盖有感而发也。

对于书籍的出版，鲁迅一向校勘得很仔细，有时看过三校还不放心，要求再看第四校。而这次对于《集外集》，二校还没有看，就催着快点打纸型，快点印出，是否自感体力不济，老境迫人，赶紧抢时间多做些事呢？当然，讲究办事效率是鲁迅的一贯思想，他最讨厌中国人的拖拉作风，一点小事就能拖几个月，一辈子实在做不出什么事来。所以他讽刺道：“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陈先生，指陈光宗。他在1934年秋天画了一张鲁迅漫画像，曾由胡今虚寄给《文学》、《太白》、《漫画与生活》和《芒种》，均被书报检查机关所禁用。鲁迅为了对抗此举，想把它印入自己的杂感集，后未果。

350412 致 萧 军

刘军兄：

七日信早到；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

《二心集》中的那一篇，是针对那时的弊病而发的，但这些老病，现在并没有好，而且我有时还觉得加重了。现在是连说这些话的意思，我也没有了，真是倒退得可以。

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金人译的左士陈阔的小短篇，打听了几处，似乎不大欢迎，那么，我前一信说的可以出一本书，怕是不成的了，望通知他。这回我想把那一篇 Novikov-Priboi 的短篇寄到《译文》去。

《搭客》及《樱花》上，都有署名的。《搭客》不知如何；《樱花》已送检查，且经通过，不便改了，以后的投稿再用新名罢。听说《樱花》后面，也许附几句对于李的答复。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

前信说张君要和您谈谈，我想是很好的，他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我和他很熟识。

此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四月十二夜

【评点】

“《二心集》中的那一篇”，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这个演讲里，鲁迅尖锐地批评了左翼作家脱离实际的作风和其他种种弊端，认为不了解实际情况，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虽然后来许多事情都不幸而言中，但左联中人却一直都没有重视鲁迅的意见。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初，能够提出这些中肯的意见，说明他虽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还对他们存在着希望，而现在是连说这些话的意思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些人已不存在什么希望了。

“原稿的境遇”，指二萧在拉都路上发现鲁迅翻译《表》一书的原稿被一家商店用来包油条。二萧对此很感不平，所以写信告诉鲁迅，许广平知道后感到悲哀，但鲁迅却无所谓，甚至还感到满足。因为他一向并不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对自己的原稿也不很珍惜，觉得能用来包油条，也还算有些用处，他自己是用原稿纸来擦桌子的。这也可见鲁迅总是抱着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事情，与有些人还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就以大师自居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关于此事，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原稿，在

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按：据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中回忆，应是翻译《表》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左士陈阔，通译左琴科；Novikov-Priboi 的短篇，即诺维柯夫—普里波依的《退伍》；李，指李三郎；张，指张光人，即胡风。

350423 致萧军、萧红

刘军兄：
悄吟

十六日信早收到。今年北四川路是流行感冒特别的多，从星期以来，寓中不病的只有许一个人了，但她今天说没有气力；我最先病，但也最先好，今天是同平常一样了。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您的朋友既入大学，必是智识分子，那他一定有道理，如“情面说”之类。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

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樱花》闻已蒙检查老爷通过，署名不能改了。前天看见《太白》广告，有两篇一同发表，不知道去拿了稿费没有？

《集外集》好像还没有出。

勿复并颂

俚祉。

豫 上。〔四月二十三日〕

近来北四川路邮局有了一个认识我的笔迹的人，凡有寄出书籍，倘是我写封面的，他就特别拆开来看，弄得一塌糊涂，但对于信札，好像还不这还[样]。呜呼，人面的狗，何其多乎！？

又及。

【评点】

对于“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的知识分子，鲁迅早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中，就有所揭露。而这篇文章，就收在他自认为写得比较锋利的《二心集》中。鲁迅将这类人比作白蚁，说他们“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的确概括出了这类人的本质。

鲁迅又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这是他近年来切身的感受。虽然他没有灰心，仍旧勇敢地战斗，但毕竟在情绪上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情绪，在写文章时虽有所克制，而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则常有坦陈。明白鲁迅此种心情，就能较确切地理解他晚年的文章和行事。

350428 致 萧 军

刘军兄：

廿六日信收到。许总算没有生病。孩子还有点咳，脚是全好了，不过皮色有点不同，但这没有关系。我已可以说是全好，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但不知能登出否？月内此外还欠两篇文债，我看是来不及还清的了，有范围，有定期的文章，做起来真令人叫苦，兴味也没有，做也做不好。

文学社寄来稿费单一张，今仍代印寄上，印书的钱，大约可以不必另外张罗了罢。

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现在也有人在必要时，说我“好起来了”，但这是谣言，我倒坏了些了。

再谈。此请
双安。

豫 上 四月廿八夜。

【评点】

“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指为日本《改造》月刊做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指1932年为《文学月刊》写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后者针对《文学月刊》上发表的芸生所写的辱骂“自由人”胡秋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而不能辱骂和恐吓。这其实是对于“左”倾机会主义文风的批评，却不能为“左”倾的青年们所接受，在次年出版的《现代文化》一卷二期上就发表了署名首甲（祝秀铤）、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指责鲁迅的文章具有“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这是两种思想的交锋，而对方手段卑劣，措辞激烈，乱扣帽子，鲁迅自然很不高兴。再加上后来田汉和廖沫沙化名攻击的事，他就非常警惕了。

350514 致 台 静 农

青兄：

二日函收到了；上月之函，却未收到。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象确系贗品，似用砖翻刻，连簠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彩，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愷造象》，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

从这两包中，各选数种，目另列，其余的已于昨日寄回了。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为我自去冬罹西班牙性感冒之后，消化系受伤，从此几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场了。但似未必寿终在即，可请放心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顿首 五月十四夜。

第一包拓片留四种（内无目录及定价，姑随手举之，乞查付）——

- 一、骑马人画象（有树木）一张
- 二、大定四年造象一份二张
- 三、汉残画象一份四张

四、一人及一蛇画象一张

第二包拓片留两种——

一、汉鹿一份两张(五元五)

二、宜州画象(?)一份三张(一元五)

以上,共留六种。

【评点】

老境催人,确是可怕。鲁迅有丰富的金石学知识,长期收集画像拓片,准备整理付印,现在却要停止收集,暂作一结束了。这是因为他自知精神体力都不能支持,而且出版无望的缘故,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否则,凭鲁迅的眼力,和他所积累的资料,倘能选印出来,则无论是对中国的社会史、风俗史,或者是对中国的文化史、美术史的研究,都将是很大的贡献。鲁迅一向支持蔡元培的美育主张,但他不好作理论空谈,而是善于在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阐发出美学观点。绘画是一个方面,石刻又是一个方面。我们也只有通过这些具体的研究,才能探索出鲁迅的美学思想。

350517 致 胡 风

十五日信收到了。前天遇见玄先生,谈到你要译《草叶》的事,他说,为什么选这个呢?不如从英德文学里,选一部长的,只要有英日文对照看就好。我后来一想,《草叶》不但字数有限,而且诗这东西,译起来很容易出力不讨好,虽《草叶》并无韵。但刚才看了一下目录,英德文学里实无相宜的东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我看波兰的《火与剑》或《农民》,倒可以译的,后者有日译本,前者不知有无,英译本都有。看见郑时,当和他一谈,你以为怎样?

那消息是万分的确实,真是可惜得很。从此引伸开来,也许还有事,也许竟没有。

萧有信来,又催信了,可见“正确”的信,至今没有发。

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ゴ—コリ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其中虽无摩登名词(那时连电灯也没有),却有十八世纪的菜单,十八世纪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上田进的译本并不坏,但常有和德译本不同之处,细想起来,好像他错的居多,翻译真也不易。

看《申报》上所登的广告,批评家侍桁先生在论从日文重译之不可靠了,这是真的。但我曾经为他校对过从日本文译出的东西,

错处也不少，可见直接译亦往往不可靠了。

豫 上 五月十七夜

你有工夫约我一个日子谈谈闲天么？但最好是在二十三日之后。

【评点】

玄，指沈雁冰，因其曾用笔名玄珠，故称之。郑，指郑振铎，其时正在编辑《世界文库》。鲁迅为胡风谋划译作选题，正是为《世界文库》所用。从鲁迅给胡风和萧军、萧红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青年作家，是如何倾心地帮助。

“那消息”，指瞿秋白被捕的消息。5月14日致曹靖华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亦指此。当红军突围长征时，瞿秋白被留在江西，遂至被捕。他主持过共产党的工作，既然被捕，当然很难生还的了。但鲁迅还是努力筹款，设法营救。这在一些书信中也有所反映。但瞿秋白很快就在6月18日被杀害了，对此，鲁迅至为哀痛，在体弱多病之际，还集资将瞿秋白的译作编成《海上述林》两册，以为纪念。

萧，指萧三；“正确的信”，指“左联”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汇报工作的信。

ゴーコリ，日文：果戈理。关于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所遇到的困难，鲁迅在《题未定草》（一）里有所叙述。

350522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八信收到。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许君人甚老实，但他对于人之贤不肖，却不甚了然。李某卑鄙势利，弟深知之，不知何以授以重柄，但他对上司是别一种面目，亦不可知，故易为所欺也。许曾访我一次，未言钟点当有更动事，大约四五日后还当见面，当更嘱之。

弟一切如常，惟琐事太多，颇以为苦，所遇所闻，多非乐事，故心绪亦颇不舒服。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三弟来信一纸，附上，希转交。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 豫 上 五月二十二夜。

【评点】

瞿秋白不仅是个杰出的文化人，而且是政坛上的一个顶极人物。鲁迅虽然未必知道共产党内斗争的详情，但却不可能不知道瞿秋白在共产党内原有的地位和后来被排斥的情况，瞿秋白被捕，继而被害，鲁迅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慨叹在文化上的损失，却避而不谈政治问题，盖不愿介入党内纠纷也。鲁迅所看重瞿秋白的，也许正是他在文化上的才能，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鲁迅对于上海之所谓“文人”，深恶痛绝，说是“有些真是坏到出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致于此”，此甚可注意。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商品经济发展得较快，在文化上自然会带来新的气象，开放性较大，每能冲破传统的樊篱，但商人的投机习气也感染了文人，不但买空卖空，倾轧排挤，而且连人头也当作商品来买卖，实在是很可怕的事。历来评价海派文人，或则轻其浅陋，或则赞其开放，而少有全面评价其优劣者，今之历史研究者，更是多说好话，少揭问题，此岂能全面评价乎？故鲁迅书信和杂文中对于上海文人的揭露，切不可忽视也。

许君，指许寿裳；李某，即李季谷，原名李宗武。许寿裳是老好人，但老好人常失于知人之明，故重用卑鄙势利之徒也是常事，许多事情就这样办坏了。鲁迅于8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又曾提及李某云：“横肉可厌之至，前回许宅婚礼时，我在和一个人讲中国的Facisti，他就来更正道，有些是谣言。我因正色告诉他：我不过说的是听来的话，我非此道中人，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也很不快活。但此人的倾向，可见了。”

350522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十九夜信收到。译克雷洛夫之难，大约连郑公自己也不知道的，此公著作，别国似很少译本，我只见过日译三四篇。

《死魂灵》的插图，《世界文库》第一本已用 Taburin 作，不能改了，但此公只画到第六章为止，新近友人寄给我一套别人的插图，共十二幅，亦只画到第六章为止，不知何故。那一本插图多的，我想看一看，但不急，只要便中带给我，或放在文学社，托其转送就好了。

听说还有一种插图的大本，也有一二百幅，还是革命前出版，现在恐怕得不到了。

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画本。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廿二夜

通信处的底子失掉了，便中希再见示。

【评点】

鲁迅一向注意书籍的插图，因为插图能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书籍的审美价值。他小时候很想得到一本绘图的《山海经》，而却遍觅不得，后来长妈妈给他买到一部，他高兴得“全身体都震悚起来”，就连她踏死隐鼠的事也原谅了。直到晚年，他还收集插图，并出版过《梅斐尔德土敏土之图》和《死魂灵一百图》，可见其重视。我国书籍出版，一向有插图的传统，从《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到绘图本小说戏剧，都是图文并茂的，后来由于物质匮乏，出版因陋就简，插图的书也就少了。近来的出版业又复注意到插图了，这是好事，但所插之图，却以照片为多，而专为书籍绘制的插图很少，这大概由于艺术家对此还不够重视的缘故。其实，插图也是一门重要的艺术，艺术家是不应忽视的。

350610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三日惠函奉悉。《中国小说史》序文呈上,由于忙和懒,写得芜杂,祈大加斧正,使成佳作,面目一新。结尾部分,请将社长名字放进去。

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这种心情,在序言中也有所流露。

《译者的话》多蒙费心赞扬,不必再加改动,只有三处误植,已代为订正。

《孔夫子》也承夸奖,据说还有赞同的文章,闻之颇为安慰。《文学月报》还是不登好,为了它的安全。读它近来几期,觉得没有什么泼辣气。

《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罢。

在中国教授中郑振铎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但今年被燕京大学撵出来了,原因不明。尽管他近来多出版纯学术的著作,似乎仍不好。因为没有出版著作的教授们有气了。他正搜集古今中外(文学上的)古典著作,编为《世界文库》出版,每月一册。日内拟将一年的寄到惠昙村,其中有《金瓶梅词话》(连载),但已删

削所谓“猥亵”之处，据说否则不准出版。

上海禁止女人赤足。道学先生好像看见女人的光脚也会兴奋起来，如此敏感，诚可佩服。

《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不久前出版，当时拟即寄奉，因你寄来的某个信封上写着什么旅馆名字，就“彷徨”起来了。这次随即托老板寄到东京。其余三册，预计明春可成，但不知结果如何。

洛文 上 六月十日

增田兄几下

【评点】

在这封信里，鲁迅谈到自己生活烦忙而无趣的多种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晚年的心境。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豪华装帧，却使他感到欣慰。鲁迅说：“我喜欢豪华版”。这何尝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却是文化人对于精神产品的珍视和鲁迅本人对美的追求。鲁迅晚年收集、翻印版画，是烦忙生活中的一种调剂，是无趣生活中的一点情趣。信中对于郑振铎的评价，表明他对勤奋学术工作者的肯定。尽管他对郑振铎的研究方法颇有非议，但对其工作和学习的勤谨，还是赞赏的。

350616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五月廿四日信早收到；每次给我的《现代版画》，也都收到的。但这几年来，非病即忙，连回信也到今天才写，真是抱歉之至。

所说的北国的朋友对于木刻的意见和选刊的作品，我偶然也从日报副刊上看见过，但意见并不尽同。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分，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五六年前，在文学上曾有此类争论，现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

由上说推开来，我以为木刻是要手印本的。木刻的美，半在纸质和印法，这是一种，是母胎；由此制成锌版，或者简直直接镀铜，用于多数印刷，这又是一种，是苗裔。但后者的艺术价值，总和前

者不同。所以无论那里，油画的名作，虽有缩印的铜板，原画却仍是美术馆里的宝贝。自然，中国也许有再也没有手印的余裕的时候，不过这还不是目前，待那时再说。

不过就是锌板，也与印刷术有关，我看中国的制版术和印刷术，时常把原画变相到可悲的状态，时常使我连看也不敢看了。

“连环木刻”也并不一定能负普及的使命，现在所出的几种，大众是看不懂的。现在的木刻运动，因为观者有许多层——有智识者，有文盲——也须分许多种，首先决定这回的对象，是那一种人，然后来动手，这才有效。这与一幅或多幅无关。

《现代木刻》的缺点，我以为选得欠精，但这或者和出得太多有关系。还有，是题材的范围太狭。譬如静物，现在有些作家也反对的，但其实是那“物”就大可以变革。枪刀锄斧，都可以作静物刻，草根树皮，也可以作静物刻，则神采就和古之静物，大不相同了。

其次，是关于外国木刻的事。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即使来得及，也还是不行。因为我的住所不安定，书籍绘画，都放在别处，不能要取就取的。但存着可惜，我正在计画像《引玉集》似的翻印一下。前两月，曾将 K. Kollwitz 的板画（铜和石）二十余幅，寄到北平去复印，但将来的结果，不知如何。

我爱版画，但自己不是行家，所以对于理论，没有全盘的话好说。至于零星的意见，则大略如上。中国自然最需要刻人物或故事，但我看木刻成绩，这一门却最坏，这就因为蔑视技术，缺少基础工夫之故，这样下去，木刻的发展倒要受害的。

还有一层，《现代版画》中时有利用彩色纸的作品，我以为这是可暂而〔而〕不可常的，一常，要流于纤巧，因为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十六日

【评点】

自从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来,革命文学家们动辄指责别人的作品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而要求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思想意识是长期形成的,也只能逐步改变,强行改造的结果,往往造成虚假意识,表现在作品中,就成为假大空的东西,所以鲁迅说:“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创作需要真诚,只有作家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才能产生好作品。

革命文学家们又搬来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话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本来,就文艺作品一经写出,总要表现一定的思想这个意义上看,当然可以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有人要把它当作宣传工具来使用,亦无不可,但总要顾及它的艺术特点才行,而有些革命作家却在作品中塞进大量的标语、口号和政治概念,而不讲艺术性,那就不是文艺了。鲁迅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所以在当年就指出:“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现在木刻发展起来了,于是,有人又要将木刻来作为宣传工具,所谓“五六年前,在文学上曾有此类争论,现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即指此而言。从鲁迅强调“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的话来看,革命文学家和理论家们的思想,似乎毫无长进。而鲁迅则是极其注重木刻的艺术价值的,所以他推崇手印本,认为制成铅版大量印刷的木刻只是苗裔。而对于当时有些人所反对的静物画,也仍作肯定,他认为只需将所刻之“物”改变一下,就有新的意义了。

“关于外国木刻的事”,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听说鲁迅收藏有

大量外国版画，并举办过展览，想去上海参观；K. Kollwitz，即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鲁迅这时正编选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于1936年5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350624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四日信早到，近因忙于译书，所以今日才复。

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豫支过板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此地出板仍极困难，连译文也费事，中国是对内特别凶恶的。

E. 君信非由 VOKS 转。他的信头有地址，今抄在此纸后面。记得他有一个地址，还多几字，但现不在手头。兄看现在之地址如果不像会寄不到，就请代发，否则不如将信寄来，由我自发。

寄辰兄一笺并稿费单，乞便中转交。我们都好，勿念。

此祝

平安。

豫上 六月廿四日

【评点】

瞿秋白被捕后不久，终于在6月18日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此事虽在鲁迅意料之中，但消息传来，仍很愤慨。不过，鲁迅以为哭是无益的，而要有一分力尽一分力地做些实事，也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悠悠然，——这是中国人的老毛病了——，而要持久。所以鲁迅立刻着手编辑瞿秋白的遗文，并自己出资将他预支过版税的两本书赎回。这才是真正的友情，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350627 致 萧 军

刘军兄：

廿三信收到。昨天看见《新小说》的编辑者，他说，金人的译稿，已送去审查了。我想，这是不见得有问题的。悄太太的稿子，当于日内寄去。但那第三期，因为第一篇是我译的，不许登广告。

译文社的事，久不过问了。金人译稿的事，当于便中提及。

《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的，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

近来警告倒没有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戒了严，但真也吃力。

黑面包可以不必买给我们了。近地就要开一个白俄点心铺，倘要吃，容易买到了。

此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刚要发信，就收到廿五来信了。出刊物而终于不出的事情，我是看惯的了，并不为奇。所以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这是很坏的现象，但在目前，我以为总比说空话而一点不做好。

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萧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另外还有，不过笔名不同。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你说做小说的方法，那是可以的。刚才看《大连丸》，做得好的，但怕登不出去，《新生》因为“有碍邦交”被禁止了。我看你可以留起各种稿子，将来按时代——在家——入伍——出走——编一本集子，是很有意义的。

我并未为自己所写人物感动过。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也并不觉痛。

豫 又及 六，二七，下午

【评点】

对于瞿秋白的被害，鲁迅很是悲痛，所以他情不自禁地向萧军介绍起秋白的文学业绩来。“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鲁迅是多么痛惜这样一个难得的文才的毁灭啊！同时，他也指出，这是“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也就是为外国入侵者开道也。

国民党政府对外卑躬屈膝的嘴脸，还可以从《新生》事件中看出。所谓《新生》被禁事，指本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发表了易水（艾松寒）的《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裕仁，日本驻沪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为名，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

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一一允诺，查封了《新生》杂志，逮捕主编杜重远，并判1年零2个月的徒刑，同时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道歉，撤换市公安局局长，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对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评论道：“如此善政（按：指图书审查事），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350628 致 胡 风

来信收到。《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那时并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究竟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样的创作法（见《译文》），是只能创作他那样的创作的。曹的译笔固然力薄，但大约不至就根本的使它变成欠切实。看看德译本，虽然句子较为精练，大体上也还是差不多。

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坠，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翻译也非易事。上田进的译本，现在才知道错误不少，而且往往将一句译成几句，近于解释，这办法，不错尚可，一错，可令人看得生气了。我这回的译本，虽然也蹩脚，却可以比日译本好一点。但德文译者大约是犹太人，凡骂犹太人的地方，他总译得隐藏一点，可笑。

《静静的顿河》我看该是好的，虽然还未做完。日译本已有外村的，现上田的也要出版了。

检易嘉的一包稿子，有译出的高尔基《四十年》的四五页，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来信，有关于韩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韩不但会打破人的饭碗，也许会更做出更大的事业来的罢。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些人，

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猛又来逼我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译作，比请教“前辈”好得多。其实在《文学》上，这问题还是附带的，现在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此说如果发表，一定又有人来辩文学遗产和枪之不同的），我觉得实在可以说是打岔。我觉得现在以袭击敌人作为第一火，但此说似颇孤立。大约只要有几个人倒掉，文坛也统一了。

叶君曾以私事约我谈过几次，这回是以公事约我谈话了，已连来两信，尚未复，因为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也就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二集》出版了，便中当奉送一本。

此布，即请

夏安

豫 上 六月二十八日

此信是自己拆过的。 又及

【评点】

左勤克，通译左琴科。他的创作法，指他在《我怎样写作》一文中所说：“我有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方法是什么时候有了灵感，什

么时候我便以创作的冲动去写……第二种方法是当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便以技术的训练去写。”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只靠灵感和技术来写作，当然写不出大作品来。从鲁迅对《铁流》和左琴科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极其重视亲身的生活体验的。

易嘉，瞿秋白的笔名，鲁迅见物伤心也。

叶君，指叶紫；元帅，指周扬，时任左联党团书记。从这封信中，已经可以看出双方矛盾之深了。文学本是独立的工作，作家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但有些人总要以领导自居，自己躲在后面，指挥别人去战斗，所以鲁迅十分不满，称他为元帅。这也是体制使然，虽然个人也有相当的责任。

350629 致 赖 少 麒

少麒先生：

五月二八日的信早收到。文稿，并木刻七幅，后来也收到了。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另碎事，就是为此。

“连环图画”确能于大众有益，但首先要看是怎样的图画。也就是先要看定这画是给那一种人看的，而构图，刻法，因而不同。现在的木刻，还是对于智识者而作的居多，所以倘用这刻法于“连环图画”，一般的民众还是看不懂。

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从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所以我主张刻连环图画，要多采用旧画法。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那篇《刨烟工人》，写得也并不坏，只是太悲哀点，然而这是实际所有，也没法子。这几天我想转寄给良友公司的《新小说》，看能否登出，因为近来上海的官府检查，真是严厉之极。还有《失恋》及

《阿 Q 正传》各一幅，是寄给《文学》去了，倘检查官不认识墨水瓶上的是我的脸，那该是可以登出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二十九日。

再：附上给唐英伟先生的信，因为把他的通信地址遗失了，乞转寄为感。 又及

【评点】

鲁迅说不妨做做巨大建筑中的一木一石，就是提倡做平凡的人，做平常的事，这与那些以领导者自居，以天才或超人自居者完全不同，然而正因为如此，鲁迅却构筑起他的文学大厦。现在是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浮躁的时代，人们都想追求卓越，而不愿做泥土和木石，然而，没有泥土和木石，又怎么能建造起巨大的建筑来呢？

350629 致唐英伟

英伟先生：

六月一日信早收到，《青空集》也收到了。“先生”是现在的通称，和古代的“师”字不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但我看《青空集》的刻法，是需要懂一点木刻的人，看起来才有意思的，对于美术没有训练的人，他不会懂。先生既习中国画，不知中国旧木刻，为大众所看惯的刻法中，有可以采取的没有？

P. Ettinger 那里，我近已给他一封信，送纸的事，可以不必提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廿九日

【评点】

从那种无法解答的玄学问题中解脱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些有益的事,是鲁迅一贯的主张,否则就会永远陷入虚空之中。鲁迅最讨厌那些自己不做事,却用种种歪理去妨碍别人做事的人。他认为,只要对人类有益之事,只要能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就应该去做。这与同日致赖少麒信中所说的做做一木一石的意思,是相通的。

350801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八月二十二日惠函早已拜读。想来你现在已盘坐在黄元工房了，因此将此信径寄惠昙村。

所赠《中国小说史》尚未收到，但内山书店则收到五册。我先买一册来读。引用文中有原文、有注释，而且用了两种字体，校对想必是困难的，很感谢。我买的那一册，已经送给山本太太，否则她一定又要破费五元，那就抱歉了。今天到书店一看，书只剩一册，都是和我相熟的人买去的。其实是老板要他们买的，似乎在大做宣传。

读了正宗氏的短文，颇有同感。在这之前，还有乌丸求女的文章，朋友剪送给我，我转给你。但其中引用长与氏所写的“想进棺材去”云云，其实仅是我所说的一部分。当时我谈到中国有许多极好的材料都被糟蹋掉了。我说过这样的话：“例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棺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做法颇感惊奇，就想钻进去了。”然而那时候长与氏不知是正同别人谈着话，还是想着别的事情，只摘用我末尾的话，就断定“阴黯、阴黯”。假如突然就讲那样的话，那就实在太愚蠢，并不仅仅是什么“凶险，阴黯”的问题。总之，我和长与氏的会见，彼此都不

愉快。

《十竹斋笺谱》第二册，完成了一半左右，由于营业萧条，工人有暇之故，这书进行得较快。照此进行，明春可望全部完工。平冢处到时自当寄去。陈老莲《酒牌》正另用珂罗版复制中。对我们这件工作，颇有些攻击的人，说是何以不去为革命而死，却在干这种玩艺儿。但我们装做不知道，还是在做珂罗版的工作。

每月为《世界文库》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一次虽只三万字，但困难译，几乎要花三星期时间，弄得满身痱子。七月份稿子直到昨天才完成。

《文学》(一号)中“论坛”栏的《文坛三户》是拙作。还写了一篇《从帮忙到扯淡》，不许发表。所谓“扯淡”一词，实较难译。也就是没有可说而又强要说，既无帮闲的才能，又要做帮闲的事之类。

洛文 上 八月一夜

增田兄几下

【评点】

这里所说的作家或记者所写的采访记，很有代表性。或者采访时心不在焉，或者不能理解被采访者的思想和语意，或者本来自己就带有一个框框，结果是采访记离被采访者的原意甚远。鲁迅之不大肯接受采访，即与此有关。单是看采访记是不能全面了解一个作家的，要了解一个作家，还是要读他本人的作品。

350824 致 萧 军

刘先生：

廿二信并书一包，均收到。又曾寄《新小说》一本，内有金人译文一篇，不知收到否？寄给《文学》的稿子，来信说要登，但九月来不及，须待十月，只得听之。良友也有信来，今附上。悄吟太太的稿子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的并不算错，便中拟交胡，拿到《妇女生活》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

《死魂灵》作者的本领，确不差，不过究竟是旧作者，他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而这些议论，可真是难译，把我窘的汗流浹背。这回所据的是德译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错误一定不免，不过比起英译本的删节，日译本的错误更多来，也许好一点。至于《奥罗夫妇》的译者，还是一位名人，但他大约太用力于交际了，翻译就不大高明。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是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

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前一辈看后一辈，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对付。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但同在一处，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惯。意见不一样，没有好法子想。

又热起来，痄子也新生了，但没有先前厉害。孩子的幼稚园中，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所以还不十分混杂，其实也不过每天去关他四个钟头，好给我清静一下。不过我在担心，怕将来会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他现在还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是也许说出去的。

此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八月廿四日

【评点】

鲁迅生前，就有些人将他比作外国的大作家，如高尔基、契诃夫等，但鲁迅自己并不赞成，“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他在这里将自己与契诃夫作了比较，说契诃夫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作家，而自己则是封建社会的破落户子弟，不同的社会背景所孕育出来的作家是不一样的。这种社会学的比较，从大处着眼，显示出其深刻性。在这之前不久，鲁迅写过一篇《文坛三户》，也是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坛，认为中国文坛暂时还是被两大类子弟所占据，即“破落户”和“暴发户”，此外还有一种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的“破落暴发户”。这篇文章对于中国文坛剖析得很深刻，当然

也触怒了很多。但鲁迅不但无情地解剖别人，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是把自己也放在“破落户”之列的，这是就出身而论，必然会给他思想上留下烙印，但他思想较新，而且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这样，他就能开拓出文坛的新局面。

《奥罗夫妇》是高尔基的中篇小说，译者周筑，是周扬的笔名。

350911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前囑徐君持稿自行接洽，原以避从中的纠纷，不料仍有信来要求，今姑转上。

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商定，先印译文。现集稿大旨就绪，约已有六十至六十五万字，拟分二册，上册论文，除一二短篇外，均未发表过；下册则为诗，剧，小说之类，大多数已曾发表。草目附呈。

关于付印，最好是由我直接接洽，因为如此，则指挥格式及校对往返，便利得多。看原稿一遍，大约尚须时日，俟编定后，当约先生同去付稿，并商定校对办法，好否？又书系横行，恐怕排字费也得重行商定。

密斯杨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但他的写作，编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字数已有这许多，再加一本，既拖时日，又加经费，实不易办。我想仍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渐渐收集作品，俟译集售去若干，经济可以周转，再图其它可耳。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上 九月十一日

【评点】

这里所说的“集印遗文事”，就是为瞿秋白出版纪念集《海上述林》。沈雁冰和郑振铎都是瞿秋白的朋友，故一起商量编辑出版事宜，而主要由鲁迅主持。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记云：“秋白同志被俘之后，进步的朋友们已有这个愿望。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集合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就商议给他出书、传布，以教育人民，扩大革命影响。于是几个朋友商议集款，动手工作。关于从排字到打制纸版，归某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工作，则都由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

《海上述林》专收瞿秋白的文学翻译，并没有采纳瞿夫人杨之华“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的意见。鲁迅说：“他的写作，編集较难”，除了搜集材料较难以外，大概还顾及党内的路线纠纷。鲁迅是现实主义者，他只按当时可行的办法做事，并不求全，也不采纳理想的方案，否则，这部纪念集也就不能很快地出版了。

350912 致 胡 风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龟井的文章,立意的大部分是在给他们国内的人看的,当然不免有“借酒浇愁”的韵味。其实,我的有些主张,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在我们里面却似乎无人注意,这真不能不“感慨系之”。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投

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蒂，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而已。

我到过前清的皇宫，却未见过现任的皇宫，现在又没有了拜见之荣，残念残念。但其力ワリノ河清要请客了，那时谈罢。我们大约一定要做第二，第三……试试也好。《木屑》已算账，得钱十六元余，当于那时面交，残本只有三本了，望带二三十本来，我可以再交去发售。

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专此布达，即请“皇”安。

豫 上 九月十二日

【评点】

“三郎的事情”，指萧军参加左联事。鲁迅认为萧军现在不必进左联，是对萧军的爱护，也反映了他对左联有看法。左联成立之初，鲁迅的印象就不好，说是在成立会上一览皆茄花之色，后来对周扬等人的作为，更为反感。左联本是左翼作家团体，应该是养成作家，产生作品的地方，但事实是：“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原因何在呢？鲁迅接着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这是领导方式出了问题。以这种方式所运行的文学团体，怎么能养成好作家，产生好作品呢？

“龟井的文章”，指日本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发表在日本《作

品》杂志 1935 年 9 月号上的文章《鲁迅断想》；李“天才”，指李长之；“那一伙”，指“第三种人”；“现任的皇宫”，戏称胡风的住宅；残念，日语：遗憾；カワリノ，日语：幸而。

350920 致蔡斐君

斐君先生：

八月十一日信，顷已收到；前一回也收到的，因为我对于诗是外行，所以未能即复，后来就被别的杂事岔开，压下了。

现在也还是一样：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些什么。我以为随便乱谈，是很不好的。但这回所说的两个问题，我以为先生的主张，和我的意见并不两样，这些意见，也曾另另碎碎的发表过。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至于诗稿，却实在无法售去，这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无法解决。自己出版，本以为可以避开编辑和书店的束缚的了，但我试过好几回，无不失败。因为登广告还须付出钱去，而托人代售却收不回钱来，所以非有一宗大款子，准备化完，是没有法子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评点】

看来,诗歌的困境,在当时就出现了,不独于今为然。现代诗之不能流行,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存在问题。诗歌内容上的政治口号化,被当作宣传工具来使用,是它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但鲁迅也并不一概否定诗歌的政治性和宣传作用,而是说诗歌不要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口号也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入诗,而首先应该是诗才行。在形式上,也应有一定的追求,既不必如旧诗格律那么严,但也要有一定的韵,易唱,动听,这样才能流传。

351004 致 萧 军

刘兄：

一日的信收到两天了。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详细情形，二者，他也许自有更远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书我不想在《世界文库》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得总结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大约二十前后可完，一面已在排印本文，到下月初，即可以出版。这恐怕就是丛书的第一本。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以下答家常话：

孩子到幼稚园去，还愿意，但我怕他说江苏话，江苏话少用 N 音结末，譬如“三”，他们说 See，“南”，他们说 Nee，我实在不爱听。他一去开，就接连的要去；礼拜天休息一天，第二天就想逃学——我看他也不像肯用功的人。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昨天到巴黎大戏院去看了《黄金湖》，很好，你们看了没有？下回是罗曼谛克的《暴帝情鸳》，恐怕也不坏，我与其看美国式的发财结婚影片，宁可看《天方夜谈》一流的怪片子。

专此布复，并颂
俚安。

豫 上 十月四日

351022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八日信收到。致徐先生笺已即转寄。兄的女儿的病已愈否？

我的胃病，还是二十岁以前生起的，时发时愈，本不要紧。后见 S 女士，她以欧洲人的眼光看我，以为体弱而事多，怕不久就要死了，各处设法，要我去养病一年。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译文》合同，一年已满，编辑便提出增加经费及页数，书店问我，我说不知，他们便大攻击编辑（因为我是签字代表，但其实编辑也不妨单独提出要求），我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之说取消，但每期增添十页，亦不增加译费。我已签字了，他们却又提出撤[撤]换编辑。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我不承认，这刊物便只得中止了。

其中也还有中国照例的弄玄虚之类，总之，书店似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统制”案，所以不听他们指挥的，便站不住了。也有谣言，说这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我们想觅一书店续出，但尚无头绪。

我们都好的，请释念。《译文社丛书》亦被生活书店驱逐，但却觅得别家出版，十一月可出我译的 Gogol 作《死魂灵》第一卷。

专此布复,即请
秋安。

弟 豫 顿首 十月二十二日

【评点】

这封信将《译文》停刊案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明乎此,即可理解他对生活书店的态度和对郑振铎的态度。并非他对黄源特别偏袒也。鲁迅是条硬汉子,一向不受别人挟迫的。

351029 致 萧 军

刘兄：

廿八日信收到。那一天，是我的豫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于是我们只好走了一通，回到北四川路，请少爷看电影。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说“婴”字下面有“女”字，要换过了。

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译文》终刊号的前记是我和茅合撰的。第一张木刻是李卜克内希遇害的纪念，本要用在正月号的，没有敢用，这次才登出来。封面的木刻，是郝氏作，中国人，题目是《病》，一个女人在哭男人，是书店擅自加上去的，不知什么意思，可恶得很。

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

《小彼得》恐怕找不到了。

耿济之的那篇后记写的很糟，您被他所误了。G 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

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刻的。但 G 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

G 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

第二部《死魂灵》并不多，慢慢的译，想在明年二三月出版；后附孟十还译的《G 怎样写作》一篇，是很好的一部研究。现正在校对第一部，下月十日以前当可印成，自然要给你留下一部。

专此布复，即请
俪安。

豫上 十月二十九日

【评点】

这里对于果戈理的评论和对于中国酷评家的分析，是本月 20 日致孟十还信的延续和补充，两信参看，可以更明白鲁迅的意见。“G 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这个对比极妙，不但是对果戈理的肯定，而且也对照出了当时中国有些作家的嘴脸。

351105 致王冶秋

野秋兄：

十月二十八日信收到；前一信并《唐代文学史》，也收到的。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材料，我无可帮助，因为平时既不收集，偶有的一点，也为了搬来搬去，全都弄掉了。《导报》尚有，当寄上；阿英的那一本尚未出，出后当寄上，我想大约在年底罢。

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的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我想，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

我今年不过出了几本翻译，当寄上，但望即告我收信人的姓名，以用那几个字为宜，因为寄书要挂号，收信人须用印章的。又南阳石刻拓费，拟寄上三十元，由兄转交，不知可否，并望即见复。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一月五日

回信可仍寄〔仍〕书店转交,不致失落的。 又及

【评点】

鲁迅在这里对编写文学史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有参考价值。研究文学,固然应该史论结合,那是指材料和见解的结合而言,至于写法,则论是逻辑的展开,史是时代的进程,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351115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

十一日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一本，顷同时收到。关于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来，日内拟即汇三十元去，托其雇工椎拓，但北方已冷，将结冰，今年不能动手亦未可料。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而需巨款则又一问题。

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像一筐，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南阳画像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

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

近来谣言大炽，四近居人，大抵迁徙，景物颇已寂寥，上海人已是惊弓之鸟，固不可诋为“庸人自扰”。但谣言则其实大抵无根，所以我没有动，观仓皇奔走之状，黯然而已。

专此布复，并颂

时缓。

树 顿首 十一月十五午

【评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打算印行汉石画像的计划，他是处处为读者的需要着想，并尽力保存一些文化遗产。可惜因经费的关系，连这一点小小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否则，以鲁迅的眼力，可以为我们选印一部汉石画像的精品。

351116 致萧军、萧红

刘军兄及其悄吟太太：

十六日信当天收到，真快。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将来不要忘记。二十四年前，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校出了几个错字，为什么这么吃惊？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的多，能校是当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

印刷所也太会恼怒，其实，圈点不该在顶上，是他们应该知道，自动的改正的。他们必须遇见厉害的商人，这才和和气气。我自己印书，没有一回不吃他们的亏。

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

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这几天四近逃得一榻糊涂。铺子没有生意，也大有关门之势。

孩子的幼稚园里，原有十五人，现在连先生的小妹子一共只剩了三个了，要关门大吉也说不定。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得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他欢迎客人，也喜欢留吃饭。有空望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专此布达，即请
俚安。

豫 上。十一月十六夜。

【评点】

“二十四年前”，指辛亥革命时期。“太大度了”，指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皇朝，却仍同意保留皇室，让溥仪在紫金城里过皇帝生活，以致东北沦陷之后，他又跑到东北去成立满洲国，重新登台做皇帝。二萧是东北人，东北沦陷之后，他们没有了家，只好在关内流浪。由于这种种的历史教训，所以鲁迅是主张报复的，他之反对“费厄”，而赞美复仇女鬼“女吊”，即此之故。

鲁迅对他为萧红《生死场》所作序言中那一句的解释，很有意思。“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既可以解作对叙事写景的赞扬，“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而他之所以说得弯曲一点，是因为这是为青年人的作品写序，要考虑到作品的销路，但又不能胡弄读者，仍要把真实的意见写出。这与时下一味吹捧的序文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351125 致 叶 紫

芷兄：

来信收到。我现在实在太苦于打杂，没有会谈和看文章的工夫了，许也没有看文章的力量，所以这两层只好姑且搁起。

你还是休息一下好。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

《选集》我也没有了；别的两本，已放在书店里，附上一条，希持此去一取为托。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上 十一月二十五夜

【评点】

鲁迅虽然并不重视创作灵感,但他的写作习惯是一气呵成,正如他在《〈出关〉的“关”》中所说的:“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因此,他反对“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因为这样会把感兴打断,而提倡立定格局之后,放笔直干的写法。但一气呵成并不等于最终完成,文章是应该多加修改的,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就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说的是一气呵成之后,再细加修改,而不是在写作过程中边写作边练字。当然,写作方式并无定制,各人有自己的习惯,但鲁迅的经验,很值得参考。

351204 致王冶秋

野秋兄：

昨得十一月廿八日函；前一函并令郎照相，亦早收到，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北方小孩，盖服装之故。其实各种举动，皆环境之故，我的小孩，一向关在家里，态度颇特别，而口吻遂像成人，今年送入幼稚园，则什么都和普通孩子一样了，尤其是想在街头买东西吃。

《新文学大系》是我送的，不要还钱，因为几张“国币”，在我尚无影响，你若拿出，则冤矣。此书约编辑十人，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化钱不可谓不多，但其中有几本颇草草，序文亦无可观也。

《杂文》上海闻禁售，第二本恐不可得，但当留心觅之。

对于《题未定草》，所论极是，世上实有被打嘴巴而反高兴的人，所以无法可想。我这里也偶有人寄骂我的文章来，久不答，他便焦急地问人道：他为什么还不回骂呢？盖“名利双收”之法，颇有多种。不过虽有弊，却亦有利，此类英雄，被骂之后，于他有益，但于读者也有益＝于他又有损，因为气焰究竟要衰一点，而有些读者，也因此看见那狐狸尾巴也。

张英雄新近给我一信，又有《文学导报》征稿之印刷品寄来，编辑者即此英雄，但这回大约没有工夫回答了。

《果戈理选集》，想于明年出全，我所担任的还有一本半，而一

个字也没有，因为忙于打杂；现在在做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须年底才完。《陀氏学校》的德文本，我没有了，在希公统治之下，出版者似已搬到捷克去，要买也不容易，所以总不见得翻译。另外也还有几本童话在手头，别人做的，很好，但中国即译出也不能发卖。当初在《译文》投稿时，要有意义，又要能公开，所以单是选材料，就每月要想几天。

《译文》至今还找不到出版的人，自己们又无资本，所以还搁着。已出的一年，兄有否？如无，当寄上，因为我有两部，即不送人，后来也总是几文一斤，称给打鼓担的。

至于讲五四运动的那一篇文章，找不出。以前似忘记了答复，今补告。

专此布达，并颂
时祉。

树 上 十二月四夜。

【评点】

想靠骂名人来出名，并不是现今的新发明，而是早已有之。鲁迅也不是到今天才挨骂，他生前就是一直被骂的。有些人骂他的目的，是要他回骂，因为鲁迅是名人，他一回骂，被骂者也就出名了。鲁迅看透了这种人的心思，所以并不每篇骂文都回骂，这使得骂人者很焦急地问人道：他为什么还不回骂呢？而有时，则拨弄一下骂人者，使读者看清他们的嘴脸。这虽然也使骂人者扬了名，但扬的是臭名，而于读者却有益。信中所说的“张英雄”，指张露薇，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对他有所揭露，但再来信，就无意与之多纠缠了。

351219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惠示诵悉。腹疾已愈否？为念。

集中国文字狱史料，此举极紧要，大约起源古矣。清朝之狱，往往亦始于汉人之告密，此事又将于不远之日见之。

近来因译《死魂灵》，并写短文打杂，什么事也无片段。翻译已止，但文集尚未编，出版恐不能望之书局，因为他们要不危险而又能赚钱者，我的东西，是不合格的。

国事至此，始云“保障正当舆论”，“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给保障，这代价可谓大极了。

关于我的记载，虽未见，但记得有人提起过，常州报上，一定是从沪报转载的，请不必觅寄。此种伎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败，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上海已见冰。贱躯如常，可告慰也。

专此布达，并颂

文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

【评点】

鲁迅一向很注意文字狱史料，他在《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及《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中对清代文字狱都有所分析，并从历史中观照出现实的问题。他还希望有人来编写文网史，杨霁云既有此意，他自然要加以鼓励。他预料日本人入侵之后，必有汉奸会去献策，正如清朝的文字狱，往往始于汉人告密。信末对于污蔑文章的分析，也很透彻：他们无非是“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1936 年

360105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一月一日信收到。《城与年》说明，早收到了，但同时所寄的信一封，却没有，恐已失落。黄米已收到，谢谢；陈君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

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此外，则后来之事，殊不可知，只能临时再定办法。

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译文》恐怕不能复刊。倘是少年读物，我看是可以设法出版的，译成之后，望寄下。

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我们如常，勿念。我仍打杂，合计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真令人觉得奇怪。

它嫂已有信来，到了那边了。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第一本约三十万字，正在校对，夏初可成。前（去年）寄《文学百科辞典》两本，不知已到否？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 豫 上 一月五夜。

【评点】

陈君，指陈蜕，邹素寒的化名，后改名为邹鲁风。据他自己的回忆，那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学联派他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他通过曹靖华的关系，找鲁迅帮忙的。不久，他又来上海找鲁迅一次，那是中共北方局与党中央失却联系，要求鲁迅代他们转交信件的。托鲁迅接关系的共产党人，远不止这一次，包括曾攻击过鲁迅的成仿吾，在失却组织联系后，也是请鲁迅接上关系的。可见当时共产党人对鲁迅信任的程度。但那些以工头自居的左联领导者，却对鲁迅不满，说他不写文章，而鲁迅自己统计了一下，“合计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倍于先前”，这叫人怎能不气愤呢？

“北方学校事”，即指北平的学生运动。对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是支持的，但鉴于当年“三一八运动”的经验，他希望学生们要注意策略。所以他在《题未定草》(九)里写道：“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而胡适，当时已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去了，所以鲁迅指责他“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鲁迅预料，政府当局在外交上必然妥协了事，而对爱国学生，则要以“整顿学风”为名，加以压迫。这也是历史的教训了。

360107 致徐懋庸

请转

徐先生：元旦信早收到。《海燕》未闻消息，不知如何了。

文章写了一点，今寄上，并无好意思，或者不如登在《每周文学》上，《现实文艺》还是不登这篇罢。

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来信中所说的那位友人，虽是好意，但误解的。我并非拳师，自己留下秘诀，一想到，总是说出来，有什么“不肯”；至于“少写文章”，也并不确，我近三年的译作，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丝毫没有懒下去。所以他的苦闷，是由幻想而来的，不是好事情。

此复，即请

春安

豫上 一月七日

【评点】

重读廖沫沙(野容)和田汉两篇从背后放暗箭的文章《花边文学》和《调和》，而“百感交集”，虽然恰好因在年底编集杂文集所引起，其实也是近来矛盾激化之故，否则，鲁迅也未必会旧事重提。对于鲁迅“少写文章”，亦即作工不勤的指责，也已传播开来，故信中又有此一说。而且，有人说鲁迅不肯将作文秘诀传授给青年，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作文是没有什么秘诀的，何况，他针对当时文坛的弊病，写作的缺点，早已发表过不少意见，可惜并未引起青年作者的注意。

360108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四日来信，前日收到了。孩子的照相，还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还未到，可谓迟慢。不知现在已到否，殊念。

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当分一份出来，明日送与老三去。

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但有时是肯听话，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上海只下过极小的雪，并不比去年冷，寓里却已经生了火炉了。海婴胖了许多，比去年夏天又长了一寸光景。男及害马亦均好，请勿念。

紫佩生日，当由男从上海送礼去，家里可以不必管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八日

【评点】

鲁迅主张让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海婴才能养成活泼的性格，性格一活泼，则在家里每天要闯一两场祸，也就在所难免了。“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这就可见海婴在家里自由发展的程度了。17日致沈雁冰信中又说：“从下星期一起，敝少爷之幼稚园放假两星期，全家已在发愁矣。”鲁迅之到处诉苦，实际上是深爱孩子的表现。被孩子闹得发愁，其实也是一种乐趣。这一点，海婴自然也会感到，所以说他父亲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360121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十三日信，早收到。海婴已放假，在家里玩，这一两天，还不算大闹。但他考了一个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竟说来说去，附上一笺，上半是他自己写的，也说着这件事，今附上。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

丈量家屋的事，大约不过要一些钱而已，已函托紫佩了。

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寓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男及害马与海婴均好，请勿念。

善先很会写了，但^男所记得的，却还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回信，稍暇再写。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一月二十一日

【评点】

鲁迅因为对海婴爱得深，所以常有调侃之语，特别是在给同样深爱海婴的老母的信中，几乎每封都有此类话语。本信所说：“但他考了一个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竟说来说去……”，即是此种调侃之语。更妙的是下面一句：“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真是绝妙的幽默。形成这种幽默的条件是：首先，海婴是个孩子，而且还只认得二百字，如果是识字较多的大人，讲这种话就显得浅薄了；其次，他说话的对象是一个大文学家的父亲，如果他的父亲是不识字或少识字的工人农民，则即使是儿子，说这种话也就有居高临下之感，令人生厌了。鲁迅虽然不赞成在中国提倡幽默，而幽默却自然地奔至笔下，他实在是一个深知幽默三昧之人。

360201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昨晨方寄一函，午后即得惠书并《企鹅岛》一本，谢谢。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而中国人向不注意，服尔德的作品，译出的也很少，大约对于讽刺文学，中国人是其实不大欢迎的。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

《岩波文库》查已发信去买，但来回总需三礼拜，所以寄到的时候，还当在二十边耳。

专此布复，并颂
春禧。

迅 顿首 二月一日

【评点】

鲁迅对于法朗士的作品甚为欣赏，“精博锋利”之评语，极当。

他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曾引用过法郎士的小说《泰绮思》中对某高僧的精神分析，来剖析某些京派文人的心理，十分深刻。信中对《故事新编》的自我评价，也为我们理解这本小说提供了一把钥匙。

360203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拜启：一月廿八日惠函奉悉。我们都很健康，但有忙碌的人，也有吵闹的人，总之是乱七八糟。

《新文学大系》的事，已于年前问过，书店说从一册至九册均已寄出，未知确否？盼复，如不确，当再查询，第十册尚未出版。

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

《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取。明天托老板寄上。

《陀的事》本是受三笠书房之托，说要作广告之用才写的，书房又把它转给改造社。写前我曾托他们修改得好懂些，当时总满口应承，原稿一到手，就原封不动地登出来。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我想今后最好是不写。

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意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森山先生的文章读过。林先生的文章终未读到，到杂志部去找，似已卖完。敝国的田汉君，我以为颇似这位先生。田君被捕，已获保释，现正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艺术）大肆活动，尽管如

此，却还胡说正义和真理随时都附在他田君身上，可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十竹斋笺谱》的进行太慢，第二册尚未出版。

迅 拜上 二月三日

增田兄几下

【评点】

叶，指叶圣陶；《陀的事》，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野口，即野口米次郎，他的文章盖指《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长与，即长与善郎，他的文章，即《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他们的文章，割裂鲁迅的话语，歪曲鲁迅的原意，盖思想倾向不同之故也。所以，鲁迅认为，中日两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以后还是不会见的为好。

森山，指日本作家森山启；林，即日本作家林房雄，他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和全日无产者艺术联盟，1930 年被捕后发表“转向”申明，拥护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林的文章，指《当前日本文学中的问题——致鲁迅》；森山的文章，指赞扬林房雄上述文章的《文艺时评》。

360210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四日信收到。农陈二兄尚未见过，想还在途中。

那一封信，我看不必回复了，因为并无回话要说。

《译文》有复刊的希望。《远方》也大有发表的可能，所以插画希即寄来，或寄书来，由此处照出，再即奉还亦可。最好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能够收到书或照片。

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〇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我们都好的，可释念。

专此布复，并颂

春禧。

弟 豫 上 二月十日

【评点】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当时盗版的情况,或则翻印,或则出选本,使得作者不能收得正常的版税,影响生活。

鲁迅从 1907 年写作《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几篇论文开始,算是正式进入了文学生涯,到得 1936 年,刚好满 30 年,鲁迅想把自己的作品汇集起来,出一总集,以为纪念。但此时只不过是起意而已,后来虽自手订目录,但在他生前尚未能实现此愿。直到 1941 年 10 月,才由许广平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1938 年版的《鲁迅全集》,共 20 卷,600 余万字,兼收创作、论著、翻译和辑录校勘的古籍,而《鲁迅三十年集》,则不收翻译,共收创作、论著和辑录本计 29 种 30 本。

360210 致黄苹荪

苹荪先生：

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二月十日

【评点】

黄苹荪是国民党御用文人，靠骂鲁迅起家，现编辑《越风》杂志，却又多次函约鲁迅写稿，当然为鲁迅所断然拒绝。鲁迅在本年有一残稿云：“有黄萍荪者，又伏许（按：指许绍棣）叶（按：指叶朔中）喉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

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鲁迅所多次称引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语出明末文人王思任骂逃跑宰相马士英的信，原话是：“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360217 致 郑 野 夫

野夫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铁马版画》一本，谢谢！《卖盐》也早收到，因为杂事多，一搁下，便忘记奉复了，非常抱歉。近一年多，在做别的琐事，木刻久未留心，连搜集了几十幅木刻，也还未能介绍。不过也时时看见，觉得木刻之在中国，虽然已颇流行，却不见进步，有些作品，其实是不该印出来的，而个人的专集，尤常有充数之作。所以我想，倘有一个团体，大范围的组织起来，严选作品，出一期刊，实为必要而且有益。我希望铁马社能够做这工作。

二十日起，上海要开苏联版画展览会，其中木刻不少（会址现在还不知道，那时会有广告的），于中国木刻家大有益处，我希望先生和朋友们去看看。 专此布复，即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七日

【评点】

现代木刻的经历,大抵也反映了中国各种事业的命运。在开始创业时,大抵是认真的,而且历尽艰辛,才开辟出道路来,而待到略一兴旺,随即马虎处之,也就很快走向衰落了。鲁迅批评木刻家的专集“常有充数之作”,说“有些作品,其实是不该印出来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语。但要“严选作品”,却谈何容易,而没有严格的要求,当然也就无从振作了。

360219 致夏传经

传经先生：

蒙惠函谨悉。《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

《高尔基文集》非我所译，系书店乱登广告，此书不久当有好译本出版，颇可观。《艺术论》等久不印，无从购买。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

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但近来文网日益，虽有所感，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

勿此奉复，并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九夜。

作 坟 两地书(信札)^{以上}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以上} 故

事新编^{昆明路德安里二十}
号文化生活出版社

编 小说旧闻钞 唐宋传奇集^{以上} 引玉集(苏联木刻)^内

译 壁下译丛 思想·山水·人物 近世美术史潮论
(已旧) (同上) (太专)

一个青年的梦 工人绥惠略夫^{以上} 桃色的云
(绝版) (同上) ^{北新} (尚可)

小约翰^{以上} 俄罗斯的童话 死魂灵^{以上} 十月
(好) (尚可) (好) (尚可)

神州国
光社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
(浅) 书馆

卢氏艺术论 新兴艺术的诸问题 普氏艺术论 文艺

与批评 文艺政策^{以上皆被禁止或}
绝版,无从购买。

【评点】

夏传经是南京盛记布庄的店员,鲁迅给素不相识的读者回信,也是常事,信中虽未能详谈研究文学之事,但要他精通至少一种外文,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信后附录中对于自己译著的简评,也值得读者注意。

360221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奉惠函后，记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一过也就罢了。

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海燕》虽然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说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其实，捕房的特别注意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专此奉复，并颂
著安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别一笺乞转交。

【评点】

“一点小事情”，指有关《海燕》出版发行的事。《海燕》第一期未署发行人，遭到主管者的干涉，故第二期出版时，编者征得本人同意，印上“发行人曹聚仁”字样。但该刊出版后，曹聚仁怕承担责任，却在《申报》上登出《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因《海燕》是鲁迅参与创办的刊物，曹聚仁又写信向鲁迅解释。曹聚仁倾向进步，在文化战线上做过不少工作，而《海燕》不久即以“共”字罪被禁，其色彩之鲜明可知，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有此顾虑，鲁迅也很谅解他，故说：“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一过也就罢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了曹聚仁的全盘。当时的许多论客说鲁迅会发脾气，现在也还有许多人批评鲁迅不宽容，其实鲁迅在大节上爱憎分明，在小事上则从不苛求于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360221 致徐懋庸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个整个，但一枝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当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后二时，等在书店里。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评点】

“先生的文章”，指徐懋庸以岑伯的笔名发表的《〈故事新编〉读后感》，文中说《故事新编》所写的“其实是现代的事故”，作者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又说：“《出关》中的老子之为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类似的想法，还不止徐懋庸一个，而是普遍地出现在当时的批评文章中。而鲁迅是不同意这种“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的，所以就写了《〈出关〉的“关”》作为回答。鲁迅对于作品批评，一向是保持缄默的，这回却破例作文回答，一则，如他自己所说：“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二则，也因为这些观点涉及对于文学典型社会意义的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于这个问题作出说明，不但回答了当前的批评者，而且可以纠正某种传统的文学观念。鲁迅在《〈出关〉的“关”》中对于典型创造的方法和意义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可以参看。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明白地说出了自己对于老子的看法：他从章太炎口中听来的关于老子的西出函谷，是为了孔子的几句话的看法，和他自己认为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意见。从而阐明了《出关》中老子形象的意义，与批评家们所说大不一样。不过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并没有点徐懋庸的名，而是以丘韵铎为批判对象。这是为徐懋庸留一点面子，也因为丘韵铎的文章说得更离谱的缘故。信中所说，能“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大公报》的一点介绍，是指宗珏的《“海燕”》，文中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360229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接来函并文稿，甚欣甚慰。《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已以“共”字罪被禁，续刊与否未可知，大稿且存敝寓，以俟将来。此次所禁者计二十余种，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

靖节先生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当时，实生财之具，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

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居多，已托书店寄上一本，以博一粲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顿首 二月二十九日

【评点】

从这封信中不但可以看到《海燕》杂志的后续“旧闻”，而且所说陶渊明之事，也极可注意。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曾批评论

者只看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猛志固常在”的一面，此处更补充了他生活中的另一方面：不但有妾，而且有奴，还是有生财之道的。那么，“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至”该作何理解，也还得重新研究了。

360318 致欧阳山、草明

谢谢你们的来信。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算辛苦。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是真的，但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

这回因为天气骤冷，而自己不小心，受了烈寒，以致气管痉挛，突然剧烈的气喘，幸而医生恰在身边，立刻注射，平复下去了，大约躺了三天，此后逐渐恢复，现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写几百字了，药也已经停止。

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这以前，我是不会受大寒或大热的影响的。不料现在不行了，此后会不会复发，也是一个疑问。然而气喘并非死症，发也不妨，只要送给它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而可惜很少有好的。此外看看“第三种人”之流，一个个的拖出尾巴来，也是一种大娱乐；其实我在作家之中，一直没有失败，要算是很幸福的，没有可说的了，气喘一下，其实也不要紧。

但是，现在是想每天的劳作，有一个限制，不过能否实行，还是说不定，因为作文不比手艺，可以随时开手，随时放下的。

今天译了二千字，这信是夜里写的，你看，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请放心罢。

专此布复，并颂

〔三月十八日〕

【评点】

欧阳山和草明当时都是左联的青年作家，鲁迅在青年人面前从来不摆大作家的架子，他以“肯做苦工的人”自居，只是可惜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不能做更多的工作了。鲁迅后期十年，身居上海，这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而鲁迅的娱乐却只有看电影而已，可见做苦工实不容易。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鲁迅此语，亦是对于青年作家的激励也。

360326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二十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都收到。中国的木刻展览会开过了，但此后即寂然无闻，好像为开会而木刻似的。其实是应该由此产生一个团体，每月或每季征集作品，精选之后，出一期刊，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观摩，得到进步。

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脸色不好，是因为二十岁时生了胃病，那时没有钱医治，拖成慢性，后来就无法可想了。

苏联的版画确是大观，但其中还未完全，有几个有名作家，都没有作品。新近听说有书店承印出品，倘使印刷不坏，是于中国有益的。

您所要的两种书，听说书店已将纸板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即有，恐怕也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书放在书店里，附上一条，便中持条去取，他们会付给的（但星期日只午后一至六点营业）。包中又有小说一本，是新出的。又《引玉集》一本，亦苏联版画，其中数幅，亦在这回展览。此书由日本印来，印工尚佳，看来信语气，似未见过，一并奉送（倘已有，可转送人，不要还我了）。再版卖完后，不印三版了。现在正在计画另印一本木刻，也是苏联的，约六十幅，叫作《拈花集》。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

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但是您似乎感情太胜。所以我应该特地声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廿六夜。

【评点】

为开会而木刻,就像为节日献礼而完成项目一样,在质量上就会大成问题,讲究实效的鲁迅当然很不赞成。但喜做表面文章,似乎是中国人的通病,要改也难,而这种毛病不改,则即使有全国性的杂志也难以精选木刻也。关于产生一个木刻团体,精选作品出一刊物的想法,鲁迅在 23 日致唐英伟信中,说得更清楚:“中国的木刻,我看正临危机,这名目是普及了,却不明白详细,也没有范本和参考书,只好以意为之,所以很难进步。此后除多多介绍别国木刻外,真必须有一种全国木刻的杂志才好;但全国木刻展览后,似乎作者都已松懈,有的是专印自己的专集,并不选择。”

鲁迅是一名战士,多为社会前途着想,所以他劝曹白即使在痛苦中,也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鲁迅深知改造中国社会之难,所以他的艰苦奋斗,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是为了社会的未来。

360328 致 增 田 涉

[译 文]

二十一日惠函收到。由惠县村发出的信，也早收到。我以为你很快去东京，故未回信。《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日本的《中国童话集》之类也有，记得是看见过的。

日本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

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但“堂哉皇哉兮嗶嗶唷”中的“嗶嗶唷”，是用在猥亵小调的声音。

我欣慰地期待五月上旬或中旬的到来。上海和五六年前的上海大不相同，不过聊当“转换心情”之药，也未尝不可。我早已不住以前的公寓，我这次的住址，一问内山老板便知。

本月初，因未注意疲劳和寒冷，致患急症，卧床多日，顷已大致痊愈，仍旧译作。

郑振铎君因活动过多，对《十竹斋笺谱》督促不力，现在第二册好容易才刻好，即将付印，全部（四册）不到明年是出不成的。

迅 拜 三月二十八日

【评点】

鲁迅在书信中多次谈到,在《故事新编》中,《铸剑》写得较为认真。这里,他又对《铸剑》的材料出处作了说明,并提醒说,要注意那里面的歌。不过他又并不作正面的解释,只是说:“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这就给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

360401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三月二十六日来示，顷已收到。^男总算已经复元，至于能否不再复发，此刻却难豫料。现已做了丝棉袍一件，且每日喝一种茶，是广东出品，云可医咳，似颇有效，近来咳嗽确是很少了。惟写字作文，仍未能减少，因为以此为活，总不免有许多相关的事情。

海婴学校仍未换，因为邻近也没有较好的学校。但他身体很好，很长，在同学中，要高出一个头。也比先前听话，懂得道理了。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辆三轮脚踏车，早已骑破，现在正在闹着要买两轮的，大约春假一到，又非报效他十多块钱不可了。害马亦好，可请勿念。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四月一日

【评点】

十多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脚踏车在当时也是颇为奢侈之物。鲁迅自奉甚俭，而对于孩子，却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但为他买价钱昂贵的脚踏车，而且还为他买自己所不喜欢的留声机，——盖因放留声机妨碍他写作之故，但孩子想要，还是给他买了，可见其爱子情深。“报效”一词，用得极妙，此词原该应用于对上者，现在却用于对下，调侃之意全出矣。

360401 致曹靖华

汝珍兄：

顷收到三月廿八日信，知一切安好，甚慰。《译文》现在总算复刊了，舆论仍然不坏，似已销到五千。近来有一些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的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进步得多；而读者的眼睛，也明亮起来，这是一个较好的现象。

谛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从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

《远方》的插画，一个是因为求安全起见，故意删去的，印单行本时也许补入。但看飞机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不登，便中当打听一下。

兄给现代书局的两种稿子，前几天拿回来了，我想找一找出板的机会。假如有书店出版，则除掉换一篇（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换一个书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先后，称为“不平常的故事”。否则，就自己设法来印，合成一本。到那时当再函商。

《文学导报》已收到。其中有几个人我知道，是很无聊而糊涂的。但他们也如这里的 Sobaka 一样，拿高尔基做幌子，高也真倒运。至于“第三种人”，这里早没有人相信它们了，并非为了我们的打击，是年深月久之后，自己露出了尾巴，连施蛰存、戴望舒之流办

刊物，也怕它们投稿。而《导报》还引为知己，真是抱着贼秃叫菩萨。

《导报》里有一个张露薇，看他口气，是高尔基的朋友，也是托尔斯泰纪念的文集刊行会的在中国的负责人。

那篇剧本，当打听一下，能否出版。原本如不难寻出，乞寄下。

文学方面，在实力上，Sobaka 们是失败了。但我看它们是不久就要用别种力量来打击我们的。

杂志又收到了一些，日内寄上。《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上一点。

专此布达，即请
春安。

弟 豫 顿首 四月一日。

再：弟 现已可算是复元了，请勿念。

【评点】

谛君，指西谛，即郑振铎。从《译文》停刊事件起，鲁迅对他之手段很不满意。

《文学导报》其实即是张露薇所编；Sobaka，是用英文字母来拼写俄文词 собака，意为走狗，指杜衡、杨邨人和韩侍桁，因为《文学导报》一卷一期的《编辑后记》里，曾提出此三人，说要特别感谢他们对这个刊物的宣传，故有“抱着贼秃叫菩萨”之说。其实，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这一封信里，可以看到当时文学界的某一方面的阵势也。

360401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三月卅日信并木刻，均收到二十八日的也收到。5·4的装饰画，可以过得去。要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批评是难的，因为我自己是外行。但据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础工夫。因为木刻究竟是绘画，所以先要学好素描；此外，远近法的紧要不必说了，还有要紧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白黑二色，光线一错，就一榻糊涂。现在常有学麦绥莱尔的，但你看，麦的明暗，是多么清楚。

从此进向文学和木刻，从我自己是作文的人说来，当然是很好的。假如我有所知道，问起来可以回答，也并不讨厌。不过我先得声明一下，有时是会长久没有回信的，这是因为被约期的投稿逼得太忙了，或是生了病，没力气写字了的时候。

《死魂灵百图》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不大清楚），但另有一种用纸较好的，却要出的较迟，这不过纸白而厚，版和印法却都一样。您可以不要急急的去买它，因为那时我有数十本入手，当分赠一本。不过这是极旧的木刻，即画家画了稿子，另一木刻者用疏密的线条，表出那原画来，并非所谓“创作木刻”，在现在，是没有可学之处的。

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它们有叭儿狗，所以比

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不过好像效力也并不大;一大批叭儿狗,现在已经自己露出了尾巴,沈下去了。

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一日

【评点】

曹白兼学木刻和文学写作,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曾经刻过一幅鲁迅像,历经许多刊物,都不能发表,又因刻了一张卢那察尔斯基像而被捕,鲁迅很同情他,故答应通信回答他的问题,还把他被捕的经历写入自己的文章:《写于深夜里》。

360402 致杜和銓、陈佩骥

和銓先生：
佩骥

收到来信并《鸿爪》一本，谢谢。

我来投稿，我看是不好的。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犯大罪。实在不值得为了一篇文字，也许贻害文社和刊物。假使是大文章，发表出来就天翻地覆，那是牺牲一下也可以的，不过我那会写这样的文字。

以我为师，我是不敢当的，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指授，而且约为师弟的风气，我也不赞成。

我们的关系，我想，只要大家都算在文学界上做点事的也就够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二日

【评点】

中国的文武名人,都喜欢广收门徒,开宗立派,这大概是古代行帮习气的遗风。到得近代思潮兴起,崇尚个性解放,就有人对此提出挑战。清谈变的思想先驱龚自珍,虽以大儒王通自诩,但明确地表示:“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是历史的进步。鲁迅是一位文化革新者,当然不会倒退到古代的行帮习气中去,所以拒绝别人拜他为师,并且说:“而且约为师弟的风气,我也不赞成。”当然,学校中的师生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应该另当别论,但如以此结成门派,也就回到古代去了。

360402 致 颜 黎 民

颜黎民君：

三月廿七日的信，我收到了，虽然也转了几转，但总算很快。

我看你的爹爹，人是好的，不过记性差一点。他自己小的时候，一定也是不喜欢关在黑屋子里的，不过后来忘记那时的苦痛了，却来关自己的孩子。但以后该不再关你了罢；随他去罢。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再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处的，要好好的对他说。

你的六叔更其好，一年没有信息，使我心里有些不安。但是他太性急了一些，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不过既然看了，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你们所要的两本书，我已找出，明天当托书店挂号寄上，并一本《表》，一本杂志。杂志的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怕，但官的胆子总是小，做事总是凶的，所以就出不下去了。

还有一本《引玉集》，是木刻画，只因为是我印的，所以顺便寄上，可以大家看看玩玩。如果给我信，由这书末页上所写的书店转，较为妥当。

一张照相，就夹在《引玉集》的纸套里。这大约还是四五年前照着的，新的没有，因为我不大爱看自己的脸，所以不常照。现在你看，不是也好像要虐待孩子似的相貌吗？还是不要挂，收在抽屉

里罢。

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据看见过的说起来,看了无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以后我想留心一点,如果看见好的,当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

新近有《译文》已经复刊,其中虽不是儿童篇篇可看,但第一本里的特载《远方》,是很好的。价钱也不贵,半年六本,一元二角,这在北平该容易买到。

还有一件小事情我告诉你:《鱼的悲哀》不是我做的,也许是我译的罢,你的先生没有分清楚。但这不关紧要,也随他去。

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

好了,再谈,祝
你们进步。

鲁迅 四月二夜。

【评点】

颜黎民,原名定邦,北平的一个中学生,1935年以“共产嫌疑”被捕下狱,出狱后不久,即化名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鲁迅很耐心地回复了这位素不相识“孩子”的来信,还给他寄书,寄照片。信中所谈的儿童教育问题,很可重视。鲁迅是一向主张尊重儿童的个性的,所以他反对随便关打孩子,而要求理解、体谅孩子的心

理,要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做大人时,不要忘掉自己做孩子时的心理和要求。而且,希望有好的儿童读物给孩子看。他还认为拿他的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这是因为他的文章含意较深,读者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准备,也即是本月5日致王冶秋信中所说的:“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所以说要上三十岁才容易看懂。这一点,也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

360405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三月三十日信已收到；先前的两封，也收到的。开初未复，是因为忙。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到三月初，为了疲乏和受寒，骤然气喘，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终经医师注射，逐渐安静，卧床多日，渐渐起来，而一面又得渐渐的译作；现在可说已经大略全愈，但做一点事，就觉得困乏，此病能否不再发，也说不定的。

我们×××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那位研究生物学的学生的事情，问是问过了，此地无法可想。商务馆虽然也卖标本，但它是贩来的。有人承办，忽而要一只鸭，忽而要一只猫头鹰，很难，而没有钱赚，此人正在叫苦连天。

序跋你如果集起来，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不过有许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国文写的，及给人写了而那书终未出版的之类，将来当代添上。至于那篇四六文，是《淑姿的信》的序，初版已卖完，闻已改由联华书店出版，但我未见过新版，你倘无此书，我也可以代补的。

《文学大系》序的不能翻印是对另印而言，如在《序跋集》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和我订约时，有不另印的话，但当付稿费时，他们就先不守约。

盛成先生的法文，听说也是不甚可解的。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看看近来的各种刊物，昏话之多，每与十年前相同，但读者的眼光，却究竟有进步，昏话刊物，很难久长。还可以骗人的是说英雄话。

我新近出了一本《故事新编》，想尚未见，便中当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四月五夜

【评点】

×××，原件此三字为收信人删去，据回忆，系“这一翼”，即指左联。实做的少，监督的多，不做事不责备，多做事多责备，所以个个想做工头，不干实事，这是鲁迅所极不满意的。但这何止是“这一翼”的弊病，恐怕是一种社会通病了，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只想做官，不干实事，而做实事者则多受责备，苦不堪言，也还是这病根所致。

“什么协会之类”，指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后，准备成立作家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于1936年6月7日成立。鲁迅鉴于前车，所以不愿加入。

360413 致楼炜春

炜春先生：

顷收到十一日信，备悉一切。至于前一函并译稿，则早已收到，所以未能即复者，即因如建兄来信所说，《中学生》上，已在登载此书译本，而译者又即《译文丛书》编者之故。因此倘不先行接洽，即不能有切实之答复也。

前天始与另一译者黄君会商，他以为适兄译书不易，慨然愿停止翻译，在《中学生》续登适兄译本，对于开明书店，则由他前往交涉，现在尚无回信，我看大约是可以的。

假使此事万一不成，则此种大部书籍，不但卖稿很难，就是只希印行，也难找到如此书店，只好到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去试一试，此外，也没有适当之处了。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豫 顿首 四月十三日

【评点】

适兄，指楼适夷，收信人楼炜春之兄，1933年9月在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组织工作时被捕入狱，在狱中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翻译过程中，曾托楼炜春告诉鲁迅，想在鲁迅主持的《译文》杂志上连载，鲁迅于1935年8月23日复楼炜春信中说：“译文社的事很难说，因为现在是‘今朝不知明朝’事，假如小说译成的时候，译文社仍在进行，也没有外界所加的特别困难，那当然是可以出版的。”《在人间》译成后，由楼炜春转交鲁迅，而此时，《中学生》杂志上已开始连载黄源翻译之《在人间》了。当时的中国图书市场容纳不下两种译本同时出现，所以鲁迅与黄源会商，黄源认为楼适夷在狱中翻译不易，主动提出自己停止翻译，在《中学生》上接载楼适夷的译本。从这件事中，可见鲁迅对革命青年的爱护，也可见黄源的高尚风格。

360415 致 颜 黎 民

颜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来信，知道那些书已经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糊涂虫。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所以现在说不出那些书合适，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也许有几种，让调查一下再说罢。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

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是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会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么？如果有，既然说了，就不怕发表。

临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改了，会写错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告诉了我所署的是假名。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小孩子》的，是不是？

就这样的结束罢。祝
你们好。

鲁迅 四月十五夜。

【评点】

鲁迅是极精细之人，从一个破绽中，就看出对方署的是假名。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很热情地给他回信，循循善导。鲁迅这里所说：不要专看一个人的著作，而要多看各家之作，“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同时也不要专看文学书，而要兼看科学书，如果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那么做起文章来也会胡涂，——这虽是针对颜黎民的具体情况而发，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至今还有一些文学青年，以偏科发展为荣，以数理化不及格而仍能写作为傲，而不知缺乏科学知识会影响文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道理，所以鲁迅的意见还很有现实意义。至于他劝人看世界

旅行记,则是为了弥补不能到处旅行的缺陷,如能旅行,进行实地考察,当然更好,这也是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

这封信还提到看桃花之事。龙华的桃花虽美,但鲁迅却不愿意去看,并非他不欣赏美,而是因为他的几个青年朋友柔石、殷夫等人被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睹物伤心,所以他是不去那里看桃花的。鲁迅是一个爱憎分明,极富感情之人。客观对象如果没有美好感情的寄托,也就不见得美了。

36042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插图本《41》，早已收到。能出版时，当插入。

三兄有信来，今转上。霁野回国了，昨天见过。但他说也许要回乡一看。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我们都好，我已复元了，但仍然忙。昨寄书两包，内有《作家》一本，新近出版。

今年各种刊物上，多刊高尔基像，此老今年忽然成为一切好好歹歹的东西的掩护旗子了。

《文学导报》颇空虚，但这么大，看起来伸着颈子真吃力。

我设法印成了一本《死魂灵百图》，Agin 画，兄所给的十二幅，

也附在后面，有厚纸的一种，还未装成，成后当寄上。

专此布达，即请
近安。

弟豫 上 四月廿三夜。

【评点】

“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真谛。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里，曾经指出：“‘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又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可见孔子就是个巧人。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巧人的处世之道盛行，而不是巧人，若要认真处事，也就难以存活了。鲁迅与左联的很多矛盾，也与此有关。鲁迅做事认真，不肯模胡从事，所以与巧人无法共事，而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他当然不愿参加新的作家协会。

360424 致何家槐

家槐先生：

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四月二十四日〕

【评点】

何家槐是左联成员，作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之寄《作家协会组织缘起》给鲁迅，当然意在要鲁迅参加。但鲁迅连左联是否还存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周扬等人连解散左联之事都没有与这位左联盟主协商过，他怎么能参加他们的新组织呢？这种拿名人做

招牌，而凡事则内部决定了要他去执行的做法，在中国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只因鲁迅办事认真，而且讲究人格的独立性，不愿由人摆布，不愿做傀儡，所以矛盾愈来愈大了。

信末署名，据收信人说：“不知在什么时候撕破失去了。”

360502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二、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考。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鲁迅 五月二日

【评点】

徐懋庸的信,是承续何家槐之信而来。所谓“我的信件”,即指4月24日鲁迅给何家槐的复信。本信则更详细地说明了他对解散左联一无所知的情况,并表示对于左联内部的是非,不愿再加纠缠,不加入新的组织,是要远离他们,避免新的纠纷。鲁迅把话说到这分上,已经说得够明确了,而徐懋庸等人还要加以纠缠,并加以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于是才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作。

36050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廿七日信已到。此间莲姊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

《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洽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罗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以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从七月起，《文学》换王统照编辑，大约只是傀儡，而另有牵线人。今晚请客，闻到者只十八人，连主人之类在内，然则掌柜虽换，生意恐怕仍无起色。

陈君款未还，但我并不需用，现在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而且他们还把前信失去，再要一封，我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

《41》印起来，款子有法想，不必寄。

大会要几句话，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

我们也准备垂帘听政，不过不是莲小姐，而是别个了。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直爽，办事较难，但想试试看。

印《城市与年》的木刻时，想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便

读者，题字大抵可以从兄的解释中找到，但开首有几幅找不到，大约即是“令读者摸不着头脑的事”。今将插画所在之页数开上，请兄加一点说明，每图一两句足够了——

(1) 11 页 (2) 19 页对面 (3) 35 页

(4) 73 页 (5) 341 页

以上，共五图。

上海今年很奇，至今还是冷。我已复元，女人和孩子也都好的，可请释念。

现正在印 Gogol 的《死魂灵图》，兄寄给我的十二幅，已附入。它兄的译文，上本已校毕，可付印了，有七百页。下本拟即付排。

专此布达，并请
春安。

弟 豫 上 五月三夜

【评点】

莲姐家，指左联；傅、郑，指傅东华、郑振铎；毛姑、毛兄，均指茅盾，即沈雁冰；“大会要几句话”，指正在筹备的“北平作家协会”拟请鲁迅为其成立大会写祝词。

“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指当时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拟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后未成立，但于 6 月 15 日由鲁迅、巴金等 63 人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我们也准备垂帘听政”，盖亦指此事。从这里，也可见文艺界两部分人意见相左，是无法联合到一块了。

“陈君款”，指借给陈蜕的钱。据邹鲁风（即陈蜕）在《党最亲密的战友》一文里回忆，他第一次到上海，在会见鲁迅之后五六天，鲁

迅曾派许广平送了几十元钱到旅馆里给他，怕他缺钱用。他后来通过曹靖华还了这笔钱。鲁迅这里说：“但我并不需用”，23 日信中又说：“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都是体谅青年人的困难，叫他不要急于还钱也。后于 8 月 27 日信中说：“陈君款早收到。”而此信所说：“现在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则是指陈蜕第二次到上海，通过鲁迅向党中央传递北方局的信，地下党过了很久才来找陈蜕，而陈蜕已经回北平了。

360504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

《死魂灵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却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此书已卖去五百本，倘全数售出，收回本钱，要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莱尼娜》（《Anna Karenina》）的插画也说不定，不过那并非木刻。

你的那一篇文章，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这原是为《The Voice of China》而作的，译文当发表在五月十五这一本上，出后当送你（你能看英文吗？便中通知我）。原文给了《夜莺》，听说不久出版，我看是要被这篇文章送终的，但他们说：这样也不要紧。

说起我自己来，真是无聊之至，公事、私事、闲气，层出不穷。刊物来要稿，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但《作家》已被停止邮寄了，

《死魂灵》第二部，只存残稿五章，已大不及第一部，本来是没有也可以的，但我决计把它译出，第二章登《译文》第三本，以后分五期登完，大约不到十万字。作者想在这一部里描写地主们改心向善，然而他所写的理想人物，毫无生气，倒仍旧是几个丑角出色，他临死之前，将全稿烧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四日

【评点】

“你的那一篇文章”，指曹白的《坐牢记略》，鲁迅请他写出，打算帮他发表，并征得作者的同意，吸取了一部分内容，写入自己的文章：《写在深夜里》，目的在于通过此事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

“上了镣铐的跳舞”，“带着枷锁的跳舞”，鲁迅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对他自己当时写作状态的形象说明。“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这是他写作的难处。但鲁迅终于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讽刺艺术，这也是环境使然吧。

360504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五月一日函收到。此集我至少还可以补上五六篇，其中有几篇是没有刊出过的；但我以为译序及《奔流》后记，可以删去（《展览会小引》，《祝〈涛声〉》，《“论语一年”》等，也不要）。稿挂号寄书店，不至失落；印行处我当探问，想必有人肯印的，但也许会要求删去若干篇，因为他们都胆子小。

我没有近照，最近的就是四五年前，印来印去的那一张。序文当写一点。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你所说的药方，是医气管炎的，我的气喘原因并不是炎，而是神经性的痉挛。要复发否，现在不可知。大约能休息和换地方，就

可以好得多，不过我想来想去，没有地方可去。

这里还很冷，真奇。霁已回国，见过面，但现在不知道他是回乡，还是赴津了。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树 上 五月四夜。

【评点】

“近来已作二文反击”，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三月的租界》点名批判了狄克即张春桥，指出他对于《八月的乡村》“执行自我批判”，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实行着抹杀的任务，“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出关〉的“关”》就批评界对《出关》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虽然没有点徐懋庸的名，但所批评的论点却与徐懋庸有关，这从2月21日致徐懋庸的信中可以看出。但鲁迅对他们的力量却低估了。他们有一个协会的组织，又有一个口号相号召，其实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不但不会马上销声匿迹，而且还想统一文学界，所以对于鲁迅的不肯加入协会，才会这么计较，甚至在集会上宣布罪状。

360508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五日信收到。研究文学，不懂一种外国文，是非常不便的。日文虽名词与中国大略相同，但要深通无误，仍非三四年不可，而且他们自己无大作家，近来介绍也少了，犯不着。英国亦少大作家，而且他们颇顽固，不大肯翻译别国的作品；美国较多，但书价贵。我以为你既然学过法文，不如仍学法文。因为：一，温习起来，究竟比完全初学便当；二，他们近来颇翻译别国的好作品；三，他们现在就有大作家，如罗兰，纪德，作品于读者有益。

但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死魂灵百图》白纸印本已订好，包着放在书店里，请持附笺去取为荷。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八日

【评点】

鲁迅一向认为,要提高我们的文学水平,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和先进艺术,所以他很重视翻译工作。但看翻译作品当然不如看原文,特别对于研究工作者更是如此,所以他给文学青年的信中,多次提出学习外文的重要性,这里又根据曹白的具体情况,提出切实的建议。他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

360508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五月五日信并汇款，均收到无误。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新近印成一部《死魂灵百图》，已托书店寄上，想不日可到。翻印此种书，在中国虽创举，惜印工殊不佳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八日

【评点】

鲁迅虽然有杰出的成就，但他持平常心态，一直以常人自居，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并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

给他作传。他只有简短的自传,有如现在的简历,那是应译介他作品者的要求而写,因为读者总想要知道一点作者的情况。这种平常心,是极其可贵的,正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这才能有大成就。但毕竟是有大成就之人,所以在鲁迅身后,就会有很多人来为他作传。

360515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昨寄一信并《星花》版税，想已到。今得到十一日来函并插画题句，每条拟只删存一两句，至于印法，则出一单行本子，仍用珂罗版，付印期约在六月，是先排好文字，打了纸版，和图画都寄到东京去。

《文学》之求复活，是在依靠一大题目；我因不加入文艺家协会（傅东华是主要的发起人），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是破坏联合战线，但这类英雄，大抵是一现之后，马上不见了的。《文丛》二期已出，三期则集稿颇难；《作家》编者，也平和了起来，大抵在野时往往激烈，一得地位，便不免力欲保持，所以前途也难乐观。不过究竟还有战斗者在，所以此后即使已出版者灰色，也总有新的期刊起来的。

它兄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刚付印，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发表过的，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结束了。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作家》第一期中的一篇，原是他的集子上卷里的东西，因为集未出版，所以先印一下。这样子，我想，兄

的疑团可以冰释了。

纪念事昨函已提及，我以为还不如我自己慢慢的来集印，因为一经书店的手，便惟利是图，弄得一塌胡涂了，虽然印出可以快一点。

上海还是冷。我琐事仍多，正在想设法摆脱一点。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妇孺均安，并希释念。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弟 豫 顿首 五月十五日

【评点】

对于不听话、不服从指挥的人随机扣上流行的大帽子，是中国官场所惯用的手法，此时正提倡联合战线，故对鲁迅的不肯加入作家协会，定以破坏联合战线之罪，正其时也。其实，鲁迅之不肯参加作家协会，只不过是鉴于前车，避免纠纷而已。对于这种动辄定人以大罪名的做法，鲁迅是极其反感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有表示。14日致曹靖华信中也说到：“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做人太坏了。”

“我的选集”，指《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署名何凝；“纪念事”，指准备出版《鲁迅三十年集》事。

360522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来信收到。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我看，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还是不编干净罢。

病中，不能多写，乞恕为幸。

此请

日安。

鲁迅 五月廿二日

【评点】

鲁迅主张文人应明辨是非，有热烈的爱憎，所以在社会斗争面前一定要有倾向性，因此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此乃确论。

以此观点可以透视出社会上许多“巧人”、“滑人”们的面目。鲁迅所以要劝唐弢不要去编“不属于任何一面”的刊物，是因为这种刊物是不可能成立的。

36052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日信收到，并稿子。《百图》纸面印了一千，绸面五百，大约年内总可售完，虽不赚钱，但可不至于赔本。

所说消息，全是谣言，此间倒无所闻，大约是北方造的，但不久一定要传过来的。

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沈，或变化的。新作家的刊物，一出锋头，就显病态，例如《作家》，已在开始排斥首先一同进军者，而自立于安全地位，真令人痛心，我看这种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

能给肖兄知道固好，但头绪纷繁，从何说起呢？这是连听听也头痛的。

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如见陈君，乞转告：我只得到他的一封信；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

这回又躺了近十天了，发热，医生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但我看总不是重病。不过这回医好以后，我可真要玩玩了。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弟 豫 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

【评点】

“一出锋头，就显病态”，“排斥首先一同进军者，而自立于安全地位”，“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这不但文学家如此，在中国人中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只会玩小花样者，岂能成大事业？这也是自败之道。鲁迅想做一篇五六万字的文章，把他历来所受的闷气说出，可惜不久即生大病，继而逝世，终于没有写成，否则，倒真是留给将来的一份重要遗产，其意义当不止于揭露出文学界的矛盾，而且还会写出中国人的某种劣根性，成为国人自鉴的又一面镜子。

360525 致 时 玳

时玳先生：

十五的信，二十五收到了，足足转了十天。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我看他们倒并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或者想由此洗一个澡，或则竟不过敷衍面子，因为倘有人用大招牌来请做发起人，而竟拒绝，是会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聪明，就签上一个姓名，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像不签一样。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因此在上海，竟很少能够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一个商办的东西，并非文学团体的机关志，它的盛衰，是和“国防文学”并无关系的，而他们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见其毫无眼光，也没有自信力。

《作家》既非机关志，即无所谓“分裂”，但我却有一点不满，因为他们只从营业上着想，竟不听我的抗议，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第一篇。

我对于初接近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好”“不好”的。如果已经“当做不好的人看待”，不是无须接近了吗？曹先生到我写信的这时候为止，好好的（但我真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喜欢造这种谣言）。活着，您放心罢。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鲁迅 五月二十五日

【评点】

这里所说的成立组织，用大招牌压人参加，而参加者则要跟在后面鼓噪，正是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里所说的“合群的爱国自大”的老毛病。中国是容不得“个人的自大”的，也就是说，容不得有个人独立的意见，如果不跟着群体走，就要给你扣上大帽子。而签了名跟着走呢？则“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像不签一样”，所以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人总是随大流者为多。时玳是一个文学青年，还没有力量与之抗衡，为其安全计，鲁迅劝他还是签名参加文

艺家协会为好。这并非有意讽刺，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鲁迅是决不会出难题给青年人做的。

鲁迅信中所写的人事，当然都实有所指，但如果把他作为文学典型来看，也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如说某些人掌握一个组织之后，他们的事业就是“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提出一个文学口号，只攻打反对这个口号者，却做不出实际成绩；又如说：“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这些毛病，一直绵延不绝，后来各地作家协会的矛盾，又何尝不是由此而起的呢。中国作家之所以没有大作品，大概也与此有关。

360706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寄信件，已将两月了，其间曾托老三代陈大略，闻早已达览。^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猻称霸王”而已。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七月六日

【评点】

这是向母亲报告病况的信，虽然简略，但可见大概。鲁迅此次生病，病情险恶，5月31日《日记》云：“下午史君（按：指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言其危，明甫（按：即茅盾）译语。”后来在《死》中记述此事道：“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一般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至6月5日，连日记都停写了，30日稍愈，补记道：“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但在6月19日，因老友邵铭之馈赠干菜笋干鱼干等物，还是力疾写了一封回信，内容主要也是报告病情的：“弟自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年事已长，筋力日衰，动辄致疾，真是无可奈何耳。”

360707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六日信及《板画集》十八本，今天同时收到，谢谢。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情形之下，我以为印刷，装订，都要算优秀的。但书面的金碧辉煌，总不脱“良友式”。不过这也不坏。至于定价，却算低廉，但尚非艺术学徒购买力之所能企及，如果能够多销，那是我的推断错误的。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然而文艺界中人，却好像并无此种风气，所以出书真难。

《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 来信所示，合为一本。新的书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为一篇。

靖华译过两部短篇，一名《烟袋》，一名《四十一》，前者好像是禁过的，后者未禁，我想：其实也可以将《烟袋》改名，两者合成一本，不知良友愿印否？倘愿，俟我病好后，当代接洽，并为编订也。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七月七日

【评点】

将文人之买书，比之绿林强盗之买盒子炮，谓应不惜钱财而购之，此喻极妙。而可惜文艺界中人并无此种风气者，则因 20 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作家的知识水准日趋低下，而且经济状况也日趋低下之故也。

360711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字更不会写。静兄由厦过沪，曾托其便中转达，不知提起过否？

其间几乎要死，但终于好起来，以后大约可无危险。

医生说要转地疗养。你的六月十九日信早到。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

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

现在还未能走动，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说了。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树 上 七月十一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令郎均吉。

【评点】

从这封信看，鲁迅病好之后，原是准备遵从医嘱，转地疗养的，后因种种原因，终于未能成行。他在8月2日致沈雁冰信中说：“先曾决定赴日，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沈雁冰建议他可仿杨贤江夫妇例，雇一日本下女，以手势达意，鲁迅又于8月16日复信云：“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危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360828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二十四日函收到。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以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

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 藤 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版画集》在病中印成，照顾殊不能周到，印数又少，不久便尽，书店也不存一本了，无以奉寄，甚歉。

专此布复，并请

暑安。

鲁迅 八月廿八日。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评点】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艺界矛盾激化的情况，及鲁迅写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因及意图。文学史家们一般都把这篇文章看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之作，文章中的确也有大量篇幅论及文学口号问题，但鲁迅在书信中言及此文时，却并未提及文学口号，而是对“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和徐懋庸明知他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之举，十分痛恨。可见双方的矛盾，并不全在口号之争，而鲁迅的公开答复，亦因为他认为此中是非，有关大局，并非个人间事。在此前后，鲁迅还在其他书信中多次论及此事，愤愤之情，久不能平。如8月25日致欧阳山信中说：“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煞是好

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又于8月27日致曹靖华信中说：“《作家》八月号上，有弟一文，当于日内寄上，其中有极少一点文界之黑暗面可见。我以为文界败象，必须扫荡，但扫荡一有效验，压迫也就随之而至了。”

360903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八月三十日信收到。^男确是吐了几十口血，但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就由医生用药止住了。^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

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全愈是不能的，但四十以上人，却无性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

马理已考过，取舍尚未可知。她还是孩子脾气，看得上海很新鲜。但据^男看来，她的先生（北平教过的）和朋友都颇滑，恐怕未必能给她帮助，到紧要时，都托故溜开了。

害马胃已医好。海婴亦好，仍上大陆小学。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九月三夜。

【评点】

这也是一封禀报病情的家信，除当时的病情外，从中还可以看到鲁迅的病史和他坚强的性格。“被八道湾赶出”，指 1923 年 8 月与周作人决裂，从八道湾迁出；“和章士钊闹”，指 1925 年女师大事件中鲁迅支持学生运动与教育总长章士钊等人进行斗争；“初到上海”，鲁迅于 1927 年 10 月从广州到上海，次年即受到“革命文学家”们的围剿；近年来的境况更差，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迫害，另一方面是同一阵营中人背后的冷箭，使他时时处于愤激之中。可见鲁迅这四次发病，都与环境的压迫，心情的不畅有关。

360903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昨收到一日信，才明白了印刷之所以牛步化的原因，现经加鞭，且观后效耳。振铎常打如意算盘，结果似乎不如意的居多，但这回究竟打得印出了十分之八九，成绩还不算坏。我想，到九月底，总该可以结束了。最失败的是许钦文，他募款建陶元庆纪念馆，后来收款寥寥，自己欠一批债，而杭州之律师及记者等，以他为富翁，必令涉入命案，几乎寿终牢寝，现在出来了，却专为付利子而工作着。

美成铅字，其实并不好，不但无新五号，就是五号，也有大小，不一律的。初校送来，却颇干净，错误似不多，但我们是対原稿的，因此发见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大抵一切校员，无不如此，所以倘是紧要的书，真令人寒心。《述林》有一半无原稿，那就没法了。此请
著安。

树 上 九月三日

【评点】

鲁迅虽然自己大病，但仍念念不忘死难战友瞿秋白纪念文集《海上述林》的出版事宜。8月31日信中曾说：“因此想到《述林》，那第二本，交稿时约六月底排成。在我病中，亦仍由密斯许赶校，毫不耽搁，而至今已八月底，约还差百余页。”言辞间，可见其急切心情。9月7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它兄译集的下本，正在排校，本月底必可完，去付印，年内总能出齐了。一下子就是一年，中国人做事，什么都慢，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成多少事。”直至9月底10月初致沈雁冰、郑振铎、章锡琛诸人信中，还为《海上述林》之排校及分赠事宜操心。

本信中对印刷局校对员的批评，也很值得注意：“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这的确是大成问题。盖校对工作，是以原稿去校正排印稿的错误的，不看原稿而以意改令通顺，则简直是语文老师改学生作文的做法了，而作家的用字造句，都有自己的特点，还有通假字之类，不为一般浅学者所知，一旦乱改，必成大错，鲁迅觉得“可怕之至”者，信然也。而这种错误做法，却有相当的普遍性，正如鲁迅所说：“大抵一切校员，无不如此，所以倘是紧要的书，真令人寒心。”

360908 致 叶 紫

芷兄：

七日信收到；记得以前诸函，也都收到的。所以未写回信者，既非我病又重，也并无“其他的原故”。不过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我的病依然时好时坏，就是好的时候，写字也有限制，只得用以写点关于生计或较为紧要的东西；密斯许又自己生病，孩子生病，近来又有客寓在家里，所以无关紧要的回信，只好不写了。

我身体弱，而琐事多，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一病之后，更加照顾不到，而因此又须解释所以未写回信之故，自己真觉得有点苦痛。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此一节请谅解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九月八日

【评点】

叶紫是受到鲁迅热情培养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集《丰收》，即由鲁迅作序，并收入“奴隶丛书”中出版，在经济危急之时，也常求助于鲁迅，现在却因介入左翼作家内部的矛盾，受到鲁迅的冷遇，所以有此不大客气的回信。而鲁迅信中所说，因身体的关系，他已不能写那么多的信，不能处处周到地照顾到各方面，却也是实情。即使并无他意，青年作家对于年老体弱的鲁迅求之太多，亦非爱护之道也。不过，尽管鲁迅对叶紫已很有意见，但当他发生经济困难时，鲁迅仍伸出援手。这可以从10月6日致叶紫夫人汤咏兰的信中见出：“有钱五十元，放在书店里。今附上一笺，请持此笺，前去一取为荷。”

360915 致王冶秋

冶秋兄：

八月廿六日的信早收到，而且给我美丽的画片，非常感谢。记得两个月以前罢，曾经很简单的写了几句寄上，现看来信，好像并未收到。

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我的那篇文章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

珂勒惠支的画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装成，不久，便取尽，卖完

了,所以目前无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谋用铜版复制,年内当可出书,那时当寄上。

静农在夏间过沪回家,从此便无消息,兄知其近况否?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九月十五日

令夫人令郎均吉。

【评点】

“我的那篇文章”,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病中,由冯雪峰起草,鲁迅加以修改并添写了数页而成。看来是意犹未尽,鲁迅还有许多话要讲,所以说:“我病稍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但可惜未能如愿。这里所说的罗致青年,给自己造成地位;没有作品,以嗡嗡营营为能事;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文学界,等等,却也的确是乌烟瘴气之事,此弊不去,中国的文艺界如何能有希望呢?

36092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得《新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故宫博物馆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则五十幅一本，百本印价，不过二百五十元，再加纸费，总不至超出五百，向种种关系者募捐，当亦易集也。此事由兄发起为之，不知以为何如？

与革命历史有关之文字不多，则书简文稿册页，亦可收入，曾记有为兄作《汉郊祀歌》之篆书，以为绝妙也。倘进行，乞勿言由我提议，因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 飞 顿首 九月二十五日

【评点】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有名的革命家和学问家，鲁迅在 1908 年曾从他学习文字学，受他革命思想和学术思想之影响很深。1936 年 6 月章太炎逝世，时鲁迅自己亦在重病之中，但他仍在 10 月间写了两篇纪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未写完而逝。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应该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鲁迅建议同门集资影印章太炎狱中诗及在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所写“速死”篆书等革命文献。

361015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现实》中的论文，有些已较旧，有些是公谏学院中的人员所作，因此不免有学者架子，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你只懂十之六，我想，不看惯也是一个大原因。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并非入门书，所以看后还觉得不甚有把握，也并不是怪。

《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谏学院来办罢。上卷插图之误，改起来不好看，下卷有正误的。

有喜欢的书，而无钱买，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时常有此苦，虽然那时的书，每部也不过四五百文。你的朋友既爱此书，可说是《述林》的知己，还是送他罢，仍附上一條，乞便中往一取。

病还不肯离开我，所以信写得这样了，只好收束。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五夜。

【评点】

这是鲁迅在逝世之前四天所写之信。他自己虽在重病之中，而仍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以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赠送，并介绍其特点。“公谟学院”，即共产主义学院。看来，他对于学院派的文章是不大满意的，因其“不免有学者架子”，而且难懂；而对“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则更加反感。

361015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惫或忙，遂稽答复。夏间本拟避暑，而病不脱体，未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荏苒已至晚秋，倘一止药，仍忽发热，盖胃强则肺病已愈，今胃亦弱，故致纠缠，然纠缠而已，于性命当无伤也。近仍在就医，要而论之，终较夏间差胜矣。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今年由数人集资印亡友遗著，以为纪念，已成上卷，日内当托书店寄上，至希察收，其下卷已校毕，年内当可装成耳。专此布达，并颂时绥。

树 顿首 十月十五夜。

【评点】

鲁迅在 1936 年所写的文章，有些是直接回答对方的挑战的，

有些则在谈别的事情时，随手刺之，总之，这一年的大部分文章都与此有关，可见鲁迅对这场斗争的重视。鲁迅并不把它仅仅看作文学口号之争，也不认为它是个人间事，而是觉得对方之所为，“实于人心有害”，故需要加以揭露。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1936 年的论争，才能看出它的意义来。可惜鲁迅早死，次年又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场论争也就不了了之，而“实于人心有害”之事，也就一直未能清除。这决非文艺界之幸事。

361018_(日) 致内山完造

[译 文]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

顿首

L 拜 十月十八日

【评点】

这是鲁迅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鲁迅的绝笔。

因为日本作家鹿地亘在翻译鲁迅的杂感选集，有些疑问，需要鲁迅帮助，17日下午鲁迅往访鹿地亘，并往内山书店。晚，三弟周建人来，谈至11时。周建人走后，鲁迅在躺椅上抽烟休息，至1时上床，2时即睡不好，3时半起来，气喘又发，继以咳呛。6时半支撑着写了此信，然须藤医生并没有医好他，终于在19日晨5时25分逝世。

后 记

鲁迅勤于作札，一生所写，数量甚多，有时一天就有几封。但生前发表很少，所发表者，除为收信人所刊之外，大抵本来就是以通信形式写的杂文，如《华盖集》中的《通讯》、《北京通信》，《华盖集续编》中的《上海通信》、《厦门通信》、《海上通信》，《而已集》中的《答有恒先生》，《三闲集》中的《文艺与革命》、《通信》、《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中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关于翻译的通信》，以及《且介亭杂文末篇》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只有《两地书》，是鲁迅自己结集，公开出版的私人通信。

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在 1937 年 6 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影印本《鲁迅书简》，收 69 封书信；1938 年出版的 20 卷本《鲁迅全集》没有收鲁迅书信，直到 1946 年 10 月，才由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书简》排印本，收 855 封书信和断片 3 则；1952 年 1 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鲁迅书简补遗》（致日人部分），收 88 封，吴元坎翻译；1956—1958 年出版的 10 卷本《鲁迅全集》，最后两卷是《两地书》和《书信》，但所收书信却少了许多，《第九卷说明》中说：“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 1946 年排印本所收 855 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 310 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 334 封。”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为了删去指摘周扬等人的重要信件，因为书

信卷的出版,时值“反右运动”之后,周扬正指挥着胜利大军,挥戈前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鲁迅的地位又不可动摇,于是不利于自己的书信,就非删落不可了。

但鲁迅书信的收集工作,则一直没有停止过,到得“文化大革命”前夕,鲁迅书信手稿已收集到 1 054 封,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因这些手稿的“遗失”和寻找,而酿成一起震撼全国的大案。1968 年 1 月,炙手可热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被捕,许广平因担心被戚本禹调走的四箱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而心脏病发作,于 3 月 3 日不幸逝世。周恩来知道情况后,责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杨成武则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查办。傅崇碧在提审戚本禹时得知,这四箱鲁迅书信手稿是江青命他去取的,后查知,就存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中。但当傅崇碧带人经江青同意,向保管员取出书信手稿后,却被江青说成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于是酿成震撼全国的“杨余傅事件”。杨是杨成武,傅是傅崇碧,余则是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这三位手握兵权的重要人物被打倒,对全国局势影响甚大。这是江青与林彪联手搞的阴谋,与鲁迅书信的内容无关,但因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而引发,却不能不在此一提。

后经周海婴上书毛泽东,这才有 1976 年 8 月《鲁迅书信集》的出版,此书有上下两卷,共收 1 381 封信,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 96 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是 1981 年的 16 卷本《鲁迅全集》,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三卷是《两地书》和《书信》,共收书信 1 455 封,包括致外国人士 122 封,此外另有附录 12 件,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

本书即据 16 卷本《鲁迅全集》的书信卷,从中选出我认为较重要者,加以评点。只有一封 1920 年 1 月 15 日致胡适信,是 16 卷本《鲁迅全集》未及收入的新发现信件。书信编排,以年代为序,致国外人士的信,不另单列,亦按时间的序列插入,编号方式和某些

特殊符号,则从《全集》本。如:

编号: 041008,即 1904 年 10 月 8 日;361018,即 1936 年 10 月 18 日。这比直接在目录上标明日期要简便些。

原件补遗及夹注式的字句,用小一号字排;原件误字、漏字,用 [] 号,排仿宋体;衍字, [] 号,不变字体;存疑,用 [?] 号。

而评点中摘引的《两地书》原信,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的《两地书真迹》影印本。

2001 年除夕,记于沪上木石斋

2002 年 4 月 4 日增补